



— 西
— 哈
— 努
— 克
— 忆
— 录

Kihanuke HuiyiL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K811

西哈努克回忆录

——甜蜜与辛酸的回忆

晨光 等译



126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哈尔滨

译者的话

——《甜蜜与辛酸的回忆》是现任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用法文写的一部重要的回忆录，1981年在巴黎出版。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曾任柬埔寨国王、国家元首，是一位著名爱国的民族主义者。正如本回忆录书名一样，他的经历充满着“甜蜜”和“辛酸”。保护国时期，他被法国殖民主义者扶上了王位，后来感到被控制之苦，曾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奔波。独立时期，作为执政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的领袖和国家元首，他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使柬埔寨成为东南亚的“和平绿洲”。自1970年3月美国策动朗诺、施里玛达叛国集团发动反动政变之后，他虽因被废黜而感到“辛酸”，但也领略到了同全国人民共同战斗并取得胜利的“甜蜜”。为了民族生存，他两度同柬埔寨左派力量合作：1970—1975年，为了反对美国侵略和美国扶植起来的朗诺卖国政权的反动统治，他出任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为1975年全国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被誉为“伟大的爱国者”。1979年以来，为反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

的侵略和河内当局扶植起来的韩桑林傀儡政权，亲自组织了一支抗越武装力量，同时还同其他两派爱国力量组成三方联合政府，并出任民主柬埔寨主席，正积极为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民主自由和不结盟的柬埔寨而努力奋斗。

西哈努克亲王通过这本回忆录，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自己在1970年3月以前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讲述了柬埔寨的概况和半个世纪以来在柬埔寨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他所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以及他为维护这一政策而同国内外敌人所进行的斗争，更是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正如让·巴雷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在本书里，西哈努克自我解剖得淋漓尽致”，这不仅对我们了解西哈努克亲王本人，同时对我们了解柬埔寨的历史变迁以及几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

我们把这本回忆录全本译出，并推荐给中国读者。在本书后面我们附上书中主要人物、地名一览表和一些名词解释，也许对大家阅读本书时多少有一些帮助。但是，由于我们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有限，译文和附录一定会有不少错误，恳切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晨 光 李 文
常 勇 明 远
一九八七年五月

目 录

- 序 1
- 1 西哈努克亲王何许人也 16
- 2 我的星相 23
- 3 子民和我 29
- 4 一生中最愉快的年代 35
- 5 父子都成了西贡人 43
- 6 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54
- 7 我继位之初和我的初恋 63
- 8 西索瓦·莫尼旺国王陛下的葬礼 72
- 9 我的加冕和不幸的开始 76
- 10 反对法国的山玉成集团 80
- 11 我的艳事和爱情 85
- 12 挽救计划和对印度支那的访问 93
- 13 日本占领下的柬埔寨 103
- 14 健康的灵魂存在于健康的体魄之中 108
- 15 一九四五年三·九事变和山玉成的归来 111
- 16 山玉成的政变和他可悲的下场 119
- 17 我们要独立 129
- 18 真诚的谅解 138
- 19 我发现了世界 147

20	亲王之间的滑稽争斗	151
21	和尚国王	160
22	归还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	164
23	重返巴黎	168
24	金边的危机	177
25	取得独立以后的辩论	183
26	要求释放山玉成	190
27	解散“民主党”的议会	195
28	强烈的爱情和最大的悲伤	199
29	王家独立十字军	203
30	既不是暴君也不是花花公子	209
31	继续进行我的“十字军东征”	213
32	胜利返回金边	220
33	反对越盟	231
34	放弃王位	244
35	万隆的回忆	251
36	建设国家	256
37	对世界的访问	259
38	倾听民众意见	273
39	自由世界在柬埔寨破产	278
40	当选国家元首	290
41	佛教社会主义	295
42	从贝尔格莱德到联合国和“熊”窝	307
43	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313
44	我为什么与美国分道扬镳	317

45	吞并高棉领土的敌人	344
46	世界各国要人对柬埔寨的访问	350
47	戴高乐将军与他的“金边演说”	359
48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九年的国家建设总结	366
49	我的电影	382
50	我为何支援越南的革命者	394
51	对美国俘虏的人道主义活动	410
52	向法国等外国朋友表示敬意	416
53	在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的日子里	422
54	我是怎么被废黜的	429
	书中主要人物一览表	438
	书中地名一览表	468
	书中名词解释	487

序

这本回忆录写到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为止。这一天，和平与宽容的、可以幸福生活的柬埔寨已经变成了地狱。就在这一天里，一小撮权欲熏心和唯利是图的文臣武将，在某些外国“机构”的支持下，经过长时间的谋划，迫使被军队包围的高棉议会宣布废黜国家元首——正在法国治病的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被罢黜了，然而在大家看来，西哈努克是一心为民族利益的、具有治国经验的、颇得人民群众信任和外国同情的唯一的柬埔寨传奇式人物。

传奇很快变成了悲剧。多少年来，亲王运用有限的财政手段和很少的军队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发展自己的国家、同时也为捍卫自己的国家免受邻近和远方国家的侵略而进行斗争。亲王还通过外交活动（这是他唯一能做到的），尽可能避免印度支那半岛其他地方的战火蔓延到柬埔寨。亲王成功地建立起来的平衡毫无疑问是脆弱的，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对于柬埔寨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

三月十八日的“政变分子”很象瓷器店里的大象。他们鼓

动人民中的某些阶层，特别是青年人起来反对“传统的敌人”——越南，并企图用恐吓的手段，把为了反对西贡亲美制度而渗透到柬埔寨一些边境地区来的越南武装力量赶出柬埔寨国土。

认为通过威胁就可以实现西哈努克亲王长期从事外交活动都没有实现的事情，这是很幼稚的，甚至是无知的想法。高棉国家元首曾经容忍越南人驻在高棉，而没有把他们赶走。但在西哈努克被排挤掉前几天，那些越南人对施里玛达亲王——王国首相的代表轻率地下了要他们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离开高棉土地”的最后通牒，并没有给予理会。当西哈努克亲王被废黜后，由于高棉部队不喜欢越南人，而那些越南人也不希望招来高棉部队对他们的敌对情绪，便干脆把高棉部队挤向西面的金边方向。众所周知，后来……。

在大家将要读到的章节中，作为国王，后又为国家元首的西哈努克亲王叙述了他同那些内外勾结，企图丢弃和取消柬埔寨独立的国内外势力所进行的斗争。

在这场由一位爱国的、聪明的、富于感情的、善于进行政治、外交斗争的和忠于朋友的年轻人，为了碰运气而孤身进行的斗争中，有不少动人的故事。但这位年轻人，既不能容忍批评，也不甘受屈辱，时而过份多疑，时而又过份自信。

在这本书里，西哈努克自我解剖得淋漓尽致。他从不掩饰自己的错误和过失，但当自认为有道理的时候，他一定寸步不让。他认为自己没有做过任何愧心之事，也未有过任何在他自己看来是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据我所知，当一个人

了解了西哈努克亲王在非常困难的年代里进行斗争的全部情况时（这本书对这种了解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对历史给予的评价就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

亲王经常碰到的障碍是：人们对他这位被称之为“杰出人物”的人不理解。自从亲王开始执政那一年起，权术家们（从整体上说）就与他水火不相容。这些权术家们分成了自相残杀的若干家族集团，只是为了反对西哈努克才联合起来。他们的关系盘根错节，却不知道西哈努克的败落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也衰落。他们一直在折磨西哈努克，并声称只有他们这些人才有可能实行民主，才有资格代表人民。而这些人又多次煞费苦心地告诫（西哈努克）亲王，说他所建立的所谓议会民主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和需要，但他们的这些努力都是在费心机的。

西哈努克从来就不是“独裁者”，而是一位既开明而又威严的君主。他非常接近群众，并同群众一起反对某些“大国”。他遵循高棉历届国王的传统，依靠子民们去反对文臣武将们的奢望和放纵。

由于西哈努克对知识分子的学习和进入社会非常支持，因此，除个别情况外，知识分子对西哈努克是非常宽容的。这些人炫耀自己的法国或高棉文凭，而认为西哈努克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学毕业生，至多是一个自学成材的，根本就没有资格领导这样一个业士、学士、博士等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的国家。

具有讽刺性的是，一开始就同这些有“高等学校文凭”的人为伍反对西哈努克亲王的竟是一些大学和中学毕业班的学

生。这些自称是“民主派”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追求大小官位，即便不是看不起组成高棉社会牢固基础的农民阶级（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就是这个阶级出身的），至少也认为比农民阶级高明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亲王在他的整个回忆录里讲述平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对他来说，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精神上，都似乎有些平庸。但是，亲王却以一种掩饰不住的感情，叙述了他和“子民”之间那种水乳交融的情感。这是毫不奇怪的。亲王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献给他的“子民”们，以答谢这些普通百姓对他的忠诚。但愿高棉人民将来能够自由选择社会制度。人们也将发现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仍在怀念“国父亲王”，就象他们过去经常称呼他那样。但是，这些高棉人将来是否都能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呢？

要很好地理解西哈努克亲王回忆录，并没有什么复杂的秘诀，只要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回忆录的作者既是一位亚洲的佛教徒，又是一位过去的高棉国王。

对于佛教的哲学、佛教的戒律和佛教的逻辑，亲王已经解释得很清楚，根本没有必要再借题发挥了。这些同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原则相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对于长期生存在柬埔寨的人来说，精通佛陀的教导却一点都不困难。这是由于佛陀的教导源源不断地传到世界的这块地方，然而这块地方也没有因此而弃绝与佛陀教导并无相悖的耶稣教导，相反却保留许多相似的内容。以西哈努克为例吧，正象读者在正文中看到的那样，他既不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信徒，也不是笛

卡尔主义者，他却接受了乔治·布拉克的说法，即“一个人随时都应该有两个想法，经常以一个想法去反对另一个想法。”西哈努克是一个想象丰富的人，一个怀疑各种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者，一个不断使自己适应各种情况的人，一个谨慎行事的人，一个毫不犹豫放弃某些失败的计划又立即去构思新的计划的人，因此人们经常说他是一个“琢磨不透的反复无常的王子”。西哈努克也有几条始终坚持的原则，例如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他来说是有口皆碑的。但是，对西哈努克来说，保护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的道路却没有任何先天的知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能够诚心诚意地同上帝结盟，也可以同魔鬼结盟。

我没有想到，已近花甲之年并且经受了这么多折磨的西哈努克亲王，依然还有个人的抱负。如果他想重新充当称之“变好”了的红色高棉政权的国家元首的话，只要他答应同意某些人和类似过去“民主柬埔寨”的迫切和不断的请求就可以了。

但他的人民蒙受的苦难又使他烦乱不安：去年我在平壤和北京看见他和他夫人莫尼克王妃昼夜收听美国之音、澳大利亚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这些新闻使他了解到他的同胞们所受的苦难。

对于他的同胞们来说，他曾经是，现在依然是他们的国王，当然是一位被赶下台的国王，一位没有权力的国王，一位灰心丧气的国王。但不管怎么说，农民们认为他是一位有着非凡的气质、神奇的能力、可力挽狂澜的君主，是他们的保护人和大救星。

西哈努克亲王在一九五五年放弃了王位，但他周围的人一直都称他为“陛下”。从他内心讲，似乎也有点相信，他的国家的平民百姓认为他就是吴哥王朝的继承人。

一位高棉国王要一直在位直到他的逝世。在本书中，大家可以读到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的遗体奇特的历险记。莫尼旺陛下晏驾于滨海的贡布省波哥山上他的别墅里，但一直等到他的遗体秘密运回他在金边的金銮殿之后，才公开宣布了他驾崩的消息。对于一个高棉国王来说，如果不是面对着敌人战死在疆场上，他是无权死在别的地方的。

一个国王既享有诸多的权利，也有不少应尽的义务。但他应尽的义务比享有的权利多得多。在西哈努克登上王位的最初几年中，他有过不少风流韵事。而在这些艳事当中，有些就是在和他血缘关系很亲近的公主们中间发生的。然而，他以一位高棉君主在这方面即有的传统为理由，对这些风流韵事作了坦率的解释。

不仅于此，他还对自己的情人造了一份饶有风趣的一览表。就连同亲骨肉——他的祖先，特别是他父亲的艳史，他也作了介绍。他的父亲堪称“行家”，成天沉浸在女色之中。特别是最后几年，他被一位野心勃勃的妃子缠住了。在西哈努克年轻的时候，他曾喜欢过许多漂亮的女子，而这些女人，也给他生了许多孩子（在这些子女中，一个心爱的姑娘甘塔·帕花公主由于白血病而去世，这是西哈努克在本书中非常动心和非常害羞的几页）。但是，当西哈努克到了三十岁的时候，由于获得了他一生中最喜欢的女子——莫尼克王妃以后，他很快变得规矩起来了。他与莫尼克同甘苦共患难，至

今他们一直是一对感情很深的伴侣。西哈努克在谈到他的一生时曾幽默地说，他曾同十九位不同出身和肤色的女士和小姐们有过交往。一个国王，特别是在柬埔寨，一个国王虽然没有私生活，但是他的“罗曼史”是人人皆知的。那些总是掩盖自己放荡行为的资产阶级分子，经常指责西哈努克“沉溺于酒色”；而那些身体健壮的，也可以说是粗俗的“子民们”却相反，他们怀有同情心，认为一位亲王应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庶民百姓对西哈努克的选择，又一次说明了众望所归。

但对西哈努克来说，从来也没有把爱情摆在国务活动之上，也没有影响他的个人爱好——音乐、马术、电影和美食。大家知道亲王喜欢喝酒，也非常了解法国的各种名酒。当他在闲暇时，他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些名酒，并经常以亲自下厨房做几道法国大菜招待他的朋友们为乐事。与其说西哈努克是个美食家，倒不如说他是个很讲究吃的人（如果饭菜做得很好，他的胃口是很大的）。同时，西哈努克也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自己也承认）。但在他的金边桑园官邸，他经常在半夜三更把我召去交待工作，我曾不止一次地看见他仅仅从首都一家中国餐馆买来的汤和一、两块巧克力作为夜宵。

我看他拍的电影，都看的是私人专场，首先看看工作样片，然后再看剪接好的，最后才看配上了音的。和他作曲一样，这也是他在越来越充满忧愁的一生中的一种消遣。他既是制片人，又是导演，电影对白的编写者和主要演员（同他既漂亮又上相的夫人配合），因此，他是他的作品中的雅克师傅。在某些西方人看来，亲王有时表现出“合礼仪的谈吐举止”，但有时亲王演的电影却被讽刺，说在这些电影里亲王好象是

一位“蹩脚的电影演员”。很奇怪的是，对西哈努克的影片，电影评论家们承认这些影片也有许多不可忽视的优点，例如：合理的选择外景和布景（吴哥窟、波哥山、基里隆高原、南方海滨的沙滩）；高质量的摄影；动人的音乐（作曲人就是亲王）；迷人的古典舞蹈和民间舞蹈等。实际上，外交官和记者们对影片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亲王在影片中谈论一些政治内容，而这些是使曾多次企图“搞乱”柬埔寨的美国及其盟友泰国和南越感到不高兴。相反，那些超政治的和纯艺术的影片，却格外受到西方观察家的欢迎。应该承认，如果说西哈努克在他拍的每一部片子中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的话，那么真正的明星并不是他本人，而是有着令人赞叹的古迹和美丽的风景，有着几千年文化和传统、有着勇敢和给人以好感的人民的柬埔寨。这难道是宣传吗？我只希望每一个宣传家只要有把他自己国家最好的东西介绍出来的雄心壮志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介绍那些令人担心的意识形态……。

这也就是说，西哈努克为他的国家做了他之前和之后所有高棉国务活动家都未曾做过的事。西哈努克用了全部精力在他的同伴中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全国性同盟，因为他正确地断定，唯有这个同盟才可能拯救被它的邻国及其盟友一直覬覦的祖国。大家有理由说，这个同盟遭到破坏，乃至土崩瓦解，并不是西哈努克的过错，而是由于各种倾向的政客们为了争夺权力而不断地拆台……。

从一九五五年一月（即刚独立一年多）到一九六九年八月（即朗诺及其集团篡夺了政府领导权）期间，在亲王的推动和

他的人民的协助下，柬埔寨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西哈努克对此感到很自豪，所以在回忆录里列举了不少关于他所完成的事业中的很有说服力的统计数字。有时人们指责亲王在计算中，加上了那些工业企业的数字。在法国，有许多中小型企业，也和柬埔寨一样，把一大批只雇佣十几名工人和职员的小厂也统计进去了。在我们国家来说，这一点也不会引起反感。而在柬埔寨，却有人认为是“虚张声势”……。

实际的情况是，西哈努克当政时期，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各种学校、各级医疗机构和各类体育设施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仅在王国的粮仓——马德望省可以生产水稻的辽阔平原上）用人工和很少机械新修起来的堤坝和水库，可以很好地控制水利，并可以得到好的收成；外国旅游者的数目从一九五五年的五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九年的五万人。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我在《费加罗报》上推荐弗朗索瓦·尼沃隆写的关于今天的柬埔寨的报道时，我作了简短而公正的评价：“一九七〇年初，柬埔寨已是一个繁荣的国家，收支平衡。一九六九年的收成很好，又多出口四十万吨大米。磅逊（当时的西哈努克城——编者注）的炼油厂正式投产，磅逊和金边之间的铁路已通车。全国公路网四通八达，又修建了喷气式飞机场和新饭店，因此旅游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如果还需要再多讲一点的话，那就是，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军事政变以前，高棉人民生活在和平和安定之中，每个人都可得到温饱。他们都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受到了应有的教育，参加了每个村庄和庙宇所举办的娱乐活动。当然，

12345 12345 12345 12345 12345

54321

柬埔寨还不能说是人间天堂，但遗憾的是这种生活已经结束十年了。

从一九四五年起，我一直住在越南，由于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头子”朗斯德尔上校难以抵制的压力，我才于一九五五年彻底离开了越南。当然，这位上校已经记不起我了。从一九五〇年以后，我经常离开交通混乱和政治紧张的西贡，重新回到安宁的柬埔寨，回到郁郁葱葱的高棉首都和没有污染的高棉海滩，重新见到高棉人坦率和可爱的微笑，和许多在这个国家生活过的人一样，我很快就喜欢了这个国家。我只希望将来能出现这样一个奇迹，即有机会再度来到这个国家。

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当时二十九岁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在他的王宫里第一次接见我——那时的巴黎一家日报记者。西哈努克中等身材，态度庄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丰富的面部表情，他的聪明才智和极强的理解力。他不仅对本国问题有深刻的了解，而且对印度支那其它国家的问题和法国总的政策也非常清楚。他同我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非常坦率和非常友好的谈话。从那时起，我首先对他非常尊敬，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的敬佩和友情与日俱增，从未中断。

至于法国，我可以肯定说，无论诺罗敦·西哈努克是国王或是国家元首还是个流亡者，她始终把他个人视为诚挚和忠实的朋友。有时，西哈努克也确实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朋友。

在印度支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西哈努克从法国手里争得了柬埔寨的独立，同样，他匆忙地承认流亡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这些使他在巴黎赢得了不少朋友，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对法国的挑战或冒犯。尽管西哈努克没有“院外活动集团”，但他在法国还是有许多同情者，特别是曾在印度支那工作过的那些“老前辈”和他在索米尔学习时所结识的军官们。西哈努克非常敬佩的戴高乐将军于一九六六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是这位第一个不滥用友谊的法国人在执政期间给西哈努克带来的友好和强有力的支持。西哈努克非常高兴地在柬埔寨隆重地接待了他。戴高乐和亲王一样，都是独立自主的、多疑的但不因循守旧的爱国者。西哈努克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戴高乐在一九六九年不去世的话，这位将军一定会把反对他的阴谋告诉他，而当时的法国当局是了解这些阴谋的，但却保持沉默。

不管如何，只要西哈努克执政，他就不会掩饰他对法国的那种偏爱的感情。由于美国在柬埔寨的笨拙表演，使西哈努克断绝了同它的来往。因此，他在政治上首先依靠中国，以便抵制自由世界（这主要指的是以阮文绍为首的南越和始终怀着敌意的泰国）给他造成的困难。因此，巴黎的支持与理解，倒是他的微妙的平衡外交政策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柬埔寨的法国人，大概都可以证明他们在柬埔寨从来都没有被当作外国人来看待。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同高棉人一起生活得很融洽，他们在一起劳动，一起旅行，一起娱乐。种族主义以及同它有着不可避免的自然联系的反种族主义，在这里并不为人所知。如果说反对派的某些“知识分子”有时

也提出法国“新殖民主义”(大家都不太相信),但他们既得不到群众的响应,也得不到领导阶层的支持。

在整篇回忆录中,亲王对法国的友谊都已充分表达出来了。西哈努克公正地评价了对王国有好处的保护制,公正地评价了王国取得独立之前代表我国驻在柬埔寨的高级驻扎官、共和国专员和高级将领。西哈努克至今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保持着极好的关系,对这一切他也从不掩饰。

在这本回忆录里,亲王以一些友好而热情的词句向他在印度支那或在法国结识的大部分法国知名人士致敬。在这个非常不完全的名单中,各种社会出身的法国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外国朋友”。其中有他在小学和中学的同窗以及他的老师,有他的副官和顾问、他的骑术教官、他的女管家、他在索米尔军校的同学和教员、他的医生,有负责他的安全的警察署长或巡视员,有直到亲王被废黜之后才辞去工作的柬埔寨驻巴黎使馆司机和门房。西哈努克向所有热爱他的人表示的敬意,使他的形象更加光彩,这也可以说明在他那艰苦的年代里,为什么他的大部分朋友仍然忠实于他之缘由。

正象这本回忆录的作者一样,这本回忆录是很感动人的。这不是一本文学著作,而是一部不仅感人而且生动的故事,其中许多主要章节叙述了完全非同寻常的人生。亲王很喜欢为报纸写一些文章或专论,但当报纸触及到他的政策和他的人格时,他甚至喜欢同新闻界进行笔战(现在已经停止了)。据我看,这本回忆录更象新闻体,而不象传记体。

这也不是一部历史著作，但研究人员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许多从未发表过的、非常宝贵的资料和看到亲王对一些他所见到的外国知名人士的尖刻评价。对于研究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七〇年这一段的柬埔寨和亚洲历史的人或研究法国在这个地区推行殖民政策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著作。

这也不是一部关于高棉政治的论著。亲王的意图是叙述他一生中的几个主要片断，而不想深刻分析他所遇到的问题与事件。但由于亲王喜欢解释和澄清他所提到的情况，因此有时对某些方面也作了一些说明。

这本回忆录的作者是一位非常独立自主的人。由于他从占据国家最高职位到后来被迫流亡，曾先后受到过爱戴、奉承、赞扬、讥笑、控告甚至被出卖（但还没有受到过极大的侮辱），因此他也能讲出他的想法，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他表达了对某些人的友谊，也表达对一些人的恶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去喜欢“大叫大嚷”的亲王，现在开始有些平静，也比较宽容了。但他还没有达到，也绝不会达到在别人打他的右脸时，他又把左脸伸过去的地步。在他的人民遭到了不幸以及他自己蒙受灾难以后，现在人们觉得他再也不愿意对一些人和事给予应有的重视。当回顾他的过去时，他经常以幽默、有时以笑话来减轻他那些人们并不了解痛苦。但是，他也因此同我们更亲近了。

一些西方读者可能还不知道，为了详细叙述他一生中最初的二十年，亲王并没有参考文件，而只凭他那惊人的记忆。他自己也承认，他可以很清楚地回忆起在青年和壮年时对他有深刻印象的人和事；在读了有关他的童年、上学、初恋

的章节中那些充满着故事性的、有趣的甚至带有色情的情节以后，读者们就可以察觉到这一点了。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当我们和亲王交谈时，他不会忘记重要的情节。例如，他有时很肯定地提醒我，我曾同他说过什么话，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我曾写过什么文章，甚至还提出早已被人所遗忘了的事情。

这本几乎是写实的回忆录有不少的优点：没有疏漏之处，有的地方还是宽大为怀的……。

这是一部既容易读又很有意思的著作，它使人们了解一个非常古怪的人物，而且是一个在亚洲并不太闻名的人物，尽管最近几年许多书籍和文章都在写柬埔寨及其前国家元首。

不言而喻，这部回忆录首先是写给那些高棉、老挝和越南的侨民与难民的。当他们在作者——过去时代的主要见证人之一的笔下，看到过去的柬埔寨和印度支那重现时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当然，这部回忆录也是写给那些一九七〇年以前曾在高棉这个国家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法国人和西方人的。它将唤起这些为数不少的人的记忆，也为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这部著作也会使那些喜欢爱情和惊险小说以及想了解当今世界上一些大人物的私生活的人，感到非常有兴趣。

总的一句话，西哈努克绝不象他的一些对手所想象的那样，是什么“过时人物”。他被废黜已经十年有余，一些瑞士记

者说他是一个“重新活跃的亲王”，因为他很识时务。直到今天，他一点也没有失去他的机敏、他的好斗以及战斗之后立即恢复的特点。

亲王意识到他的人民当中（特别是民众阶级），大部分对他仍抱有信心。他也知道，他是当前唯一可以代表高棉民族和人民讲话的一位柬埔寨国务活动家。对此，在一些主要国家的首都，甚至在一些对亲王本人还有批评或保留的国家里，都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一天，那些柬埔寨悲剧的制造者们，根据国际舆论的强烈要求，并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利益，愿意接受谈判解决的原则的话，那么西哈努克的名字一定会成为高棉方面的代表。他绝不是第一位被阴谋赶下台，又经受了—一个或长或短的灾难之后又重新上台的国务活动家。

让·巴雷

1

西哈努克亲王何许人也

在动荡的一生中，我先后当过国王、首相、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反帝的侨民，最后成了一个流亡者。正象大家谈论的那样，我还要经常回答全世界的报社和电台提出的许多问题。我知道一个现代的国务活动家应该利用“第四个权利”——即宣传工具。它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各国政府也是颇有影响的。

在我“完全”管理我的国家的时候，正如有时人们所写的那样，在某些记者的笔下，我经常碰到一些多少有点意思的关于我本人、我的政策以及我的国家的不断重复的陈词滥调。我要用许多时间反驳某些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或不怀好意的批评或谎言。有时候，我非常反对有些人提出许多相同的问题，甚至十几个人连续用同样的言语来提出问题，而新闻界或他们控制的报纸也不止一次地重复我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

在我接近六十岁的时候，特别是在我的人民和我本人经受了如此大的考验之后，我开始从另一方面看问题，也就是

更清醒地看待这些问题了。有时我对这些记者们大发雷霆(我是改不了的)，但对记者们来说，他们只是出于职业的需要，而大部分记者干得还是不错的。他们写的文章或他们通讯社的电讯，不管是对西哈努克还是对他的“派系”讲好话还是讲坏话，总是在使世界了解柬埔寨的问题上起了应有的作用。老实讲，过去经常被我为不公正的西方新闻界，今天却为柬埔寨做了一件不可估量的事情，这就是把柬埔寨的悲剧作为头条新闻，用高棉难民的悲惨命运和经受着史无前例的屠杀与种族灭绝危险的我国人民那难以表达的痛苦，感动着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善良人们。各国政府不能无视报界提供的新闻。这样，报界就完成了一项既有人道主义又富有政治意义的使命，对此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由于我酷爱体育，过去我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希望事先知道记者们将向我提出的问题。因此，在新闻界中我就有了这样一个“什么问题都能回答”的名声。一般来说，我能够很巧妙地摆脱某些记者企图使我落入的圈套。然而，有一次我却遇到了难题，那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纽约，尽管苏联投了反对票，我还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谴责了(尽管这种谴责是无效的)越南是军事入侵我国的罪魁祸首。正当我回味着开始自由时刻的时候，一位漂亮的美国女记者走到我面前，我们在一起长时间地交谈了有关我国和我亲属的情况，她向我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棘手的问题：您的生活的确是迷人的。但实际上，亲王，您是何许人也？

我是何许人也？由于我对自己的处境也是不甚了了，所以我感到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不少论著和书刊都在写我。每一本论著或每一本书刊，都从自己的角度来描写西哈努克或企图使人家可以看出我的人格的某些方面。这也就是从“外部来看”的西哈努克。有的对西哈努克高度评价，也有的对西哈努克进行贬低；有的爱慕西哈努克，也有的污辱西哈努克。亲王成了如此“争论”的中心，任何人对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可能为自己画出一幅公正的画像，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务活动家，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当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时候，也只能看到自己最漂亮的一个侧面，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在不能讲出自己全部面貌的时候，我试图尽可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如实地描绘出来。由于担心对自己作出一个在别人看来是妄自尊大的评价，我只好在这部著作中突出我的幸福与辛酸的回忆。鉴于我现在已不是正式官员，因此也不需要再去考虑我的高贵形象。在这个自尊心、名誉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希望有一点小小的幽默。

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纽约，我简直成了可怜的约伯，由于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和在我掌权的时候一反惯例，我既没有个人的财产，也没有从贿赂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这些贿赂却使某些所谓我的“信徒”们发了财。这些曾经多次拜倒在我面前甚至吻我脚的信徒们，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反对我的军事政变中，却无情地诽谤了我，并成了我的死敌。

我愿意和我夫人回到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的穆丹镇。在

那里我有一座小别墅，由于多年没有人住，还需要重新修理。但有不少高棉朋友告诉我，法国的生活费用昂贵。还有一些流亡在美国的高棉人——他们原来是朗诺的同情者，现在成了“西哈努克分子”——也请我们和他们一起到同情我们且很好客的“美国佬”那里去。他们还告诉我，在山姆大叔这里，大家可以生活得很舒适，比在法国的花销也少得多。但不管在这里或那里，有的地方生活费用高，有的地方生活费用低，而这些都超过了我们的财政许可，因为我的收入几乎等于零。再加上我从与红色高棉决裂以后，已老老实实地把他们给我的那笔能使我在纽约显得很“神气”的钱交给了红色高棉驻联合国代表团，我希望他们把这笔钱转交给我的中国朋友，因为这笔钱是来自他们的慷慨……。

为了挣点钱，为了象大家说的那样“养家糊口”，我找到了我的朋友威廉·阿特伍德，他曾是《看》杂志的编辑，现在是《每日新闻》的编辑，今后将成为大商贾和畅销书的作者。我对他说，我准备写一本主要涉及越南和柬埔寨纠纷的由来和起因的书。威廉让我和一家美国很有名的出版商联系。这位出版商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对我表示完全同情，但又毫不隐讳地表示，他对这样既无商业性质，又令人厌恶的争斗的内容不感兴趣。他以美国人的坦率对我说：“西哈努克亲王，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人想知道您是怎样一个人，您的一生简直是一部惊险小说，还是写点您本人的历史吧！这样您一定可以赚得很多钱。我保证帮助您出版这部书。我请求您不要在写同柬埔寨共产党人和越南共产党人斗争的文章上浪费时间了。我们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对这些东西已经讲得够多的

了。”

我非常固执，我仍继续写关于柬埔寨——越南冲突的书，我把稿子寄给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出版商，这些出版商均表示不满意。幸而一位著名的法国出版商答应出版这部书，我坚持出版这部书并答应以后把我的回忆录也交他出版。的确，在一九七九年名人回忆录销售很好。玛格丽特·特鲁多秘闻、巴黎公爵亨利秘闻、亨利夫人伊莎贝尔·戴·弗郎丝秘闻都成了书店的畅销书。但我既不是一颗富人明星、也不是“一千多年来统治法国的四十几名国王”的后裔，而是吴哥著名君主的后裔（一个无家可归、一文不名的后裔），怎么能同那些人相提并论呢？但是，由于某些事件和他对自己国家前途的现实主义看法，这位亚洲前“专制大君”、“红色亲王”或“粉红色亲王”已逐渐变成了“蓝色”，法国人和西方人还会欢迎他的回忆录吗？

在我开始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解除了我的物质忧虑，向我和我的亲属提供了非常慷慨和“阔绰”的接待，这使我很容易当上了自己“回忆录作者”的角色。

过去，我承认我很少公开谈及我的生活，特别很少叙述我的私生活。今天我感到我已经老了，也知道死神任何时候都会来临，我感到有责任把我知道的“受压抑”的人物——即我自己留给历史。

如果我不从事这个自我反省的工作，我也知道会有别人把它承担起来，而且我过去的一些法国同事已经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了。我从一些读者那里了解到，我是一个残暴的封

建主，即使是最好的比喻，也不过把我看成是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王子在亚洲的化身。这些王子在政府中毫无顾忌，大肆掠夺国库钱财，沉浸在肉体的享乐与酒宴之中，甚至对用匕首或毒药杀死政敌和情敌津津乐道。

从上述这点来看，有关我一生的叙述，肯定会吸引恐怖影片或色情影片的专家们。可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既不是凯撒大帝，也不是萨德侯爵，更不是一个国家财产的掠夺者。从一九七〇年以后，我之所以能成为幸存者，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交替地收容了我。

的确，我曾是一个专制国家的元首，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和埃及纳塞尔的混合体。但我决不能与乌干达的阿明·达达相比，也不能与赤道几内亚的马西亚斯·恩圭马相比，我只不过象某些法国右派报纸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离奇和不足挂齿的小小国王，这些报纸认为我只是一个黄色皮肤的“黑人国王”。

肯定，我不要求自己象佛祖释迦牟尼那样完美无缺。我更不是佛教徒的“撒旦”——魔罗的再生。我是一个凡人，有优点，也有缺点。正如《圣经·旧约》中《创世纪》所说的那样，我的德行不比上帝创造的那些兄弟们多，也不比他们少，但也应该接受前世的罪孽。

如果说惊人的遭遇和不幸之事充满了我与众不同的一生，也仅仅是由于命运无法预料的频繁变化而造成的，那就是一九四一年四月法国殖民当局要选举（在我们那里君主是选举产生的）柬埔寨国王，而完全出乎意料，一个年轻的中学生竟被选为国王，可这个中学生的唯一志向却是以后当一

名小小的法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员。

西哈努克何许人也？我冒昧地希望，不用作自我介绍，我的男女读者们在浏览了这部著作以后，通过他们的洞察力，将可以回答这位纽约女记者的问题。

2

我的星相

我 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金边时间十九时整，正是巴黎时间正午时刻。

我的母亲西索瓦·哥莎玛公主——当时的国王西索瓦·莫尼旺陛下之爱女——很讲究星相，而且对星相学坚信不疑。这也是亚洲大家庭里的一种习俗，当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都要给他占卜一下星相。在主张“破除迷信”而提倡怀疑论、唯理论等等的现代西方社会里，那些占星家、预言家、星相家和算命先生们，多数是为商业和企业研究星相的，许多顾客都前往他们那里寻求令人满意的启示和预言。我母亲则希望获得一切好运气，她求星相家为西哈努克这个小娃娃占卜了星相。

我的祖父诺罗敦·苏他罗亲王——著名的诺罗敦国王陛下（1859—1904）之子——巴利文专家，模仿着一位印度佛教传奇式的王子的名字，给我起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名字，叫做“西哈”（也可读成“星哈”或“新加”），按巴利文来解释是“狮子”的意思。就象“新加坡”那样，是“狮子之城”的意思（“新

加”意为狮子，“坡”是城市）。至少对我亲爱的祖父来说，“西哈努克”应该成为高棉的一位“狮心王理查”，这就引起了很多
人等待着我呱呱落地的哭声。

莫尼旺国王预言说：“诺罗敦·西哈努克将有一天占据着柬埔寨最高的职位（他没有说是王位，也许认为这个预言不一定能实现）。他的一生将是非凡的（就是说同一般人不一样），而且具有足以对付一切要毁灭他的（行政或政治方面的）敌人的意志。这个卦是会灵验的，他将能经受一切考验，渡过一切险境，战胜他的敌人。”

每当想起这些预言的时候，我就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宫廷星相家还真能大致看准了我的命运，至少到我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是这样的。我曾经有过许多国内外的敌人，他们都在促使我的毁灭。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很驰名的，有些则是令人畏惧的。而今，他们都从舞台上消失了，有的已经死去，有的则在政治上被淘汰了。即使不是我本人，那也是老天爷战胜了他们。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个相当棘手而且是我不能避而不谈的事情。

在柬埔寨王族中，表兄妹和堂兄妹之间，甚至同父异母兄妹之间，是可以互相婚配的，尽管这种近亲通婚有时会给下一代带来智力上或精神上的严重缺陷。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诺罗敦国王的孩子，是同父异母兄妹。我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则娶了他的侄女——诺罗敦国王的孙女。莫尼旺国王是西索瓦国王——诺罗敦国王的同父异母兄弟——之子。诺罗

敦和西索瓦都是安东国王的儿子，前者为兄，后者为弟。

摆出这份家谱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诺罗敦·西哈努克是安东国王人口众多的庞大家族中——有的称他为父亲，有的称他为祖父——那些同父异母兄妹之间、叔父和侄女之间、叔伯兄妹之间互相交配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生理学的法则，人们会担心西哈努克先生是不是一个退化物或者是一个疯子。

有那么一句（几乎是）历史性的语言，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是一九五三年，在他的法国朋友们不知不觉地要尽了政治和外交阴谋之后，年轻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向法国提出柬埔寨完全独立的要求获得了成功。同年十一月九日，法兰西联邦驻我国的部队司令长官巴隆·戴·朗格拉德将军在即将离去的时候，召集了一个法国军官会议，并发表了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的一些副手们听说把这个美丽的王国交给一个“疯子”君王而感到惋惜。朗格拉德将军当时说：“先生们，国王是个疯子，但他是一个天才的疯子。”

几年以后，一位美国外交官当我面不怀好意地提起了朗格拉德将军那句不寻常的话，我回答说：“我宁愿做一个‘天才的疯子’，也不做一个没有才华的‘庸人’”。因为如果仅仅是‘庸人’，不论他是高棉人，还是法国人，大概他不可能在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能为自己的国家争得独立。

我的启蒙教育

对幼年的西哈努克亲王的的教育，他的父母委托给他的曾

外祖母周坤·巴特夫人。她那时已是七十三岁，但手脚和眼睛都还很好。

资产阶级出身的巴特夫人嫁给诺罗敦国王众多的儿子中的一个儿子哈萨甘亲王。我的母亲哥莎玛公主(后来的王后)是哈萨甘亲王和巴特夫人外孙女。我的母亲是在巴特夫人抚养和教育下长大的，因为她的母亲很早就已过世。

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我的曾外祖母想把西哈努克这头“小狮子”培养成为柬埔寨未来的阿育王(印度皇帝，印度佛教的保护人)。从五岁起，当时还是个顽童的我，却要开始遵守佛教的五项戒条。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我执行了其中最容易做到的一条，即不撒谎，或称不妄语。但是，其它四条，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和不饮酒，也都压到我的这个娃娃的头顶上来了。然而，使我感到自我满足的是在斋日的时候，由一位和尚口授之后，我即能背诵这些信条，至于它们的含义是什么，我是不很理解的。

巴特老外婆去世时，已经八十多岁了。在为她举行葬礼的时候，我受命当了二十四小时的和尚，或称为“小僧人”。作为和尚，我必须戒忌晚餐，人们只给我送来了一些块糖，这就会使我心满意足了。我的曾外祖母被火化的第二天，我便脱去黄袈裟还俗了。

接着，我的父母又把我交给了祖父母。我的祖父诺罗敦·苏他罗亲王是一个文人，他试图让我对高棉文学发生兴趣，但我却热衷于同邻近的小孩子们踢足球。在柬埔寨，王族的孩子同平民百姓的孩子之间，就象后面有的章节谈到的那样，相处得很随便，并没有什么隔阂。

我在前面已说过，我的母亲——美丽的哥莎玛公主（直到晚年，她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是莫尼旺国王的爱女，因为我是他的爱女的独生子，所以我的外祖父对我特别宠爱。可惜的是，他经常被近六十个嫔妃缠住，（他自己感觉得到吗？）不能对我进行教育，但他对我显得非常宽容。我小小年纪就能组织起一个小剧团和一个小乐队，还资助了一个少年足球队（它的需求是很有限的）。

我在这个家庭里受到了艺术方面的熏陶，而且至今也没有把它抛弃。我爱好音乐是受父亲的影响，他是优秀的萨克斯管和笛子演奏员。父亲大概想在这个家族里，把我培养成小提琴手。但很可惜，我经常旷小提琴课，一心想成为一个象我父亲那样的萨克斯管演奏员。相反，我对笛子毫无兴趣，却被黑管迷住了。

我对戏剧的爱好，是我祖父苏他罗亲王熏陶出来的。倒霉的是，王室里以写佛教著作或以巴利文与梵文著书为自我安慰的达官贵人们为了消除疲劳，一到晚上都要带领全家人来看剧，就不可避免地要来看小西哈努克……。

我对电影的爱好的达到了着迷的程度，这完全是我父亲和母亲所造成的。他们虽然没有对我进行什么训练，但他们每星期六晚上都带我去看电影。我们最喜欢的明星是玛琳·黛瑞西和莫里斯·谢瓦利埃。

至于体育方面，象我前面说过那样，起初是同邻近的小孩，接着是同我们那一片的弗兰索瓦·博杜安小学校的同学，后来又同西贡沙士鲁·罗巴中学的同学一起练。这样，在较长的时间里，我成了足球、篮球、排球的爱好者，同时也练

过骑术。由于坚持了这些“爱好”，使我能够保持了身心的均衡发展，也因此使我能承担沉重的任务和坚持繁重的日常工作。

有些人不理解一个国家领导人也需要给自己留出一点消遣的时间，所以说或写道：“西哈努克是一个不称职的国家元首，但他是一个高棉音乐的好作曲家。”是不称职的国家元首吗？我的人民会对此作出评价，他们不认为我是不称职的，所以，从一九七〇年以来，他们大多数人都要求我回去工作。至于好作曲家嘛，我想，是不坏。使我非常激动的是，我听说流落国外的同胞们普遍地转录了我所写的歌曲，并在晚间共同来欣赏，借以回忆高棉人可以欢笑和歌唱的那个时期。

3

子民和我

在我讲到人民最低的阶层时使用了“子民”这个词。这时人们这样谴责我：有人说我有“王族的傲慢”，或者说我有“优越感”，有人说我有“父道主义”，而这些指责大大违背了大部分（在我看来这也是最有趣的）高棉人民的意志。是“傲慢”还是“优越感”呢？高棉的平民阶层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同时也懂得我为什么这样称呼他们。“父道主义”？我怀疑“主义”这两个字。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怀有一种象对自己子女一样的感情对待始终忠于高棉的百姓。我们历代国王都怀有这种感情。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一直依靠人民，同某些“大国”的野心和阴谋进行斗争。

我国的农民（人口越来越多）从内心接受我称他们为“我的孩子们”，而他们亲切地称我为“国王父亲”。我和真正勤劳、正直和忠诚的人民从政治上和感情上都很接近，而那些过去的大部分高棉政治家，现在却变成了阴谋家、堕落分子和被人看不起的人。这些人根据耶稣会创始人的说法，把所有不服从他们命令的人都处死或进行慢慢的折磨。

那些非常能够蛊惑人心的政客们满口是“人民”，他们以“人民”的名义讲话，以“人民”的名义行动，以“人民”的名义盗用公款，以“人民”的名义屠杀他人。对此我还能讲什么呢？似乎“人民”是属于他们的。由于我知道这一尊贵的名词正在被滥用而感到遗憾，所以我称那些真正的人民为“子民”。苏联用“老百姓”这个词来确指最普通的社会阶层，对此没有人找茬儿同苏联吵架。在我的嘴里，“子民”并非贬义，而是一个亲切称呼。我把追求特别待遇和权利的政客阶层同那些爱我而又从来没有从我处得到过金钱和荣誉的人区别开来。这些政客都非常会讨我的欢欣，以致他们自称为“里亚多搭兹”，而这个词如果译成法文就是“子民”。

由于这个有重要意义的说明已经见诸于文学作品，我愿意重申，“子民”亲眼看到了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自一八六三年法国对柬埔寨保护以后就已废除。如果说那个时代以前的先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真挚的热爱、保护和服务于他的臣民，然而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开明的专制政府”。

由于我拒绝让沙文主义思想（很奇怪的是有这种思想的人经常自称“左”派）来摆布历史，我只承认一八八四年诺罗敦国王与法兰西共和国高级代表签订的条约。虽然这个条约贬低了诺罗敦国王，使高棉国王成为法国当局的一个傀儡，但这个条约也有一个功劳，即使柬埔寨从封建社会中摆脱出来，从而成为一个具有模仿法国模式的，符合柬埔寨佛教国家特点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的现代化国家，柬埔寨的男人和女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农民得到他们所耕土地的

证书。与“红色高棉”政权所说的恰恰相反，关于农奴制和耕地占有制的封建制度已于一八八四年被废除了。

在弗郎索瓦·博杜安学校里，我和过去“农奴”的孩子们同坐一条凳子学习。我小的时候就和这些孩子一起劳动、一起玩耍。以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〇年我在西贡的沙士鲁·罗巴中学读书时，结识了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和女儿们以及高棉“封建主”的孩子们。在这些孩子们中间，我可以举出三朝首相秀先生的后代，直到一九七五年，秀家族一直是柬埔寨最资产阶级化和最贵族化的家族。如果秀首相的个别孩子们，如秀臣（以后成了波尔布特政权的卫生大臣）、秀木和秀蒲拉西等在波尔布特“政权”中成了真正的无产者、“贫苦农民”的儿子，那么，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很显然，由于我父母、我的祖父母既不是“民主派”，又不是蛊惑人心的人，所以他们并不鼓励我“到人民中间去”很好的了解他们。但他们知道王族对人民群众应尽的义务，而人民群众无论在朗诺“共和”时期或波尔布特共产主义时代，对王族的忠诚却始终不渝。这些制度的掌权者们对柬埔寨的君主制和西哈努克本人所不能原谅的就是“子民”与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社会联系，而任何荒谬的指责都摧毁不了这种联系。

我依然记得在二十年代，巴特老外婆经常接待男女农民的来访。这些农民自动的给她带来田地里生长最好的稻谷和其他农产品。这已经不是封建君主和奴仆之间的关系了，因为这些农民是他们土地的唯一主人，而我曾外祖母却不是地主。这是忠厚的人对一位他们非常了解的老妇人的一种朴素

的感情，这位老妇人也为他们做了不少事。同时这些农民也钦佩她对佛教的虔诚。当然 巴特夫人这样的人并不知道“不许剥削人”的原则。她也不知道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她更不会想到将会有一天在柬埔寨建立所谓“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她只知道忠于佛教的教义。

我很痛心地发现，一些柬埔寨人其社会地位越高，越不忠诚。而最贫困的高棉人，尽管他们并不晓得什么是“机会主义”，却认为不做随风转向的风向标才是高贵的。

一九七〇年，受恩于君主并宣誓忠于王权的朗诺发动政变以后，我的母亲——西索瓦·哥莎玛王后被用武力驱逐出王宫。从此王后被禁闭在一座很普通的别墅里。我的同胞只要胆敢到我可怜的母亲被软禁的地方去探视，他们就要受到那些“新共和派”的严厉惩罚。过去宫廷中“达官贵人”的夫人们，在我母亲显赫的时代都曾发誓效忠于她，而现在却都回避了，甚至一些夫人们，为了讨好当时的主子，还敢于在公众面前称我母亲是“老婆子”或“叛徒西哈努克之母”。但在这个时期，首都一些贫苦妇女却偷偷地募捐，把很少量的钱寄给她们称之为“王后”或“国母”的她。尽管有朗诺警察监视，靠近金边的一些省份的不少农民，仍定期给我母亲送来一包包的大米。我怎么能不爱这些人，而又鄙视这些人呢？曾外祖母巴特夫人和我一样爱这些曾为她做过好事的农民。

至于年轻的西哈努克，王后想让他熟悉身穿黄色袈裟（因为佛祖和他的弟子们穿着象黄土一样颜色的长到脚面的袈裟，从一个农村到另一个农村传经讲道）秃头的和尚。和尚们很熟悉去巴特夫人居住地方的路。这些和尚的确吃去了我

母亲个人微薄收入的一大部分。由于她想通过做的善事为来世积德，不但每天养活十几个和尚，还经常赠予他们一些用于宗教活动和生活上的小礼品，诸如大蜡烛、夹香用的筷子、肥皂、牙刷、牙膏、浴巾、本子、铅笔、蘸水笔杆以及一些其他东西。

在农民看来，外省出身最低贱的和尚，在“高棉共和国”时期是忠实于我的，而金边大寺庵里的那些大主持们，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五年却谴责我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同流合污”。他们支持朗诺，认为他是从天上下来拯救他们摆脱西哈努克的压迫和“红色魔鬼控制”的“将来佛”。

在七十年代，一个朗诺的谄媚者说，我和“子民”们接触后，就赶快回到房间里用酒精或香水洗手，还低声抱怨说：“呸！这些农民多么脏呀！”这个指责使我非常痛苦，因为实际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非常简单。在我的一生中，我喜欢我的农民。我去各省巡视的时候，许多小姐们和女士们，根据我们这里的习惯，都抢着用带着又长又尖的指甲的手来同我握手，我也把手伸向她们。由于她们很热情，我的手就象经过按摩一样，在无意之中被她们的指甲划破了。离开人群以后，我的手很疼，只好找护士涂上一些酒精或红汞，医治一下由于感情流露所造成的皮肤划伤。

我与人民的友好感情不是从我当权以后的年代开始的，这种友好感情可以追溯到我的少年时代。这种友情来自于我父母和我祖父母给我做出的榜样，难道莫尼旺国王不愿在菩萨省德罗边县自己的土地上与农民一起种稻吗？百分之九十的社会名流在职业上要靠我，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受教育方面

也要靠我，而在七十年代他们却抛弃了我。“子民”们却一直没有把我抛弃。一九七〇年三月和八月，金边附近几个省的农民，为支持我而勇敢地游行，遭到了朗诺军队的机枪扫射和大炮轰击。

这些男人和女人们与我之间的人道主义的联系，使我一直想留在柬埔寨。

4

一生中最快的年代

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不是儿童而成为一个青年了呢？我承认那是在公元一九三六年，即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提过这个问题，但一九三六年在我的一生中确是一个、也是有益的转折。

直到一九三六年，我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由于受到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宠爱，我从来没有丝毫烦恼。我充分享受了我幼年时代的欢乐，可能是因为我的星相之故，才使我以后成为一个享乐主义者加运动员。当我对我的幼年时代颇为留恋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一个非常沉着的孩子。就象刚才所讲的那样，除了文艺和体育活动外，我对于功课是不够刻苦钻研的，但上小学时却总是轻而易举地在每个学年结束时都获得了优良的成绩。

在我小学毕业后，我的父亲（未来的国王）苏拉马里特亲王认为我太热衷于课外活动（对电影无节制的酷爱，而且还有其它爱好），多多少少会影响我在中学的课业，因而他希望我能够严格地致力于学业，以便在一生中能够取得成功。

在我国，成为一名亲王，只不过是一个爵位，而不是一个地位。安东国王后裔的上百名亲王里，只有少数人有些个人的财富，而这些财富也是可怜的很。其他亲王则只能靠一些体面而报酬不高的职业维持生活，例如：军队里的中士或上士、警官、海关的职员、或商店的职员等（当然，我说的是一九七〇年之前，即柬埔寨还是一个王国时的情况）。

因此，我父亲决定让我在他曾经取得优异成绩的法国人办的沙士鲁·罗巴中学做寄宿生。我带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经常同我一起游戏的小伙伴。在他们看来，西哈努克并不是一个亲王，而是一个好伙伴。我母亲是个很精明的女人，她曾和我一起阅读三十年代那些对我童年很有魅力的连环画，她让我注意我同邻居小伙伴的关系，就象故事里讲的那样，我很象出身于大资产阶级的比科特，而那些同我一起游戏的小朋友，当然就象出身低贱的孩子们了。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那些小朋友的名字叫做朱洛特、欧内斯特和奥古斯特。我母亲对我说：“你不能再象你十岁时那样继续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了，因为你很快就成为青年人了。一个青年人，应该全力以赴地进行越来越艰苦的学习”。我对亲爱的妈妈说：“可是比科特在班上是最末一名，而我在班上总是第一啊”。我母亲对我的反应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呆了一会儿，她才用一种慎重的口气对我说：“你看到了吗？我的孩子，我们的国家是法国的保护国，只有非常精通法语的高棉人，才有可能在政府机关中找到肥缺。因此，不论如何，你也要进入拥有最佳法语教员的最好的学校，就是法国人办的沙士鲁·罗巴中学。”

当然我只能服从决定，但我也有些不高兴。在金边的弗朗索瓦·博杜安中学和西索瓦中学，我看到寄宿生的生活太可怜了，特别是伙食太差，真令我视为畏途。因为在我祖父母那里，或者在我父母那里，我已经习惯于美味佳肴。

我一生中爱好精美菜肴，是从我父亲那里学来的。尽管我平时不在父亲那里居住，但周末经常到父亲那里吃饭，我们不但很讲究饮食，而且也很会品尝好吃的东西。如果说我母亲很喜欢高棉菜，包括波拉霍（是一种卤鱼，味道很浓，有点呛鼻子），而我父亲却喜欢法式大菜。每个月我父亲都要花费很多钱购买鹅肝和其他精致的法式大菜，去“讨好”居住在我国首都或西贡、河内的漂亮而又容易亲近的高棉小姐或外国小姐（当然是背着我母亲干的）。当时担任印度支那政府理事会常务委员、柬埔寨国王陛下的大臣的苏拉马里特亲王，每年都有机会到越南的两个大城市（即西贡和河内）小住，因为这两个大城市都建有法国总督的官邸。在这样的大城市里，“花”是不少的，只要你愿意去“采摘”就可以弄到手。

我父亲的达尔波小轿车驶过窄小而铺满沥青的光滑公路，把我从金边接到西贡。这条路虽经岁月摧残，但依然如故，我缩在车子的一个角落里，感到自己象一只被带往屠宰场的羊羔。离开了父母和家庭的时候，我远没有料到，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所度过的，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和最富有教益的岁月。

乍一看西贡这所中学是令人厌恶的。在我看来，如果与附近豪华的印度支那总督府相比，这座用栅栏围着的殖民式

样的旧楼房，简直是一座监狱。金边的西索瓦中学有着充满阳光的大楼，还有宽阔的体育场和田径运动场，而沙士鲁·罗巴中学只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小小的休憩场所。这个凸凹不平的休憩场所，时常把穿着短裤的运动员的膝盖擦破。学校的宿舍、饭厅和盥洗室虽然洁净，但却昏暗而凄凉。然而正是在这个古老砖石结构的建筑物中，我体会到了法兰西印度支那式的集体生活。

毫无例外，这所学校的男女教员都很有能力，并把自己的职业看得非常神圣，他们对各国来的学生都是彬彬有礼的。

一般来说，高棉、越南和老挝的年轻人都比较聪明，对老师也非常有礼貌。而那些法国青年则好动，喜欢开玩笑，甚至很顽皮。我很惊讶地发现了他们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令我着了迷。他们很快就把我当作朋友，并教会我许多至今仍然使用的俏皮话。不管是聪明还是笨拙的学生，也不管是文静还是顽皮的学生，我们都对老师怀有同样爱戴和敬佩的心情。但有时法国青年也对他们搞些恶作剧。

在二年级A班时，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他是一个混血老师，名字叫居德奈，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越南东京人。我们小同学拉里维埃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小淘气。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对我说：“看，这个家伙的那张嘴脸，和他的名字一样，真是一个翘鼻子”。居德奈察觉到我的伙伴在开他的低级趣味的玩笑以后，也只不过说一声：“拉里维埃，不要出怪相了！”

以后，在五年级A班（主要上拉丁、希腊语课）时，来

了一位非常迷人的老师，她刚刚从达丹尼安号客轮下来，名字叫做戈德里夫人。这位金发老师脸上的雀斑使她活象一个小姑娘。她平常很爱笑，而且笑起来时脸上就会出现深深的酒窝。班上所有的男孩子都喜欢她。当她提问我关于维吉尔的话时，我忘记讲拉丁语了。由于我非常高兴在戈德里夫人的教育下进行学习，所以使我在学年末期取得了最优异的成绩，各科都得十一分（过去我每次只得十分），超过了学校成绩优秀奖获得者——一个名叫杜大福的越南人。在我的数学和其他理科老师看来，这个越南人是顶顶大名的，而我这几科是比较差的。但我的拉丁语、希腊语和英语都很好，法语也不错。当了国王以后，我在河内又见到了戈德里夫人。她与丈夫离婚了，一直过着独身生活。我强制自己不要向她提出嫁给我的要求，这也由于当时我见到漂亮的女子还害羞，而且这个女人又是一个外国人，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我这样安慰自己：“法国人可能不喜欢看到我和他们的一个女同胞结婚，而高棉人也不喜欢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成为他们的王后”。

在六年级A班，我们的法文、拉丁文、希腊文老师是一位获得文学学衔的年轻人，名叫弗朗索瓦。这位老师很严肃，配戴着一副近视镜。正象别人说的那样，他总是“埋头在书堆里”。他也是一个光棍，见到女学生就有点害羞。这是一位一流水平的教师，他的每一节课都讲的非常清楚。我们全神贯注地一字一句地听他讲课，甚至那些既笨且懒的学生，也都能从他那有吸引力的讲课中获益不少。我对弗朗索瓦先生的敬佩，使我决心以后要到金边的西索瓦中学里教授法文、拉

丁文、希腊文。

由于我一点也没有放弃体育、音乐和电影，我认为只要获得一个稍高于中等知识分子的古典文学的学士学位就足够了。

就在此时，我又爱上了一个女子，就是我的一个富有魅力的同学——埃莱娜小姐。这回我只是不声不响地欣赏她。我的座位在她后面，我偷偷地呼吸着她那薰衣草香型的香水味，而她也时常转过头来要我帮她做练习，即把拉丁文和希腊文译成本国文字。对此，我已感到很幸福了，因为我还处于精神恋爱阶段。很遗憾的是，我在登上柬埔寨王位以后，没有再坚持下去。

在我上课的那所沙士鲁·罗巴中学里，一点种族主义都没有。法国学生、高棉学生、越南学生和老挝学生都相处得非常融洽。尽管我们这些人几乎都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富裕的家庭，而同学们之间的声援和互助精神都使我特别高兴。同学对上至校长萨勒，下到一般老师都是很有礼貌的。

在我登上柬埔寨王位几个月之后，弗朗索瓦先生离开我们到越南一所大的中学任教去了。在六年级A班，代替弗朗索瓦先生的是一位更加可爱的老师——卡泽纳瓦先生。他是一位和善的胖叔叔，他那浓密的白发就象一头狮子，尽管他的面孔令人生畏，却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我很快就成为他所喜欢的学生。当时曾是班上第一名的同学，且又是我中学时的好友杜大福，以后在信中很幽默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当国王，我一定能在期末获得优秀成绩，因为我是卡泽纳瓦先

生的“宠儿”。

敬爱的卡泽纳瓦先生对我继承王位是如此高兴，以致在我登基那天，他把一节课改为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是我们的老同学”。这次讨论没有能够录下音来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如果有的话，对我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好的留念。由于我非常想向我的老师表示敬意，我就利用第一次正式访问西贡的机会，到我老师在西贡的住宅，向他、他的夫人和他们的漂亮女儿，也是我六年级时的同学——莱特科致敬。我同卡泽纳瓦先生之间的友谊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九七九年一月，我的老同学科莱特——她已经结婚，当了妈妈，也可能当了祖母——还写信祝贺我最终得以摆脱魔掌，并在信中写道，她父亲直到临终前还一直在想念我。

是的，在沙士鲁·罗巴中学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年代。学校里的设备是简陋的，伙食是廉价的。然而，我却在这所学校里，感受到这是一个真正文明的人道主义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人们敬仰希腊和罗马古代的英雄，不知道什么是个人主义、嫉妒和恶意。在我们学校里，智力差的同学羡慕但并不嫉妒功课好的同学，功课好的同学自动地帮助他们做作文，搞翻译。当某位同学遇到什么不幸时，我们宁可不看电影，不吃糖果，尽我们的力量筹集一些钱来帮助这位同学。例如，我的一位名叫索斯戴纳·勒塞日的法国同学，他出生于印度，当他那居住在外省的父母被越南强盗杀害以后，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在沙士鲁·罗巴中学，男女学生都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学习，而政治却进不了我们学校的大门。因此，在我们之间只

存在着兄弟友谊，没有不可告人的想法。但不久，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占据了学校，法国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杜大福和其他越南朋友成了反殖战士、亲“越盟”分子，而秀臣也成了“红色高棉”分子……。

在金边的西索瓦中学和其他中等学校以及别的教育部门却恰恰相反，年轻的高棉人几乎不能认真学习。一些带上了十分浓厚政治色彩的蛊惑人心的政客、教师和同学们不断地鼓动，有时还胁迫同学们进行宣传或破坏活动，或把同学们拖入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罢课。这种骚动的结果是，一小撮具有高年级文凭的人，利用其他人知识平庸，使他们的人民沦为奴隶，并使真正在发展中的祖国倒退了几个世纪。

但是，无理取闹与无结果争论的兴趣，仍然存在于巴黎的高棉“大知识分子”中间。这些人根本不懂得，国家的统一是几乎全部被破坏的祖国和即将被消灭的人民能得以生存的唯一希望。而野心无止境的社会名流和对理论一窍不通且又爱“钻牛角尖”的知识分子，都置民众阶级的巨大不幸于不顾，干起了分裂国家和使它崩溃的勾当，这就是柬埔寨的悲剧。

5

父子都成了西贡人

我已经说过，我父亲曾在沙士鲁·罗巴中学读过书。那么他的儿子继承他原来的座位，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用其名字来命名这所学校的那位法国国务活动家是何许人也？我翻开《小罗贝尔词典》，上面记载着查士丁尼、拿破仑、撒母耳和普罗斯佩·戴、沙士鲁·罗巴。沙士鲁·罗巴是一位法国国务活动家，一八三七年当选为议员，一八五一年任海军部长，第二帝国（一八三〇年——一八六七年）期间他继任海军和殖民地部部长，在这期间他为改组法国舰队作出了贡献，并宣布了对交趾支那的吞并和建立了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制度（一八六三年）。一八六九年任内阁总理。拿破仑三世下台后，他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我可爱的中学就是用这样一个经历如此非凡的大人物的名字命名的。这所学校为高棉培养了两位未来的国王。

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我父亲选学了越南语，却没有挑选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完全精通越南语，这为他和漂亮的西

贡女郎的风流韵事提供了方便。在感情方面我没有我父亲那么早熟，我却特别喜欢体育、法式大菜和去市立图书馆，当然我也很喜欢看电影。

二次大战爆发前几年，西贡就已有几家设备很好的带有空调的电影院（这样的电影院在金边还没有），这就为电影爱好者提供了比在柬埔寨更多的选择余地。每个星期日我都去看美国电影明星克拉克·嘉宝、罗伯特·蒙哥马利、琼·克劳福德、诺玛·沙雷、米尔纳·洛伊、埃洛尔·费林（啊！《布来德上尉》、《林中傻瓜》等）和法国电影明星夏尔·布瓦耶、皮埃尔·里夏尔·威尔莫、米歇尔·摩根、安娜·贝拉演出的电影。看过电影之后，如果还有一点余钱的话，我便匆忙向寺庙的方向走去，到卡蒂纳大街（有西贡的爱丽舍田园之称）一家很别致的冷饮店去品尝一下味美无比的尚蒂利奶油点心或每见必尝的杏仁冰激淋。

说到吃的方面，如果能到豪华的“大陆饭店”（当时是交趾支那首府唯一一家比较豪华的饭店）去吃什锦拼盘或撒着巴马干酪丝的烤肉卷，我就感到满足了（因为我的助学金不多）。每到月末经常手头拮据，我只好喝一份中国菜汤、一根奶油紫雪糕和一瓶当地产的桔子水。

我本来也不那么好，因此，我也不想把自己说得非常好。星期六去市立图书馆，经常还是我“一文不名”的时候。在图书馆里，我经常看我最喜欢的作家皮埃尔·伯努瓦写的书。可以说，我认真地阅读这位法兰西文学院卓越院士的著作，并没有其他目的，主要是想增加我对现代法国文学的知识。实际上，这些著作使我避开了对未知世界的幻想。我似乎“漫

游了撒哈拉王国的沙漠绿洲和科尼斯玛城堡，“访问”了黎巴嫩城堡主夫人，我还看到了北极的白昼。但愿其他三十年代法国文学大师们能原谅我，如果我坦白地说我特别喜欢伟大的小说家皮埃尔·伯努瓦，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年轻人也都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由于在越南南方生活了五年，和我父亲一样，我也结识了不少越南朋友。许多西贡家庭邀请年轻的高棉王子到他们家去品茶，我很愿意去，但我尽量设法避免吃越南饭；因为我非常讨厌鱼露（我父亲也很讨厌鱼露），几乎所有的越南菜都要加上这种佐料，而这种佐料的味道和气味使我简直受不了。

高棉有一句谚语：“安南人（现在的越南人）的血液中有虚伪的东西，因此绝对不要同他们交朋友”。就我个人来讲，我对越南人没有丝毫的敌意，我的敌人恰恰以此为依据对我加以诽谤，企图使我威信扫地。一九七〇年朗诺政变以后，有些人说，由于我“狂热迷恋了一位越南女郎”而“把我的祖国出卖给越共和越南北方”。

这里所指的“越南女郎”不是别人，指的是我的妻子莫尼克·西哈努克，婚前的名字叫莫尼克·伊吉。她父亲弗朗索瓦·伊吉是个意大利血统的法国人，她母亲博夫人是柬埔寨人，带有一点中国血统，但丝毫没有越南血统。那些为朗诺效劳的拙劣作家们，却编出了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按照他们的说法，莫尼克·伊吉不是她现在的父亲和母亲的女儿，而是一个越南弃儿，她刚出生就被当时在西贡工作的伊吉先

生抱走了。但这些拙劣的作家们忘记莫尼克·伊吉长的非常象她的父亲，以致没有一个法国人说莫尼克是外国人。

应该说，“高棉共和国之父”豢养的那些宣传家们，不仅仅专门编造这么一个谣言，而且直到最后，他们还编造了许多有关我的难以置信的极为古怪的故事。这些人把他们的同胞都当成了头脑迟钝的人。然而，正是这些难以置信的极为古怪的故事，激起了高棉人民的愤怒，也引起了国外观察家们的哄堂大笑。在这本书里，我还要提到这个问题。

既然如此，我愿意坦率地告诉大家，在我这一生中从来就没有同一个越南女郎有过暧昧关系。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我倒认识了不少非常迷人的富有魅力的漂亮越南女郎，但无论在上学的时候，还是在离开学校之后，我从未被她们的妩媚所倾倒，但我并没有以此夸耀自己，因为有的人喜欢玫瑰，有的人却喜欢兰花……不，任何一个越南女子只不过是我在沙士鲁·罗巴中学同安南人（在柬埔寨，人们用“阮”这个贬义词来称呼安南人）结成朋友的开端。在我的一些同窗中，有的后来成了共产党人、有的成了反共分子、中立主义者、佛教徒、天主教徒、高台教徒、孔门之徒等等，而在中学的时候，他们却都是我的好同学，甚至是非常要好的同学。

我不喜欢沙文主义，因为它是民族情绪荒谬可笑的激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越南同学的智力在全班同学的平均智力之上。在我们中学里，越南同学考试的分数比法国同学、高棉同学、老挝同学和印度同学（在印度出生的法国同学）都要高。也可能正是由于他们聪明，才有人说

他们诡计多端。由于具有这个优点才使得他们在各方面，包括使用权力方面，都能大显身手。

在西贡，我和在印度出生的法国人有着非常好的关系。我在西贡的通讯处就是他们中的佩雷拉先生的家。他们一家对我和我的堂兄弟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老妈妈就象对待她亲生孩子一样周到地照顾我们。后来听说她由于年事已高和丈夫的去世，只好住进了一家法国养老院。为了帮助她，我不时给她寄去一些钱。政变以后，我在北京也象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朋友们一样，仍继续和这个家庭保持书信来往。但一九七五年红色高棉胜利以后，暂时中断了同我所爱戴的人们的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失望与不幸，我的性格已变得象刺猬的针刺一样坚硬，我的朋友们也认为我的性格太坏了。我的爱情艳事也引起了流言蜚语。然而，我在中学时，却是一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有道德的、善于交朋友的男孩子。学校的法国当局早已注意到我，并密切地进行观察，但却不让我知道。他们非常喜欢我一生中的这个良好的开端。我同我的同胞们相处的非常融洽，当然也有些人后来憎恨我。我有一个知心朋友，他的名子叫何来恩，是桔井省川龙一家大木材商的儿子。何来恩试图让我对政治感兴趣。他自称“由于老百姓的贫困所唤起的觉悟和感动，我认为应该结束崇拜君主政体。”慢慢地我也了解到这个所谓的“小百姓的保卫者”的父亲，实际上是子民们的残酷剥削者，他给老百姓的工资非常少，向省地方当局（包括法国地方当局）搞贿赂，乱伐

森林，大量捕杀野兽（那时象牙的销路很好）。后来，我“幼年的朋友”何来恩步其父亲后尘，当然也就成了朗诺的狂热支持者，同时也把我拖入了泥坑。最后，他被他剥削和欺侮的人们无情地杀了。朋友，安息吧！

在沙士鲁·罗巴中学那么多的高棉同学中，我最喜欢的是我的三个堂兄弟：伦西（长兄）、康托尔亲王（在我当政时，他曾多次担任首相）和威利亚亲王（幼弟，他也曾在宫廷里做过好几任高级官员）。他们的父亲很年轻时就过世了，他们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都是诺罗敦家族的（他们是堂兄弟）。他们的母亲是我母亲的姐姐，名叫西索瓦·塔薇特公主，她们两人都是当朝王后的女儿。在我这三个堂兄弟中，比我大两岁的康托尔最严肃，也最用功。如果在上课时，我得到的分数比他好，他一点也不嫉妒。他喜欢我，鼓励我。

伦西比我大三岁，但最懒，而且性格很粗暴，老是寻衅打架。他甚至在五年级B班学期结束之前就申请回柬埔寨了。在柬埔寨，他完全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到了六年级，伦西不愿上英文课，他对我说：“我以为到这个学校来就是要学习法文的，为什么除学习法文以外还要学英文呢？据我所知，印度支那不是英国殖民地。”我堂兄的英文老师安德里厄先生长得很胖，但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对班上的“头号”又懒又笨的学生非常宽容。由于班上其他懒学生的反对，老师也不给我的堂兄打零分，而只是幽默地说：“孩子们，你们想干什么呢？伦西是可以原谅的，他是吴哥国王的后裔。大家都知道，高棉人已无力重建吴哥了。伦西不是一个坏学生，

也不是一个懒学生，仅仅是对建设吴哥感到厌烦罢了！”

请允许我在这里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这是在一九四一年，在法国挑选我为柬埔寨国王的前几个月。为了解越南老百姓活跃的生活情况，我和比我年轻四岁的堂弟威利亚一起到西贡居民区散步。一个人力车夫靠近我，并以无法模仿的带有越南口音的法语对我说：“先生，这里有不少漂亮的姑娘，我可以帮您找一个。”我处在感情和义务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不管越南小姐多么漂亮（还带有一点羞怯），但我一点也不愿落入她们熟练的手腕中；另一方面，我也不愿给这位老实巴交的人力车夫留下如此印象：刚满十八岁，我就那么虚弱或阳痿了。我想了一个好办法，至少当时我认为是个好主意。于是，我非常有礼貌地回答人力车夫说：“老弟，谢谢你的建议，可是（我指着威利亚）我的小堂弟和我在一起，请你接受我的歉意。”可是，引诱者并不觉得尴尬，他带着特别动人的神情对我说：“先生，我可以给您找一个我认识的年龄大一点点的青年姑娘，还可以给您的堂兄弟找一个年纪很轻的小姑娘。”我和威利亚只好赶忙离开了这个西贡平民区，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个地方的人想在德行方面打我们的主意了……。

不久，一场悲剧发生了。这给我在西贡度过的最后几个月带来了忧虑。这个悲剧也间接构成了我命运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偶然事件，即法国和泰国发生了战争。

柬埔寨被肢解

被希特勒德国战败了的柬埔寨强大的保护国——法国，

又面临着泰国的威胁和侵略，因为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怂恿下，泰国出动了海、陆、空三军入侵柬埔寨。几个世纪以来，泰国就觊觎并正在蚕食柬埔寨的国土。

尽管法国——印度支那军队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但他们在战争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内却顶住了敌军的进攻。虽然法国——印度支那的战士们很快就显出了不那么凶猛，但他们却比自己的敌手更有士气，更为顽强。我带着军事上的有色眼镜来观察这场在我国西部和西北部进行的战争，觉得敌人可能会占领西贡，甚至可能会打进我们这个宁静的中学大院。

大部分的教员被叫到国旗下。我们的校长萨莱先生穿着一件漂亮的炮兵上尉的上衣，下身穿着马裤，脚上穿着崭新的皮靴。我们的学监巴普蒂斯特瘦得皮包骨，他没精打采地穿着一身殖民军队陆军中尉的制服。我最喜欢的老师卡泽纳瓦先生特别胖，穿着一身紧绷绷的空军中尉制服。一个法国同学——处在这个年龄上是可怜的一——对我说：“我们的老师这么胖，根本就进不了飞机的驾驶舱，恐怕他只好成为一个地勤人员了……”作为卡泽纳瓦先生的一个崇拜者和最好的学生，我非常高兴他搞地勤。

穿着军服的军人拥满了西贡。我注意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从越南的东京和安南来的越南士兵和军官，去柬埔寨前线之前，他们要在西贡作短暂停留。在交趾支那人中，工程师、建筑师、取得越南国籍的法国医生，都动员起来成为预备役军官。他们穿着剪裁合体的服装，但对保卫他们（新）的祖国的义务却有点无动于衷。

在西贡读书时，我的监护人之长子马尔赛·佩雷雅，原来是个预备役中士，现在也被派往高棉——泰国前线。他亲爱的妈妈哭得象个泪人。后来马尔赛成了战俘。停战协定签字后，他才获释。他向我们讲述了他被俘期间在泰国战俘营度过的痛苦岁月。为惩罚他不遵守纪律，他曾被关进有铁栏杆的笼子，每天早晨，一个长着一副野兽面孔的泰国中士，向他的臀部乱踢一阵，作为“早餐”。回到家里以后，我和他全家把马尔赛看成一个英雄，他受到了他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为了不让他的屁股痛，他妈妈还为他缝制了一个柔软的垫子。

那时西贡最显赫的人物是贝朗热海军上将。他的巡洋舰在机智地把泰国的大部分战舰引诱到暹罗湾的戈张港湾后，用火炮一艘接一艘地把它击沉。戈张大捷在交趾支那首都，当然也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激起了无法形容的喜悦。我当了柬埔寨国王以后，就把相当于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王国大十字勋章授予贝朗热海军上将。在地面上，法国、高棉和越南战士，以英雄气概同怯弱的泰国士兵进行了战斗，简陋的法国大炮显得特别有杀伤力。在空中，马力不足而且装备也很差的法国老式飞机，就象灭蚊器消灭蚊子一样，击落了许多比法国飞机先进得多的泰国歼击机和轰炸机。最后，法国——印度支那联军击退了侵略者。由于泰国军队完全溃败，法国——印度支那联军长驱直入泰国。在其保护国已经明显的失败面前，当时非常强大的日本进行了干预，企图阻止法国——印度支那军队前进。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法

国人却去卡诺萨（也就是日本东京）与泰国的全权代表签署了一个极不公正的和平条约，并要柬埔寨承担这场战争的全部费用。根据该条约的条款，高棉王国将把我称之为“我们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泰国，也就是我国的粮仓——马德望省、盛产宝石的拜林地区、暹粒省的一部分（那地方有吴哥时代的几座中等庙宇）、磅同省的一部分（那个地方有令人仰慕的边境寺庙——柏威夏寺），还有上丁省和菩萨省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我们可怜的国家就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

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所有高棉学生都举行“国丧”。在金边，我的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国王发表声明，以我们国家的名义拒绝承认东京条约中有关法国把王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割让给泰国的条款的有效性。一九四一年四月，复活节的假日快到了。在回金边之前，我和我的法国队友同其他几所中学（主要是越南的贝杜基中学）比赛了几场篮球，我们篮球队的队长是科罗斯·雅克·科斯塔，在我们球队里有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队员，这就是罗伯特·拉库蒂尔（我不知道他是否同著名的记者和作家、我的朋友让·拉库蒂尔有亲戚关系）。罗伯特是我的娱乐朋友，从六年级A班开始，就同我一起在学校寄宿，他父母原籍是法兰西留尼汪岛。直到朗诺政变之前，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政变以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由于谈到罗伯特·拉库蒂尔，我追溯了我在沙士鲁·罗巴中学第一年的情况。请允许我使用作者的特权，向曾经非常热情招待过我这样一个害羞的中学生的家庭，表示我最深

切的怀念，特别是凯雷、夏贝尔、奥阿罗等家庭。但愿这些家庭的成员，在读到我这本书时，能知道我并没有忘记他们……。

6

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一九四一年复活节期间，当我回到金边度假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父母和所有纯粹的高棉人一样，对我们国家领土的被肢解感到非常难以忍受，同时也为我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国王令人不安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担忧。

法国与泰国签订了牺牲柬埔寨的令人憎恨的条约以后，我的外祖父一直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外祖父曾是圣·梅克桑军校的士官生，后来又成了法国军队的预备役准将，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法国这么一个在战场上的胜利者，却在（日本）东京屈服于泰国这么一个失败者。作为一个国王，他沉浸在绝望之中。一想到自己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神圣的不可分割的国土，今天却这么一大块地从他的手里失掉，他就昏厥过去了。这简直就象别人从他身上挖走一块肉一样，使他感到切肤之痛。我们的国王想到距离首都远些的地方去避一避，以解除他的忧伤和痛苦。于是，他便躲到与交趾支那（南越）交界并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进了贡布省一座位于海拔一千一百公尺的波哥山别墅。他在那里闭门谢客，

甚至连法国当局的人，也不予会见。他特别喜欢的王妃们，也得不到他的宠幸了。他只勉强吃点东西，不久病情加重了。

我父母一直等到我回来以后，才一起去外祖父那里。经过几小时的平原和山区旅行，我们才到了王家别墅。我感到有一种悲痛的气氛笼罩着这座别墅。只有国王的近亲，才能到身边侍奉他。在国王身边只有我父亲、母亲和我的两个舅舅：西索瓦·莫尼勒亲王（他摆出一副王储的姿态，这只是非正式的，因为高棉的君主是选举产生的）和西索瓦·莫尼庞亲王。此外，还有非常激动的年轻的西哈努克。几个小时以后，国王就咽气了。

“国王驾崩了。国王千古。”在波哥山大家都认为莫尼旺国王陛下的长子——莫尼勒亲王将被王位最高委员会立为先王的继承人。作为顺从的朝臣，我们拜倒在未来国王的脚下，然而他对我们的效忠却不予理睬。他正在和我那泣不成声的母亲商量，准备在夜里悄悄地把我所敬仰的外祖父运回金边。

按王国的习惯，如果国王不是战死在沙场，那就应该安放在王宫金銮殿内的德威维尼查（议事厅）里。我也要参加庄严的先王的移灵工作。因为根据传统，国王不应在波哥山别墅驾崩。象侦探小说的笔法那样，我们给国王穿好衣服，并尽量好好地把他安放在他的黑色雪铁龙轿车的后排座位上。莫尼勒亲王坐在司机旁边。我父母和我坐在自己的达尔博汽车里，紧跟国王的老式轿车。在我们车子后面，是我舅父莫尼庞亲王的汽车。仪仗照旧，就象国王仪仗队在路上前进。凌晨一点钟，我们的车队穿过了沉睡的首都，终于到达了

王宫。

第二天是非常庄严的一天。先王的遗体被匆匆忙忙地用防腐香料处理过，并穿上大礼服，停放在灵床上，以便人民群众、外交使节、法国当局，当然也有先王的亲属，向遗体告别。法国高级专员、高品级的王子与公主以及王国重臣显贵，可以往先王遗体上面洒几滴香水。然后，先王遗体被安放在一个饰有吴哥式金色雕刻、散发着香味的棺木内，供人民群众瞻仰。在三个月里，六十四名和尚（与先王在世时的年岁相同）每天诵经每天超度陛下的亡灵。我们则利用这段时间修建火化塔，即巨大的尖顶七层塔子，其上面饰以雕花的印度檀香木。先王的遗体就在这塔子里面焚化。

但也就在此时，一个出人意外的消息在金边及至全国和国外传开了：一个被其外祖父莫尼旺亲昵地称为“托尔”、被其祖父苏他罗称为“玛普”的不为公众所知的十九岁中学生，将被王位最高委员会选为柬埔寨国王。

“选举”不过是说说而已，自从保护国的地位确立以来，实际上是法国授意王位最高委员会来挑选国王的。王位最高委员会由王国政府首相、佛教两大派（摩诃尼迦耶派和达摩育特派）的最高领袖和婆罗门教（该教在吴哥时代是佛教竞争的对手，而现在只在王宫里继续存在）的最高领袖组成。正是根据法国人这个没有见诸文字，但一直必须遵守的特权，我曾外祖父西索瓦、我的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在明智的和众望所归的安东王长子——诺罗敦国王的真正继承人被损害

的情况下，才得以登上了柬埔寨王位的。

一九四七年，当我向我国人民颁布第一部王国宪法时，规定高棉王位属于安东国王的男性后嗣。由于这些后嗣多达几千人（我们历代国王都是一夫多妻的，所以他们的子女很多），每一位亲王——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心里都在琢磨着：“为什么不让我当国王？”

法国当局选择我这样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人（为国王），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他们可以不承担任何风险的使高棉民族主义者感到满意。这些人曾成立过一个“煽动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有的在后面我还将提到，如引人注目的行政官员山玉成和沈法。在他们创办的报纸《诺戈瓦特》（即巴利语“吴哥”的意思）上，他们发表的文章就主动提到，柬埔寨的王位不应该成为对法国非常顺从的西索瓦家族的专有特权，而应该归还给诺罗敦家族。

实际上，西索瓦家族亲法国的名声并非捏造。而诺罗敦家族恰恰相反，却敢于批评法国在柬埔寨和印度支那推行的“专制主义”政策。

自从法国强加给诺罗敦国王的一八八四年条约签字以后，诺罗敦国王丧失了一切权力。为了表示他的愤怒和谴责，从那时起，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直到他去世前从未离开宫门。他拒绝会见外来的任何人，但他却秘密地命令那些胆大、敢干的外省臣民们起来造法国人的反，尽量整治整治法国人。（法国）当局当然知道国王的抵抗。由于不想从王宫里鼓动农民起来造反，诺罗敦国王派他的长子尤根托亲王去

巴黎，要求法国政府恢复高棉君主的一切权力。由于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尤根托以无比的激情揭露了法国的殖民政策（有一个时期，法国乃至其他欧洲列强，都曾以给落后民族送来文明和物质福利而扬扬得意），因此，法国禁止他返回柬埔寨，他被迫流亡到暹罗，并在那里度过他的余年。继尤根托之后，就轮到了诺罗敦国王的次子——我的祖父苏他罗亲王。他也被排除在王位继承者之外。因为原来被法国选为“法定继承人”的苏他罗亲王，对法国当局经常有失言的地方。他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了一帮反法的高棉民族主义者“陈茂集团”的支持。这个“陈茂集团”除了有沈法、山玉成之外，还有巴春。而巴春其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法国军队中服过役。

虽然高棉民族主义者于一九四一年提出了把王位交给诺罗敦家族中的一员的要求，但法国早已在莫尼旺国王执政末期就选择了年轻的西哈努克。但愿我是一个不会使法国当局担心的诺罗敦！我的双亲苏拉马里特亲王和他的夫人，一向以法国为可靠的朋友而著称，他们的独生子又接受过良好的法国教育。大家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温顺的中学生，一定会成为一个能为法国效劳的驯服君主。当然，先王的长子莫尼勒亲王也是相当亲法的。一九三九年，当法国参战之后，他和他的弟弟莫尼庞参加了法军，并曾出发到法德边境地区。

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莫尼勒由于母亲是诺罗敦家族的女子，他只有二分之一的西索瓦家族血统；而西哈努克由于母亲是西索瓦家族的女子，也只有二分之一的诺罗

敦家族血统。由于我们血管里的血液是两个家族的混合，因此我们这些人也很复杂：有的人亲法国，有的人激烈批评法国，但绝没有人憎恨法国。

尽管我的舅父莫尼勒有着光荣的军旅生涯，但因为他的口齿不灵，而不再是“王储”了。然而，他周围的一群“青年激进分子”同党却批评他与法国当局的意志背道而驰的某些消极方面，并鼓动他同我祖父苏他罗竞争王位。他们那些丘八式的粗俗言语和有时非常激烈的叫骂声，终于使某些法国知名人士感到不高兴，这也使得法国最高当局知道莫尼勒肯定不可能是一个驯服的国王。因此，不论在金边还是在河内和西贡，在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让·德古克斯海军上将所接近的人们中，形成了一个对我父母有利的“影响集团”。

在柬埔寨，法国当局的高级专员蒂博多是一位性情粗暴但心地善良的人，他坚决反对莫尼勒亲王。由于他经常主持王家内阁会议，他非常欣赏我父亲的忠顺，因而我父亲便成了他的意中人。相反，他对宫廷总监莫尼勒的刻薄想法和那些得罪内阁其他成员的意见大为不悦，以致使高级专员认为莫尼勒是令人厌恶的“应声虫”。

蒂博多先生不喜欢莫尼勒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莫尼勒的夫人万纳·莫尼勒是高级专员最讨厌的秀首相的外孙女。在上一章里，我曾讲到了秀首相，他是三朝元老的首相，一直在王宫里称王称霸。蒂博多先生甚至想让他退休。高级专员曾对我说：“陛下，秀是一个腐化、放荡和虚伪的人，他背叛了国王和法国，而只会图谋自己的私利。如果他继续留在王国政府内，他一定企图向您施加他的影响。我认为，一定要

把他赶下去。只要您给他以慷慨的养老金，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把他打发了，因为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这也是蒂博多先生写信给德古克斯海军上将时，认为必须排除莫尼勒继承王位的原因。由于海军上将刚刚来到印度支那，他既不了解苏拉马里特家族，也不了解莫尼勒家族。但也不想受他的前任西尔韦斯特总督的意见的影响，因为西尔韦斯特总督临终前曾写了一份对我舅舅非常不利而对我父亲非常有利的报告。可是海军上将最亲近的同事们大部分都是“柬埔寨人”，如乔治·戈蒂埃总督、奥菲尔总督和瓦斯内尔教授等。正是由于我父亲的老朋友，我在金边的导师瓦斯内尔教授教我学会了西塞罗语言和狄摩西尼的修辞的基本原理，从而使我一到沙士鲁·罗巴中学以后，就能比我的同学们进步得快，并能在拉丁语和希腊语方面取得好的成绩。

我们家所有这些朋友都成了我父亲或其子被推荐为国王候选人的狂热支持者。而且，他们把推荐我为候选人，作为在诺罗敦和西索瓦两个家族之间的一个理想的妥协产物。

我继承王位，对我父母来说，是一个幸福和骄傲的源泉。然而，对我来说，却是一种接近于恐惧的担忧。

根据法国最高驻扎官的要求，我父亲和母亲负责向我宣布这一伟大的、令人惊奇的，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新闻：我将继承柬埔寨王位。据神话传说：我们王国是二千多年前由一位从印度来的甘布亲王和娜亚（海蛇）女王建立起来的。“甘布”和“娜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甘布亚”，高棉人把它读成了“柬埔寨”，英国人则读成“肯波迪亚”，而法国人却把它读

为“甘波兹”。可笑的是，一九七九年在巴黎的一位高棉知识分子竟然说“柬埔寨”这个名字是法国殖民主义者造出来的……。

我父母对他们的独生子能继承最高荣誉感到非常高兴，而我姑母拉斯美·索帕娜公主竟高兴得说起“胡话”来了。

由于预感到痛苦的命运、莫名其妙的害怕以及本能的不安，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哭了一场。我一点也不高兴，反而有些害怕。我感到非常恐惧，全身发凉。我对我父母说，我挑不了这么重的担子：我太年轻了，同这个职位不相称。

我父亲首先有点发愣，然后非常难过地说：“你是诺罗敦家族最后的希望，西索瓦家族已连续传了两代，使我们蒙受了几十年的耻辱。现在，诺罗敦家族总该出口气了。可是，当我儿子被王位最高委员会一致选为国王的时候，他却拒绝继承自我们伟大的祖先诺罗敦一世去世之后丢失已久的王位。如果你继续坚持这一令人费解的态度，那我只有一死。”我父亲既焦急又气愤地冲进自己的房间，狂躁地敲打着房间的门。过了一会，又轮到我母亲了。她尽量地劝说，想让我恢复理智。她说：“我的孩子，不要再这么哭了，你的眼泪会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王朝和我们的国家带来灾难，你可怜的妈妈央求你。你是诺罗敦家族唯一的希望，为了这个家族的名誉，还是同意继承王位吧，你一定能象你显赫的祖先一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伟大君王。如果你拒绝继承王位，西索瓦家族就会把王位永远继承下去。”我母亲并不是仅仅重复我父亲提出的理由，她也哭了起来，想以此来唤起我的儿女情。她继续说道：“好好想想吧！你拒绝继承王位，法国会认为这

是对他们极大的冒犯。你已经知道了那些顶撞法国当局的亲王们有什么样的下场。你的父母、祖父母是要对你的态度承担责任的，他们会被流放到我都不知道的地方去。尽管你很年轻，但你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请你可怜可怜我们吧！你还是说‘同意’吧，我求求你。”

我又怎么能顶住这个感情的攻势呢？我终于擦干了眼泪来安慰妈妈，我毫无表情地接受了她的请求。大事已定，不管如何，我将成为国王了。我父亲听到这个好消息，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并以诺罗敦家族的名义感谢我。我祖父母更是兴高采烈。我祖父苏他罗说：“现在我可以闭眼了，诺罗敦家族终于战胜了长期以来的不公正之事。”

周围的子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来到我父母和祖父母居住的地方，表达他们的喜悦心情。大家都非常高兴，而我却非常严肃，我正在反省自己的变化。

那天晚上，我父亲为我准备了一顿晚餐。和平常一样，我还想坐在餐桌的一头，因为根据法国的礼仪，只有主人才坐在餐桌一侧的正中间。我父亲不管这一套，因为他招待的是国王。他让我坐在餐桌一侧的正中间，面对着家里的女主人——我的母亲，而父亲却坐在我原来的座位上。老实说，我感到非常不自在，看到我那尊敬和爱戴的父亲为了我而自己“降低地位”，真感到惭愧万分。

7

我继位之初和我的初恋

我被推上王位以后，就离开了宁静和熟悉的宅邸，住进了王宫——克马林宫（这个名字来自巴利语，其意思是：“天赐和平”）。这是一座既漂亮又高大的砖石结构宫殿，传统特色的屋顶覆盖着黄、蓝两色的琉璃瓦。与克马林宫相邻的庄严的金銮殿内，安放着我外祖父莫尼旺干瘪躯体的棺材。

我主持了各种世俗和宗教的仪式来祭祀先王。我需要尽量处理好参加仪式人出场先后顺序的棘手问题，以及遇到的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一句话，我要表现得既严肃又谦虚。为了避免家庭内部的不安定，我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改革。比如，我免去了我的祖父母、我的叔（舅）父（其中包括逆来顺受的舅父莫尼勒亲王）和我的姑（姨）母们朝见国王时“下跪叩首”的传统礼节。反而象一个无足轻重的王子那样，每次都是我这个国王首先向他们敬礼。当我的堂兄康托尔和伦西向我致敬时，我也立即向他们还礼，使他们一点也不感到屈辱。其他的堂（表）弟和先王莫尼旺和他的妃嫔们的孩子都要先给我敬礼。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过去王宫里的那种气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克马林宫后面还有六十几间比较舒适的房子，那里住着我尊敬的先辈的妃嫔们。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蒂博多称这个地方是“黑人村”。他向我表示在莫尼旺国王遗体火化以后，他主持的王国政府将把这块地方清理一下。当然，不会让以前的妃嫔们没有地方住，她们每人可以无偿得到城里的一块空地和一笔修建新住宅所必需的费用。对于到达学龄的先王的孩子，每天到小学或中学校去上课，都由王家车队的司机用汽车接送他们。几乎对我怀有父子般感情的蒂博多先生毫不隐讳地说，如果继续同这些妃嫔们混在一起，他担心我的德行会受到影响。他反对把沙士鲁·罗巴中学的这位高才的寄宿生放进“母老虎”（即这些女人）的“牧场”里。的确，在她们中间，有的还是长得相当漂亮，“可以受用的”。

好心的蒂博多先生并不是对王族里的每一个男子都关心的。因此，我舅父莫尼勒和莫尼庞经常借口看望我的父母，在白天（或夜间）来克马林宫。实际上，他们是对以前宫廷里容易亲近的某些女人特别感兴趣。而漂亮的小伙子莫尼勒，就象蜂蜜招引苍蝇一样地吸引着她们。莫尼庞没有多大吸引力，只好等着捡剩的。而另一个求爱者——西索瓦·拉塔里（是一九七〇年“三·一八”政变的主谋之一，施里马达的父亲）也来后宫碰一碰他的桃花运。这位长得一脸瘪三样的狡猾的老头儿，不凭他的相貌而是靠他的待人才气勾引漂亮的妃嫔。但因为他既不是龙萨，也不是缪塞，所以他经常一无所获地在王宫里随便逛荡借以消磨时间。公开讲，应服丧三个月，然而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宫廷里一点也没有伤感

的气氛，唯有我母亲——莫尼旺国王陛下最宠爱的女儿在为先王哭泣。

西哈努克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一些时候以来，在蒂博多先生警觉的目光下，他以自己的行动感化了每个人。

在整个王国，高棉子民们对西哈努克怀有非常诚挚的友情。只有那些在法国军队中服过役的柬埔寨大兵，对他们敬慕的人——法国军队中的军官莫尼勒中尉被剥夺了王位继承权而有些不高兴，但他们对新国王其人是从服从的，也是忠诚的。

高棉民族主义者一派也很高兴。这一派以为他们在得到政治界好评的《诺戈瓦特》报上发表了非常雄辩的社论以后，就能够随便进出我的家了。我接见了这一派的领导人，他们企图使我关心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但因为我刚刚离开沙士鲁·罗巴中学，对政治还漠不关心，我只好有礼貌地听他们讲。这个被他们看作是“历史性”的接见，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日本以武力夺得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权之前的那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然而，法国保护当局很快打断了国王与这个反法派系的联系，《诺戈瓦特》编辑部也跟着改变了调门……。

法国当局不失时机地给我周围派来了他们的心腹之人。在我身边，他们派了一位“代表”（法国高级专员的特别“大使”）加斯东·巴罗尔先生，一位私人顾问雷内·莫里宗先生，既当我的家庭教师，又是我的正式讲话和信函的拟稿人，还有德古海军上将让给我的一名副官阿梅代·菲利普·戴布瓦松先生。我应该承认这“三人帮”是很有水平的。

管理民政事务的巴罗尔先生，肩宽得象举重运动员，头发剪着小平头，有一副军官的头脑（他的确当过军官）。他是一位富有才智和口才的人，他用一种无法模仿的方式向我讲述安德烈·莫鲁瓦所写的《布兰布尔上校的沉默》的故事。由于被他的口才和彬彬有礼的讲话所征服，我就越发自愿地让他替蒂博多先生“监视”我的行动，而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回避他。

莫里宗先生，也是管理民政事务的。照我看，他象个纯血统的法国人，他很有魅力，也有象摩尔贵族一样黑的皮肤，一条笔直的头缝把他紧贴在头皮上的头发分成左右两边，他的身体可以和吕多尔·瓦朗蒂诺媲美。尽管他的风度象个花花公子，但人们对我说，他非常忠于他那娇媚的夫人。

而戴布瓦松先生，由于他的工作职务关系，就成为我每日的同伴。这是一位出身贵族家庭，曾经当过法国海军中尉的青年人。他高个子，细条身材，椭圆形的脸，长相标致，简直具有象一尊希腊神般的古典美。他举止文雅、教养良好、知识渊博，对宫廷布置很有审美观点，这就使他成为我这个愿意接受西方影响的亚洲君主所梦寐以求的一位副官。虽然我对他的多才多艺很欣赏，但有时我对戴布瓦松先生那总要任意支配他人的怪癖感到很生气。一九七〇年政变以后，菲利普·戴布瓦松弃甲经商，他却成了我最忠实和最可靠的朋友之一。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出身高贵和心灵高尚的统一。

就幸福而言，我似乎有了一切。然而，在我睡眠时却经常做恶梦，梦见由于我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比较差，中学毕业

会考时没能“及格”。尽管我认为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很不错，却也弥补不了我在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的不足。这个恶梦，在一九七六到一九七八年我被关押期间，仍不可思议地伴随着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荒唐的梦不止一次地阻止我在睡眠时回忆起当时给我安排的灾难性的命运。

我继承王位使我逃避了考试的折磨。但是我毕竟才十九岁，在我成年（即二十岁）以前，我还应该继续学习。学习的范围是法国文学和哲学的基础知识。我的老师是法国教育界在柬埔寨的大师、总学监和文学学衔获得者戈尔贝先生。我非常喜欢上他的课，他还想让我对（贝多芬、肖邦和德彪西的）西方古典音乐感兴趣。戴布瓦松先生负责找这些音乐大师们的唱片和其他一些古典作品。戈尔贝先生让我学习这些东西来圆满结束我的“王子教育”。唉！西方古典音乐就象数学那样使我非常厌恶。我仍继续吹萨克管，拉手风琴、奏爵士乐，因为这是我的爱好，后来我又学会了吹奏单簧管。

作为一个年轻和当代的国王，我也希望学习一些金融、经济和银行方面的知识。巴罗尔先生指定宋双先生（后来的国家银行行长）和大资本家陈豹先生给我讲授这些课程。我承认我对经济和金融问题并不太“理解”，当我尊敬的同胞们给我上课时，我却在想着法国式的漂亮的马术了。

从我少年时起，我一直幻想有一匹马，不是一匹赛马，而是一匹可以表演骑术的驯马，会跳障碍的驯马。我对马的喜爱，是从我外祖父莫尼旺国王那里继承下来的。有一天，我外祖父曾给我看了一张照片，那是他在圣梅克桑军校身穿军服、骑着一匹漂亮的马拍照的。这张使我入迷的照片，一

直放在我外曾祖母巴特夫人的房间中最显要的地方。早在童年时候，我是美国西部片的观众，从那时起我就被演员甘·麦纳德骑的那匹漂亮白马泰山迷住了。因此我就缠着我父母给我买一匹适合我身材的座骑。他们给我买了两匹高棉种的小型马：一匹是白色的，我给它起名为泰山；另一匹是黑色的。这是两匹既健壮又有适应性的马，它们既不需要兽医，也不需要马夫，更不需要马厩：它们自在地生活着。我同邻居小朋友经常学着美国西部牧马人的样子，拿着套马索和左轮手枪在一起开玩笑。我骑泰山，而他们轮流骑着小黑马。

当了国王以后，我再也不能扮演美国西部的牧马人了。我和预备役军官莫里宗先生以及出身于专门搞围猎家庭的戴布瓦松先生组成了一个法国式的小型马术队。对我非常好的德古海军上将送给我三匹马，其中两匹是阿拉伯种与安南种杂交的马：有一匹是枣红色的，名字叫达达朗，另一匹是带有白色斑点的灰马，名叫欧百里香；还有一匹是银灰色的母马，名字叫卡拉波芙。莫里宗先生在一次严重的摔伤以后，离开了我们的小型马术队，由我的法国骑术教练富尔卢贝先生代替他。达达朗是一匹受过训练善于跳越障碍物的马，但它的样子很差，我把它送给了戴布瓦松先生。他还真能将就，不管障碍物有多高，他都不会使达达朗失前蹄，我选中了非常漂亮的欧百里香作为我在加冕礼时的御用座骑。这也是一匹善于跨越障碍物的马，但没有达达朗那么果断。同容易发怒的达达朗相比，非常漂亮的卡拉波芙的魅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匹腼腆的母马在障碍物前有时打响鼻，有时甚至把富尔卢贝先生从它的背上摔下来。还象人们看到的那

样。我继承王位之始，就置身于半人马星座气氛之中……。

我第一个公开表示的就是巩固我同我的子民们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我弃绝了使我开始感到难以忍受的道德观，开始了我的第一个风流韵事。

占猜雅殿（意为月光殿）的敞廊上，可以鸟瞰王宫对面的公园。就在这个王家敞廊上，我发表了登基之后的第一次讲话。金边和附近省份的许多群众都集合在王宫和四臂湾（即湄公河、下湄公河、洞里荷河和巴萨河四条河流的汇合处）之间的广场上。群众的欢迎是非常热烈的，僧侣和官员们都对我的讲话感到非常满意。他们高度评价我讲话的“用词漂亮”，这应该归功于我的祖父苏他罗，是他教我很好地学习高棉语。说实在的，这篇讲话是我的私人顾问莫里宗先生先用法文起草的，然后由一年轻有为的主管官员农金尼先生（一九七〇年以后他投奔了朗诺集团）译成高棉文。经过好几年的努力，我才学会自己起草政治性的讲话。在一九五五年后，也就是在我逊位以后，我才下大力气去研究怎样作讲演，这样才使我学会了怎样恰如其分地发表即席讲话。而在那个时候，由于我知道自己不会起草讲话稿，我也就满足于尽量念好我的法国顾问为我写好的稿子。我在占猜雅殿的敞廊上站了一个小时，就是一个成绩。而蒂博多先生却坐在那里喝牛奶……。

那一天，我的子民们向我表示他们对我的忠心。男女农民们都被我这个“漂亮王子”的身材迷住了，他们说到了五十年代仍是一个美男子。不少上了年纪的乡下妇女，简直是

着了迷。她们说：“我们年轻的国王象神话中的主人公那样迷人，他简直就象神一样”。在这样的奉承面前，我并没有失去理智。

在王宫里，先王的妃嫔们对我毫不感兴趣，她们认为我没有经验。她们中间最年轻的，但仍比我年纪大的石夫人却对我流露出爱慕之情。说老实话，她并不合我意。由于我讨厌她，两年以后才表示对她的爱情。而且，我们的关系是短暂的。

相反，我却痴心地爱上了王家芭蕾舞团的明星甘霍小姐，她给我生了两个孩子：一九四三年生了帕花黛维公主，她后来成了高棉古典舞蹈的王后；一九四四年生了拉纳烈王子。尽管我的父母是无意的，但他们毕竟是我们之间建立关系的牵线人。由于对古典舞蹈着了迷，他们就致力于改造和训练我们的舞蹈团，因而使我们的舞蹈团于一九六四年在巴黎歌剧院由戴高乐将军主持的一次纪念晚会演出中，得到了世界的承认。我可以这样说，只要同这些舞蹈演员接触，迟早会丧失自己的节操。我父亲本人就被美丽的叶小姐所倾倒。尽管我母亲非常生气，但叶小姐在我父亲在位时（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〇年）却始终是高棉的蓬巴杜夫人。

我对甘霍小姐的迷恋，使我的父母和蒂博多先生很失望。蒂博多先生曾请求我中断同甘霍小姐之间的关系，以结束法国人和金边资产阶级嘲笑的局面。他提醒我：甘霍小姐出身相当卑微，而且她的母亲卡薇夫人又是一个酒鬼。然而我对甘霍小姐的迷恋却得到一个人的支持，这就是和我一样热爱子民的我的母亲。我母亲很喜欢甘霍小姐，并在她的一

生中一直保护着甘霍小姐。我的母亲抚养帕花·黛维公主和拉纳烈王子，他们俩是我十四个孩子中她最疼爱的两个孩子。

由于任何东西都不能熄灭我对甘霍小姐的爱情（帕花·黛维公主长得非常象她的母亲：不高的身材，古铜色的皮肤，漂亮的面孔，纤细的身段），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决定举办一个分散我注意力的活动，他认为这种办法是有益于健康的。于是，他组织了一次对柬埔寨各省的视察（当然不包括被泰国吞并的那些省份），他亲自陪同我进行这次活动。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乡亲们都给我送来了令人感动的礼品：大米、水果、工艺品，甚至还有棒香。可以说，他们不只一次地表示了对我的热爱和崇敬。作为“我们”那些省份实际负责人的法国驻扎官也为使我在他们那里逗留期间感到愉快和舒适而想尽了一切办法。他们让我住最好的房子，给我准备非常考究的法国大菜。而那些法国驻扎官的夫人们（有些人还是相当漂亮的），也出来献殷勤。我还很高兴地会见了我父母的好朋友和支持者罗曼·佩纳威尔夫妇。

但是，我没有忘记甘霍小姐，我回到王宫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然而，我对她的迷恋只不过是一年而已。

8

西索瓦·莫尼旺国王陛下的葬礼

在我外祖父莫尼旺国王的隆重葬礼上，一望无际的人群，以远东人、特别是以高棉人丧服的颜色——白色为主。王子和公主们（也包括我，因为我还没有加冕）、文武百官、宫廷贵妇和先王陛下的大部分臣民都穿着白色的制服、白色的礼服或其他白色的服装。先王陛下的六十名妃嫔当然也穿着白色的孝服，同时还要象民间寡妇在服丧期间那样剃光了头。那些自认为是先王的子孙（高棉语音为关、皂）的臣民们，根据传统礼仪规定也要剃光了头，成千上万个光头，在热带骄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由于基本上没有黑颜色（只有欧洲的妇人们才穿黑色的裙子），因此，只有那金黄色和白色互相争艳。金黄色是诸位殿下、阁下、高级官员和军官们的袖饰和领饰、童男童女仪仗队放在先王棺木上和棺木周围的金色假花、王家舞蹈团女演员们穿着的镶金的红色服装和戴着的金黄色的锥形冠，当然还有宫廷侍从们打着的金色王旗。另外，就是国旗上的红、蓝两色。护送先王出殡的仪仗队身着金黄色和白色的制服，

显得非常豪华。大家一点也没有悲伤，因为对高棉人来说，死被认为是得到了解脱，迈进极乐世界的一步。传统的乐队（配有笛子、双簧管、木琴、鼓、锣）演奏着清脆、多变的乐曲。就象我的同胞们自愿参加他们朋友的葬礼那样，既没有人哭泣，也没有人开玩笑。葬礼在虔敬的严肃的气氛中进行。我可以这样说，先王葬礼同我父亲——柬埔寨后来的也是最后一位国王于一九六〇年的葬礼完全一样。

安放着先王遗体的棺木是用一辆装饰得形如九头蛇般的宽大装甲车运到火葬场的。在殡车的平台上站着身穿戴沃达（传说中护卫我们王国的神灵）盛装的年轻王子和公主们（也就是先王的儿孙们），还站着身穿绣着金丝线的服装、手持金、银两色花的女舞蹈演员和一位超度死者的佛教高僧。

对基督教徒来说，人们为死者的安魂而祈祷；而对我们来说，根据佛教的教义，死者的灵魂是不会永眠的，而是生与再生之轮回（周而复始）。这个轮回除涅槃外没有其他终点，死亡并非虚无，而是达到了最高境界，也就是无法形容的极乐世界。佛陀自然可以达到涅槃，而人间那些男人们和女人们只有在各自的生活中通过对他们的亲属和做其他好事来尽量减轻自己的折磨（即他们应受责备的内心活动和身口动作的总和），才有可能达到极乐。可以这样说，人就象两翼承受着沉重罪孽的伊卡洛斯那样，如果能够赎回这些罪孽，那么他就可以升到天堂。这才能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灵魂应该是纯洁的，绝不应象“叛逆天神”所做的那样。如果灵魂能达到这一点，它就能继续上升，直到涅槃。

参加葬礼的人当然都强烈希望国王可以到达天堂，并达

到涅槃。但先王的灵魂是否已到达了无法形容的极乐世界呢？他的羯磨毕竟不是那么沉重。的确，先王曾有过六十个妃嫔，尽管高棉的法律在一八八四年就明文规定，允许一夫多妻，但禁止通奸。由于我的外祖父莫尼旺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原配夫人，因此，他根本就来不及欺骗她。如果我相信我母亲的话，首先他同他的妃嫔生了两个婚生的儿子，就是欺骗了他的王后。这类事就不要再提了……。相反，先王达到涅槃的时间将要推迟，因为先王在世时非常喜欢打猎，他杀死了（这是他来世背上的重负）大量的孢子、鹿、野猪、老虎和大象。除此以外，他（几乎）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他的子民们的看法，我们对他很宽容。

遗体焚化仪式举行得非常隆重。先王的骨灰放在一个精心雕刻的纯金小骨灰盒里。这个骨灰盒将安放在一个叫作舍利塔或卒塔婆的建筑物内，是先王为了安放他的骨灰，在距离金边四十公里左右的乌东山顶上建筑的。乌东是吴哥之后和金边之前的王国首都。正如莫里斯·巴雷斯讲的，在这个“神灵佑护的山上”有许多埋葬国王遗骨的卒塔婆（古代印度埋葬佛骨的半球形坟墓）。沿着从首都去磅清扬或磅湛的公路上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埋葬西索瓦国王（即先王莫尼旺的父亲）遗骸的坟墓和墓碑细长的轮廓。

德古海军上将和我一前一后爬上我的各位先王安息的小山头。

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五年朗诺分子和红色高棉进行战

争的时期，某些西方通讯社说乌东山已被炮弹和飞机毁为灰烬。然而，一九七六年在乔森潘先生的陪同下去马德望省的道路上，我从车里向我祖先的遗骸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埋葬他们遗骸的卒塔婆仍然矗立在那里。

但愿韩桑林集团和他们的越南盟友不破坏文物并保护乌东山宝贵的古迹！

9

我的加冕和不幸的开始

我的加冕典礼恰恰在我的十九岁生日那一天。选中这一天，是宫廷占星家应我母亲的要求，经过对我星相和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出生的时辰仔细占卜之后，作出的权威性决定。

我的加冕典礼，可以与一九四七年以前印度国王的加冕仪式媲美。在进入金銮殿由佛教两大派僧王和婆罗门教僧王为我加冕之前，我由仪仗队护送，在首都正式巡行，确有亚洲千年君主制雄壮和生动的排场。

我的前面和后面是喧闹的乐队、别致的民间舞蹈团、文武百官、身穿金丝绒装饰服装的年轻侍从、身着织锦礼服戴着袖饰、领饰和勋章的亲王和老态龙钟的大臣们以及穿着华丽服装的公主和宫中的女官们。接着是一只白色神象（实际上是患了白化病的象）和披着用金、银线绣的丝绸的深灰色象队、手执黄蓝两色新国王王旗的王家骑兵、首都和外省高棉人代表团、占族代表团（他们的祖先是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少数民族（有普农族、库依族、比尔族和桑雷族）

代表团、旅柬华侨和越侨代表团，他们都穿着自己传统的民族服装，奏着民族乐曲，跳着民族舞蹈。由于我还没有后妃，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女官，就连那甘霍小姐也没有来陪伴我。

法国的男女来宾们当然是不参加巡行的行列的，他们与外国代表团一起舒舒服服地站在观礼台上。法国总督德古海军上将光临了这次典礼。西萨旺·冯国王陛下亲自率领老挝王国代表团参加了典礼。

我的祖母苏他罗王妃负责仪仗队的安排，而我母亲，也就是她的儿媳，只好退避三舍。这一天，对我的祖母来说是极其荣耀的一天，她不断责备仪仗队和安排仪式的负责人。她提醒这些不幸的人们说，在诺罗敦国王（我们姓氏之起源。我祖母是他最宠爱的女儿）时代，绝不允许在方法上和礼节上出现任何差错。我母亲了解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所以悄悄地对那些受到粗暴对待的官员们说：“你们千万不要泄气，我婆婆在批评中并没有丝毫恶意。”但不管怎么说，对某些人来讲，这一天是漫长而艰巨的。

我在首都的正式巡行分四个阶段进行，每一阶段的交通工具都是不同的。第一阶段乘轿子。轿是暗红色的，轿杆上饰着金色的花纹，由身穿着上个世纪制服的皇家卫队的身强力壮的士兵们抬着；第二阶段乘车辇。车子形似凤凰（传说中的神鸟），由六匹黑马牵引着；第三阶段骑大象。这是一头长着长牙的印度式打扮的大象；第四阶段骑马。我骑的那匹马就是我起名叫欧百里香的马，它身上披着金色和银色的甲，在喧闹的音乐声中、在子民们高兴的欢呼声中、在那些把长发盘在脖子上的年轻婆罗门教僧侣们所吹奏的酷似那牛角或

螺的低沉号角声中，它一点也没有受惊，仍然很听话。可怜的欧百里香，可能因为它受不起这么重大的荣誉，在我加冕以后不久就死掉了。

然而，法国官员们和不少高棉资产阶级分子对甘霍小姐的敌意并没有丝毫消除。那些想“为了我好”的人认为我“行为不端”，应受到指责，因为甘霍小姐来到我身边之前已经不是一个童贞女。大家都知道她有一个情夫，名字叫乍华，在一次中了彩票之后成了百万瑞尔（柬埔寨货币）的富翁。我同她断绝关系后，甘霍小姐又找到了她原来的阔情夫，并给帕花·黛维公主和拉纳烈王子（她和我所生的孩子）增添了许多同母异父的弟弟和妹妹。一九七四年我在北京流亡时，曾有机会为她们中的一个男孩尼亚尔主持过婚礼。

还是回到一九四一年围绕着妩媚的甘霍小姐的斗争来吧！我和她的关系完全是共谋的，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我的母亲和其他民间妇女们都希望我能在民间妇女中间选上一位。她们说，我完全从吴哥君王那里承袭了“圣王”的权威，因为我那些杰出的先辈们都有不计其数的妃嫔，而他们在人民群众中都受到了礼遇和宽容。

我的祖父母苏他罗亲王和他的王妃认为医治我放荡不羁的唯一药方，就是立刻休掉甘霍小姐，娶一位年轻美貌的泰国公主为妻，我想在这里没有必要提起苏他罗夫妇对暹罗（以后改名为泰国）的感情，因为他们年轻时曾在那里受过教育，所以他们对暹罗比对法国更亲善。

我的母亲反对我（一直反对我）同任何一个女人结婚。

我的母亲说，我是注定要过独身生活的，因为我的星相预示着我绝对找不到配偶。我母亲的态度肯定不是要象伊俄卡斯忒那样，先是俄狄浦斯王的母亲，后来又成了他的妻子。我认为，不管是否有意识，我母亲想永远由她主宰一切，包括她的儿子和柬埔寨王国。我多少有一点象她，因为我的传记作者们在这方面都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都断定，我最怕的是失去柬埔寨君主特权和臣民们的爱戴。

在我加冕典礼的当天晚上，命运给了我一个不祥的预兆。一场大风吹灭了象征着胜利的蜡烛，那是当天上午我当着佛教僧侣和宫廷及全国达官显宦们的面点燃起来的。按照惯例，这支蜡烛应该保持三天三夜不能熄灭。

王宫和首都维护传统的人们个个都吓呆了。人们预言大灾大难将要降临到我头上，将要降临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可悲的是，这个预言果真应验了，因为我的统治变得越来越可悲。君主制被那些从君主制捞到好处的人废除了，国家也在一九七九年被越南人侵占，人民成了他们屠刀下的牺牲品。难道从登基那一天开始，我就是不幸的君主吗？

10

反对法国的山玉成集团

我已经提到过山玉成的名字，他是反法民族主义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曾鼓动我进行反对保护制的斗争。山玉成是交趾支那的高棉人。在四十年代，交趾支那的高棉人大约有六十万，他们生活在叫做“下高棉”的王国里，也就是下柬埔寨的高棉人。

直到十八世纪末，交趾支那一一直属于高棉王国。十九世纪初，安南人（从越南北部和中部下来的越南人）通过武力和利诱占领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半。一八五九年，法国人乘船到达西贡时，交趾支那另一半的归属问题成了安南部队和高棉王家部队之间争夺的目标。法国人采取了先全部占领这块土地再解决这个问题的策略，因此，这块土地首先成了法国的殖民地，而后又成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可以从法国的众议院派一名议员做驻柬代表。一九四九年，尽管我国政府多次提出强烈抗议，可是法国为了破坏胡志明进行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还是把这块历史上属于高棉的领土交给了越南的保大皇帝。五年以后，保大陛下的政权垮台了，法国人也

撤离了越南。

高棉反法民族主义团体由陈茂负责，此人是一个极为反动的七十多岁的老阴谋家，但他的阴谋经常被他自己泄露。这个集团的“大人物”是山玉成，这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政府官员，其傲慢和野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外表看，他是一个又矮又壮，皮肤较黑的人，脸上架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尽管他是同我争论最凶的政敌，可是他对我的父母却怀有真挚的感情，他一直到最后始终是我父母的忠实朋友。

这个团体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叫做巴春，他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标致男人。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战争期间，他曾在法国军队中服役，还获得了十字军勋章。回到金边以后，这位法国人的朋友，在“极端分子”的影响下，成了法国的反对者。他对我抱有敌对情绪，但同苏拉玛里特亲王及其夫人是好朋友，而这对夫妇是非常亲法的。

沈法是一个狂热的职业记者和政客，同时又是我父亲的挚友和我母亲的仰慕者。在六十年代，当他同我有难以置信的争论，并在他办的地方报纸上和他寄给外国新闻界的稿件中攻击我的时候，我母亲害怕我会把这个顽固的对手关进监狱，竟在我面前充当了他的辩护士。

读者们可以看出，上述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反对我，但却很热爱我的父母。他们似乎不考虑是亲法分子，还是反法分子。在他们看来，我的父母是高尚的、贤明的、谦恭的，而他们的儿子却是“一个没有教养的、放荡的、腐化堕落的人”。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对我来说，遗传学并没有起任何作用。

这个团体最后一位明星，是阿渣鸠（高僧）。这位高僧学识渊博，是研究巴利文和梵文的高等学府的毕业生。谙熟印度的这两种神圣文字，是要精通佛教必不可少的。由于阿渣鸠曾在金边巴利高等学校当过教授（我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他在教徒和非教徒的学生中颇具影响。

作为反法民族主义运动战略家的山玉成、巴春和沈法，他们知道为了把青年和人民争取到他们这一方面来，必须先得到佛教僧侣们的支持，因为佛教僧侣主宰着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柬埔寨人的思想。所以他们一直在做佛教僧侣们的工作，企图使这些人支持他们反对保护当局的斗争，而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渣鸠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在得到了佛教僧侣们的同情，加上占领柬埔寨和印度支那其他地方的日本人悄悄地给予支持，这个民族主义团体欺瞒了既不能又不想参加这个反法运动组织的年轻国王西哈努克，决定开始进行动摇保护国地位的活动。当时的时机非常有利，高级专员蒂博多在“废黜”了秀首相以后就退休，并将回法国去，戈蒂埃总督将要来接替他。此人是无与伦比的行政官员，既有学问又聪明，他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和将要到什么地方去。然而戈蒂埃却让一位伟大的航海家，但对行政管理一窍不通的德古海军上将给留下了，他身边需要这位高军阶的军官。

山玉成、沈法非常高兴地看到，由于没有法国高级专员驻在柬埔寨，法国在柬埔寨的行政机关就象无头之躯，特别是凶狠蛮横的“法国走狗”秀首相又被撤职回家（他很快就死在一个女人手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情欲非常强烈的情

妇)。

在我加冕典礼以后，精明能干的法国保安局长布罗什东先生告诉我，山玉成分子同某些日本军官有着不寻常的交往，这是不能不令人担心的。布罗什东先生谙熟这些秘密交谈的主题。他以他上级的名义要求我“拿出点厉害，”以平息高棉活动分子的反法情绪。

由于《诺戈瓦特》报开始攻击和指责我（虽然未点名），说我对柬埔寨的解放没做任何事情，我请求我的母亲代替我会见该报编辑部全体人员，请求他们对此做出解释。山玉成、巴春和沈法让我母亲放心，并对她说：“布罗什东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家，我们没有策划任何反对法国的阴谋。”

可是布罗什东并没有说谎，在我母亲在王宫里同山玉成分子谈话后几周，就发生了僧侣、大学生和教员（教师队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山玉成的）在塔山（高棉语读成“百囊奔”。“百囊”是山的意思，“奔”是奔夫人的名字。这个并非重要的山丘的名字，就是我国首都名称的来由。）附近的法国行政当局办公楼前进行示威游行的事件。高举标语牌和高呼口号要求柬埔寨政治和行政独立的示威群众与法国警察之间互相殴打起来了。一位僧侣用雨伞打了法国高级专员公署办公室主任，打得他鼻青脸肿。不少示威群众和法国警察都受了伤。

法国当局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带领僧侣们闹事的阿渣鸠被迫还俗，并送进了昆仑岛感化院。以后巴春也被关进了这座感化院。而山玉成，则被他的日本朋友藏了起来。这些日本人把山玉成打扮成国王陛下的军官，偷偷地送出了柬

埔寨。他逃到日本东京，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一九四五年。

这次事件之后，从表面上看，金边市已恢复平静，那些没有被捕的山玉成分子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了。日本军方也保证在法国与高棉之间的问题上，一定持不介入的态度。他们申明：他们与“雨伞暴乱”（历史上给这次游行起了这样的名字）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说，在与上层交往中，他们确实同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

在平静中，山玉成分子却在准备着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决定性的一击。

11

我的艳事和爱情

一九四二年，我几乎是要效仿了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六年前，他为了同他所爱的女人——一个已离过两次婚的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结婚而弃位。此举使他的人民非常惊愕。因为她，英国权势集团对他怀着敌意。而我的辛普森夫人是年轻的西索瓦·蓬姗莫尼公主——已故莫尼旺国王和他的一位妃子坤娜夫人的女儿，即我的后外祖母所生的姨妈（这种姻缘，正如我在本书第二章中所说那样，柬埔寨王族中近亲结婚是没有什么障碍的）。蓬姗莫尼进宫，是怀有野心的坤娜夫人以拜见我的母亲——莫尼旺国王的子女的保护人——而引进来的。她那时才十三岁半，但长得比实际年龄要大些，已经发育成熟了。她的美貌立刻就把我迷住了。背着我的母亲，我对她进行了试探。她对我……毫无娇羞地顺从了。

我们的爱情持续了九年（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五一年），共生下了七个孩子。他们是：

尤瓦那王子：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是我领导下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成员。红色高棉夺得政权之后，他

拒绝回柬埔寨，而同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们流亡到香港过着穷苦生活。

拉威旺王子：中学毕业（业士）。朗诺发动政变之后，投红色高棉参加抗战。取得胜利前两年，他病死在丛林中。

夏卡朋王子：高棉王家空军部队军官，被朗诺撤消职务，并于一九七三年到北京同我团聚。红色高棉取得政权之后，他选择了流亡法国的道路。在三个妻子（他是个多配偶者）的帮助下，他开了一个小小的柬埔寨饭馆，而且表现出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苏里亚·伦赛公主：她是我两个爱女之一。当我第一次流亡中国的时候，她同一个曾留学东德的高棉共产党的工程师结婚。一九七五年九月，她同丈夫和孩子们陪我回到柬埔寨。后来到一个边远省份。在一九七六年四月我辞去国家元首职务之后，一直未得到有关她们的消息。

甘塔·帕花公主：非常娇小可爱，是我的一个爱女。一九五二年死于白血病，时年仅四岁。

克马努拉王子：一九七〇年政变之后，他投军于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红色高棉的新闻部长符宁的保护下，他们工作着。一九七五年九月，克马努拉曾回到金边我的身边。

巴东·帕花公主：是蓬姗莫尼生的幼女。她曾嫁给我的外甥西索瓦·杜萨迪亲王，后来离了婚，又嫁给我们的一个空军军官索波塔先生。杜萨迪后来成为出色的抵抗战士。索波塔于一九七三年驾驶着美制飞机轰炸了朗诺的总统府，并驾着同架飞机到中国来投奔我。巴东·帕花也参加反对朗诺

的抵抗活动。“高棉共和国”的军事法庭指控她参加“颠覆阴谋”，把她关在监狱里好几个月。一九七三年获释之后，她到北京来找我。朗诺失败以后，她同丈夫和孩子们决定随我一起返回柬埔寨。一九七六年四月，她们同我彻底分开。

蓬姗莫尼公主为我所生下的孩子都始终生活在我身边，这充分说明我对她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她在红色高棉进占首都之前不久，病逝于金边。

现在，还是回到一九四二年，即我同蓬姗莫尼恋爱的时候来吧。法国政界人士对美丽公主的年龄和我们之间的亲族关系大加议论，那些坏人把“后姨妈”说成我的“亲姨妈”。海军上将德古受到了警告。他最后决定同即将回金边任高级驻扎官的乔治·戈蒂埃分手。在我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支持下，他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通。

为了同蓬姗莫尼保持关系，我尽力说服我的父母。为了不让人们对我们的关系说闲话，我请求他们同意我和她结婚。我母亲却给我一个沉重的打击。她说：“和蓬姗莫尼结婚？你就不想一想，她的母亲坤娜夫人和她的哥哥莫尼勒亲王曾欺骗过咱们的莫尼旺国王，这在整个宫廷是众所周知的。蓬姗莫尼和她的母亲一样不诚实，你是国王，她将来会欺骗你的。以后人们对这方面的议论，你妈妈这辈子的无法忍受的。”戈蒂埃先生也出来帮腔助势，他说：“不管怎样，法国是反对这种婚姻的。”我感到忧伤、惆怅，因此把我准备弃位的想法告诉我的父母。我母亲对我说：假如你把自己打扮成滑稽可笑的英国爱德华八世，也会同他一样受到各系王族的斥责。

我没有停止斗争。我向母亲夸耀蓬姗莫尼，说不能把她

同辛普森女士相提并论，她是王族，而且在我之前还是个处女。我母亲当即严肃地说：“王儿，你的一切活动都将编入王国历史。恐怕历史学家们会把在位期间的你，写成只会寻欢作乐，不关心国家事务的腐败君主。”

母亲接着说：“孩子，听我说，假如有一天，你因为不能从法国那里为王国争得独立而弃位，我国人民和世界上都会对你的功绩表示敬佩。但是，如果你为一个女人而抛弃王位，尽管你认为她还是个处女，但对你的父母还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对热爱你的子民们也是一种严重的罪过。”至于我父亲，由于他正热恋着舞蹈演员小叶，对此感到非常尴尬，只能羞涩地向我点头表示赞同。

最后，我认为母亲的理由很充分，我让步了。然而，尽管我父母对蓬姗莫尼给以非难，德古海军上将也对她很恼怒，但我依然把她保护在自己身边。

过去，被轰动的新闻界连篇累牍地报道说我有“不计其数的艳事”，有时还把我说成一个“浪荡公子”。当然，就是在我于一九四一年四月登基以后的时间里，直到一九五二年四月我赢得了莫尼克·依吉——我的患难伴侣——的心的时候，我一直就不是一个圣人。

这就是我诚实的自白。当我登上王位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聪明又腼腆的年轻中学生，是一点恋爱经验也没有的，在这十一年里，我接触过的女人总共也只有十九位女士或姑娘，我的记忆力是很好的，但那些短暂被我宠幸过的女子中，恐怕也会有一两位的名字被忘掉了的。我的相貌可谓是讨人喜

欢的，这是上苍的王母娘娘赐给我的。我是国王，既不会损害他人，又不缺少钱财。这就成为最讨人喜欢的王牌。正如人们所说，我到底象谁呢？那就是象我的父亲苏拉马里特亲王，他给我讲了一段“爷们之间”谈论的事情，说他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同各民族的女子有了无数的艳事。然而，他却认为这对他很好，并不觉得这是个耻辱。我虽然对自己作了谦虚的“估价”，但我还是再次把我的事公诸于众。

对那些诽谤我“放荡不羁”的言论，使我身边的高棉和法国老朋友感到好笑，因为他们看出这是为什么。但我是怎么会堕入淫荡境地，又是谁把我捧上王位呢？因为当时法国当局非常注意我的私生活，直至“要求”我结束那种关系，他们认为那样同我的身份不相称。

我有时在王宫里组织跳舞晚会，但我的舞会要比那些供要求苛刻的客人们玩闹的舞会正派得多了，他们往往在对国际集体舞“火车头”厌倦了之后就瞎胡闹。

我的法国朋友阿尔芒·里什博士、埃尔丁·戴佩古拉博士、米尔蒙特市参议员马蒂威特经常被邀请来跳探戈舞、华尔兹舞、慢狐步舞和伦巴舞，他们都能证明我所喜欢的是演奏萨克斯管、单簧管和手风琴，或者按照迪诺·罗西和弗兰克·西纳特拉的风格演唱歌曲。意大利影片《美满生活》中弗里尼那种淫荡的镜头，对柬埔寨王宫里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那里面居然让一位君王由于充当歌手或乐师而长时间的当众出丑。

我的其他“爱好”也都是无可指责的。开始时，我组织了马术比赛；后来，我又组织演剧，其中有一出是我根据画报

增刊的内容编写的。有一段时间，我成功地拍摄了一些没有剧本的影片。六十年代，我拍摄了一些高质量的影片，其中有的电影剧本是我写的。为保证演出，我也在其中扮演角色。影片中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们亲爱的柬埔寨人，我的用意在于介绍我国美丽的风光和精湛的传统艺术。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的爱情。在这里我要说出那些同我相好的女子的名字，这在柬埔寨是人人皆知的。对此，我的法国读者们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他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已熟知他们国王那些嫔妃们的名字，新闻界也毫不掩饰地披露了他们共和国大人物们的风流韵事。

人们已经知道，我第一个爱的人是甘霍小姐。我们的相爱持续了两年，即由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这位爱妻为我生育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儿是帕花黛维，后来成为高棉古典芭蕾舞第一号女演员；儿子拉那烈，后来的法学博士，曾是埃克斯·普罗旺斯大学的教师。

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五一年，我同西索瓦·蓬姗莫尼公主有着较长时间的关系，我在前面就此已作了详细的介绍，还说过她为我生育了七个孩子。

一九四四年在与石夫人有过短暂的艳事之后，我同西索瓦·莫尼盖姗公主有了一段真正的爱情。她是蓬姗莫尼的同父异母妹妹，是莫尼旺国王同他的一位妃子达特夫人的女儿。莫尼盖姗非常信教，和曼特农夫人一样有道德。她为我生了一个儿子，即曾在柬埔寨和中国学习并取得优异成绩的纳迪波王子。他非常正直和朴实，热爱人民。他的母亲在他出生

后几个小时就辞世了。在莫尼克之前，我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心里就特别的爱恋那诺罗敦·诺丽亚公主。她是我的姨表妹，即我母亲的亲姐姐西索瓦·塔薇公主的小女儿。她于一九四五年同前夫诺罗敦·瓦克里万亲王离婚。直到一九五五年，我在让出王位的第二天，利用我母亲正忙于同我父亲准备继承我的王位而举行登基典礼的时候，同诺丽亚结了婚。在同她结婚之后二十四小时，我又同莫尼克·依吉结了婚（在我家里多妻制是得到允许的）。从此，诺丽亚逐渐地同我疏远。一九七五年，在她的姨母哥莎玛王后归天之后，她便到法国隐居。现在，她已被接收到安置老年人的养老院里。

比我小十二岁的万象老挝姑娘玛尼婉，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曾是我的伴侣。她为我生了两个女儿。她们于一九七〇年站到“共和主义”阵营一边。姐姐苏佳塔，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同她所崇拜的施里玛达亲王一起在金边被红色高棉捕获，后来她便消声匿迹了。妹妹阿伦同她的丈夫——施里玛达的儿子一起流亡美国。

必须重复一下，一九五二年是我开始迷恋着莫尼克·依吉的时候。在这本回忆录里，我还将再次谈到她。

正如人们所知，我父亲在与叶小姐接触之前，沉浸于无固定对象的艳事中，而我则和他不同，我对那些被我宠幸过的女子，都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关系，她们和我所生的孩子都不是没有父亲的，而且都无例外地被封上了王子或公主殿下下的称号。

此外，我还有一些短暂的艳史，大都是和王家芭蕾舞团那些美丽的女舞蹈演员。这些美人有的和我亲近，有的和我

们军队中那些富有魅力的军官相好，有的则跟着金边市有钱的官员或“富翁”们。最后，她们都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丈夫。

最后，我还要提一提我首次正式访问巴黎的时候所认识的两位漂亮的喜剧女演员和一个著名夜总会里的一位形态优美的女顾客，那个夜总会的茨岗小提琴使我陶醉不已。

这就是我全部的“不可胜数的艳事。”它引起了“美好社会”的伪善斥责和我的传记作家们不怀好意的评论。唯有热爱我的高棉“子民”们认为，在我年轻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快乐快乐。他们还说，如果同我们王廷的前辈们相比，我还是相当有理智的。

人人都有各自的道理！

12

挽救计划和对印度支那的访问

新任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戈蒂埃先生是一个既果断又很富有想象力的人。为了提高我在印度支那和法国上层社会的崇高形象，他设计了一个三点“挽救计划”：

一、作一次对整个柬埔寨的视察，包括豆寇山这样不被人们注意的山区也要去；然后，从南到北穿过整个越南，即由交趾支那、安南到东京；然后，再从北到南穿过老挝的川圹、朗勃拉邦、万象和巴色。最后经过上丁回到柬埔寨。

二、进行现代化的改革，主要是实行柬埔寨文字拉丁化；正式使用格里历，不再按着阴历在四月十三日过高棉新年，而是在公历一月一日过新年。

三、同一位很有教养、出身高贵的高棉资产阶级小姐结婚，她将和我一起分享柬埔寨王权。这个婚礼要按照保大陛下同一位具有现代女君主风度、出身高贵的漂亮的交趾支那女子举行婚礼的意图和风格进行。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计划的结果吧！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很好的设想而已。如果读者们同意，我先从计划中的第三点开

始叙述。

婚 姻 计 划

漂亮的戈蒂埃夫人选中了秀珍小姐，她是前首相秀的孙女，也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后来成为红色高棉的部长秀臣、秀木和秀蒲拉西的妹妹。和蒂博多先生相反，戈蒂埃先生对这一家人怀有好感和充满敬佩。说实话，这个家庭是柬埔寨最荣耀和最有学问的家庭。珍小姐并不漂亮，但她和安南王后南芳具有共同点，就是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且知识面很广，同时也是一个完全够格的家庭主妇。一些人认为这也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即她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只相差几个时辰。

这个设想得到了法国和高棉上层社会的热情赞同。我的父亲一贯做事特别谨慎，但对此也表示没有意见。而我的母亲，仍固执地信守我的星相注定要独身终生。实际上，我的母亲非常清楚，在礼宾顺序上王后要排在她的前面。在她看来，这是不礼貌的，也是不可容忍的。

我认识珍小姐，她品德高尚，很讨人喜欢，令人敬佩，但她的外貌却一点也不能吸引我。如果一定要我把她娶过来，我将是一个不好的丈夫，因为我将到别处另寻欢心。一位欺骗王后的国王，比一位手里捏着几朵“花”的独身国王，将要受到更大的谴责。在这个问题上，我母亲是我客观上的同盟者。她很有分寸地把我的要求，向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夫妇进行了解释，说我不愿意和这样一个虽然令人敬佩但

我并不喜欢的女子结婚。戈蒂埃先生对我的拒绝有点不愉快。

我拒绝和珍小姐结婚，还给我带来其他预想不到的不幸后果。从那时之后，具有影响的秀氏家族一直反对我。一九四一年莫尼旺国王的逝世，就曾使这个家族遭到了一次惨败：我的舅父莫尼勒王储早就娶了珍小姐的表姐，漂亮而有魅力的卜婉娜，又称为罗塞特卜。如果象人们（也包括他们自己）所预料那样，莫尼勒真的成为国王，秀氏家族就会因此成为全国最显赫的家族。但是，法国保护当局却把我推上了王位，打破了他们的这个美梦。

珍小姐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家庭中最后一个赌注，法国人选中了她，想让她和我一起登上王位，但被我拒绝了。这对她的亲属来说，是一个不能忍受的冒犯。由于对我的仇恨，珍小姐的哥哥们先是参加了山玉成集团，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卜婉娜的侄子卜·德斯库马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外交官，他在六十年代也进入了丛林投奔了红色高棉，为我的下台效了犬马之劳。

据我看，柬埔寨最有钱有势的家庭成员都成了共产党分子，这并不能解释为他们突然对“无产阶级产生了感情”，而应该看到这是家族之间的仇恨，他们的失败和所受的污辱，促使他们走向极端来反对我本人。因此，前者是不自觉的，而后一种情况则是自觉的。

现代化改革计划

戈蒂埃先生强烈地推动着我，把我的名字同改革联系在

一起，他还对我说：这次改革可以使您的王国和人民走上进步的道路，高棉的年轻一代将称您为“我们的阿塔土尔克”（土耳其人民送给一九三八年逝世的现代化土耳其奠基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称呼，其意为“土耳其之父”）。

高棉文字拉丁化勉强地被政府官员们所接受，但却遇到了佛教僧侣和习惯势力的强烈反对，因此，在日本人武装进攻驻柬埔寨的法国人以后不久，我就宣布废除高棉文字拉丁化。

在用格里历代替阴历方面，我也遇碰到了同样一些人的反对。然而，这次却得到了我母亲的支持。我的母亲对《浴佛节》不再是四月十五日（柬埔寨传统新年的第三天），而是一月一日，感到非常高兴。按照传统习惯，虔诚的佛教徒们在这一天里用香水为大小佛陀塑像沐浴，并用泡有香花的水泼在僧侣们身上。原先这些僧侣在柬埔寨一年中最热的四月份参加这样的仪式以后，又接受信奉佛教的善男信女们送来的新的黄颜色的袈裟，是感到非常惬意的。但是在改革之后，我亲爱的妈妈也不是不担心那些年事已高的僧侣们，在“隆冬”季节（也就是从十二月到翌年一月的凉季）被那些未经加温的“冰水”淋在身上，再加上刺骨的北风（可能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真有可能会感冒或冻得发抖……。

面对着这种可悲的情况，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事变”之后不久，我即下了圣旨，不仅废除了一八六三年签订的法柬条约和一八八四年的协定，同时也为佛教徒们废除了同天主教徒一起在一月一日过新年和在“冬天”泼水的规定。我对这些“传统习惯”的做法，得到了虔诚的佛教僧侣们的欢迎。

由于这场改革引起人们对我的不满，但后来人们又被高兴和满意所代替，而我自己也尝到了甜头。

印度支那的旅行

戈蒂埃先生对我颇有好感，在我一九七〇年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他待我那种堪称楷模的态度，又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之间的友好感情。

他们这个创举（指印支的旅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前面我曾叙述过我在一九四一年和蒂博多先生一起做的第一次非常成功的对王国各省的巡视，但在那次视察中，很显然我没有能够深入到我国最偏僻的地方去，而“戈蒂埃计划”使我来到了柬埔寨最边远地区的同胞们中间。这些同胞们承认，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国王。他们知道，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但他们承认，从来没有一位君主到过他们这些县城或村庄。为了到这些边远地区，我有时乘汽车，有时乘轮船，有时乘牛车，有时甚至骑马或骑大象。由于当时还没有跑道和导航设备，所以根本就不能乘坐飞机。即使比较简便的直升飞机，在印度支那也是十几年以后才出现的。

一九四三年，戈蒂埃先生陪同我乘坐汽车和汽船。在这次旅行中，还有几个法国人组成的护送小组。这个小组由加斯东·巴罗尔先生负责，其他人中主要有我的副官戴布瓦松先生、新闻处处长德雅尔丹先生（负责起草新闻报导，后来这些文章都成了文学作品）和我的私人医生里什。当然，这个小组还包括我们所经过各省份的法国地方官员和高棉省

长。

戈蒂埃先生出色地组织了国王到柬埔寨西部根本无法进入的豆蔻山地区去视察。我在这里提一下，那里就是一九七九年的时候，在越南装甲车的追赶下，红色高棉逃去避难的地方。这个地区地形高低起伏，完全被热带丛林所复盖。我就象一位吴哥时期的君主那样，短途时乘坐牛车巡视，以讨好农民。在那里骑马或骑象到处都可以通行，但戴布瓦松先生和里什先生却喜欢步行。

在山沟的村庄里，我向子民们发放了大米、食盐、衣服和药品。那些贫穷而高尚的子民们向我祝福，并给我送来了野果——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奉献给我的东西。但这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和令人感动的记忆。

我的豆蔻山区之行以没有被泰国占领的菩萨省北部为出发点，南部则以与泰国相邻的美丽的海滨省份戈公为终点。

驻菩萨省的法国专员贝尔纳先生的厨师(越南人)做了拿手好菜，而他的主人却很擅长狩猎，定期给我送来当地的猎物。和我同桌的巴罗尔先生、戴布瓦松先生、德雅尔丹先生和里什先生(他们将在戈公和迪韦尔专员重聚)特别高兴地看到，连最有名的法国食品专栏编辑都会感到惊讶的特殊风味的菜肴。一天，他们给我端来了清炖母雉、野猪排、烤豆蔻山幼雉和野果。又有一天，我品尝了葡萄酒炖雄雉、烤孢子肉、野猪生火腿和用椰子做的糕点。当然，在菜单上没有鱼和蔬菜，但不管如何，这些野味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各大餐馆供应的烤猫、烤老鼠和动物园里的动物肉一样，有另外一种特点(或叫做别有风味)。一八七一年，是普鲁士军队围困巴黎

的时候。

自从我即位之后，在我做为国家首脑的整个时期里，这种“深入”柬埔寨内地的巡视，每年都要进行的。直到一九七〇年朗诺政变之前，每个星期我都要安排到各省各县去视察，作指示，亲自参加整治土地的集体劳动。我和农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友爱。这种友情，经受得住暴风雨的考验。由于朗诺，以后又是红色高棉，使我在七十年代离开了人民大众，这给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由于北京的中国朋友和平壤的朝鲜朋友们的爱护，让我过着“帝王”生活。但这种生活也消除不了我的痛苦，我依旧象一条离开了池塘的鱼一样感到不舒服。

我非常感谢德古海军上将为我组织了对越南和老挝的正式访问。在交趾支那，我可以同西部各省份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下柬埔寨的）高棉族接触。他们是这些美丽省份的历史性主人。

这些与祖国分离的同胞，对我的欢迎是非常动人的。许多年纪很大的农妇把我包围住了，不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讲得一口流利的高棉语（带着阿尔萨斯口音）的赫费尔省长只好进行调解，以便让这些老实的农妇们把我放开。在安南顺化，我受到了保大皇帝和南芳皇后隆重的接见，他们还设宴为我洗尘。唉，不巧，偏偏那天正好是耶稣的忌日，而皇后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很抱歉地说：我们只好吃一顿只有鲜鱼和蔬菜的饭了。但是，为了我而修复的豪华的安南古老王宫却使我着了迷。不久以后，即在六十年代，我

仿效保大皇帝的办法，重新恢复了吴哥宫院的豪华景象，以便接待我尊贵的客人和朋友，例如，戴高乐将军夫妇、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夫妇、苏加诺总统（没有带夫人，因为他有好几个老婆）、海尔·塞拉西皇帝和他的一家。

在河内，德古海军上将和他的夫人——一位身材修长，非常漂亮的妇人——在他们的公馆里非常盛大地欢迎我，就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后一位总统阿尔贝·勒布伦在巴黎接见一位外国君主一样。

在身穿红、白两色制服、佩刀出鞘的一个班骑兵的簇拥下，我乘坐敞蓬汽车游览了首都。晚上，在灯火辉煌的总督花园里，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招待会，最后演出歌剧。

访问了河内之后，我参观了海防港、锦普——红海露天煤矿，然后乘汽车沿着阿斯特里德王后（比利时利奥波德三世的夫人，在一次车祸中遇难）所走过的公路到老挝北部。我看到了有名的查尔平原，我还见到了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历史中都有记载的奠边府、桑怒和丰沙里地区的山区部落民族。

在朗勃拉邦，我有机会向西萨旺·冯国王和王储（不久就成为老挝国王的西萨旺·瓦达纳陛下——杰出的知识分子，热情好客的主人）再次表示谢意，感谢他们都参加了我的加冕典礼。我非常欣赏朗勃拉邦那酷似高棉传统形式的古老的老挝王宫，我后来为它谱写了一首歌曲。我同样被那不象高棉舞蹈那样娇揉造作，而是更为自发的老挝舞蹈所吸

引。象塔希提岛和巴厘岛的姑娘一样喜欢用花打扮自己的年轻的老挝姑娘们，更是令人着迷。身材不高，相貌端庄细腻的老挝姑娘，一笑就低下头去。于是，我便下决心要在我所爱的女人名单中再添上一位漂亮的老挝姑娘，然而这是一九四九年的事了。

在万象，我受到了非常有威望的，有影响的万象古代君主家族的族长佩差拉亲王的接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为了朗勃拉邦王族的利益而统一老挝之前，老挝是由好几个公国组成：即北部朗勃拉邦公国、中部的万象公国、南部的占巴塞公国。我过去就知道身材不高，皮肤棕色、有小胡子的佩差拉亲王是我父亲的最好朋友，他们两人都是法兰西印度支那政府委员会的成员。由于这个职务，他们曾多次去西贡和河内小住，这就使他们能在那里各自度过了几个“美好的、温存的和风流的”良宵。佩差拉的同父异母兄弟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后来也成了著名人物。梭发那·富马成了西萨旺·瓦达纳陛下时期最后一位中立派的首相，而苏发努冯则成了老挝爱国战线党（巴特寮）的领导人和社会主义老挝的第一位国家主席。

我经过上丁回到柬埔寨。上丁市是建在三条河流（湄公河、斯雷桑河和斯雷波克河）汇合处的一个景色迷人的小城镇。我又重新回到了能歌善舞的高棉老挝族姑娘中间。

老挝族的魔力一直陪伴我回到我的祖国。这是命运的一种标志。朗诺政变前几年，我曾主持过印度支那人民“反帝”团结运动成立大会。在金边举行的这个运动的首次会议预示着有名的广州会议（一九七〇年四月）的召开。当时，代表

越南北方的范文同，代表越南南方的阮友寿、代表老挝的苏发努冯和我本人，我们分别代表本国人民保证，在反帝斗争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我们将永远团结在一起。

柬埔寨的和平时期是短暂的。和平被破坏和玷污了，然后又又是新的战争。越南共产党在用武力占领共产党领导的柬埔寨之前，先控制了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老挝。我们的友谊与团结的庄严誓言，在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所采取的弱肉强食法则面前已经烟消云散了。

13

日本占领下的柬埔寨

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的军事事变，日本加强了对柬埔寨的军事占领。但是，在对战争初期戏剧性的胜利一阵狂喜之后，日本却遭到了一系列可耻的失败。

不可抗拒的美国战争机器开动起来了，什么东西也抵挡不住。保卫日本群岛的前哨阵地一个一个地丢失，他们在各地的驻军也被歼灭了。在缅甸，盟军在著名的蒙巴顿将军指挥下，把日本军队赶到东部靠近泰国的地方。而泰国所采取的策略，是想以简单地更换领导班子的办法，使自己能够站到战胜国一方。因此，泰国对曾经帮助它在一九四一年强占了柬埔寨和老挝一大片领土的“忠实盟友”——日本，越来越公开表示不满。

由于看到泰国将要倒向西方阵营，又害怕泰国给英法联军提供通道，日本人企图把弱小柬埔寨变成新的防御基地。日本人增调了不少援兵，为了使这些援兵能有舒适的住处，他们把大部分高棉学生赶出了砖石结构的学校（其中包括在金边市区的我亲爱的弗朗索瓦博杜安学校）。更令人惊奇的

是，为了烧饭，他们竟卸下了这些学校的门窗当劈柴烧，我国政府只好匆忙建立起一座座草棚充当教室。

沥青铺得很好的国家公路，在日本大卡车的压力下，很快就被毁坏，而那些日本卡车的数量和通过这些公路的次数仍在不断增加。我们也无力进行必要的维修，因为日本人征用了我们（很穷的）公共工程部仅有的几台修路机，并把这些机器开到他们自己的工地上：修小型掩体和飞机跑道，以便接应他们在泰国的空军撤退。

我们的法国保护者确实有权保持沉默。时机一到，日本人只需反手一击，就可以把法国人赶了出去。我比法国人更加无能为力（原因不必赘述），我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脚踏两只船的日本人：他们一方面越来越积极地支持山玉成反对君主制的民族主义集团，另一方面又支持几位玩弄阴谋诡计想把我从王位排挤出去的王族成员。

在这些人当中有诺罗敦·蒙达那，他是我父亲远房的叔伯兄弟。此人曾是法国的宠儿，在我“当选”为国王以后，法国人免去了苏拉玛里特亲王农业大臣的职务，派他接替了这个位置。另外一位是诺罗敦·诺林德，他是我父亲的另一位叔伯兄弟，他曾受到良好的法国教育，也是柬埔寨最有钱的人之一。从一九四二年以后，这两个人同日本人眉来眼去，最后他们终于在“太阳升起之国”开始落到地平线的时候，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可见，这两个人在这方面确实没有泰国人聪明。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我至少有一点是满意的，即我为我

国的年轻人做了一点好事。自从泰国侵吞了马德望省以后，我们丢掉了柬埔寨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只剩下金边的一所高级中学了，在首都和外省小学也非常少。法国保护者曾在一九四一年底送给我相当于一九七九年五万法郎的继位赠款，有人建议我用这笔钱在王宫修建一个游泳池或在乡下修建一座行宫。但我决定把这笔钱用于我国第二大省份——磅湛的教育事业。由于我的这笔捐赠，磅湛市有了一所漂亮的初级中学，后来升为高级中学，因此，我的这个行动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为了表示他们内心的喜悦，这个省的居民和青年们决定将这所中学命名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中学”。从此，尽管王国丢失了马德望学校，但我们却又有了一所新的中学。就象金边的西索瓦中学一样，日本人也不敢征用这所以国王名字命名的中学。

可是我得到的民心却是很短暂的。不了解我在多么困难的处境中进行挣扎的高棉人，谴责我让法国当局为了印度支那其他地方的利益，在我国推行了人民反应强烈的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的措施。在这个方面，可以做几点解释：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战争年代，盟国海军对日本占领的国家采取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印度支那当然是其中之一，因为印度支那也包括在日本人臆造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之内，并以此作为骗人的诱鸟反光镜（日本人自诩为猎人，而亚洲“兄弟”国家则是那些被恬不知耻的拔掉了羽毛的鸟）。从日本开来的船只没有带任何礼品、任何援助和一粒粮食给那些所谓从“西方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可却把这些“兄弟国家”的财产，特别是对日本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运

往日本。日本人的解释是很简单的：“我们承受了战争的压力，而我们进行这场战争就是为了你们。等到这场战争胜利了，你们将获得彻底的民族独立，那时你们国家就可以更协调更快地得到发展。”

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之前，柬埔寨一直有两个主人，日本主人要我国人民向他们提供廉价的非正规部队的战斗员、劳工、给养（大米和鱼）和木柴（因为光靠学校的门窗是不够用的）。法国主人要求我国农民提供木棉（一种类似棉花的植物纤维），为在严寒气候地区生活的东京人御寒缝制棉被。我国的男女织布匠人都动员起来干这个工作。法国当局却忘掉了在四十年代，我国生产的棉花数量很少，而且由于限制棉织品的进口，我国人民如果没有用木棉织的布，就只好穿破烂衣服了。法国人还规定，要从日本人征用大米的剩余部分中，拿出一部分来供养印度支那的一些饥饿地区：安南北部，东京的一半和老挝的三分之二地区。此外，法国人还要求我们拿出大米来制造法国和印度支那行政机关车辆使用的燃料（辛烷值很高的酒精）。

在正常年景时，我国是重要的产米国家，现在大米已奇缺。当然，他们总是以“声援”印度支那人民的名义要求我们做出“牺牲”。但是这些“牺牲”沉重地压在我国工匠和新兴的工业者的头上，也使我在我的天然同盟军——我的臣民面前处于不舒服的境地。确实他们有理由抱怨大米和布匹的价格猛涨。我国农民愿意用木棉织布，平时储存一些大米，以供全家享用。他们对此并没有隐瞒自己的不满情绪。

我在一九四四年对各省的视察中，了解到小小老百姓的

这些困难。衣、食、住都依靠老百姓并一度被山玉成分子鼓动起来提出合法要求的佛教僧侣们，非常了解老百姓的这些忧愁，他们也指责我在法国当局面前表现“迟钝，”好象是我允许法国当局“刁难”我的同胞似的。

我在法国人和日本人面前的无能为力，并没有引起我国那些好心人的同情。在视察时，我听到了这样的议论：“国王陛下是神灵的化身。我们现在的^{不幸}，是因为陛下不愿使用您那神奇的权力来解除我们的苦难之故。请陛下可怜可怜我们吧？”对这些请求，我不能生气，但又让我怎么来作回答呢？我答应向菩萨祈祷，请菩萨和神灵加速这场战争的结束。正如我多次重复说过那样，这场战争的“唯一原因就是由我国的一切邪恶造成的”。

14

健康的灵魂存在于健康的体魄之中

健康的灵魂存在于健康的体魄之中，这是朱韦纳尔的座右铭，也是被德古海军上将任命为印度支那体育和青年高级专员的迪科鲁瓦海军上校的座右铭。仪表堂堂、威严庄重的迪科鲁瓦想要把所有印度支那和法国青年训练成为具有坚定精神的完美的运动员，既能抵制戴高乐主义的诱惑，又无限忠于贝当元帅。由于迪科鲁瓦是一个狂热的“贝当分子”，所以每次运动会开始时，他就让年轻的高棉人唱贝当元帅的国歌。在金边体育场，我们的田径运动员面对贝当的巨幅画像，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声朗诵着：“元帅，我们这里在您——法国大救星的面前宣誓：我们是您的保卫者！”

有一个名叫沈法的年轻学生是反法政客（他后来却又成为法兰西联邦的参议员）他经常参加这些活动，但又在我的跟前嘟囔着：“在小学，法国人总是让我们重复奇怪的历史课：‘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是金黄色头发的雅利安人’，而现在又说贝当元帅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什么都清楚了！”

迪科鲁瓦对我非常敬重，但我作为柬埔寨君主，尽管被

夜间的爱情生活搞得很疲劳，仍然要积极参加田径运动和其它体育活动，每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在毕业于著名的儒万维尔学校的优秀教练米勒尔军士长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我在王宫组织王国各部门之间优秀选手们的足球赛、排球赛、篮球赛和田径赛，而我本人也积极参加。

我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马术——跳越障碍。欧百里香那匹马死了以后，戴布瓦松先生把他的马——达特兰借给我一段时间。为了不长时间地夺别人之美，我在河内搞到了一匹阿拉伯和安南杂交的马——黄道。这匹马是著名的索穆尔骑士邦德来·丹贝勒上尉为我挑选的，他又为我把这匹马训练成为极好的座骑。黄道披着一身灰白色的毛，和纯种马一样，跑起路来既轻快又勇猛。它从河内来到我这里，一点也没有出毛病。在比赛中，甚至同交趾支那最强队比赛时，我和它一齐取得了令人不能忘怀的胜利。这是一匹非常可爱和非常聪明的马。在骑过它以后，我总是给它卸下马鞍，可是它不象其它马匹那样利用这个自由机会去草地上蹦蹦跳跳，却象一条狗那样跟着我走，而且还按我的步伐调节它的步伐，在我和来访者谈话时，它就停下步来。黄道在我痛苦的国王生活中，给了我极大的乐趣。

我是个喜欢体育的国君。我在王国里，提倡体育运动，并以身作则。

我是一个篮球选手，我喜欢自己亲自训练柬埔寨国家队。在国家队里，有几位是我在弗朗索瓦·博杜安学校读书时的老同学（其中最有天賦的是西索瓦·慈乃旺），还有的是我

在沙士鲁·罗巴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例如，罗伯特·拉库蒂尔）。在西贡时，我的篮球队在战胜了由“无数”法国人和堤岸（一座靠近西贡的华侨商业城市）的那些才智出众的中国人组成的强大篮球队以后，获得了印度支那篮球冠军。

在田径方面，高棉队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西索瓦·慈乃旺是印度支那的百米赛跑和跳高冠军。皇家卫队的一名军官郑中尉获得了印度支那二百米短跑的冠军。

但是，足球是我们的弱项。在比赛时，柬埔寨队在印度支那五个国家中只赢了老挝一家，名列第四，排在交趾支那、东京、安南之后。我曾设立了“西哈努克杯”来发展金边西索瓦中学（柬埔寨人）和西贡沙士鲁·罗巴中学（法国人）之间的友谊。在轮到金边球队去西贡时，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望我过去的老师（我全都给他们授了勋），会见我的老同学。有一些人还到“大陆旅馆”同我一起吃饭。我在我的老师卡泽讷瓦的家里同他的夫人和他们漂亮的女儿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我还同我寄宿学童时代的代家长佩雷拉一家在城里散步。

是的，我的许多美好的回忆是同西贡相联系在一起。我在那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我早已经预感到今后的年代将与过去是截然不同了。……

15

一九四五年三·九事变和山玉成的归来

在多灾多难的一九四五年中那个倒霉的三月里，象在印度支那其他地方一样，战神将在柬埔寨得到它最喜欢的祭品——血。

日本抗击法国保护制度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了。老实说，长期以来，法属印度支那一直忠于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国“合作”的贝当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垮台七个月了，其领导人正在特别最高法庭受审，他们的同伙也正在被追究刑事责任。法国领土的解放者戴高乐将军，在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掌握了政权。当然，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也越来越多地转向戴高乐将军。不管原来是“贝当分子”，或者一直都是戴高乐分子，因为他们都是法国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无法选择的。

无论如何，德古海军上将仍竭尽全力，想保持印度支那永远属于法国。虽然经过屡次挫折，日本已经大大削弱，但它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强大。因此，德古将军一方面要在日本人面前演出一幕“忠诚”的喜剧，另一方面还

要秘密同法国新政府和新的法军司令部进行接触。但是，他在印度支那的一些同胞的行为，不能使他的工作顺利进行。由于这些人不懂得，日本人即便状态非常不佳，但还可以承受得住最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就在到处刺探情报的日本间谍（大部分为越南人）面前大谈其所听说的由军队提供装备的登陆或联合演习。

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中，根本没有彻头彻尾的亲日分子，他们经常公开或私下嘲笑日本人。特别是在柬埔寨，日本人曾经恣意地污辱法国保护当局，并支持反法的民族主义运动，策动那些不久前还在法国人面前发誓“永远热爱”法国的亲王们割断同法国的联系，煽动人民群众以粗暴的态度来对待那些“保护者”，甚至起来造他们的反。日本人知道自己的末日快要到了，他们所采取的报复行为是：煽动它的天皇的殖民地人民起来反对西方，给西方留下一个暴乱的动荡不安的亚洲。

法国高级专员戈蒂埃，被仍在企图避免不幸下场的总督召回河内，由高级公务员贝尔朱安代替戈蒂埃任驻金边代理高级专员。贝尔朱安请求我在三月初接见他。他告诉我：“日本人力图在几天以后，结束法国在柬埔寨的保护制度和在整个印度支那的统治。”他向我保证，法国一定要武装抵抗到底，要求我一听到金边市警察局的警报，就把全家搬到他在洞里萨河畔，塔仔山脚下，离王宫只有两公里的官邸。一句话，代理高级专员的要求是，要我同把我扶上王位的法国保护制度共存亡，死也要死在他的官邸里。由于我对此深知底细，我对他的建议表示同意，并对他说：“就这样定下来吧！在法

国和日本之间，我一定选择法国。”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警报突然响起来了，我立即找到我的司机，把帽子扔给他，我们乘了一辆小的公务汽车。因为乘坐这样的车，容易被误认为是一辆平民的汽车。我们的车疾速驶向高级专员的官邸。我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住在离王宫一公里的地方。他们也应到贝尔米安先生那里去，但愿他们已经到了。

我到官邸的后面，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这里一切非常平静。但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阵自动步枪的枪声。由于不知道怎么办，我叫司机把我送回王宫。在半路上，我看见法国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尸体横卧满街头。我们在路上，还碰到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巡逻队。我请求佛陀保佑，不要让我遭到逮捕。佛祖果然满足了我的请求：这些日本兵只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通常为普通高棉人所乘坐的我那辆破旧不堪的车子。

我们来到了王宫的围墙边，许多日本军官和士兵正在那里审问我的卫队。我命令我的司机冷静地行车，并把车子开到附近的一座庙宇——巴东·瓦岱寺。夜幕降临，我的汽车开进了这座庙宇的后院，僧侣们已经进入了他们自己的房间。没有一个日本人看见我。我朝高乌法师的卧室走去。自从我登基以后，我同这位高僧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这位出家人让我在他的卧室里藏了一夜，并请我和他一起背诵佛经，求佛陀保佑我。他还对我说，如果日本人来了，他准备牺牲自己来保证我的安全。他还建议，如果日本人宽容了我，我

应该在沃萨期间当一段和尚，以报答佛祖的恩德。我答应了这件事并在一九四七年还了愿。不久以后，为了表示对这位见义勇为的高僧的谢意，我封了他一个“桑岱”（即王爷）的爵位。这是授予一个宗教人士或世俗人士的最高荣誉称号（我曾在我加冕以后授予德古海军上将为“王国的护国王”）。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我继续躲在高乌法师的卧室里，直到一个愉快的柬埔寨人和一位杰出的面带笑容的日本人来到这里。这位柬埔寨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舅父布洪。他是我母亲的表兄弟（他的母亲潘薇拉公主是我们外祖母——莫尼旺国王已故王后的妹妹，但嫁给了一个平民）。布洪是山玉成——沈法反法集团的成员，但他和我的父母关系很好。那个日本人也认识我，他是一个店铺的老板。当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他开的那个铺子里买日本饼干，每次去都受到他的照顾。这家铺子离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官邸不远。布洪向我透露了他的这位日本朋友的真正职业，原来他是一位天皇武装部队的情报官，多年来在金边开了这一片店铺作为掩护。

我舅父很高兴地告诉我，日本人已决定保持我的王位，并允许我父母和我在一起。在日本占领者那里，我舅父是我们最好的辩护人，很可能是他救了我们的性命……。

在我的舅父布洪和原日本店铺老板的陪同下，我三月十日回到王宫，他们搞的排场很大。在东门口，一个连的日本步兵向我致敬。布洪带来了一个名叫多田熊的日军中尉，负

责我的安全保卫工作。日本投降以后，他进入了丛林，并在很远的一个山谷里当了一名“高棉”和尚，后来又成为巴利文和梵文专家。而我的副官戴布瓦松和贝尔朱安先生以及其他我认识的法国人都被关在金边的一座日本监狱里。

在王宫，我又看到我父母，他们安然无恙。头一天，他们听到警报以后，就赶快乘车来到法国高级专员的官邸，但是我舅父布洪也正好赶到那里，他不让他们进去。在一个有远见的日本宪兵为他们租下的一座房子里，我父母亲又见到了农业大臣诺罗敦·蒙达那亲王和其他亲王们。蒙达那亲王自己感到在劫难逃，他连续不断地喃喃自语道：“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今后将会有一位新国王！”而我父母却喜欢沉默。三月十日，的确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并不象蒙达那希望那样的变化。

诺罗敦·西哈努克仍是国王。高棉王室和王国政府的日本“高级顾问”久保田阁下是一位很有分寸的职业外交官，并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和驻柬埔寨日本军队司令官真木将军前来觐见，我在金銮殿接见了他们。他们对我说，我们国家从今以后就从法国殖民主义那里解放出来了。日本所进行的战争，并没有别的野心，只是为了阻止西方人变我们的亚洲为他们的殖民地。他们请求我正式宣布柬埔寨独立，我对他们说，为了符合我们的民族传统，我要请占星家选择一个吉日。这个日子就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宣布了民族独立并颁布了法令，废除了一八六三年的保护条约和一八八四年协议。

那些亲目的民族主义者组织了一次“民众”游行，以庆祝

刚刚得到的独立，但这个独立只是一棵空心大白菜。三月十一日以后，我曾给日本政府写了一封正式公函，要求日本政府从法律上承认柬埔寨王国并互派大使。而日本政府直到它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时，也没有作出回答。一直到最后一刻，日本人始终保持着它的“高级顾问”，而这个“高级顾问”有点象过去的高级专员，所不同的是“高级顾问”不主持内阁会议，也不签署诏书和政令。由于久保田先生是一位谨慎和有分寸的人，我适应他并不太困难。当他请求我允许长期流亡日本的山玉成回柬埔寨时，在对未来无不担心的情况下，我只好同意了。

在内阁首相兼宫廷大臣和财政大臣的黄意阁下的协助下，我主持了内阁会议。一天，一群西索瓦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山玉成分子，其中有秀的孙子），要求我接见他们，我便在王宫里接见了他们。他们毫不隐讳地对我说，我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连一点经验也没有，应该让“有经验和有智慧的、正直的”黄意阁下主持内阁。

我向这些自以为是的同胞们说，我作为刚刚宣布独立的柬埔寨国王，有权也有义务领导我国的政府。我必须代替法国高级专员，因为保护制度已经废除，我已收回了作为一个君主的全部权力。至于所谓缺乏管理国家经验问题，我向他们指出，在登基之后的四年中，我已向法国人和曾任政府大臣的我的父亲以及黄意阁下学到了不少作为国王的本领。这是我恢复职务以后第一次遇到的事情，对这些来访者的态度有点生硬。我对他们说：“诸位先生，首先请你们完成自己的学业，你们还没有成年，还是让我来行使自己的职权吧。我

完全了解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完全知道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些年轻的反对派面色苍白，默默地离开了王宫。然而，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反对西哈努克的政变中，对我进行了报复。

国王宣布独立之后才一个星期，山玉成便乘一架日本轰炸机从东京回到柬埔寨。他俨然是一个凯旋者，在金边受到了他的朋友们的欢迎。

我很快就让山玉成参加了我的政府，成为我的政府中最年轻的人。可是他的同伙却认为他担任外交大臣这个职务太小了。他们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命令我任命山玉成为副首相，要求我把他排在仅次于首相黄意阁下的位置，不要把这位“具有大无畏精神的民族英雄”放在各位大臣之末。而山玉成本人，却装得很冷静。在内阁会议上，山玉成还对我给他这样的荣誉，任命他为外交大臣表示“深切的谢意”。他向我保证，他将竭尽全力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效劳。实际上，山玉成的外交，只是忙于高棉与日本的关系。另一方面，把山玉成塞进内阁之后，日本政府仍然没有把我们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通过“高级顾问”同我们讨论问题。

山玉成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狂热的支持者拉进外交部。他招收了一批没有文凭，甚至连小学文凭都没有的人充当实习外交官，唯一的标准是看他们在保护制时期是否参加了反法的示威游行。骤然间，不少僧侣脱下了袈裟，进入了政界。

我的其他大臣们年龄都比山玉成大，却都老老实实在地通

过他上呈诏书和政令草案，因为他们都怕他。我感到自己在政府中已经完全孤立，只好象在法国保护制时代的做法那样对山玉成呈上来的各种文件一一签署照准。

日本人在我的大臣们中间有了这样一个虔诚的合作者。他们便利用他来征得了劳工、民用卡车、牛车和牲口、压路机和其他公共工程机械，用来为他们的部队服务。

我们的那些不服从日本占领者命令的高级官员们也吃了不少苦头！忠于国王和人民的省长翁谦戎，对日本人所提出的要求敢于表示不满。他很有礼貌地向本省的日本指挥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指挥官先生，您命令我大量征用农民的车子、驾车的牲口、铁锹、铁铲和锄头。请允许我向您说明，现在正值雨季的农忙时期，不论是种稻田还是旱田，我们的农民需要这些工具和牲畜。如果农民们不抓紧这个雨季来做完这些农活，我们大家都会在将来的旱季里挨饿。”他的这番话激怒了日本指挥官，得到的回答是挨了这位指挥官重重的一脚。我知道这一严重事件之后，就命令我的外交大臣（更确切地说，是日本的事务大臣）向“高级顾问”提出抗议。第二天，山玉成对我明说，他收到了一个“友好的回答”，但他没有对我说，我也没有问这个所谓回答的内容是什么。

很明显，我国和我自己才脱龙潭又入虎穴，但是法国“龙潭”比日本“虎穴”要好得多。可怜的高棉人民同意我的看法，因为他们把受到拘禁威胁的法国人一家一家地分别藏在自家的茅草房里，高棉人还帮助反对日本人的法国抵抗者回到丛林，并为他们提供给养和药品。

16

山玉成的政变和他可悲的下场

读者们可能会问，在日本占领柬埔寨以后，有不少高棉亲王对他们那么崇拜，甚至连声都不敢吭地执行其命令，可日本人为何要选择还在高棉王座上的亲法分子若罗敦·西哈努克？据我看，他们是从其战略高度来处理这一问题的。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比起其他任何一位亲王来人民群众特别是王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更熟悉我，也更热爱我。我敢说，在日本帝国还有许多其它重要事情要做的时候，如果把我从王位上赶下来，让任何一位其他亲王取而代之的话，肯定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反。

另外，效忠日本的人只不过是赶时髦，过去他们都以虔诚的亲法分子而闻名于金边资产阶级社会，子民们对这些人并不了解，因为这些人不经常到子民中间去，这些人甚至在政府官员中和佛教僧侣中，也找不到支持者。

农业大臣蒙达那并不了解农民，他的“稻田”是金边体育俱乐部的客厅，他在那里无休止地打扑克和打台球。而诺林德却阿谀奉承有影响的僧侣，但比较起来，这些有影响的僧

侣更喜欢山玉成。为了讨好日本高级军官，山玉成举行了盛大招待会。为了得到军纪严整的日本军队和日本政府的欢心，必须要多搞一些这方面的活动。

由于没有找到更好的人选，日本人只好选择了保留我的做法。很可能那些忠于太阳的儿子——天皇的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考虑要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共和国。日本人考虑到我是吴哥国王们的继承人，所以，他们让我继续统治柬埔寨。但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日本人又想利用山玉成，并通过争取佛教僧侣、教员和学生们的支持，来控制我国。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到了。日本人喜欢“九”这个数字，高棉人和其他亚洲人都认为“九”这个数字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对他们来讲，“十”这个数字意味着乌有，无价值和失败。他们选中了九日这一天来发动反对西哈努克的政变。这次政变是在日本军队配合下进行的，其目的有三：一、把我从内阁会议主席的位子上排挤下去，因为他们认为我在内阁会议起着阻碍他们的事情顺利进展的作用；二、彻底改组王国政府，用以山玉成为首的忠实于日本事业的民族主义者来代替那些“怀念保护制度的大臣”；三、使柬埔寨投入为反对同盟国而战的最后阶段。

午夜，（根据老百姓的说法，这是一个干坏事的时刻），几个装备精良的山玉成分子组成的一个小组，首先闯入黄意阁下的家，然后又闯入各位大臣们的家，并把他们扣押起来。对曾是我办公室主任，后来又成为内阁会议秘书长的农金尼先生来讲，更是带有悲剧性。由于他被看作是“法国殖民主义

者的走狗”，被山玉成分子用手枪打中。我想尽了办法，才把他送到了金边中央医院。在医院里，他成功地接受了一次非常大的手术。

同样在午夜，一辆挂着白旗（不知道为什么？）的老式汽车驶进了王宫大院，从车上走下几名凶相毕露的人，每人身上都带着一支日本造的大口径手枪，他们让那些惊恐万状的佣人们立即叫醒我和我的父母。当我们来到接见厅的时候，政变分子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他们向我们行了一个合十礼，但态度却很傲慢。其中一个人对我说：“陛下，您还认识我吗？”我端详了他一会，对他说：“你不就是弗朗索瓦——博杜安学校的学生吗？”对这一回答大家都满意。这个小伙子恭维我说：“陛下的记忆力超人，没有忘记同窗学友。是的，我和陛下一直在一个班里读书，直到中级班二年级。我没有上高级班，因为我喜欢逃学。”

我母亲一直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各种考验，她向各位来访者提出了一个既简单而又合乎逻辑的问题：“各位先生们，半夜三更来到我家并把我们都唤醒，你们想干什么？”我的老同学向我母亲展示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国王诏书说：“殿下，我们请您的儿子——国王陛下在诏书上签字。”

我们把诏书看了一遍，诏书上写着：一、解散八月九日午夜前存在的内阁；二、国王放弃主持内阁会议，请首相代为主持；三、任命山玉成为首相，并允许他自由挑选内阁各位大臣和副大臣，组成新的王国政府。

在这个最后通牒面前，我母亲严肃地质问政变分子，为什么要强迫国王放弃他的内阁？我的老同学回答说，现在所

有的大臣都是“把我们国家出卖给外国人的叛徒”。我母亲生硬地反问：“他们把柬埔寨出卖给哪个外国了？三月九日，法国保护制度已被铲除了，那些没有被杀掉的法国人都被关进了监狱，在柬埔寨的唯一大国就是你们的伟大朋友——日本。除了日本人，在柬埔寨的外国人只剩下中国和越南的商人。难道王国政府想把国家出卖给他们吗？”我们周围都是政变分子，他们的头头不想让辩论继续下去，就以威胁的口气对我母亲说，“不要再提出什么别的问题了！高棉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各位大臣的背叛行为由来已久。国王应在朝臣和子民之间作出选择，人民是信任我们的民族英雄和解放者——山玉成阁下的。如果国王还忠实于他的子民的话，他就应该立即签署这个诏书，并让山玉成阁下把国家从无边的灾难中拯救出来。”

我母亲知道她已经无法说服这些疯子，便对这些人说，让她的儿子——国王“根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去做决定吧！我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在诏书上签字。我终于下定了决心，“甘心情愿”地接受对我施加的暴力。我说：“各位先生们，对我来说，政府的权力并非独揽不可。自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以来，我在行使这一权力过程中是问心无愧的。但由于你们认为山玉成阁下可以比我更好地把柬埔寨引向光明的前途，我当然很乐意请他出来组织新的王国政府，并取代我来领导这个政府。”政变分子脸上露出了笑容。我的老同学给我一支钢笔让我签署诏书。当他们向我父母和我告辞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山玉成分子比刚来的时候礼貌得多了。

我和他们一起来到克马林宫的庭院，我装作很轻松的样

子，在那里踱来踱去。我碰到了我的“侍卫官”多田熊中尉，他用无动于衷的眼神瞄了一下我的来访者，做出一副“中立观察员”的样子，这一切都好象很做作。我发现，王宫已被日本装甲车包围住了。我听见发动机正在起动，然后声音越来越远。这些装甲车离开了我的驻地，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如果我拒绝签署诏书，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政变分子会不会把我和我父母杀死呢？日本人是立即出来干预呢，还是袖手旁观呢？不管如何，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八月十日，这一天非常平静。令人奇怪的是，老百姓没有以游行来庆祝山玉成的上台。山玉成只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中午，我听说被山玉成分子抓走的我过去的一些大臣，其中包括黄意阁下，都被释放回家了。

毫不奇怪，为日本法西斯效劳的柬埔寨“区长”——山玉成的内阁是由他那些反法的亲密战友们组成的。其中有巴春等几位，都是从昆仑岛感化院释放出来的。但却没有阿渣鸠，因为他在生存条件非常差的监狱里死去了。七十年代，我到河内的时候，我的越南朋友孙德胜主席和范文同总理向我透露说，他们曾经被关在阿渣鸠牢房的隔壁。阿渣鸠是一个英勇的反抗者，因此才招来了杀身之祸。

我的舅父布洪拒绝参加新政府。他对山玉成分子说，他愿意充当他们与王族之间的桥梁。我便任命他为宫廷总监，代替已经退休的黄意阁下。

八月十日早上，山玉成容光焕发地来参见我的父母，向他们保证说，他将“忠于国王”。同时，他还向我父母表示，

如果他们生病，他可以提供“最好的日本医生”为他们服务，以代替阿尔芒·里什博士和其他被监禁的法国医生。我母亲向他表示感谢。但他走了以后，我母亲对我说：她宁愿死，也不让日本人给她看病，因为她只相信法国医生和法国医道。

根据巴春的建议，山玉成主动提出一个对他很不利的想法（这是后来的事情了），这就是任命一位参加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普法战争的老战士——钦迪先生为国防大臣。钦迪当时是滨海的贡布省省长，他同巴春曾在一条战壕中战斗过。巴春把钦迪先生推荐给山玉成，并说他可“以不可否认的能力”来完成他的新任务。当山玉成和巴春向我母亲说到钦迪在防务方面的“能力”时，我舅父莫尼勒（他曾是圣西尔军校的学生）不禁笑了起来。钦迪不愧是一个坚定的“勇士”，但他在武装部队的指挥和建设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莫尼勒预言，如果山玉成部队与法国军队对垒，他的部队一定会遭到失败，肯定会被击溃。实际上，法国人在柬埔寨已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一直非常亲法的钦迪，在时机到来时，他将把山玉成出卖给法国军事当局。到时候，山玉成部队将由于没有“头”而象泡在水里的糖一样，完全化掉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山玉成的统治下，他们是怎样管理“王国”的。山玉成及其同伙企图从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他们的政敌——狂热的保皇主义者和原保护国的官员们。

我的许多高级官员，在到达退休年龄——五十五岁之前就退休了。其他一些人，特别是王国警察局负责人都消失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我的蓝球队主力队员之一、年轻而

热情的监察官宾卡米亚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被指控为原法国警察局的特务，一天早上被带到离金边一百多公里的壁岭上，未经审讯就被枪决了。经常出入丛林的猛虎，从不给遭到不幸的人留下任何痕迹。

我们的僧侣们对山玉成和巴春上台表示高兴，是有些原因的。而普通人民群众，他们看到新的统治者到处横征暴敛，没收他们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财产和生产工具去为日本人效劳，所以，他们对此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一些好发牢骚的普通群众相继失踪，大家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因此，有些老实人马上变得很顺从，他们忍耐着，暂时不说话，但在盼望美好日子的到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金边，并迅速传播到各省。我母亲急忙拿了蜡烛和棒香敬奉佛陀和神仙，感谢他们战胜了作孽多端的日本人及其高棉走狗。而在山玉成面前，我父母总是装出忧愁和可怜的样子。面对主子的失败，山玉成傲慢的态度却一点也没有收敛。他说如果法国人敢回到柬埔寨，他们一定会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钦迪的部队击溃。这不能不使我想起了一九四〇年法国军队溃败时，魏刚将军被召回的情景。

山玉成感到特别紧急的是，怎样使他的政权“合法化”，以便使人们在法国殖民主义者回到柬埔寨时就已对此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于是，山玉成组织了一次“公民投票”：每个公民都应该当众投票，并在票上签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本能地投了赞成票。只有一张票，也只有一张票是弃权的。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姓甚名

谁。然而，山玉成也就“满足”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赞成票了……。

这次“公民投票”只不过是一场闹剧，但却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为了达到永远把持权力的目的，山玉成也不知道该拜哪一尊佛好了。为此，他不惜犯下了背叛国家的罪行。在同我最后一次会见中，他对我说，他刚刚派了老政治家班英去曼谷，要求泰国提供军事援助以使用来反对法国人。他的这个做法，把我惊呆了。我要山玉成说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根据我掌握的情报，法国部队想借不久将来他们的英国盟友来柬埔寨的机会，重新征服柬埔寨。三月获得的民族独立，绝不能丧失。泰国王家部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而且在日本战败以后，他们正在设法阻止美、英占领他们的国土。泰国愿意帮助兄弟的柬埔寨王国，共同战胜法国军队。如果我们很好地感谢他们，泰国会答应帮助我们。然而，唯一使泰国感兴趣的……就是我们今后放弃收回马德望省和法国转让给暹罗的柬埔寨其他地区的要求。”我被他如此厚颜无耻和这样对民族利益的背叛吓呆了。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我对山玉成说：“阁下，我请你立即把班英召回金边，绝对不能让他完成你给他的使命。柬埔寨不能放弃收回我们的邻国、假兄弟于一九四一年非法夺去的我国领土。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因为国家独立要服从于领土完整。领土完整是我们这个小国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我们国家的领土早已被压缩到最小的范围。如果每一位国王、每一位首相为了保持他们的权力都牺牲我们的一块国土给贪婪的暹罗人或安南人，那么不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的柬

埔寨就会只剩下一座城市——金边了。”我又接着说：“另一方面，请阁下注意，日本的失败和泰国人向日本人的妥协，为我们高棉人收复被窃走的领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现在属于战胜国阵营的法国，也一定会要求收回马德望省和其他从法国人手里丢失的地区。请你们不要存在任何幻想了。泰国象一个风向标，总是随风转来转去的。泰固定将奉承战胜国，并尽力使人们对它同战败国日本结盟给予谅解。在法国的要求面前，泰国是顶不住的。我同你讲这些话的用意，是要向你指出我决不希望再回到法国保护国的怀抱之中，但我坚信法国最终会明白这是时代的错误，并将放弃保护国的政策。阁下，如果您允许，我可以就维护我们的民族独立去同法国人进行谈判。我请你把班英召回金边来，阻止他把我们被肢解的省份奉献给曼谷贪婪的人。”

山玉成的脸色变得很苍白。他对我说，他拒绝从泰国召回他的使者，然后很不礼貌地向我告辞了。

几天以后，英国人和廓尔喀（尼泊尔一个善战的部族）士兵一起来到我国，准备收缴日本军队的武器装备。一些日本军人剖腹自杀，以避免被收降的耻辱。

英国驻柬埔寨部队司令格雷西将军，对我作了礼节性拜会。这是一位很有礼貌且又非常幽默的人，他讲一口生动却又带有较浓的英国口音的法语。他将侵柬日军一个高级军官所佩带的一把武士大刀赠送给我作为“历史性”的纪念。

趁此机会，山玉成的国防大臣钦迪与英国人勾结一起，要求英国人悄悄地用飞机把他送到西贡。在那里，他受到自

由法国著名英雄勒克莱尔将军的热情接待。几个小时以后，法国特遣队来到金边波成东机场，并乘英国吉普车向金边进发。他们突然闯进山玉成的办公室（原为法国高级专员办公室），首相的卫兵当时都没有来得及（或根本就不想）拿起他们的武器。他们抓获了山玉成，并马上送到西贡监禁起来。

金边一片寂静，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一些欧洲妇女或混血儿和英国女王陛下的军官们脸贴着脸地跳起舞来了。

17

我们要独立

并不是克伦威尔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山玉成始终企图推翻高棉君主政体，但他既不精明，又不诚实，也没有一个领袖人物的那种政治谋略。奇怪的是，他和他那些最要好的朋友们，却爱好谈论希特勒主义的著作，首先开始阅读的是《我的奋斗》。他们还力图在我国推行直接从纳粹主义那里学到的一套办法。

在西方国家进行战争期间，一些希特勒党徒从犹太人那里或从占领国的博物馆里收集了许多艺术品。而山玉成效仿这个强盗式的先例，在他对金边短暂的统治期间，让他的党羽大量收集工艺品、首饰、金条和银锭，其借口是要用来购买“抵抗法国侵略者”的武器。他们甚至还成立了一个收集这些艺术品的“全国委员会”，来负责这项“爱国主义”的收集工作。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说，没想到日本垮台得那么快，他们还没来得及用那些黄金来换取武器呢。他们无法偿还他们欠下的这笔债，因为在山玉成被逮捕后，这些战争时期掠夺来的财宝都不翼而飞了。他的某些忠实信徒（其中有彭江

莫尔，他是秀氏家族的成员）已把这些财宝转移到了曼谷。由于有这些财宝他们在曼谷长期过着阔绰的生活……。

我发觉，山玉成被逮捕以后，在柬埔寨没有人起来为他辩护。我以为起码会有一些僧侣再次掀起“雨伞事件”，可是这些人一点也没骚动。山玉成招募来的士兵和后来的朗诺士兵一样，尽管他们身上有护身符和避邪物可使他们免遭枪弹，但却都乖乖地躲到兵营里去了。而前不久还喜欢上街示威的中学生们（我这里无需讲那些已由混乱制造者封官进爵的新权贵们了），我也以为他们可能会一致地起来反对，但他们现在也不愿见人了。

为了在柬埔寨恢复法国的统治，勒克莱尔将军无需派了一个师的兵力，只需几个营的步兵就绰绰有余了。

钦迪对他的计谋很得意，自以为这一来就可以当上首相了。他要求见我，并请我原谅他这个“年迈的和忠实的奴才，未能把他那个使柬埔寨从山玉成这个“坏蛋”手里摆脱出来的计划告诉我。我却对他安然自得的赔罪泼了冷水。我对他说：“阁下，有一件比清除山玉成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又回到柬埔寨了。您是很清楚的，我国人民不愿意法国人再回来。我已在给勒克莱尔将军的特使加洛瓦少校的一封信中很清楚地讲了这件事，因为他请求我把我对法国人回柬埔寨的想法告诉他。”为让我放心，钦迪说：“我在西贡见到了勒克莱尔将军，他向我做了这样的正式保证：柬埔寨不再是法国的保护国，它应享有自治权。”我反应强烈地说：“阁下，请看吧！‘自治’这个词本身就说明法国人不承认我们的独立。然而，我国人民和僧侣唯一能接受的东西就是独立。”

如果法国拒绝承认柬埔寨是一个独立国家，那么我将处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地位……”钦迪肯定没看出我想得这么远，还很冷静地对我说：“陛下，您知道我对您是全心全意的，如果您愿意把我处死，我随时可以把生命奉献给您。”

现在又轮到我来说服他了。我无动于衷地对他说，即便你不让法国人逮捕山玉成，已经占据我们的邻国越南的法国人，也会按他们的方式来“拜访”我们。我还补充说，要么装出一副笑脸象对待朋友那样来欢迎法国武装力量，要么拿起武器尽力把法国武装力量赶出柬埔寨，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一点也不现实，因为只要看看山玉成分子们懦弱的样子就可以知道武装抵抗是无用的。至于小小老百姓那就更不用讲了，海上封锁、日本人的占领及其过分的要求和为了结束山玉成那种时间虽短但结局悲惨的下场，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与勒克莱尔的部队打仗等于自杀。钦迪倒吸了一口气，但还是称赞我对形势作了“英明的分析”。

几天以后，勒克莱尔将军来到金銮殿觐见我。他同我谈起了自治。我回答他说，我们需要独立。作为一个好的战略家和外交官，这位伟大的战士避免和我进行当时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争论。他却述说了我对法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同情心，还谈了戴高乐将军对我的敬佩。晚上，我请他和我共进晚餐，并请他欣赏了王家舞蹈团的表演：这位将军简直被高棉古典舞蹈给迷住了。

但是，勒克莱尔却给钦迪留下一个意想不到的不愉快的事。非常尊重等级制度的勒克莱尔，代表法国支持我舅父西

索瓦·莫尼勒这位圣西尔军校校友和军官取代山玉成当政府首相，而钦迪只是新内阁成员。当时山玉成分子反应不太好，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他们不公正地指责我“逼迫”他们的朋友钦迪去西贡，为把他们的“民族英雄”交给法国人，鼓动法国人重新把柬埔寨变成殖民地作准备。这样，我第一次变成了君主制度的反对者的替罪羊，但这还远不是最后一次。

一九四六年的临时协定

我认为，如果说我国大部分同胞都不满意法国人回到柬埔寨，那是有点不太诚实了。但是可以肯定，那些被山玉成集团蒙上了政治色彩的僧侣、知识分子和中学生们，对丧失“民族独立”（实际上，这个“独立”是日本人的一个骗局）表示了他们的愤怒，更确切地说是表示了他们的悲痛。至于其他人，当把他们放在一边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他们对一切都已经厌烦了。对山玉成主义，对在我国非常敏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对引起美国飞机对金边进行空袭使几百名无辜者死亡的日本占领军，他们全都厌烦了……。

相反，王国政府的官员们对法国人的回来却公开表示高兴。他们所不能原谅的是，山玉成硬要把他们拉进他的“圈子”里，并对他那一伙由于同法国一些宪兵交过锋的人都给了职位，并记了功。

在戴高乐将军辞职和把职位让给费利克斯·古安以前，曾想任命阿莱桑德里少将为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专员（我

要求不要再使用已经不存在的“保护国”这一称号)。阿莱桑德里少将实际上是代替了我的和我的政府原来的日本“高级顾问”久保田，他也不主持内阁会议，也不签署诏书和命令。这位将军之所以能在我国受到大家欢迎，是因为他那漂亮的相貌（尽管他有点秃顶），他那无拘无束的笑容，他那中等的身材（不会把柬埔寨女人吓住），他那象尉官般苗条的体型，以及跳舞的才能。他的夫人很标致，神态一点也不拘谨。这位将军还有一位不赶时髦但很活跃的副官。他很愿意帮别人的忙（特别是对柬埔寨夫人和小姐们），也很幽默。他叫做居约，这个名字有些与众不同，但也因为这个名字更使人感到亲切。

法国政府让阿莱桑德里与柬埔寨签订一个临时协定同莫尼勒进行谈判，因为国王再也不愿意听到象一八六三年条约和一八八四年那样的协定。为什么要签订一个临时协定，而不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呢？

一九四六年时，法国议会尚不打算签订一个承认柬埔寨独立的条约。由于确立保护制的条约已被我废除，因此它已不能再应用。这就应该签定一个国家不再是另一个国家的主子，而这另一个国家又没有完全摆脱前一个国家的保护，两者同时存在的协议。独立条约是一九四九年才在巴黎签订的。而当前，阿莱桑德里与莫尼勒达成的临时协定，使两个权力机构没有许多敌意地双双存在着。

当然，有时也因为一点小事而争吵。例如，双方已商定，废除法国驻各省的专员，各省的高棉省长可以自己做主。但是，法国还要给各省高棉省长派去法国顾问，而且要求让这

些顾问占据过去法国专员的一半住宅，尽管这些住宅已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就已经移交给高棉省长。一个偶然的机，我向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蒂埃里·阿尔让留海军上将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对他说（我认为这样做是通情达理的），一个高棉家庭和一个法国家庭，尽管他们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但长期在一起居住下去，一定会产生一些矛盾，久而久之终将引来一个不愉快的结局。我向他建议，为法国顾问建筑一些舒适的住宅，他们对此一定会感到高兴的。然而，我简直是白费了气力。海军上将起来反击我的外交攻势，他立即把这件事提到原则高度来看。他向我解释说：您——西哈努克要保护柬埔寨的荣誉和威望；而我——阿尔让留的责任是保护法国的荣誉和威望。我终于找到一个理由反驳他说，如果法国能表现出一点宽宏大量，那么它在大家的心目中就会越伟大。我们的争论没有继续下去。所以，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独立协定签字以后，法国才同意让高棉省长独自占据过去法国专员的住宅。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法国才急忙给在柬埔寨的法国高级顾问建筑质量好的样子漂亮的砖瓦结构的住宅。但是，这简直是对命运的嘲弄。根据一九五三年我的首相宾努阁下和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里斯特鲁西先生签订的独立协定的若干补充议定书，这些新建的住宅全部移交给了我国政府，而且我国各省的省长再也没有法国顾问了。

在军事方面，我们建立了高棉王家武装部队。而王家海军和王家空军到了一九四九年才组建的。王国政府首脑莫尼勒和法国军队上尉同意给法军一个很大的宽限，让他们在一

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以前仍负责柬埔寨的国防事务。也就是说，到了那一天，法兰西联邦的军队和法军指挥部将永远撤出柬埔寨王国。

简单地再谈一下我的家庭内部的事

现在回过头来谈一下我的家庭内部的事。在这方面我要操很大的心，同时我还要对付日本占领者和柬奸山玉成，我还要应付重新回到柬埔寨的法国人。

一九四五年间，仅仅几周之内，两个极大的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先后失去了养育我多年的祖父和祖母苏他罗亲王和苏他罗王妃。就象菲利门和巴乌西斯亲密的夫妻关系一样，我祖父和祖母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他们几乎是手挽着手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我无限爱戴他们。

一九四六年，我又失去了我的一个伴侣——温存的莫尼盖珊公主，她是在生了纳拉迪波王子几个小时以后去世的。请允许我向读者说明一下（以后还会谈到），纳拉迪波王子曾在中国上中学和大学（学农艺和文学），以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的语言和文学的专家。他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毛主义者。

为了给我的读者提供更确切的情况，现在我想回顾一下我与我的姨表妹妹诺罗敦·诺丽亚的关系，当然后来我同她结婚了。许多公众舆论以同情的眼光看待我同莫尼盖珊的关系，同时也有许多公众舆论指责我同诺丽亚的私情。人们可能还记得，诺丽亚在和我同居之前，就已经同她的第一任丈夫

诺罗敦·瓦克里万亲王离婚了。在金边的某些人士中间，有人还指责我“偷了”瓦克里万的妻子。一些知识分子还把我的“罪孽”比作《圣经》中所说的大卫国王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同居一样。

这未免太认真了。诺丽亚和我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们两个人的母亲也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姐妹。正是我本人，应瓦克里万的紧急要求，对诺丽亚和她母亲做了许多工作，以使我的这个堂弟和这位表亲结了婚。而瓦克里万在结婚以前已有不少艳事，在他和诺丽亚结婚以后，尽管诺丽亚的身力和精力都很旺盛，但他仍然另有所欢。因此，诺丽亚不能忍受丈夫的这种不忠贞。我和瓦克里万是亲密的朋友，即使在他们离婚以后，我们还是亲密的朋友。有时晚上，他还到王宫的莫诺波里殿同他的前妻和我一起玩。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我还让他当宫宴礼宾局长，多次陪同我去法国和其他别的国家访问。

后来，那些企图败坏我的名声而散布流言蜚语的人改变了说法，说瓦克里万为了捞取荣誉而把老婆“卖给了我”，对于这些话，我和他只是耸耸肩膀而已。瓦克里万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亲王，而且又很富有，他既无需过多的荣誉，也不需要更多的钱财。我曾说过，我在一九五五年同诺丽亚结婚后，把她封为第一夫人，后来我又同莫尼克·伊吉结了婚，她便成了我的第二夫人。我非常宠幸我这两位夫人。但到了六十年代，诺丽亚和我的关系开始恶化，虽然没有离婚，但我们已经分居了。读者们一定能猜到其中的原因，这就是诺丽亚越来越嫉妒莫尼克（我应该承认，这是合乎情理的）。

如果在政治上我知道如何克服困难，但在感情方面，我却是犹柔寡断，我不知道如何来摆脱这个困境。但是，诺丽亚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办法：她虽然还爱着我，但却最终离开了我，并悄悄地到法国去了……。

18

真诚的谅解

一九四六年四月，费利克斯·古安政府邀请我去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我乘一艘王家海军的“光荣”号巡洋舰去法国。这是一艘很漂亮的舰只，我的正式随行人员和私人随从可以在舰上生活得很舒服。

我的正式随行人员有部长会议主席西索瓦·莫尼勒亲王、财政大臣涅·刁龙阁下（王国政府中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农金尼阁下（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重伤刚刚痊愈）、韩·潘拉西先生（我的私人秘书，有时还是我的舞蹈教员）、卜京先生（最高法院的法官。莫尼勒的妻舅）、卜图尔上尉（我的副官。也是莫尼勒的妻舅）、米胡中尉（我的卫队长。过去是殖民军的上士）以及我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时的同学何来恩。我的私人随从主要是一些高棉青年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山玉成分子，秀臣（后来他成了红色高棉的部长）也在其中，还有一位使金边西索瓦中学的教员和学生都带上“政治色彩”的扬四洲。我曾叔祖西索瓦以前访问法国时，曾带去了一些舞蹈演员，她们在巴黎和马赛的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次，

法国新闻界一方面因为我们没有带舞蹈女演员而感到惋惜，一方面又赞赏“年轻时髦”的西哈努克带来一些学生。

乘“光荣”号巡洋舰旅行，既舒适又富有教益。舰长还把最好的房子让我住。在舰长的餐桌上，饭菜比平时多。我们的高棉学生在船员的餐厅里，还吃了科西嘉汤和牛排加煎土豆条。军官们告诉我，负责我的行李（非常复杂）的随从人员都在一艘现代化的战舰上。我对此是信任的。在船上，还举行了诸如原子弹等技术问题的讲座。有些人如饥似渴地听这些讲演，也有一些人半醒半睡地正在做巴黎女郎的梦。

整个旅途中，只发生过一件事：一天晚上，一条抹香鲸狂怒地向这个铁制的庞然大物进攻，因为我们的船只打扰了它的航道，船浪还冲击了它。后来，这条抹香鲸被我们船的螺旋桨打死了。在第二天天亮以前，我们的船慢慢地行驶着，一直到潜水员们把这个“海上堂吉河德”打捞上来。

经过二十天的海上旅行，我们到达了马赛。在马赛港，我受到了马赛市市长和法国政府部长加斯东·德菲尔先生的欢迎，手持国旗的一个海军陆战营士兵和军乐队向我致敬。愉快活泼的人群向我欢呼。总统专机在马里尼安等候着我。飞机把我送到布尔日机场，我受到了许多部长和礼宾司长杜麦纳先生的欢迎。那里，奏起了国歌，鸣起了礼炮，仪仗队向我行军礼……。

古安总统在爱丽舍宫迎候我，并为我举行了盛大的午宴。出席宴会的知名人士听我讲一口“纯正”的法语都感到很高兴。法国政府让我和我的全体随行人员在巴黎最好的里茨旅馆下榻。在豪华的房间里，我就可以看见非常美丽的旺多姆

广场和闻名世界的铜柱。

我穿上最华丽的服装(有助状盘花纽的短上衣和纱裙)，乘着敞蓬汽车向无名烈士墓献上一大束王国国旗颜色的花(红花和蓝花)。

几天以后，我隐匿姓名和身份去满足自己最大的爱好：看电影。幕间休息时，观众认出了我，并很友好地向我鼓掌，我只好起立谦虚地向这些热情的人们鞠躬致意，结果又引起了他们的掌声。由于记者的帮助，我已得到巴黎人的爱戴。当时仅仅二十四岁的我，生活是美好的，就象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春天一样。

欢迎柬埔寨国王的接待委员会，为我安排了非常好的日程。我去巴黎歌剧院观看了朱尔·罗曼的讽刺喜剧《克诺克医生》，这个剧的著名导演路易·茹韦在化妆室里会见了。我还到银塔餐厅用餐，在那里可以看到灯火辉煌的巴黎圣母院。我还参观了博物馆。在诺曼底，我看到了大西洋边的障碍墙和同盟国军队登陆的沙滩。我还在有悠久历史的索米尔军事学院进行过几个星期的骑兵和装甲车的实习。然后，我从阿尔卑斯山回到了马赛。一架美式四个引擎的总统座机用了几天时间把我从马赛送回了柬埔寨。

我向接待委员会主席戎基埃尔将军告辞。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非常有教养的将领。他在接待我的礼宾安排上，一直严格遵守法国王宫的礼仪。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骑兵队长勒旺、戴布瓦松先生(曾在金边担任我的副官)和米尔蒙特市市长马蒂威特(他是一位主管公用事业的官员。一年以后，我聘请他担任我的私人顾问)。

现在我还要再谈一谈在巴黎逗留期间的情况。戴布瓦松先生说，金边的越南裁缝为我剪裁的西装有些不太合身。我的财政大臣看到我手头拮据，便很高兴地去克尼泽时装店那里为我购买合身的西服和衬衣。这样我就可以非常漂亮地出现在妩媚的巴黎女郎面前。尽管有许多腰包塞满美元的美国军官同我竞争，但我还是受到了不少巴黎女郎的欢迎。尽管我的地位和年龄都有些不合适，但仍然被茨冈人小乐队伴奏的夜总会迷住了。山鲁左德乐团和卡萨诺瓦乐团的优秀演奏家们完美地演奏了我最喜欢的几首曲子：加德的探戈舞曲和一九四六年流行的阿尔斯托尼的交响乐曲。

然而，爱情总不会象提琴和美食那样使我陶醉。我非常喜欢吃里茨旅馆的两大名菜：与波尔图葡萄酒冻在一起的、新的、粉红色的、可口的鹅肝和烤得又香又嫩的汉堡雏鸡，银塔餐厅的鸭子（这是我的朋友，杰出的饭店老板克洛德·泰雷的拿手好菜），金铃餐厅的洋葱汤，还有诺曼底的牛肋排、鲜食和奶酪。当我年轻的时候，在西贡就已经非常欣赏新鲜奶油了，而诺曼底的奶油却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我的沙士鲁·罗巴中学的老同学何来恩，也给我带来一些令人烦恼的事。他的不轨行为，以及时常酗酒，在里茨旅馆和其他一些地方，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但是，他那些放荡行为却没能损害我在法国逗留期间的乐趣和成果。

巴黎生活的魔力，使我周围的一些人头脑发昏。尽管他们的夫人没有和他们一起来，但他们还是玩得很痛快。以严肃闻名的莫尼勒和农金尼也有很快活的艳事。我的朋友涅·刁

龙是个十足的唐璜式的风流荡子，他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他总是看中那些身材比他高大得多的巴黎女郎或小姐。

当更加坦率的法国与愿意进行合作的柬埔寨，正在巴黎就两国之间的新关系所进行的谈判更加和谐与一致的时候，在距离巴黎不远的地方——枫丹白露，由胡志明率领的越盟代表团，却正在使法国政府的代表日子难过。

在巴黎，我们方面由非常亲法的莫尼勒亲王参加的会谈，使法国和高棉达成了“真诚的谅解”。而在枫丹白露，由于越南没有莫尼勒式的人物，谈判只好以失败而告终。法国竭力企图缩小这个失败的影响。然而，这次谈判的失败，酿成了几个月以后在越南爆发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战火最终漫延到了整个前法属印度支那。

我来法国访问的另一个有意义的事件是，我在索米尔军事学院进行的骑兵和装甲车的实习。由于法国政府知道我喜欢骑马运动，便在日程中安排我对这所军事学院及其全体骑兵教官的访问。这些骑兵教官，曾为法国骑兵赢得了光荣。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要求成为这所军校的一名学员。这个不寻常的要求，引起了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忙乱。最后，他们决定让我先作为一个国王，对这所学校进行正式访问，然后再作为法国军队预备役中尉，在这个学校里逗留两个星期。

作为与法兰西合作的柬埔寨的国王，一个身穿有助状盘花纽短上衣的吴哥国君的后裔，我出席了隆重的招待会，市长和省长都在招待会上讲了话，然后是丰盛的晚宴，最后是

索米尔军校骑兵教官的马术表演。和我有着深厚情谊的索米尔居民们，向我热烈鼓掌。法军骑兵中尉诺罗敦·西哈努克身穿崭新的军装，戴着天蓝色军帽和银色的肩章，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献上了一束有高棉国旗颜色的花。

一九四六年，这所军校的校长迪罗絮上校（后来晋升为将军）为我们这所立过许多军功的学校编写了一部校史。在这本书里，他还为我开辟了非常有趣的章节。这所军校的学生赢得了全世界的敬佩，因为他们在一九四〇年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无比英勇地抵御了节节胜利的德国军队，守住了长达二十公里的防御线，保住了蒙索罗与热纳之间的卢瓦尔河通道。我的名字也铭刻在这样一所富于光荣历史的学校的史册之中了。

总教官马尔戈少校，一直严格遵守学院式的骑术规则，但他对从远道而来的动作又不很正规的学员还是有点宽容，只好把力量集中在教练跳越障碍物这个课目上。他想让我练习象老百姓所说的超越障碍，但他认为首先要改正我骑马的姿势，并指定骑兵教官伊利埃中尉（身穿古代骑兵的短上衣、马裤、黑皮靴，还配有金线饰带）担负这个任务。我慢慢地学会了非常符合军校规定的骑马姿势，并得到了我军校同学们的夸奖。实习期限终于结束了，当马尔戈少校将黑色的皮制马鞭、金色马鞍的前桥和教官荣誉证书授予我的时候，我简直高兴极了。迪罗絮上校和他的副手博福尔中校，对我学习装甲车的课目也表示满意。一九四八年，我又在这所学校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第二次实习后，迪罗絮的继承人，未来的法兰西联邦驻柬埔寨部队司令朗格拉德将军给我评上了很好

的分数，并颁发给我坦克驾驶员和坦克炮手的证明书。

离开索米尔军校前，我参加了军校一年一度的舞会。第二天，我又在卢瓦尔河畔的布丹旅馆举行正式晚宴，答谢军事学校的教官们和同学们，我还为他们每个人都授了勋。在宴会上，我们痛饮了这个地方生产的最好的葡萄酒，我在这里就象在沙士鲁·罗巴中学那样，再一次体验了真正的同志情谊。为了回答我这些新朋友的愿望，我庄重地答应再到军校来。两年以后，我实现了这个诺言。

特殊的荣誉：戴高乐 将军在科龙贝接见我

我在法国第一次正式访问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戴高乐将军在科龙贝教堂，他的花园住宅布瓦舍里非常诚挚地欢迎我。原“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不能忍受“排斥其它党派的政权”，来到这里隐居。他在隐退之后，只在这里会见他的家庭成员和很少几个在一起斗争过的战友。让将军邀请我到 he 家里去喝茶，这是勒旺少校和我在巴黎的法国同事们、几位忠诚的戴高乐分子了不起的成功。戴高乐将军只请自己前往（不需要任何人护送）科龙贝。只有一位便衣警察和我一起乘车前往，而这个便衣警察也只能在门口等着我。虽然将军非常愿意表示他对我的好感，但他仍同法国现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

许多作家，如安德烈·马尔罗和克洛德·莫里亚克曾经写道：我不可能去戴高乐的乡村别墅，因为这是戴高乐中校

在第二次大战前，为了假期同家人团聚而建立起来的。这座与村庄邻近的高大别墅面向着风景优美的森林和原野。说实话，我没有心思来欣赏这些，一心只想着正在正门门洞里等待着我的主人。尽管他的身材高大，但由于他和蔼可亲、谦恭礼貌以及对人和事物的理解力，我并不感到我们之间在身材上的差别。

他衷心地欢迎我，并把我引进了一个小客厅。在小客厅里，我非常高兴地被介绍给戴高乐夫人。被法国人亲切称为“伊冯娜大婶”的戴高乐夫人请我坐在沙发上，而将军却坐在靠边的一张椅子上。就象任何一位资产阶级太太那样，戴高乐夫人亲自给我端上了一杯茶，也给将军端来了一杯，接着又给我们送来了小蛋糕。也许是我少见多怪，但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一位伟大的法国女性如此朴实。后来，直到我非常荣幸地在我接待戴高乐将军和他那可尊敬的夫人时，科龙贝客厅里的这个友谊的场面，仍然还在我的脑海中回旋。

我与法国解放者会谈的情况，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我希望见到这位对自己的历史作用坚信不移的人。戴高乐将军是一位既和气又谦虚的法国人，他非常高兴地接受我对他的诚挚的和无限的敬意。但是，他既不谈自己，也不谈他所进行的斗争，而只同我讲面积又小、距离又远的柬埔寨问题。他如此谦虚，甚至还让我向他“介绍”柬埔寨的情况。然而，我发现他对柬埔寨是非常了解的。他对我说，他高度评价我父母对法国的友好感情，也非常感谢我在柬埔寨和法国之间建立和平关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当时人们都担心两国之间会引起一场军事纠纷。

二十年以后，当将军访问我们国家的时候，曾发表了一个富有预见性和令人赞佩的“金边讲话”。一些报刊杂志对性格不同的高棉国家元首和法国总统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的东西，表示非常惊讶。其答案很可能是我们二人都很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把国家的独立置于一切之上。我母亲对我说，将军和我的黄道十二宫的图案是相同的，都是天蝎宫，因此我们天生都有自豪感和富于感情的。

我访问科龙贝几天以后，当我在里茨旅馆宴请法国领导人的时候，我和国务部长莫里斯·多烈士同座一桌。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对我对布瓦舍里的拜访很感兴趣，并问我对戴高乐将军有何想法。当我告诉他，我认为将军是法国的一位最伟大的爱国者时，多烈士并没有反驳我。

19

我发现世界

九四六年以前，我的视野只局限在法兰西印度支那。我对法国的访问，使我发现了巴黎这个无与伦比的首都；带有战争创伤的、绿色的和富庶的诺曼底；具有诗情画意的马赛及其湖泊（过去我只在马塞尔·帕尼奥尔和安内西的影片中看到的），景色诱人的阿尔卑斯山和后来成为我最喜欢的蓝色海岸。

除法国以外，由于旅途中的停留，我还访问了一些大城市，结识了许多知名人士。我是乘“光荣”号轮船去法国的，先后顺路访问了亚洲最大的港口——新加坡（在那里缅甸的蒙巴顿勋爵和他的夫人请我与他们共进午餐）、科伦坡和“僧伽罗仙境”的锡兰（一位英国将军在那里会见了我是尚未定型的“汤姆逊将军”）。然后，我又访问了亚丁。尽管阿拉伯的气候非常闷热，但我仍然感到那里是很迷人的。我看见了红海、西奈半岛、法老的埃及和开罗。在那个地方，我去西里·巴扎家吃晚饭。此人是一个大封建领主，曾任法鲁克国王的首相（法鲁克国王没有接见我，但我参观了他那很了

不起的王宫)。在西里·巴扎家里，我结识了最漂亮的希腊王子皮埃尔和他那热情友好、讲话流利的俄国籍夫人。他们在我最困难的年代里（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四年）一直是我的忠实朋友。从巴黎回柬埔寨时，法国总统专机在巴林、卡拉奇、加尔各答和仰光都作了短暂停留，我又看到了许多东西。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美食家，我利用各种机会品尝了既丰盛又味美的英式早餐。更有趣的是，那味美无比的“桔子酱”——连皮制做的桔子酱。我还品尝了各种各样咖喱味的巴基斯坦、印度和锡兰大菜。而何来恩的行李袋里却放满了英国香烟和威士忌酒。

我这次旅行的高潮，是和蒙巴顿将军的会见。一年之后，他成为英国驻印度的总督。蒙巴顿将军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很有风度，夫人和小姐们都认为他象“神仙一样美”。另外，他也是刚刚结束的战争中的真正英雄。在会见他之前，我只知道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因为在中学时期，老师们给我讲述过他们的英雄故事。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活着的英雄。

人们都说，真正的英雄比那些“暴发户”更谦虚和平易近人。的确，蒙巴顿勋爵夫妇对我表现出了真正的“兴趣”。由于他们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可以简化了我们之间的交谈，因为我在中学时所学的英语都是很简单的。我说过，刚刚会见我的戴高乐将军，从来就没有对我讲过他同德国人的斗争。他的谦虚，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我感谢蒙巴顿将军向我讲述了他的军队的战功和他的印度朋友——“圣雄”甘地和潘迪特尼赫鲁，使我沉醉在荷马英雄的故事中。我又发现了“新大陆”，而

这些过去在我的印度支那“小省”的头脑中，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将成为好的亲王

有时人们说我对我的敌人毫不留情。实际上，对企图谋害我的人，我不止一次地表现得很严肃，甚至暴跳如雷，但我的“粗暴”大多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所以我的“受害者”在我不得不放弃政权的时候都生活得很好。

虽然我没有忘记这些人对我的冒犯，但我经常宽恕他们。山玉成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曾策划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反对我的政变。如果我不同他们的头头合作，他的打手们就会把我和我的父母全部枪杀。山玉成被法国人关进了西贡的监狱以后，他从法国人那里争到了与国王，也就是和我通信的权利。他不断请求我向法国当局说情，以便使他获释。他对我说，他只是为民族独立进行斗争，别无犯他罪。

为了这件事，我曾先后多次同蒂埃里·阿尔让留海军上将和巴黎政府进行交涉。对于释放这样一个被法国人视为“危险的鼓动者、柬奸和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一点也不热心。由于我执意相求，终于得到了部分满足，山玉成被宽大释放了。但法国人坚决不同意让他返回柬埔寨，而把他流放到法国保罗德旺斯，这是外省一个诗人和艺术家经常去的小巧玲珑的城市。山玉成住在一座小旅馆里，那里的烹饪使他又胖了起来。这位特殊的“旅游者”的一部分开支，由法国政府海外部支付。根据我的建议，我国政府每月还给山玉成相当于一九七九年的五百法郎。

尽管法国当局同意让他去普瓦提埃学习法律，但我的这位同胞还是为这个“忍受不了”的流放而哀叹。他获得了这个学科的学士学位以后，我国政府同意授给他“特殊使命的法官”的头衔，并给他晋了级。在法国共产党控制的高棉留法学生中，由于山玉成是法西斯的有名同情者，所以被戴上了殉教者的桂冠。然而，这些留学生又对他将把我从政权中赶走的想法表示高兴。

一九四六年初，我在金边收到了使我非常感人的信，这是我曾提到过的沙士鲁·罗巴中学的一位越南同学杜大福写给我的。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我们是成绩优秀奖的竞争者。中学毕业后，杜大福参加了越盟，先后进行过反对日本和反对法国人的抵抗斗争。在勒克莱尔将军对水草平原进行的一次扫荡中，勒克莱尔将军的部队发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小组，这个小组存放着一些牵连到他们的许多政治朋友和杜大福的文件。杜大福因此关进了监狱。他是在狱中给我写这封信求救的，要求我立即进行干预。由于高级专员和法国政府对我的友好感情，我终于使他从这个事件中摆脱了出来。他获释之后，给我写了非常动人的信向我表示感谢，并向我保证从此再也不“闹事”了，但我对此有点怀疑。他说他要避免柬埔寨国王再同他接触，也不把他的地址给我。

在巴黎，我三年级A班的老师勒居耶夫人到里茨旅馆来看望我。由于杜大福是她的得意门生，她向我打听了杜大福的消息。我没有对她说杜大福的经历，只说他现在还在交趾支那，最近还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可惜他没有给我留下地址。

20

亲王之间的滑稽争斗

我回到金边不久，就遇到了很多新的烦心事。我只好应付着亲王们之间的争吵，他们都说自己是民主的捍卫者。然而，他们并不关心全体人民，只是关心他们是否有运气掌握政权，能否把我从王位上赶下去。

山玉成当时正在法国流亡，而回到柬埔寨的却是喜欢阿谀奉承的西索瓦·尤德旺亲王。他是一九七〇年（成功地）发动了反对我的政变的西索瓦·施里马达亲王的叔父。尤德旺和比他年龄小的、七十年代成为波尔布特政府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宋成长得很相象，也有些象山玉成。他们三个人的肤色很深，几乎是黑色的，而且都是带着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但和膀大腰圆的山玉成相反，尤德旺和宋成都是细高挑儿，显得比较脆弱。

宋成的外貌只是个假象，实际上无论哪一方面，他都是个硬汉子。而尤德旺的身体很不好，他患有肺结核病。作为柬埔寨的主宰（一九四七年），他“在位”的时间并不比山玉成的时间长。尤德旺回到金边时有三个值得夸耀的方面，即：

第一、他是一位亲王；第二、他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这是第一位不是在医学方面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棉人）；第三、他娶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妻子。她渐渐地模仿着王后的风度（毫无疑问，她是有意在训练自己这样做）。

由于山玉成不在，年轻的知识分子只好转向尤德旺。这位尤德旺在竞选中发表了几段蛊惑人心的声明（以后我还要提到），就成了他那些信徒们心目中的“柬埔寨民主之父”。然而，我对他非常了解，这个称号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如果在柬埔寨有民主之父的话，那只能是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改变那些带有政治倾向的僧侣和高棉知识分子公开提出民族独立问题的想法，法国政府建议我国爱闹事的民族主义者进行一次有趣的游戏——即法国式的民主。

在征得了我的同意之后，法国委托我们那一位特别优柔寡断的首相莫尼勒亲王起草王国宪法。性格专横的莫尼勒亲王希望他的国家，象他亲爱的母校——圣西尔军校那样，把纪律放在重要地位。因此，莫尼勒亲王精心炮制了一个远不能满足他个人口味的方案。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和几位法国顾问一起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才使一个任何人都不得意的草案得以出笼。

法国要求我授权高棉的政治家们成立各种政党，并由王国政府组织无记名投票选举国民议会议员和王国议会（相当于法国的参议院）议员。尤德旺及其同伙成立了民主党，并要求由他们组成一个负责起草宪法的制宪议会。而法国却坚持它的意见，即由国王象“个人馈赠”那样批准柬埔寨国王陛下的首相起草宪法文本。

以尤德旺为首的民主党人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们要求由“高棉人民”选出自己的议会（这些民主党人对他们可以获得多数还很自信）负责起草宪法，而不应受法国和王国政府的干扰。他们要求我对这问题进行裁决。

就个人来讲，我赞成进行友好的协商，但法兰西共和国专员阿莱桑德里将军的继承人卢贝先生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要求我坚决顶住。他对我说：“陛下，起草宪法应该是陛下的使命，而决不是那些没有公众事务经验的政客们所能做的事。只有您一个人才真正了解您的子民们的思想和需要，而起草宪法正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请您向您的子民们宣布，您的意愿就是向您的子民们颁布宪法。对此，高棉人民会感激您的。”我对卢贝说：“在我去巴黎旅行和与您谈话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宪法和民主是个什么东西。这些争吵已使我厌烦。由于双方都要求我定夺，我想结束这场人们对其奥秘并不感兴趣的争吵。我的决定是：一、象您和拥护君主政体的高棉人民所希望的那样，我将向人民颁布宪法；二、我暂时接受莫尼勒内阁提出的宪法文本；三、那将选举产生的议会不称之为制宪议会，但它可以任意修改莫尼勒起草的宪法草案，其条件是不管如何不能损害君主政体的原则。”

我的决定使卢贝先生和我的舅父莫尼勒很伤心。但这一决定却得到了民主党的热烈欢迎。聪明非凡的尤德旺正在等待着时机。

我可以非常坦率地表示，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权力的行使对我已是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由于法国保护制实际上已卷土重来，我也就象山玉成那样，成了一名越位犯

规的足球队员了。法国保护制使我成为一个既无权又无责的国王。除了日本人给予的假独立时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至八月九日），我一直没有掌握王国政府的领导权。现在王国政府属于莫尼勒，今后王国政府属于尤德旺。象高棉知识分子说的那样，我还能起什么作用呢？还是去过“花花公子”的生活罢。

一九四七年普选，为民主党开辟了胜利道路。这是早已预料之中的事，但是这个党组织得还不太严密，也还没有多少朝气。然而这个党的智囊团却很了不起，他们当中有巴黎大学的毕业生、我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宋双、文学学士姜万和董乌、中学教员辉根托、中央学校的工程师宋云西……以及沈法等。另外，民主党人还有佛教僧侣们的支持。而佛教僧侣们的这种态度，又引起了人民群众、王国的优秀阶层——政府官员们以及学生和老师们对民主党的支持。

尤德旺的同伙用“恢复民族独立”和重建“人民组成为人民的政府”的诺言来诱惑人民群众。最后这些人还利用了我的“告全国人民书”的有关段落，即宣布在王国实行民主和要求农村百姓实行集权君主制的民主化。

被人们称之为“民主党”的人，实际上是在玩弄字眼。由于他们知道人民群众非常留恋君主制，因此，他们也不想设法说服人民群众接受一个国王任何权力都没有的制度。但他们却喋喋不休地向农村的百姓们强调：国王陛下一直在要求你们投票赞成“民主”。在高棉语中，“波罗佳蒂波岱”这个词，既有“民主”的意思，又可作“民主党”的简称。然而，在我国只有一个党以此来命名，这就是尤德旺和他的朋友们所创建

的党。

一九四七年，民主党获得辉煌胜利以后，那些可怜的竞争者——自由党领袖诺林德亲王和进步党领袖蒙达那亲王（那些专爱讲别人坏话的人说，进步党是“进步的台球党”，因为蒙达那亲王很喜欢玩台球）来到王宫抱怨这个“民主党”。他们说这些“民主党人并没有照章办事，而是强奸民意，用欺骗的手法让人民相信是国王号召人民投票支持“民主党”的。这些廉价的政客们大概还不清楚，在“民主”的旗号下什么事都会出现的……。

法国人所希望的柬埔寨民主化，不是要建立一个真正依靠人民的政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柬埔寨的制度仍然是封建制度，“政治化”的公民们仍然要聚集在他们尊敬的“封建君主”周围。莫尼勒亲王及其拥护者们表示反对“江湖骗子式的民主化”，他们认为这种“民主化”就是王国“无政府主义化”的前奏。而“江湖骗子式的民主化”的鼓吹者，首先就是尤德旺亲王及其同伙，其中包括僧侣和中学生。其次是诺林德亲王，他在竞选中竟白白地浪费了他母亲宾达拉公主强行从已故西索瓦国王那里弄来的财产的一半。最后，还有我一再指到的蒙达那亲王。

为了“民主”所进行的斗争，最后实际成为三个亲王（莫尼勒亲王没有参与）之间很不光彩的争斗。这三位亲王争夺法国留给柬埔寨国王仅有的一点权力，而法国却保存了相当多的权力。这场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一场贵族们有组织地、合法地反对国王的“福隆德”运动。

而对高棉人民来说，就象山玉成时期那样感到有些失望。

一九四七年是尤德旺亲王极为荣耀的一年，他完全压倒
了莫尼勒和西哈努克本人，同时他也让别人忘掉了山玉成（人
们对山玉成谈论得很少了）。

莫尼勒亲王，特别是他的妻子——漂亮的卜婉娜没有掩
饰他们的不满。一九四六年的时候，由于勒克莱尔将军的恩
赐，莫尼勒登上了政府的最高宝座。在他岳父卜夏（秀的女
婿）宽敞的家里，先生们和女士们接踵而来讨好这位当权的
大人物。然而，一九四七年大选以后，风向变了。卜婉娜夫
人含着眼泪向我叙述了一天之内的变化，她的住宅突然变得
象坟场那样地荒凉，死一般的寂静。那些达官贵人们都争先
恐后地去尤德旺的宅邸，而坐在得胜的丈夫旁边的夫人——
漂亮的多米尼克却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平常不喜欢说别
人坏话的莫尼勒也按耐不住对我说，尤德旺的野心不是要当
内阁首相，他最终目的是柬埔寨的王位。他还向我很诙谐地
描绘了人们在“民主”亲王家里察觉到的“王宫”气派，他甚至
说多米尼克·尤德旺正在草拟一个王宫新的礼宾规则，并说
去拜访多米尼克的高棉和欧洲女士们已开始向她行屈膝礼，
好象她已经是王后了。我只是向我舅父引用了我在六年级时
从我亲爱的阿丰苏老师那里学到的一句谚语：“不要与虎谋
皮……”。

无论如何，在尤德旺家里是很令人惬意的。“民主党”在国
民议会里占绝对多数，但在王国议会中却不是多数。他们利
用国王允许他们从容地修改宪法草案的机会，制订一部赋予
国王和内阁很少权力的宪法文本，把莫尼勒方案中关于国家
权力的规定移归民主党人。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颁布的

王国宪法是一部笨拙的、不符合高棉人民需要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的翻版。

在六十年代，我的反对者说我国的制度是“封建制度”，但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九年（或一九八〇年），哪一个柬埔寨制度可以夸耀为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制度呢？朗诺的“高棉共和国”，不论怎样声称它是民主和自由的，但选举舞弊一事是无人不知晓的，美国报刊发表文章说这是最腐败的制度。沈法虽然不喜欢我本人，但他还是在文章中写道，“这个制度比西哈努克制度还要腐败十倍”。

尽管尤德旺是一个自重的高棉人，但他也没能逃脱这一规律。他所讲的“民主”也不过是为了把国王的权力转移到他的集团手中。甚至当着我的面，他也大谈什么“优等人”。他们的“优等人政策”，并不是把开办我们非常缺少的新的小学、新的初级中学和新的高级中学，作为政府首脑的职责。他们只想让人们知道，柬埔寨国家和柬埔寨人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一小撮知识分子——达官贵人和大资产阶级子女的手中。他们这些人有运气也有办法去法国留学，并带回独立前在柬埔寨落后的教育中所得不到的高等学校文凭。实际上对“民主党”这一派来说，只不过是想说明与那些不属于“优等人”的“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相比，他们在知识上占有优势，所以他们有权来领导国家事务。

由于对尤德旺之流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感到非常愤怒，莫尼勒创办了一个叫做《野牛》的报纸。野牛是我国一种令人敬畏的动物，它敢于向猎人进攻，用它的犄角挑开猎人的肚子。由于被从首相宝座上拉下来，莫尼勒就成了反对派记者。他

的法文既漂亮又尖刻。他是《鸭鸣》报的长期读者（以后我也成为这个杂志的长期读者），他想把他的《野牛》办得比巴黎的《鸭》更要有进攻性。他终于完全达到了这个目的。

我也悄悄地但很高兴地参加了这个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我的文章署名是诺罗敦·托尔（我的读者们一定记得，“托尔”是我外祖父莫尼旺国王在我小时候给我起的一个亲昵的名字）。那些“民主党”人到处找这个诺罗敦·托尔，但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探听到这个神秘的“托尔”，最后他们误认为“托尔”就是我的堂兄诺罗敦·康托尔。我和我的舅父，我们一起揭露了民主党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和欺骗。我们的报纸很快就和那家有名的法国杂志一样，成为一家精通斗争艺术的报纸，它巧妙地抛出揭露现政府的丑事的文章。报纸发表了新政权的混乱和某些实际上是不法商人出身的部长和“民主党”议员的卑鄙勾结的证据。我们灵活地揭露了议会新议长徇私狂法的行为。但是，我们揭露的最严重事件是，当权集团与所谓在丛林中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爱国者——“伊沙拉克”高棉（“伊沙拉克”是勇猛的意思）确切无疑的勾结，而“伊沙拉克高棉”实际上是一伙为柬埔寨的胡志明争得好处的匪徒。在“野牛”杂志里，莫尼勒攻击“民主党人既虚伪又可耻”，他们不敢向法国政府要求独立，却想依靠那些没有抵抗过法国军队、只会敲诈勒索农村穷人的“合法”的匪徒。越盟从我们那些笨蛋的例子中得到启发，已开始派遣到我国来制造混乱和把我国居民“共产主义化”的武装分子。而得到“民主党”和高棉越盟分子（即为胡伯伯效劳的我国同胞）支持的伊沙拉克高棉却定期勒索柬埔寨人，使我国农民进一步破产。

在这个期间，尤德旺过着象大老爷一样的生活。他要求我把在白马的那所到目前为止一直给高棉君主使用的别墅让他，还要求我把距金边五十公里左右的敦里巴迪木屋别墅也给他，以供他休息之用。他所到之处，内政大臣（当然也是“民主党人”）命令各省省长，不是要他们集合人民群众来欢迎，就是要他们把从人民群众中征集到的“礼品”集中在这位亲王的官邸，有：大米、玉米、胡椒、水果、工艺品。即使有时尤德旺没有来，也没有人敢动这些东西。

一天，一条新闻在金边传开了：患肺病的尤德旺得了重病。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尽管医生们尽力抢救，但在几个星期以后他还是离开了人世。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死了，他的部将纷纷起来争夺帝国。民主党象一个打破了的瓷瓶，它的碎片已无法粘合到一起了。老百姓悄悄地说：“我们的国王是受到苍天保佑的，排挤国王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你们可以看看山玉成、尤德旺亲王的结果吧！”在王宫，我母亲看到很多臣民涌来，而且大部分是妇女，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她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了。人们是来向我母亲表示热情的敬意的，这证明风向又转了……。

21

和尚国王

佛教僧侣高乌长老于三月九日夜至十日，当我逃避日本人的时候，为我提供了庇护。也在那个悲剧性的夜晚，当听到我许诺将在一九四七年“沃萨”时节披剃时，他感到非常高兴。

“沃萨”是雨季中的一个阶段，约有三个月时间。在这期间，为了不影响村民们的农活，佛教僧侣们必须专心致志地进行佛教活动，他们几乎经常关闭着寺院的大门。在这一阶段初期，虽然没有祭祀任务，但许多高棉男子，不论是老的还是年轻的，仍然要去参拜和尚或在整整三个月中同“专职”和尚在一起。我敢说，他们是为了对佛经进行深造，并进行祈祷，以求得减轻他们的“羯磨”。

“羯磨”是用来称我们今生和来世的行为及品德的砝码。如果你不具备成为阿罗河（佛）的素质，说明你所造的孽胜于所积的德。你负的债（羯磨）越重，就会越远离最高境界涅槃，即达到极乐的圆寂。

我们的教主佛陀，二千五百多年前出生在尼泊尔。他提

醒我们说，人生就是无边的苦海，这是完全有道理的。积习很深的享乐主义者，不觉得全然如此，我认为有爱情、美味佳肴和漂亮的小卧车是愉快之事，人生也有它好的一面，不应忽视它的乐趣。

然而，具有超于凡人的洞察力的佛陀指出，这些所谓的乐趣仅仅是幻觉，而无数的灾难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每一生物的生活之中，有时还是难以忍受的。例如，韩桑林政权及其主子越南制造了人间地狱——全面的饥荒。这一定是我们民族在前世积下的羯磨过多了，所以才使我们遭遇到了灾难的一九七九年。

同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佛教不相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和法力无边的真神在你过世之后对你进行什么审判，但认为你的祈祷可以感动上苍。佛陀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弥赛亚^①。他是个先觉者，给人们指出应该遵循的最好的道路，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幸运地到达最高境界的极乐世界。尽管这种运气可能性很小，但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佛陀教导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尽量地不断地行善，千万不要造孽。应该摆脱贪得的欲望，就象释迦牟尼佛陀，又称威桑达拉^②涅槃之前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的东西以及他自己国家的东西都分给了受苦人。总而言之，一定要谋求自我解脱，正因为如此，佛教教义才能在哲学方面变成所谓非常进步的理论之一。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进入寺庙当和尚，同年九月还俗离开了寺庙。在那里我向我师父高乌长老和后来的僧格里亚兹

① 弥赛亚是犹太教中的神，是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

② 佛教徒对其教主释迦牟尼的尊称。

（即僧王的意思）俊纳特、德斯和胡达以及其他学识渊博的长老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三个月时间，根本就不够用，起码需要三十年的学习和思考的时间，才能真正地理解佛经深奥的真谛，进而揭开佛经这个宝藏。尽管如此，在一般的自我修养及法国远东教派科尔贝总学监的哲学课和科戴斯与戈鲁贝夫二位先生的佛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一个月的宗教研究，我可以写出很体面的文章，用来向众多的聚精会神的听众们进行每周一次的说教。我写的说教要在特哀塞尔（即斋日）宣读。每月有四个斋日，最重要的斋日是维萨，也就是在五月月圆的那一天，即佛陀诞生的日子，又是佛陀悟道和涅槃的日子。由于我的布道有点正统派教徒的风格，这种风格与在沙士鲁·罗巴中学读书时所灌输的法国古典风格非常相似。由于使用了有关中国佛教，特别是西藏佛教故事中的推理，我的布道说明了佛陀的教义是正确的，这些故事都是从戈鲁贝夫的著作中选出来的，而当时的高棉佛教徒对这些故事却一无所知。法国远东教派为了感谢我大量引用了其流派最杰出成员的著作，还授给我他们流派的“荣誉成员的称号”。

我披着和尚的袈裟、剃光了头发和眉毛，任何时候都是光着脚丫子走路，每天都要和其他和尚一起到街市上化缘（和佛陀一样，每个和尚都要靠求人布施来充饥，并应尽量过着俭朴的生活）。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我的剃度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轰动。外国报纸以“和尚国王”为题刊登了照片和评论文章，而亚洲的佛教徒们为此感到很高兴。非常恭顺的人民群众，对我表现出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虔敬。那些“民主

党”分子因为不能逆潮流而动，只好都到靠近王宫的银庙来听我的布道。在这三个月里，那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和尚都亲自到我的寺庙里日夜地陪伴着我。

在马德望省（这是最近才割让给泰国的我国物产丰富的一个省份）最有影响的高僧（方丈）请我到他庙里去讲道，其他省份的方丈也都效仿他的做法。他们也不顾忌这样一项戒条：在“沃萨”时节里任何一个和尚原则上不能离开自己的寺庙。

不论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家庭，都争着把佳肴、糕点或大米饭装入我的钵盂里（和尚化缘时用来装食品的器皿）。后来，虔诚的教徒们每天都为我准备许多食品，寺庙只好派出小卡车以我的名义把这么多食品拉回去，分给生活上不够富裕的和尚。我想，如果许多寺庙从今以后都生活的很好，我担心我的子民们由于经常为他们身穿桔黄色袈裟的国王准备这么多的美味佳肴而破产。多亏“沃萨”结束了。我带着极大的乐趣回到了世俗生活，但远离了涅槃……

22

归还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

我和法国之间第一次发生严重纠葛是在我的二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即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按照惯例，法兰西共和国专员卢贝先生应在这一天到王宫来向我表示祝贺，并发表“外交”贺词。当然，在这篇贺词中，不涉及任何微妙的问题，主要是讲“传统”的友谊，并祝这种友谊“万古长青”。

今年，却和往年不一样。往常的做法是，法国高级代表在三天前就把他将要在外交使团面前发表的讲话稿告知国王，以便国王起草答词。然而，我这次收到卢贝先生所要发表的讲话，并不是“玫瑰香水”。毫无疑问，由于卢贝先生对民主党领导人的“煽动性”文章很恼火，因为他们谴责法国事实上仍维持对柬埔寨的保护地位，还指出，英国已经给印度和缅甸以自由。因此，卢贝先生决定进行反击。他的讲话是要使人们懂得，在柬埔寨还没有足够数量能胜任的军政干部和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技术人员之前，如果法国给予柬埔寨独立，它就会停滞不前，而且还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

我的法国籍私人顾问，米尔蒙特市马蒂维先生为我草拟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答词，然而这篇答词的内容使我很为难。因为它会使我最终要表示拥护法国保护制，反对“民主党人”用报刊要求独立并以此进行令人厌恶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说实在的，等到这些“民主党”人掌握了政权以后，肯定不会有胆量公开向法国政府提出独立的合法要求的。这是我当权以来第一次面对着情感和义务矛盾的选择。我不能接受马蒂维先生为我起草的讲话稿。但我必须作出抉择：或者以感谢卢贝先生的祝贺来掩盖他提出那个倒霉的问题；或者表示赞成我一点也不喜欢的、也没有好感的“民主党”人的主张。

经过一天的考虑，我决定同卢贝先生坦率地进行一次交谈。尽管我的法语讲得非常地道，但我自己还是亲自起草了一份讲话稿。我向法国代表指出，世界上有许多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根本不能与我国相比，这些国家的行政管理也表现得很不得力，既混乱又毫无秩序。而柬埔寨却不然，一旦获得独立，决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当时，我那大胆的讲话，有如投下了一颗炸弹。马蒂维原以为我对他起草的讲话稿不会做任何修改，便轻率地告诉他的朋友们，说我将向卢贝先生求情。可是，卢贝先生对此却难以控制他的不满情绪。他的随行人员都惊呆了。在场的高棉人，也都在窃窃私语。

第二天，我的同胞们对我的“勇气”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对此也并无疑虑。一些“民主党”人也要求觐见我，向我表示祝贺。我感到我正在发生某些变化，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我一直是一个顺从的君主，对法国人的建议更

是俯首贴耳，因为我对法国人一直是很尊敬和有感情的。我的朋友卢贝先生认为，古代文明的继承者、肩负民族独立重任的高棉人是无能的，尽管我对此的反映是有节制的，但这个反映在我的国家元首任务的构想中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我的对手们都认为，今后我一定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认为卢贝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柬埔寨仅仅依靠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和制造动乱的家伙们，那末柬埔寨的前途将是可悲的。事实已证明，多数“民主党”人，在他们掌权以后，不论在行政管理还是在经济管理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无能。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四年同越南共产党一起在我国制造不安定的直接责任者。但英国的一位大政治家曾说过：“不论好与坏，都是我的国家”，根据这一说法，不管柬埔寨是否有保证自己国家独立的物质力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对其自决权提出异议。尽管我的一些同胞们（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同我胡闹，我将至死毫不妥协地捍卫这一深刻的信念。而在法国，只有一个人能理解我，这就是戴高乐将军。

尽管有这么多的曲折，但对我们的王国来说，一九四七年仍是吉祥的一年，因为法国让泰国把马德望省和一九四一年被他们夺走的其他（柬埔寨）领土归还给我国。当然，泰国人的内心肯定是不会乐意把这些地方归还柬埔寨的。但是，他们需要得到盟国的谅解，原谅他们曾和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共谋。他们也需要加入到胜利的自由世界的行列中，并请求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接受他们为正式会员国。

收回被人夺走的省份，使我很高兴。正如我以前指出的，对一个国家来说，领土完整比独立还重要。当然，我并不是批判胡志明所说的“没有比独立和自由更珍贵的东西了”。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更不用去说一个和我国一样大小的，几个世纪以来被邻国肢解的国家）的版图变得越来越小，那么它的独立和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推理使我对我国应暂时放弃独立感到宽慰。一九四五年法国重返柬埔寨，导致两年以后（即一九四七年）柬埔寨得以收回当时法国在日本压力下交给泰国的柬埔寨领土。

这个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我国的法国——泰国协定是在华盛顿缔结的，宋双阁下作为我的高级代表参加了会谈并出席了签字仪式。在马德望省，蒂埃里·阿尔让留海军上将代表法国把失而复得的柬埔寨领土庄严地交还给我。可是在泰国军队撤离这些地方时，用炸药破坏了许多设施，特别是桥梁。

曼谷当局对我收回这些高棉土地，一直很不甘心（几年以后，泰国又派军队到我国，占领了建有柏威夏寺的高地。这个问题，争论了很多年，我们后来只好让海牙国际法庭作出判决，让盛怒的泰国把这座寺庙——民族艺术的瑰宝还给它的合法所有者）。泰国人对我进行了报复，他们支持伊沙拉克高棉，比游击队更不择手段地反对王室。后来，伊沙拉克高棉曾多次制造混乱，企图阻碍我掌管新解放的领土。

但是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人”却非常忠诚，这一点我的邻国却没有想到。直到一九七〇年三月朗诺政变，我们这些“阿尔萨斯——洛林人”仍一直忠于我本人。

23

重返巴黎

尤德旺去世了。他的重要副手姜万继任了政府首脑。尽管姜万年轻和没有多少行政管理的经验，但他无可争议地是我们一位最聪明和最有礼貌的政治家。

一九四八年春天，法国邀请我去巴黎，主持大学城内的“柬埔寨公寓”奠基礼。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专员卢贝先生提醒我，为了赢得独立，柬埔寨必须培养大量有才能的干部。因此，我决定每年向法国派遣更多的学生，攻读对我们最有用的学科，如医学、公共工程、师范、建筑、农艺、兽医等等。由于我们的国民预算比较紧张，我请求法国政府帮助我向在金边（唯一的）中学获得优秀成绩的毕业生提供助学金。原来，高棉留法学生暂时住在印度支那公寓。但是，由于高棉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法国便决定花一笔钱，另外建造一所公寓。它脱离印度支那公寓而完全独立，因为那里是越南人发号施令的地方。

我们的公寓是建筑学上的一大成功。这座公寓外表很现代化，但内部却完全以仿吴哥窟的浮雕来装饰。公寓的大门

两边，还根据高棉的神话故事摆上了两只蹲着的狮子。

文学学士、世界上最年轻的首相姜万陪同我去巴黎主持这座公寓的奠基礼。这座公寓后来培养了不少参与一九七〇年政变的反西哈努克分子和红色高棉的许多头面人物。从姜万那里我知道，只要我在感情上略有差错，很可能就会得不到他的宽恕，因为我的首相将要同秀家的掌上明珠秀珍小姐结婚，而秀家对我拒绝同这位小姐的婚姻一直耿耿于怀。

我敢保证，我在那里没有任何风流艳事。一九四六年，我已有三个妻子，但她们三人都没有在法国新闻界中给我招来任何麻烦。可是，这次却遭到一件倒霉事。一天，我在爱丽舍田园大街豪华的勒杜延饭馆里吃晚饭时，碰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摄影师。据饭店老板的介绍，她是讨人喜欢的摄影师，一直很想为其图片社拍一张柬埔寨国王坐在豪华的桌子旁的照片。由于她说这张照片不做广告，她本人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就同意了她的请求。后来，饭店老板请我允许这位漂亮的女人（也是我碰到的最漂亮的一位法国女郎）坐在我旁边合影留念。为什么不可以呢？等拍完照片以后，我请这位年轻女郎和我一起喝杯香槟酒。然后，我们在一起很随便地交谈起来了。她对我说，她已和一个朝三暮四的丈夫离婚了。我很激动地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一个美人有不忠实的行为呢？她接着说，由于孤独一人，她只好在大饭店和酒吧间进行拍照来抚养她年幼的孩子。由于丘比特（爱神）开始逗弄我，我不由自主地邀请她第二天到里茨旅馆吃晚饭，她也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盛意。为了慎重起见，我邀请我的首相作为“见证人。”

晚餐是在非常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姜万对我邀请的客人也很友好。我很留心观察，她的举止很文雅，不时地对我报以真诚和动人的微笑，说话时发出轻柔和令人愉快的声音。我想，如果她不是已经离过婚，没有当过家庭主妇的话，她完全可以成为令人陶醉的柬埔寨王后。喝过咖啡以后，我们互相告辞了。我的私人秘书潘拉西受命送她回家。路上，潘拉西试探了她感情上的变化。他不加思索地对她说：国王喜欢她。她很诚实地回答说：她不图风流，只希望同一个既忠于她又爱她的孩子的人结婚。我所考虑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喜欢孩子们，因为我喜欢每一个孩子。我的问题就在于是否忠诚，而且也考虑是否能结婚。总之，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而且并没有引起任何不好的后果，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命里注定的却是另一回事。

以后的事情是勒杜延旅馆的老板引起的。这位老板同《巴黎晚报》的社会新闻专栏编辑联系，并向这位编辑叙述了我同他的女摄影师的“浪漫曲”。这位老板甚至还拿出了那天在里茨旅馆晚餐的菜单，而我那位可爱的客人至少也没有守住秘密。清晨出版的《巴黎晚报》（同它的报名并不相称），第二天就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并附了一张照片，通栏标题是：“柬埔寨国王将和一个法国情人结婚”。

到我住处吃早饭的法国高级专员皮尼翁和我的私人顾问马蒂韦对这份报纸很感兴趣，他们爽直地对我说：“你们俩人倒是很般配的一对。”但是，高棉大学生的解理力并不强。他们阅读了《巴黎晚报》以后，感到很气愤。他们派代表团来到里茨旅馆，并要求我立即接见他们，我把他们带进我的会客室，

皮尼翁和马蒂韦先生也都在座，代表团的头头是秀臣的弟弟、秀木和秀蒲拉西的哥哥秀宗和西索瓦中学山玉成分子的头目扬四洲。这两位先生以少见的蛮横无理的语言责备我，说我行为放荡，给柬埔寨“丢脸”。受恩于我的年轻人竟对我如此憎恨，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惊呆了，语塞了。

皮尼翁先生决定干预这件事。他平时很有礼貌，也很尊重法国——高棉的关系，但今天却也粗暴地反击起来了。他向我那些年轻的批评者说，我同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妇人吃晚饭，并没有干什么丢脸的事情。他还向那些青年人指出：“你们错误地轻信了这家报纸的文章。”最后，他又说：“先生们，你们没有任何权利闯进国王住地，也无权不公正地指责国王给你们国家丢脸，因为这个国家也是他自己的。国王陛下是法国的客人，你们又是国王的客人，因为他同意，你们才能到这里来的。现在，我代表法国勒令你们不要耽搁地离开这里。”山玉成分子和“民主党人”的傲慢态度一下子都消失了，并立刻离开了旅馆。他们走了以后，我要求法国高级专员干预此事，要《巴黎晚报》编辑部在今后的编排中停止提起我的所谓“浪漫曲”。在电话中，编辑部回答皮尼翁先生说，晚报正在进行第六次印刷。对我来讲，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只好自己把它忘记了事。另外，我只好离开巴黎到索缪尔市去躲一躲。在那里，我去索缪尔军事技术学校……。

在索缪尔，朗格拉德少将代替了迪罗絮将军，领导骑兵和装甲兵技术学校（我对这所学校在前章里面已经介绍过了）。朗格拉德是一位贵族（男爵），他在“自由法国”武装部队，

特别在勒克莱尔将军指挥下的第二装甲师中，打过一场出色的仗。一开始，朗格拉德将军就对我很有好感，并尽力使我在索缪尔的第二次逗留期间，在军事知识方面获得收益。在柬埔寨，我的舅父莫尼勒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也搞了一所“小圣西尔军校”，这所军校从去年起已经培养了两期高棉军官。

按照王国宪法规定，我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作为全军的最高司令官，我应该在军事艺术的几个最主要方面有良好的素养。朗格拉德正在努力去做，他为我制订了一个极为有趣的学习计划，这个计划大纲的水平比对其他柬埔寨预备役中尉的要求还要高。

我特别欣赏朗格拉德将军，他的身材很高，嘴唇上有一小撮胡子，他既有军人的气派，又有上流社会人物的风度。朗格拉德将军亲自向我讲授战略战术和军事历史。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官，课后他又成了出色的幽默的故事员。使我非常懊悔的是，我在一九五三年为争取我国的完全独立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时，曾“冒犯”过他。那时，他担任着一个扎手的职务——法兰西联邦武装力量的司令长官。但是，我们两人依旧互相尊敬，并没有受到这次冲突的影响。课后，朗格拉德请我到他家做客。男爵夫人象戴高乐夫人那样和蔼和朴素，他们以一个模范君主主义者的样子，象对法国国王那样欢迎我。女主人向我行了一个很大方的屈膝礼，这是第一位外国妇女这样对待我。我察觉到，他们的孩子都受到极好的教育，他们还根据宫廷的礼仪把孩子们介绍给我。男爵夫人的饭桌变成了“御用餐桌”，我坐在她的对面，使用的是

镀金银餐具。这些餐具来自曾在凡尔赛供职的祖先。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纯军事的主题。在军校，我的教官都是勒克莱尔、德拉特尔和朱安部下的最出色的军官。我最感兴趣的课程，分别由加贝尔伯爵上尉（战术）、格里比斯少校（装甲兵）、后来是金边军校校长的维亚内——拉扎尔少校（步兵）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卡塔拉少校（工兵）讲授。还有其他第一流的教员为我讲授通讯、炮兵、后勤等课程。负责我课程安排的是朗格拉德将军办公室主任狄龙上尉，他是一位曾服侍过法国国王的爱尔兰贵族的后裔。

和我一起实习的同学们都很友好，都是名门子弟。他们请求我在离开他们之前举行一次报告会，以使他们很好地了解我国。我起草一篇稿子，从各方面介绍我国的情况，其中还特别谈到民族独立的问题。我的顾问马蒂韦先生从形式上比较大地润色了这篇稿子。我在军政要人（索缪尔的全体军官都参加了）面前发表的这篇讲话，取得了成功。我发现，当我指出给我国以独立只会加强法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合作和友谊，以及柬埔寨永远把法国当成最亲密和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时，军校的军官们都向我表示非常赞赏。

现在，请允许我回到另外一个对我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主题：骑术。在索缪尔，由于伊利埃上尉的继承人帕迪拉克上尉的帮助，我结束了校内的骑术实习。在我后来去的枫丹白露骑术中心，实际上只是参加体育骑术比赛（有马术比赛和骑马越野障碍赛跑）时，枫丹白露骑术中心首席指挥官、法国马术队队长、享有盛名的骑兵、在国际

比赛中获得百余次优胜的皮埃尔·卡瓦那上校又负责改进我的骑马方法。由于我对体育骑术有些经验，卡瓦耶上校对我很有好感。在枫丹白露的比赛中，由于得到了一匹经过训练的好马，我“毫无差错”地跑完了全程，因而我被法国骑术队邀请去森林中帝王犬猎队队长的富丽豪华的别墅里共进午餐。

法国骑术队由许多很讨人喜欢的军官们组成，他们骑马的姿式都非常漂亮。其中，莫普少校、蒂利埃尔子爵（继维亚内——拉扎尔少校之后任金边军校校长）、弗雷松上尉都是很好的骑手，他们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就很有名气了。在枫丹白露我还向上年纪而且已退休的知名骑手格扎维埃·比扎尔德少校、居丹·德·瓦莱安少校致意。为了列举我所认识的骑术大师们的名字，请允许我做一個简短的回顾：一九四六年，在雷翁少校的帮助下，我在里茨旅馆举行了一次酒会，招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队的骑术大师们，其中有罗什·德·夏赛少校、比斯奈尔少校、巴迪拉特少校和未来的奥林匹克训马冠军儒索莫上校。

一九四八年，作为一个实习军官，我陪同卡瓦耶上校和法国骑术队去维希。在那里，我高兴地认识了和奥尔盖格兹骑士同样有名的骑士戎基埃尔·奥里欧拉（后来的奥林匹克冠军）、意大利军官英泽欧兄弟、墨西哥上校马里勒斯·科尔特斯。科尔特斯上校骑着他那匹小马，提出同那些大马较量，还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骑马）跨越障碍的奥林匹克冠军。墨西哥骑术队先在维希，后来又在伦敦的马赛中冒了尖。在伦敦，我的卡瓦耶朋友、法国上尉谢瓦利

埃^①（难道姓氏对职业也有影响吗）？取得了奥林匹克骑术比赛的个人全能冠军。在维希赛马结束的舞会上，女士们争先恐后地同墨西哥军官跳舞，因为这些军官不仅是了不起的骑士，也是熟练的舞蹈家，尤其是跳桑巴舞更是无可匹敌的。

离开维希后，我又回到索缪尔向朗格拉德将军辞行。他在卢瓦尔河畔的漂亮旅馆里请我吃饭，他当时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根据他很有权威的看法，法国最好的厨师是费在尔南·普安，他在（伊泽尔市）维埃纳的金字塔旅馆任职。我准备去拜访这位正直的人。

经过军事学校时，我高兴地获悉，根据朗格拉德将军的建议，武装部队部长授予我装甲兵预备役上尉军衔。朗格拉德将军亲自向我颁发了两个证书：一个是坦克驾驶员证书，另一个是炮手证书。这第二个证书是因为我在布列塔尼地区的基贝隆附近进行了短期射击实习，在那里我曾幸运地在活靶射击中取得了好的成绩。

我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离开了索缪尔，离开了军事学校，也离开了布当旅馆。布当旅馆的老板德丹夫妇、招待科长德洛夫人及旅馆其他人并没有把我当成顾客，而是把我当成朋友。德洛夫人也将离开索缪尔和法国，同我一起到柬埔寨去。她以她的能力和权威负责王宫的招待工作，并很好地照顾我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德洛妈妈。”一九五六年，她帮助我准备招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宴会。伟大的中国国务活动家和我忠实的德洛夫人很快就成了伟大的朋

^① 谢瓦利埃是骑士的音译——译注

友。这位可爱的夫人后来以她那习惯的坦率对我说：“我不喜欢共产党人，但周恩来是一位大贵人……”她很了解周恩来。

24

金边的危机

内政问题使我遇到很多困难，而离开王国出去访问的时间也即将来临。自从法国回来以后，我就已经感到，“民主党”失去了他们“伟大的舵手”——尤德旺亲王以后，相互之间的争吵使金边局势动荡不安。他们为了接班人的问题，也在进行激烈的争夺。

这场争吵是围绕着修建一座安放前首相骨灰的纪念塔引起的，而且酿成了一起肮脏的财政丑闻。这位前首相就是人们要用他来取代软禁在法国的而急忙宣布为“高棉民主之父”，甚至还被称为“民族英雄”的人。在民主党领导层中，早已商定为这位已故的领导人修建一座比吴哥国王之后历代君主的骨灰塔规模更加宏伟的陵园，当然不能同我们伟大的苏里亚瓦尔曼二世的纪念塔相比，因为这座陵园和吴哥窟的规模差不多一样大。但这位前首相的拥护者们想为他修建一座我曾祖父、曾叔祖父、外祖父——诺罗敦国王、西索瓦国王和西索瓦·莫尼旺国王的纪念塔更加宏伟的建筑。正如大家所知道那样，西索瓦和西索瓦·莫尼旺的纪念塔座落在乌东国君

山上。

尤德旺的祖先的骨灰塔与乌东国君山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但在山下。因此，他的拥护者们却想修建一座和埃及小金字塔差不多雄伟的纪念塔，企图以可观的规模来弥补其高度的不足。

纸上谈兵是很容易的。他们早已设计出这座将给予子孙后代瞻仰的纪念塔蓝图。但是，当他们要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才发现要完成这项建筑工程所需要的费用是非常惊人的，而当时的费用又很拮据。他们首先想从国家预算中来支付，但经过投票所决定的一项补助金，虽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仍然无法补足此项工程的需要。这样只好求助于公民们的爱国心和对民主的热爱，号召每个公民慷慨解囊。当然，穷人们什么也拿不出来。而那些富人们则认为没有必要把钱花在一个已经不能再为他们效劳的人身上，因此，他们捂住腰包，一毛不拔。工程的组织者无计可施，不得不选择那些坚定地信仰山玉成和民主党的教师作为化缘的对象。但是，由于教师工资微薄，也无法为这项“法老式”的工程提供资金。学生们倒不拒绝做点捐献，但他们只有几个买冰棍的小钱，即使都戒掉了这种零食，这笔收入也是少得可怜的。一些不象尤德旺的部属们那么顽固的人开始有些后退，但同意为其崇拜偶像修建一座合适的花费不大的骨灰塔。

但尤德旺的部属们仍然坚持原议，甚至走到了可恨又可笑的地步。国民议会中的民主党仗其多数，无视反对派的愤怒抗议，通过了一项特别法，强令所有居民（包括住在茅草屋的农民）每户为修建骨灰塔缴纳相当于一九七九年五个法

国法郎的捐款。

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柬埔寨人口约五百万。因此，将有几十万户城乡居民要纳捐。这项活动可以收入几百万法国法郎。民主党通过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为该党前主席修建一座宏伟的纪念塔，而且还可以为国库转进一笔预算之外的收入。如果认捐人后来知道，用了山一样高的金钱，却只为尤德旺修建一座非常小的骨灰塔，他们一定会感到这是有生以来最惊讶的事了。实际上，多收的款项根本没有上交国库，而全国建设纪念塔募捐委员会的主席及其委员们在银行的存款却大大膨涨起来了。在这里我不愿意说出这些负责人的名字。

在七十年代，尤德旺的骨灰塔被彻底破坏了。一九七八年，在同红色高棉国家元首乔森潘的一次出巡途中，我从汽车里看到了这座骨灰塔的遗址——一堆杂草丛生的废墟。

民主党由于募捐丑剧已经名声不佳，而所谓的“严森波的叛卖”更使它进一步衰落。严森波是一位出色的行政官员，又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尤其喜欢拳击、赛跑和排球），曾是警察和保安队的头目——尤德旺亲王的保镖。由于此人是一个既有权势又令人敬畏的人物，因此，他有不少朋友，也有许多敌人。在他的主子死去以后，他也将成为一个平民。

宋双、董乌、沈法集团（一九七九年，组织和领导人民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姜万为第一位“农民”出身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由于严森波和其他一些过去尤德旺政府的“头面人物”认为姜万集团鄙视他们，便以积极、善辩和蛊惑

人心的本领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人数越来越多的不同政见者，在人数不多的反对党（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支持下，企图推翻姜万政府。

在一位态度和蔼，颇得民心的“民主党人”游格先生主持下，他们在议会中展开了一场真正的斗争。由于害怕成为少数，严森波首相请求国王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这是唯一明智的解决办法，我对此表示同意。但是“民主党人”之间进行的这场骨肉相残的斗争中，游格先生却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一天，一颗手榴弹在游格先生的脚下爆炸了，而凶手却一直未能捉拿归案。姜万对这种相互倾轧的政治感到厌恶，决定弃政从商。后来，他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民主党”一直纠缠于内部争吵，使我获得了时间，为争取通过和平方式使法国承认我国独立而努力。趁此机会，我又一次赴巴黎，同法国政府就一个后来在历史上称之为“一九四九年法国——高棉条约”进行谈判。不久，这个条约就代替了一八六三年条约和一八八四年协定。

法国高级专员皮尼翁先生向我提供了一架双引擎的“达科塔3型”飞机。他亲自陪同我前往，同时还邀请我父亲、母亲和我的姑母拉斯美·索巴娜公主（我父亲的妹妹）同我们一起旅行。

不幸的是，到了雅典以后，我父亲病倒了，他的糖尿病第一次恶化了。救护车把他送进了医院。从他卧床不起到希腊医生和护士们把他的病治好，在这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母亲一直坚强地陪伴着他。我姑母拉斯美由于非常想欣赏巴黎的风光，不愿意留下来陪伴我的父亲，便和我一起

去巴黎（因为在巴黎，我有许多不能推延的重要的正式会见）。我母亲一直没有原谅我姑母这个“无情无义”的行为，直到一九七五年在北京去世前几天，当她回顾往事时，还为这件事对着她周围的人埋怨我的姑母。

获悉我父亲住院的消息以后，希腊国王保罗一世在王宫里为我举行的茶话会上，请我向父亲转达他的祝愿，祝我父亲早日恢复健康。他请我放心地去巴黎，因为苏拉玛里特亲王会得到非常好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心的。国王对我的接待是非常热情的，还把我介绍给风度优雅、无比美丽的弗雷德丽卡王后和他的孩子们。一位小公主天真地问她父亲：为什么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竟先于他登上了王位呢。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问题，因为在欧洲，人们并不知道还有君主选举制度。我尽力向这个可爱的孩子解释高棉国王选举的复杂过程。当然我没有对她说，在保护制度下，实际上是法国给它所选定的人戴上王冠。

在巴黎，我又一次同留学生中的山玉成分子和“民主党人”进行斗争。他们要求我接见他们，我立刻予以接见，这次会见是在协和广场的克里荣饭店的客厅里进行的，在座的有一位充当调停者的民主党高级人物。我们的留学生们，特别是那些领头的，对我让服务员端上来的香槟酒和小蛋糕都不屑一顾，而是一心强烈地谴责我支持“高棉民主的破坏者”严森波。这些学生对我到巴黎来为签订“独立条约”而进行的谈判表示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在我的整个生涯中，这些青年人和他们的父兄们，多数人一直对我怀有戒心和仇恨，竭力缩小甚至否认我为争取民族独立

所作出的贡献。

这都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现在的年轻一代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请读者们允许我在下面几章里对一九五八年九、十月间我在金边出版的法文《柬埔寨现实》周刊发表的文章作一个概述。该周刊的主编是我的朋友、本书序言的作者让·巴雷。这些文章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资料。我认为，这些文章并不是什么辩护词，但它们却说明了我是如何认真对待我所肩负的责任的，同时也表明了我的爱国精神。

让我们以一个简单的说明来结束本章。经过在雅典很好的治疗，我父亲精神焕发地和我亲爱的妈妈一起来到巴黎。法国政府为我的父母、姑母和我本人准备了一个日程。我们去巴黎的歌剧院（在那里，我向塞尔日·利法尔致意）、凡尔赛宫、卢浮宫等。我父亲悄悄地对我说，他非常喜欢欣赏莫里斯·谢瓦利埃的表演，因为谢瓦利埃是他最喜欢的明星。但很可惜的是，这位演员当时没有演出。为了缓和我父亲的情绪，我对他讲一段故事说，一九四九年，我很高兴地见到了一位有名的江湖艺人并同他一起到我们两人的朋友家去吃饭，这位朋友就是著名的喜剧演员夏皮尼。就在那一次，我告诉了莫里斯，我父亲也是他的狂热欣赏者，他对此非常高兴。

25

取得独立以后的辩论

我在本章里将谈及这么一个当时并没有在高棉人民中间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因为高棉人民对此心中完全有数。但是，一小撮反对王室的顽固的敌对分子和某些外国评论员却支持这么一场争论：那就是对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同法国签订了标志着最终恢复了我国独立的协定以后，我国人民自发地称呼我为“独立之父”的问题，他们提出，我是不是以欺骗的手法窃得了这个称号的？

山玉成及其同伙和他们的美国朋友（例如《柬埔寨简史》的作者马丁·弗·黑尔兹等）指控说，我为了自己的利益，窃据了唯一真正的“抗法英雄”山玉成的功劳和荣誉。

而人民派的激进分子却认为一九五三年同法国签订的一系列协定一文不值，而把我们民族独立的具体标志说成从一九五四年七月的日内瓦会议开始，并把功劳归于越盟（越南人）及其当地附庸——越盟高棉所进行的武装斗争。

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一些资料的要点，来说明我为独立而进行的努力，不是从一九五三年才开始的，也不是始于一

九四九年，而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五年，也就是在第一批戴高乐法国武装“解放”力量刚到印度支那的时候。日本投降以后，一些法国人在英国人的陪伴下来到柬埔寨。这些人的领导人加济瓦少校连续给我写了三封信，要求我派一个负责同法兰西最高专员讨论“柬埔寨地位”的代表团，到蒂埃里·阿尔让留海军上将那里进行谈判。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我给加济瓦海军少校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对他说，柬埔寨王位和王国政府并不拒绝同法国政府谈判，但我们很想事先知道我们的代表是否被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代表”。我明确指出：“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事件以后，柬埔寨已经宣告独立。”并表示柬埔寨愿意同法国保持“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关系，但是这些关系不能有损于我国的独立”。

我的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实际上我对这封信的结果一点也不抱幻想。正如读者们所知道的那样，我国一九四五年的独立是日本军人所答应的，但东京政府并没有给予承认，因为几个月以后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它的成员们也都被宣布为“战犯”。

由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以后，法国再也没有尽到对王国的保护责任，我们当然可以宣布法国的保护制度已经无效。但是，法国不接受这个论点。那么，还能有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国际组织会给我们以支持呢？我认为，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再从零开始（历史已证明我是正确的），进行外交和心理攻势。经过几年工作以后，我们同法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条约，直至柬埔寨获得完全独立。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

三年期间，我一直受到蛊惑人心的政客们和所谓“抵抗战士”们——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把柬越边界向越南人开放的强盗——的许多侮辱。

可是，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我一直在继续向法国要求我们的独立，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危险的鼓动者”。一九四八年，过当笃节（展览节）时，我曾写信给法兰西共和国专员，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信中写道：“如果我谈到独立，这是因为这个词及同这个词有关的一切构成了解决高棉——法国关系的关键……我最渴望的是，我国人民能得到和平和自由，法国和我国之间达到完全谅解……我最关心的不是我的王冠，而是柬埔寨的主权。我最大的抱负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高棉王国。我所期待的不是同胞们的感谢，也不是他们的酬劳，因为任何人都不是他自己国家命运的预言家。我向法国保证我绝不提出那任何有损于法国——高棉合作的要求，只要求我国能有权收回那些对于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还缺少的那些东西，我对我的同胞们从来没有任何隐瞒。我并没有否认我的子民们还有缺点，也没有否认我们国家仍缺少有知识和有能力的人，更没有否认我们的行政管理经验还很不足，但我认为这些并不能构成我国人民行使主权的障碍。很多例子告诉我们，不少独立国家也有盗用公款、政治丑闻、骚乱、造反、甚至是革命的发生！我以为不能因为对人们这些缺点有某些看法，法国就不能尽快满足我们的正当要求。”

我只好在国际法范围内一步一步前进，绝不能原地踏

步。我希望一九四九年我们同法国签订的条约会包含有完全独立的因素，我也希望这个条约成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之间的基础。在预备性会谈中，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的信，我郑重要求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对现在和将来都要作出允诺和保证。我特别详细说明：

(一) 条约必须确定柬埔寨真正的内部主权；

(二) 法国承认的柬埔寨独立应该具有国际价值，应能得到世界诸大国的承认，以便使柬埔寨王国可以向国外派驻代表和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三) 法国武装力量或混合部队的活动地区应该尽快缩小，逐步由高棉自己监督和管辖的和平地区取而代之；

(四) 法国政府将同意赦免那些归顺的伊沙拉克分子。

一个月以后，皮尼翁先生向我作了答复。我认为，有必要比较详细地公布一下这个答复的内容：

1、“陛下，我再次向您保证，法柬条约签字以后，我一定尽我的全部力量使柬埔寨的独立具有国际价值并为世界各大国所承认，以便使柬埔寨可以向国外派遣自己的代表并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2、关于权力的移交以使柬埔寨内部主权具体化的问题，我将尽力使条约中有关这方面的条款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形成和达成协议；

3、由于最近已在暹粒省和磅同省成立了国王陛下直接管辖的和平自治区域，法国武装力量和混合部队的活动地区已开始缩小。达春及其所部的归顺是一个胜利，待高棉王国部队有了足够的手段之后，就可以考虑扩大这个和平自治区

域……对于那些已归顺了的或将要归顺的原来的敌对分子，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专员戴雷蒙先生在写给王国政府的信中，已表示对这些人要采取宽大措施。至于我本人，我准备赞成您给我转来的有关实行大赦的各种建议；

4、……至于政治流亡者返回柬埔寨的问题，我已在十月二十二日给陛下的信中表示同意陛下乐意采取的绥靖政策。

一九五一年，《世界报》根据我在马德望省的一次讲话，整理了一个材料说，“昨天，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声明说，印度是英联邦成员，但英国和印度是平等的，法国也应该给我们相同的地位”。柬埔寨国王特别指出：“柬埔寨和法国是通过一八六三年的条约才结合在一起的。要想废除这个条约，一定要同法国进行谈判，所以我们签订了一九四九年的条约。但是，签订这个条约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从法律上达到完全独立的一种手段。”

毫无疑问，对法国来说，我是一个顽固的对手，但我对法国却一直是光明正大的，我从来没有向他们掩盖过我的真实想法。

条约签字以后，我便致力于加速这个条约的实施，以造福于我的国家。我们得到了许多大国在法律上的承认：在一九五三年以前，我们已得到了三十五个主权国家的承认。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意大利、泰国、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我们在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大使馆。这样一来，尽管我们还没有摆脱同法国的旧关系，但我们已经可以单独执行自己的外交政

策，并可以通过许多国家驻华盛顿或曼谷大使馆直接同世界各国交往。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我们以全权代表身份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并与同盟国一起在“对日和约”上签了字。这就是说明，我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

我认为，回顾一下高棉国王如何逐步从法国手中争取到军事方面的主权是有益的。

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我就一直要求收回军事指挥和平定内部的权力。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写信给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专员，表示了由我们自己负责恢复国内和平的意愿。我还在信中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求实现高棉军队及其司令部的自主，由我们自己来执行平定柬埔寨内部的任务，掌握着为此而进行必要的军事行动的权力”。我们的目的“有效地解决王国内部的不安定的问题”。

我向法国朋友们指出，军事上自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使柬埔寨的独立更具体化（因为军队是一个国家独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另外，也是“为了给平息暴乱的斗争以民族的特征”。而且，实现军事上自主就可以“消除我们的敌人可利用的各种误解”。再者，实现军事上自主，还可以使大部分伊沙拉克叛乱分子归顺过来，因为“这些叛乱分子最终要作出抉择，要么服从于他们的国王和他们的政府，要么还是充当祖国的敌人，继续反对国王和王国政府。”

上述这些论点是合乎情理的，无可辩驳的。法国人只好接受了，并立即把暹粒——磅同地区的指挥权移交给我，而

且还要求我在这个棘手的地区做出个样子来证明我治理国家的能力。由于达春所部归顺于国王，这两个省分很快就平定下来了（达春拥有一个营的兵力，他们到处实行恐怖统治）。达春很会随机应变，利用我许下给归顺王室的伊沙拉克的头头们以高官厚禄的诺言，便决定反正。鉴于他的实力比较大，被授予“四条杠”的司令长官称号。

一九五一年，法军把马德望地区的指挥权也交给了我。这个地区乌和温叛乱集团都降服了，只有越盟分子还在那里活动，但他们已变得很谨慎，不像法国占领时期那样进行造成大量伤亡的伏击战了。

其他地区军事指挥权移交和法国驻军及其司令部撤离柬埔寨的道路已经打开，但真正实现这些目的，那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的事情了。

26

要求释放山玉成

在为我同皮尼翁高级专员“精心”起草的一九四九年条约的缔结扫清道路后，我让我的舅父莫尼庞——当时的首相在这个条约上签字。

我是在法国新任驻柬埔寨专员戴雷蒙的陪同下，乘飞机回金边的。临行之前，我匆匆参观了法国的几个最漂亮的宗教建筑：兰斯大教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科尔马圣马丁教堂。我赞赏这些宗教建筑就象赞美我们最可爱的吴哥古都一样；这些建筑都带有神奇的色彩。由于事先听到有人怀疑，说我在这个神圣地区的停留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更好的佳肴，我只好匆忙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转了一圈。

现在，我请读者们参阅一下一九五八年发表在《柬埔寨现实》周刊上的文章，大家就可以在最后一章中找到，为什么我多次而坚决地向法国政府提出要求释放山玉成的原因。

那时山玉成正在法国流亡。西贡军事法庭曾经判处山玉成劳役二十年和流放国外二十年，但我要求法国政府把他引

渡到法国，减刑为软禁在圣保罗德旺斯一座美丽的别墅里。由于他在一九四五年时是我的首相，而且他又是我长辈们（苏他罗和苏拉玛里特）的朋友，便借签订一九四九年条约之机，要求法国对他实行大赦并让他回柬埔寨。

为了交涉这件事，我整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法国却一直迟迟不满足我的要求，因为他们担心山玉成回到柬埔寨以后会给法国，也会给我带来很多的麻烦。即使在他向我保证“效忠”和“感激”时，我对这位死不悔改的阴谋家和叛乱集团的坏头头也没有抱过任何幻想。但我认为我应该原谅他，应该给他有重新报效国家的机会。直到现在，尽管山玉成对我国和我本人做了那么多坏事，我也从不后悔。由于柬埔寨国王的干预，山玉成幸而被法国宣布释放。他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回到了柬埔寨，但他的仇恨心和他的野心远远超过了他对祖国的热爱……。

当山玉成还是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时，就已经是诺罗敦家的一位常客。在保护制时期，在许多高棉人的眼里，诺罗敦家族是彻底“民族主义”的象征（至少在道义上），是殖民制度的一个“抵抗者”。正因为他是“我家的朋友”，所以我对他的被捕和流放感到过意不去。正因为如此，我便尽我的一切力量，设法让他能返回柬埔寨，恢复他的自由。为了使他获释！改变他的命运，我多次向法国当局进行了口头和书面的交涉。我想，只要从我的那些信中拿出三封来看看，就可以雄辩地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一封信中说道：“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专员先生：我荣幸地再次提请您对前首相山玉成

的处境予以关注，并请求您要求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向法国政府进行交涉，以便彻底撤销对这个柬埔寨人的判决。我重提一下我上次去巴黎时磋商的情况，当时法国政府已同意停止对山玉成的软禁。此人回柬埔寨问题在当时也提出来了……。山玉成先生也已向外界表示，如果能回到他的国家，他保证在一定的时期内或永远不参加政治活动。有了这样的条件，就应该放他回到柬埔寨。但我所渴望的并不是这么回事。柬埔寨王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最有能力的高棉贤达为之效力，我也深信山玉成在柬埔寨不会做出有损于法国利益的事情。我还认为，采取这样慷慨的措施，是法国和柬埔寨关系史上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行动。”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的信写道：“致负责同联邦成员国关系的部长。部长先生：……为了达到缓和的目的，我曾多次要求法国当局撤销业已宣布的判决。今年初，我又特地要求完全撤销对这个柬埔寨人（山玉成）的刑罚。我认为现在有必要重申我的这一要求，同时也请求当局允许山玉成无条件地回到柬埔寨……。我相信（法国政府）对柬埔寨王国政府和对山玉成先生的这种信任的表示，一定会得到柬埔寨舆论的好评。我将非常感谢您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在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兼法兰西联邦主席的一封信中，我写道：“总统先生，我荣幸地请您关心柬埔寨人山玉成的情况。他已经得到了您的宽恕，但我还要请求您给他彻底减刑，并允许他返回柬埔寨。我最近从山玉成那里获悉，他保证对我效忠。他的保证使我相信，他

回柬埔寨不但不会产生什么混乱，反而会再次证明最高法国当局是宽宏大度和言而有信的，这必将在我国引起极好的反响。”

山玉成对于我的救助经常表示感激之情。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陛下，我荣幸地向陛下表示我最深切的感谢，感谢您在物质上对我的生活所给予的帮助，感谢您为使我获释并重返柬埔寨所做的持久的努力。我将忠于陛下，恳请陛下在我获释后，使我能重回柬埔寨同亲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我再也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由于我的努力，不久以后山玉成就接到了撤销对他的软禁的通知。他用了这样的言词来感谢我：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陛下，今天我得到了法国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长的通知，他们已决定撤销对我的软禁，并允许我可以在法国自由活动。我荣幸地向陛下表示，我保证对陛下忠诚，并对您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您为我和那些忠诚地老老实实地为王国和陛下效力的人的利益，同法国当局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山玉成请求我出面干预（正如大家已经知道那样，我已经做了），要求无条件地释放他。同时，他又一次向我保证，他将对我“忠贞不二”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山玉成获得释放，在他朋友们的欢呼声中回到了柬埔寨。就在这一天里，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陛下，由于您的不断干预，在六年流亡之后，我今天才能回到故土。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我向陛下致以崇高的敬礼，并借此向陛下表示我对您的忠贞

和谢意，以及我要为祖国献身的决心。”

王国政府本想根据他的能力和学识，给这位前首相（即山玉成）一个部长职务。但是，有点忘乎所以的山玉成，似乎不愿意接受政府中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职务。回国后不久，他就去“丛林”进行所谓的“抵抗运动”去了。

马丁·弗·黑尔兹在他写的《柬埔寨简史》中编造说，我恨不得以牺牲山玉成来讨好法国人，以换取完全独立。因此，山玉成才派遣他的“部队”去法国占领的地区，拿起武器同法国人进行斗争。然而，山玉成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而是到暹粒、磅同、马德望自治地区去进行所谓的“抵抗运动”。实际上，这些地区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法国军队司令部业已把指挥权移交给了我，那里已经没有法国的一兵一卒。所以，他的“抵抗运动”不外乎是对诺罗敦·西哈努克进行谴责和辱骂的广播宣传战。

山玉成的部下只能躲在远离法国人的自治地区，审慎地进行军事活动……。姜沙烈、高达和温洪在马德望省采取行动，抢掠和杀害自己的同胞……。这种行为是极为不光明正大的。山玉成及其同伙的做法，其用意在于向法国人证明，我没能实现维护独立地区安全的诺言，促使他们不要把其他省份的军事指挥权移交给我。

目前，山玉成正在国外避难。我要指出的是，他流亡到国外是完全自愿的，因为正如他本人所知道的那样，我从来就没有反对他返回柬埔寨。

27

解散“民主党”的议会

经过一年零几个月的平静之后，我在一九五一年决定重建议会制并进行普选。但是，同样的原因导致了同样的后果。新的国民议会无论在人员的组成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与一九四九年解散的国民议会惟妙惟肖，犹如孪生姊妹一般。

新任首相辉根托先生，原来是一所中学的教员，“民主党”党员。十五年前，他曾是我取得小学毕业文凭的主考官。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与我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他老实地对我说，投他们党赞成票的选民，起码有一半是在听了我对全国发表的讲话之后才做出决定的。这就是我在普选前的一次讲话，我说我想重建民主制度。子民们听了我这个讲话以后，以为我是拥护“民主党”的，所以才投了他们的赞成票。

严森波是“民主党”的反对派，而且是一个新党的领导人。他在我父母面前哀叹说，他领导的“保皇”运动，可能是因为悲剧命运的嘲弄，也可能由于国王的讲话的缘故，才使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

我舅父莫尼勒创办的《野牛》对自相诽谤的“民主党”进行

了讽刺，把我们的政客们比作争吃主人（国王）残羹剩饭的饿狗。

一九五一年当选的议员们继续执行他们一九四九年制定的政策，助长了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发展。他们的国防大臣宋云西先生（巴黎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按照他在议会中的朋友们的指示，从法国提供给我用于保卫我所管辖的自治地区的医药和武器弹药中扣下一部分，秘密运送给山玉成及其“游击战士”。当然，这位大臣对我没有讲过这件事，因为这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但是，我在自治地区视察时，许多诚实的军官向我揭露了这个令人不能接受的“扣留”，因为它使我们那些还被不安定因素所笼罩和被疟疾所袭扰的地区的战士们得不到最迫切需要的补给。同时，大家已看到一种反常的情况。例如，在暹粒省北部的芝罗年翁、三隆和宗卡县以及靠近泰国的马德望省的波列内波列县等地，山玉成的部队装备着法国的新枪，而且弹药充足。尽管是在疟疾流行地区，他们像有魔法保护似的，个个身强力壮。而那里的王家部队战士，所装备的却是旧枪，配备着过期的弹药。而且，由于没有奎宁抵御疟疾的侵扰，战士们个个是弱不禁风。

我是在了解了事实的情况下才讲这番话的。因为我直接指挥着自治地区（暹粒省、磅同省和马德望省）的王家部队，所以我非常了解我的部队的凄惨状况。但是，我根本就无法处治宋云西和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因为负责全权处理这个事件的“民主党”议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肯定会否决我关于处理上述人物的议案。

另外，议会拒绝批准一九四九年法柬条约的文本，使我

蒙受了凌辱。我对政府讲：“如果你们否决了我，就请你们立刻就完全独立问题同法国政府去谈判。你们可以利用全体选民们给予你们的权力来进行这项工作”。而“民主党”人却回答我说，提出这样的要求，时机“还没有到”……。我不同意这种前后矛盾的言行，便反问他们说：“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呢？你们拒绝了最终使我国获得完全独立的法柬协定，同时又拒绝就柬埔寨完全独立问题同法国进行新的谈判，难道你们为了不使自己受到牵累，真的要依靠山玉成和他的部队，甚至依靠越盟及其本地盟友，来迫使法国反悔吗？你们太不严肃了！”那些“民主党人”对我不作回答，而且继续坚决地执行他们捣乱和背叛的政策。

一九五二年，为了避免既要降临的灾难，我决定再一次宣布解散议会。我庄严地向全国宣布，在三年之内，我本人对政府负完全的责任，并保证最迟在一九五五年，从法国人手中为柬埔寨争得完全独立。我还补充说，到了一九五五年，我允许全民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我作出鉴定。

“民主党”那些人羞愧地低下头，离开了很快被我改成咨询机构的议会。非“民主党”的原议员（包括严森波及其同党），写来了热情支持我的动议。尽管已经没有了立法权，但他们照常到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去办公，并完全满足于这种状况，直到一九五五年的公民投票。

王家军队站在我一边，并谴责那些从王家军队拿出武器、弹药、药品送给捣乱分子的人。

宋双先生代表他的党来到王宫，“很有礼貌地抗议”解散国民议会。

第二天，西索瓦中学和国立师范学院的学生举行罢课，并得到了离开议会的那些人（即民主党人）的声援。也正是这些学生，为反对当年的首相严森波允许在金边开设“民众”娱乐场（设有剧场、赌场等），曾举行过罢课。为了惩罚罢课的学生，严森波宣布把那些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场所，关闭一个月。由于学生和老师们拒绝离去，他们同首相整整辩论了一天。首相派来了消防队，依靠高压水笼头，和平地但又无可抗拒地把学生们赶走了。学生们编了一首歌谣，对首相进行报复。这首歌在首都的青年人中很快就传开了。歌词大意是：“万岁！严森波首相，他开了一个娱乐场，却关了一所中学堂！”我从来没有动用过消防队、警察和士兵来驱赶年轻的反对派，我总是等待着他们最坏的情绪过去再说，最多也不过是几天的事情。

至于那些民主党的领导人，他们以后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又同我联合在一起了。我派宋云西和辉根托去国外当大使；任命宋双当我的首相。

28

强烈的爱情和最大的悲伤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在金边，我赢得了莫尼克·依吉的心，并娶她为妻。在一次评选美女的时候，我传奇般地“发现”了莫尼克，并且立即被她的魅力所迷住。

事实上，这件事也没有多少传奇的色彩。莫尼克一家早就同我家有来往。我的岳母博夫人和她的父母曾是我祖父苏他罗亲王——我外祖父莫尼旺陛下在高棉王位问题上的“不幸”竞争者——的热情支持者。莫尼克的父亲依吉先生，是一位法国籍意大利人同一位法国布列塔尼妇女的儿子，在较长时间内曾是我父亲苏拉马里特亲王的好友。他在一九三九年被列为预备役中尉军官，当德国人于一九四〇年进攻法国的时候，被列为失踪者。

对于莫尼克和她的兄弟姐妹，从他们出生之后我就认识了。所以，莫尼克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从小就认识她，而且早就领略了她那天生的窈窕淑女的姿容。坦率地说，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将成为她的情人。在联合国科教文

组织资助下。在姑娘们时常出入以及人们常去的西索瓦中学和金边戴斯卡特法语中学举行评选美女的时候，我决定表示我的爱情。

现在，将轮到我心里的人揪住我的心了。这没有什么使人不愉快的。因为仅仅是莫尼克的魅力，她的微笑，她的耐性，就如一种武器，足以使我无暇考虑对别人的爱。尽管这种机会很多，对我的引诱也很厉害。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一年期间（即到这本书出版时），尽管我仍有“花花公子”的雅号，但我还是可以自夸地说，我是一个正派人，一个好丈夫，根本就不象我父亲那样，在他长时间昏迷不醒的前几周内，不顾他的爱妃叶夫人的真挚感情，还同王家芭蕾舞团几个漂亮的女演员有过一些短暂的艳事。而我，我完全忠于莫尼克。她对我，不说是顺从的话，也是我一位循规蹈矩的妻子。

由于她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人谦虚，举止稳重，很有教养，聪明伶俐，再加上高雅的性格，使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和频繁出国活动的政治家，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为有这样最理想的妻子在身边而感到自豪。她所到之处，即使是共产党国家也一样，都得到上至高级领导人，下至地位低微的人的赞美，菲律宾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巴加在为欢迎我而发表的正式讲话中，毫不掩饰而“卡西蒂利亚”风流式地说，我妻子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漂亮和最难抵抗的女人，她给柬埔寨带来了荣誉。

可叹的是，这个最幸福的一年却被一件最不幸的事所结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我悲痛地失去了爱女甘塔·帕花，

一个娇美、温柔、最令她父亲喜爱的四岁女孩。这是我前一年已同她分居的蓬姗莫尼公主所生的女儿。

我那可爱的小女的名字，按巴利文是“娇媚的鲜花”的意思。她患了可怕的白血病，仅一周的时间就被夺去了生命。她刚发病的时候，宫廷御医和王族的朋友里什医学博士只以为是高热病。然而，甘塔·帕花的体温上升得很快，高达四十到四十一度，接着，几乎升到水银柱的顶端，已接近四十二度。临死前，她显得非常痛苦，因为人家给她注射了大量的非常疼痛的盘尼西林。虽然这种办法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但在那个时候这是对付这种可怕疾病的唯一方法了。她因为不能进食，眼看着很快消瘦下去，给她注射时，在她那骨瘦如柴的胳膊和腿上都很难找到进针的地方。在接近失去知觉的时候，她微弱地呻吟着，并重复地说：“太痛啦！”“太痛啦！”

她得病之前，是女孩子中最活泼的一个。她的保姆是个信天主教的越南妇女。这位保姆教她学会说一口流利的越语，每个星期天还带她去做礼拜，并教她背诵儿童教礼。但在佛教斋日的时候，我也带她到寺庙去。她还没有入学，只会说几句法语。而且经常说出一些逗人发笑的错句。有一天，我对她说：“阿梅（这是她在家里的小名），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很乖的小姐。”她回答说：“不，爸爸！你才是一个很乖的小姐呢。”我的表妹诺丽亚很喜欢她，一次，诺丽亚问她：“我亲爱的孩子，你长大以后要嫁给谁，是文官，还是军官呀？”甘塔·帕花并不知什么是嫁人，只以为这是喜欢的意思，所以她很天真地回答说：“我要嫁给爸爸，还要嫁给姑姑。”她的声音很好听。每天早晨起床时，我都听到她用高棉语或越南语细声

地唱歌。

十二月的一天早晨，没有听到她的歌声，我便走到她的小房间里，见她躺在床上，脸色非常苍白。她痛苦地说：“爸爸，我病了。”这就是她在意识清醒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十二月十三日晚上，她陷入了昏迷状态。那天晚上，刮了一整宿的凛冽北风。后来，我给我心爱的孩子举行了王后级的葬礼。失去了她，对我来说，至今还是难以安慰的痛苦。我那时哭我的小女儿，竟被那些崇拜山玉成和“民主党”的中学生利用来印成传单说：“人世间有内在的正义，西哈努克践踏民主和民族独立应受到惩处。”

29

王家独立十字军

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五日致高棉人民的信中，我庄严保证至多用三年的时间，即从法国人手中收回他们仍然占有的妨碍我国对内外行使主权的最后几个权限，实现我国完全独立。

在宾努首相的帮助下，准备好（同法国）进行谈判的所有必要的文件以后，我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去法国。我的总部设在离嘎纳不远的拉纳普勒。三月五日，我从拉纳普勒写了一封长信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先生，要求他归还我国的主权。在这封信里我还附上了两个照会：一个是“关于不安全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军事、司法、财政和经济问题。”

两个星期过去了，但我一直没有收到复信。鉴于柬埔寨形势不断恶化，我又给奥里奥尔总统写了第二封信。我在信中主要说：“军事问题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对此问题的解决，哪怕拖延一点时间，都可能促进王家军队有生力量的瓦解，而这种情况正在以令

人担心的速度蔓延开。实际上，在柬埔寨并没有人知道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办法而离开王国，因为我不愿意使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为难，也不愿暴露我的意图，使人怀疑我正在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有一些高棉人还以为，当我们的战士在战斗中流血牺牲的时候，我却在科特达祖尔游山玩水呢。”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共和国总统三月十九日的复信。他在信中对我说，他已经仔细地阅读了我的两封信，并很快就把这两封信转给了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对此将予以“尽快地仔细地研究”。三月二十五日，奥里奥尔先生请我在爱丽舍宫进午餐，他向我保证他对“友谊的忠诚”。当然，我尊重奥里奥尔先生的邀请，但是我同他的交谈并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

后来，我把我的总部迁移到枫丹白露，并向法国政府递交了几份以文献资料作为依据的备忘录。因为我相信法国领导人最终会同意与我们进行谈判，所以我让宾努先生到巴黎来。同时，我也把办公室搬到克里荣饭店。

我曾同法国联邦成员国联络部部长勒图尔努先生进行了一次戏剧性的会见。他对我说，我的一切交涉都是“不合时机”的。他还说，消除我信中提出的那些困难，完全取决于我。这位部长接着说：“你的臣民们，对你唯命是从，因此，只有你才能使他们懂得情理。”我回答他说，只有在我光明正大地为民族利益服务的时候，我的臣民们才会服从于我。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与法、柬结盟一样，柬埔寨的民族利益就是迅速和彻底的扩大柬埔寨独立的范围。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已知道没有必要等待法国政府再次愿意讨论我们的问题。因此，为了打开局面，我决定在国际范围内，为在我国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的愿望，发动一个宣传运动。我想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可能愿意向其法国盟友为我们说情。

勒图尔努先生得知我将要经过加拿大去美国的消息后，会见了柬埔寨驻巴黎的高级专员莫尼勒亲王，企图通过他了解我去“美国的意图”。我舅父对部长说，对此他一无所知。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之后，勒图尔努先生请莫尼勒亲王转达他的祝愿，祝我一路平安。他还劝告我要“谨慎”，并明确地指出这将冒着丢掉王冠的风险。我对他的祝愿和劝告表示了感谢。

到了蒙特利尔后，我才觉察到与法国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的美国邻国加拿大（起码是魁北克省），对既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又要为独立不断进行斗争的印度支那人民也很感兴趣。在这个法文意为“国王之山”的美丽城市里，我要求新闻界注意既关系到法国又关系到我国的双重性的问题。在印度支那，法国是自由世界的代表。所谓自由世界，就是既反对共产主义，又懂得满足人民要求独立的必要性。

我通过加拿大电台对外播出了我国的声音。在回答“柬埔寨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我说，当前柬埔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安全。这个问题沉重地压在我们民族头上，也使我们国家的活动处于瘫痪。我承认，由于共产主义的越盟和高棉伊沙拉克的活动，不安全的状况不断加剧。而越盟和高棉伊沙拉克越是高举独立和解放的旗帜，他们对

群众的宣传就越能收到效果。我还指出，最重要的是，用以保护我国人民利益的军事力量，还有启发全体柬埔寨人民觉悟的政治力量，既能唤起全国人民为保卫最珍贵的财富——独立——去进行斗争，又能让全国人民知道敌人的宣传完全是口是心非。

有人还问我：“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问题是否同在越南一样严重？”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在我国不那么严重，由于我国的文化、宗教、传统以及每一个农民都占有一小块土地的实际情况所决定，我国人民没有给共产主义宣传以许多可乘之机。但是，我又加上了这么一句：在一个国家的独立愿望受到挫折时，什么情况都会出现的。

在美国，我没有得到他们政府的什么支持，但是有巨大影响力的新闻界，却为我在报纸上进行了宣传。

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对我并不隐瞒他们政府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杜勒斯先生认为，法国应该尽早地给它过去的“保护国”以独立；另一方面，他对我的看法，即认为印度支那人民取得独立以后，有能力使共产主义遭受失败，并以民族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是持异议的。美国外交界的头目向我声明，他的同胞们始终赞成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也非常理解我们的正义要求。他向我许诺说，一旦共产主义使柬埔寨受到分裂的威胁时，美国将竭尽全力让法国归还柬埔寨全部主权。但杜勒斯先生也补充说，我们现在正处在战争的紧急关头，我们要赢得这场战争。高棉与法国的分歧只能使敌人——共产党人得利。目前，柬埔寨不可能代替法国，在军

事上更是如此。因此，杜勒斯先生的结论是：“没有法国司令部及其军队的帮助，你们的国家很快就会被赤色分子所征服，而你们的独立也就会随之付诸东流”。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九日，我在纽约会见了《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詹姆斯。詹姆斯写的文章在美国和全世界舆论界中起到了一颗炸弹的作用。我的同胞们同印度支那其他国家的侨民一样，都对詹姆斯写的文章表示赞同。

下面，我谨摘录这篇文章如下几段话：“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昨天警告说，如果法国人不在最近几个月内给他的国家以独立，就会出现这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现政权，并同共产主义分子领导的越盟站在一起的真正的危险。在一次同记者的谈话中，柬埔寨国王声明，要求完全独立是有根据的，这就是法兰西联邦的每一个成员国都应享有象英联邦内的巴基斯坦和印度那样的独立。柬埔寨君主提醒说，当他签署把柬埔寨与法国联系在一起的若干协定时，他就对他的人民说一定能争取到真正的独立。‘我是我国加入法兰西联邦的唯一负有责任的人’。他又补充说，如果我国人民不能得到我答应给他们的东西，‘我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出，法柬关系中最大的障碍是，法国人坚持要把大部分柬埔寨军队置于法国人指挥之下，以及限制柬埔寨的司法和经济方面的主权。国王说，‘柬埔寨的司法机关管不了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我们的警察也不能动他们一根毫毛。他们在经济上束缚我们的手脚。我们不能自由进口，也不能自由出口’”。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把争论又引申到了

老挝问题，并对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提出了批评。社论主要写道：“对老挝的入侵引起了一些怀疑。为什么越盟愿意到远离他的根据地的地方去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老挝人似乎不是那么全心全意地愿意进行抵抗。长期以来，人们多次听到这种说法：‘为什么我们要自相残杀来维持法国（在这个地区）的政治控制呢？’应该排除从我们开始向印度支那提供美国援助那一天起就欺骗我国政治领导人的这个虚伪的希望。西方大国（美国）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要了解这个处境的一个方法，就是听取柬埔寨国王的意见，并考虑在法兰西联邦内给予他更多的让步。”

尽管华盛顿当局对我并不支持，但由于新闻界的协助，我得到了美国舆论界的支持，起码是得到了他们的同情。

当然，法国政府对我极为不满意，但他们也已开始认识到，过去他们低估了我的好斗性格。几个月之后，我向法国政府提出，他们应改变对我的态度的几点理由。

30

既不是暴君也不是花花公子

我知道，为独立而斗争是很严肃的问题。然而，为了取悦于一些读者，我这里要穿插一些另外的事情。

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我曾花费了很多时间，用来同西方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就所谓我过着“花花公子”生活的问题进行辩论。一九七五年，我在巴黎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那时我已经五十三岁了，而且还是红色高棉的国家元首），有一位记者问我：“殿下，您仍然还是个花花公子吧？”怎样才能使这些好奇的人们明白过来呢？因为这些人普遍接受并甘当旧“观念”的俘虏。漂亮的妻子、考究的佳肴、电影、音乐、名牌汽车对人们是很有诱惑力的（在现时生活中也确是如此），但另一方面，人们也要竭尽全力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平和进步而进行激烈的斗争。

我无需同过去的法国君主们相比较。在他们中间，除极少数人之外，不仅是建立和保卫法国的英雄，而且还是具有美德的典范。如果回顾一下现代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统和国务部长，就可以看到，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爱情生活比我们更

为活跃。不说还健在的人了，我仅以我已故的朋友苏加诺总统为例，他是印度尼西亚独立的真正英雄、不结盟国家的伟大领导者，然而在他的一生中有无数的艳事，而且每每都尽情享受。

无论如何，如果要把我的名字同那些不怀好意的廷臣和朗诺的朋友们联系在一起的话，那我宁愿背上“花花公子”和“暴君”的名声。我六十年代的一些法国朋友企图把我说成未定型的红色高棉分子，但同时又说，我曾残酷地追捕和在肉体上消灭红色高棉和我的其他反对者。在一九七〇年三月朗诺发动政变之后不久，他们中的一位还说，我指使人在金边桑园宫寓所附近秘密地屠杀或活埋了“历史的”革命头子们，其中特别提到乔森潘、胡荣和符宁。然而，乔森潘现在还担任着“民主柬埔寨”的国家元首，至于胡荣和符宁都曾是他们的大部长。我承认我可能犯的“罪行”，但不能承认那些虚构的罪行。

老实说，在六十年代，在同红色高棉和山玉成的自由高棉两方面的斗争中，我拒绝赦免一小撮手持武器或同外国势力勾结、企图通过破坏活动或举行暴动来推翻我们国家制度的自由高棉的叛国头子。做为国家元首，我并没有依照这些问题给他们判以极刑。

相反，我的错误倒象人们经常所说那样，就是我下命令“野蛮镇压”了马德望省三洛地区的农民，因此引起了他们反对那些敲诈勒索和挑起事端的文武官员的骚乱。可以设想，采取这些粗暴行动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它只能使一贯忠于我和对我怀有感情的唯一社会阶级（其中有马德望省三洛人），

产生了对我的敌意。历史已表明，那个对我怀有敌意的强大集团，在红色高棉同它取得联系之前，就已经反对我了。

下面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谈一谈不那么悲伤的事吧。那就是我怎样娶了被称之为“万象之花”的姑娘的。

一九四九年，在姑母拉斯美公主和蒙公主（后者是我父亲的堂妹）的陪同下，我到老挝的行政首府万象去避暑度假。陪同我去的还有一对法国朋友，即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专员西古拉尼先生及其迷人的夫人。

那是在一次南旺舞（流行于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的现代集体舞。南旺是围成圆圈跳舞的意思。）晚会上，我爱上了一位十五岁的漂亮女学生玛尼婉·帕尼旺。

万象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从不放过娱乐的机会，每天晚上都带着乐器到我的寓所里来，主要有开呐（是一种用细竹筒制成的既细小又轻便的管乐），用它同口琴和手风琴来伴奏，真富于乡间风味，令人感到很自然。悦耳的音乐使我陶醉，忘掉了一切疲劳。说真的，老挝人比我们高棉人更富于音乐天才。那些业余男女歌唱家的嗓音是那样悦耳动听。年轻姑娘们的舞姿真是妙不可言。她们由衷地微笑或大笑，一点都不羞涩胆怯。玛尼婉是这一美丽花束中最动人的一朵，我把它摘下来并带回了金边。但我父母却待她很冷淡。

在万象，社会上有佛教僧人，我经常去参拜，并“高兴和荣幸”地祈祷说，我愿意同一位农民出身的老挝姑娘“结成姻缘”。我并不一定非要在宫廷簿籍上登记同她结婚不可，但人们告诉我，如果我不同玛尼婉结婚，哪怕是象征性的，那么我们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会给她的亲友招来不幸。

为保全高棉王廷的体面，何况过去也有过先例可循。我的姑母拉斯美公主和蒙公主安排了一个“象征性结婚”的仪式，这使玛尼婉的母亲（她是位寡妇）感到非常高兴。仪式是在我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国王不能蹲在一个平民身边。按照规定，我必须着王服（有贵重装饰的短上衣），在佛教式的婚礼主持人安排下，神气十足地倚在“新娘”旁边的绣花靠垫上。

一九七〇年，由于我心目中只有合法之妻莫尼克·伊吉而把她抛弃，玛尼婉气愤地投奔了朗诺、施里马达集团。我在前面一章里已说过，玛尼婉和她的女儿苏佳塔及其丈夫，是怎样失踪的。

31

继续进行我的“十字军东征”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保持缄默，我却在努力向法国争取我国完全独立方面，成功地得到了一部分新闻界和一部分反共、反殖的舆论界的支持。

在回柬埔寨的路途中，我经过了日本。在那里，我收到了我的首相宾努阁下的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告诉我，法国请他到巴黎去研究对我所提出的要求的答复。在皇宫里，裕仁天皇设茶点款待我。身穿朴素而舒适的服装、彬彬有礼的太阳之子特别谨慎，他怕被我带入政治领域，但我还是涉及到我唯一感兴趣的问题。天皇祝愿我在我的事业中有好运气。为了不过分使天皇受窘，在使他知道这一切以后，我便向他告辞了。

回到金边以后，刚刚从巴黎回来的我国首相，把法国政府提出反建议的特别案卷交给我。长期以来，这是我的同胞第一次如此热烈地欢迎我。人们都来到大街向我欢呼，我的车子从波成东机场到王宫的路上几乎无法走动。经过这次凯旋，我有点飘飘然。但是在研究了法国的反建议以后，我又

很快地清醒过来了。在军事方面，法国不再交给我新的和平地区，而一味地建议用联合参谋部来代替法国参谋部。在这个联合参谋部里，我可以指定高棉军官参加工作。在司法方面，除了法国人、中国人和法兰西联邦的侨民以外，任何外国人都要受高棉司法机关管辖。而在柬埔寨的非柬埔寨人口几乎都是法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他们实际上继续不受高棉司法机关的管辖。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法国建议仍维持现状。

由于在高棉人民的心目中，我已经成为“民族英雄”，我只能拒绝法国提出的我根本无法接受的建议，并再次要求法国政府给柬埔寨真正的独立。然而，法国保持沉默……。为了把我的正义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加以“夸张”，我决定到泰国去。我想，起码可以在那里比较容易地同外国记者和其他国家外交官进行接触。在曼谷，普密蓬国王不敢接见我，泰国外交部长对我说，泰国不能同情我，因为泰国不想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同法国找麻烦。我不敢说他们“放肆”，但他们也真是太不客气了。泰国总理銮披汶元帅对我说，如果我想向他提出什么要求，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去。泰国政府以我再也不是一个“流亡者”为借口，禁止我从事“政治活动”，不让我会见记者，甚至不让我住在我国驻泰国大使官邸里。但我没有把王位让给别人，我也没被别人赶下台（相反我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无论在国外或国内，我都是柬埔寨国王。

我体会到，在这样一个既不友好又不好客的国家里，再呆下去是没有必要的了。于是我给泰国国王写了一封信，向

他表示感谢，不是感谢根本不照面的他对我的款待，而是感谢他派王宫中的厨师给我送来的暹罗菜肴。当然我不会对国王说，这些菜端到我的饭桌上时已经完全凉了（我当时自费住在曼谷的一个旅馆里，从来不出去），因为这些菜事先都要经过内政部长抛·斯里加农警察司令的检查。

我乘汽车经泰国边境城市亚兰回国。在那里，有一百多位高棉人等着我，他们拜倒在我面前，请求我同意他们加入我的军队，以便帮助我争取祖国的独立。这些人，大部分属于资产阶级，我不想把他们拖入我的冒险事业中去。我对他们说，目前我不缺少士兵，我希望和平解决柬法分歧。尽管我劝告他们，仍有一些人秘密离开泰国到吴哥附近的暹粒来找我，因为我的司令部就设在暹粒。

在从曼谷回到暹粒途中，我和胡达高僧同乘一辆汽车。由于我知道他和山玉成的友好关系，便请他审慎地试探一下山玉成是否赞成我进行的“十字军东征”，是否愿意考虑同我联合。几天以后，山玉成没有通过这位高僧，而是通过位于柬泰边界的扁担山下的自由高棉电台的一篇社论向我作了回答。这篇社论的主要内容是：“西哈努克的所谓‘十字军东征’只不过是叛逆国王在其主子——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指挥下演出的一出丑剧。唯一的民族英雄是山玉成，而山玉成决不同西哈努克——高棉人民的敌人联合”。

不论在曼谷还是在东京，尽管他们禁止我从事政治活动，但我仍然可以把我对我国独立问题的立场，以书面形式交给了世界和当地的新闻界以及各外国使馆。

在世界上，舆论界对我的评价也不一样，一些人赞成我的行动，也有一些人则持批评的态度。《巴黎竞赛画报》认为我对泰国的访问，是得了“离奇古怪的、可笑的漫游症，是一个典型的反复无常的、言行不一的君主”。而《震旦报》却说“这是一个僧侣比士兵多十倍的国家可笑的抱负”。在伦敦，《每日邮报》讽刺说：“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有运气真正得到类似的独立吗？因为他曾多次要求得到象巴基斯坦那样的独立。没有法国人，恐怕柬埔寨早就成了共产党中国的独立的卫星国了”。

然而在法国响起了一个受人尊重的呼声，它对舆论界是个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对法国政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使他们认真对待我的要求。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的《费加罗》报中，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大作家乔治·杜阿梅尔写道：“对这位以戏剧性方式使印度支那事件变得复杂化了的柬埔寨国王（出发去曼谷时）所作出的决定，人们也许会错把它当作是一种任性的结果，或看作是王子哥和年轻人的一种幻想的表现。观察家都持着等着瞧的态度，所以，既使遇到什么严重事件，他们是不会对此感到震惊的。一九四七年，我曾在金边呆了一段时间，当我陪同博拉埃尔先生（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经过老挝回来的时候，我曾听到琅勃拉邦国王（西萨旺·冯陛下）庄严地宣布，他的国家加入了法兰西联邦。当时，金边正沉浸在喜悦之中：人们将欢度送水节……。一天晚上，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人数众多的宾客，衣着华丽，喜气洋洋。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年青的国王举起了酒杯子，然后用地道的法语和尖刻的语调

发表了一个强有力的直截了当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承认他的国家属于法兰西联邦。同时，他又用简单明了的言词宣布，如果柬埔寨在近期内得不到基本满足的话，这种协调就不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我感到很少有人对这一警告给予应有的重视……第二天正巧是送水节，国王邀请博拉埃尔先生和我去四臂湾观赏水上景致。这个四臂湾，是湄公河及其支流在此汇合后构成的沧海般的水域。我想，假如是一个海军军官，他是很难对国王的汽艇感到满意的，因为这艘船真太寒酸了。国王自己亲自掌舵，船上只有他和我们二人。在整个游览过程中，他发表了许多具有权威性的谈话。他的话不象一个封建君主所说的话，倒象一个忍受不了一切束缚的人迸发出来的语言。（……）自从柬埔寨象老挝那样失去了乐园般的和平之后，使人因此闻到了“三圻”（交趾支那、安南、东京）发出奇奥的气味。从此之后，掠夺也开始折磨着这个王国。年青的国王发表了使大家都感到吃惊的声明：只有那些仔细地听过他以明确的不是咄咄逼人的语言对公众发表讲话的人除外。……地球的这一部分处在动荡之中。英国人应该在缅甸保持相当的部队，而他们是如此自愿地向我们提出殖民主义式的建议。荷兰人在美国人的压力下离开了印度尼西亚……。于是，我便开始考虑罗诺敦国王那些严肃的话。当时，我自己想，国民议会的所有议员们是否都至少以好奇的心理经常去翻阅《小拉鲁斯》，比如看看地图，尤其是读读有关高棉和印度支那的内容。”

在此，我对一些高棉和法国的知名人士表示敬意，在我

的“十字军东征”的第一阶段中，这些人曾以自己的智慧、忠诚和专业知识的给予我特别的帮助。他们是：

宾努阁下。从一九四一年我登基后，他就一直忠诚地为我服务（他那时是首相兼宫廷大臣黄意阁下的办公室主任）。一九七〇年三月，他仍站在我一边，而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大臣和军官们都转而为朗诺和“高棉共和国”服务。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五年，他是我流亡北京时的首相。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九年期间，他和我同时在柬埔寨成为红色高棉的阶下囚。由于中国的压力而象我一样获释以后，他支持我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后所采取的立场。

德朗先生。他是一位已退休的法国民事专署主任，曾被我任命为外交、司法和行政事务的顾问和专家。是他，帮助我撰写我在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三年期间，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总统的信函和备忘录。

桑·萨里阁下。他在“王国十字军东征”时期，曾任王国政府的副首相。

法国军队的塞塔上校。他曾在自治区里任我的参谋长。

法国军队的儒贝上校。一九五四年在我指挥反对越盟的军事行动时，他接替塞塔上校，担任我的参谋长。

这两位法国高级军官被我任命为高棉王家部队的少将。后来，法国也承认了他们为法柬友谊所作出的努力，并晋升他们为法国军队的准将。

我另外还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合作者，在此不可能一一叙述。我永远感激他们在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的珍贵帮助。

许多法国政界人士和记者不原谅我的“独立十字军东

征”，但至少他们不怀疑我是完全忠于我的祖国的。我谨以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十字报》上所刊登的保罗·默尼耶先生的文章为例：“在西哈努克身上存在着一种东西，它使这位令人讨厌的人变得可爱了：他的爱国心，似乎比他想重新执政的愿望还要强烈。”

32

胜利返回金边

自治地区包括和泰国有共同边界的暹粒（这里有吴哥古迹和马德望（即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两省以及暹粒南边的磅同省。一九五三年六月，我把我的政府内阁和总参谋部安设在暹粒市内（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的总参谋部是法国塞塔上校领导的）。我声明，只有到了法国同意把它仍旧掌握着的（军事、司法、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权力移交给我国政府的那一天，我才返回首都金边。

由于法国知道，一九四八年我在索米尔学校时曾是朗格拉德将军的得意门生，所以法国以为任命他为驻柬埔寨的法国军队总司令是最合适的了。这样一来，我只好被迫同曾教过我战略和其他军事技术的人“和平”地交锋。我的另一个“对手”是法兰西共和国新任驻柬埔寨的专员，里斯特·鲁西先生。大家叫这位聪明、机灵的科西嘉人和难以对付的外交代表为“里斯特”，但他还是有远见的。这两个人都相当明智，没有犯把高棉国王和法国之间的和平对抗变成武装冲突的错误，否则这场冲突的唯一胜利者将是坐收渔利的第三者——

越盟。

里斯特·鲁西和朗格拉德同意让那些仍处在法国指挥下的高棉军官和士兵，在自治地区里同他们的君主会合，前提是只要这些军官和士兵们有这样的愿望。那些反对越盟最坚决的英勇善战的伞兵以及其他许多高棉军人，包括金边“小天鹅”学校的士官生，为了同我在自治地区里会合，都赶紧离开他们的部队和他们的法国长官。有些人借了中国人的大客车，另一些人借了些法国军队的卡车，等到达目的地后再归还给他们。由于缺少营房，我的这些人只好根据可能在靠近城市的村庄安顿下来，一些装甲兵也跑到我这边来了。我把这些装甲兵派到磅同省和磅湛省交界处。这样一来，这个交界处就成了“自由”柬埔寨和“被占领的”柬埔寨之间的一种“分界线。”

于是，高棉装甲车和法国装甲车就处于对峙状态……但两边的装甲兵却相处得很友好。朗格拉德很聪明，从不在自治地区附近露面。他宁愿在那些边远的省份里同伊沙拉克分子、越盟和高棉越盟分子作战，以便使我对他的意图放心。

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法军司令部派了几个营由北非人组成的法兰西联邦军队进驻金边，因为自从高棉军人跑到暹粒省以后，那里就没有部队驻扎了。这些北非人首先在几个战略地区（简单地）建立了据点……然后他们便就地待命。他们很快就被那些来看他们、和他们聊天的老百姓，路过他们驻地的漂亮姑娘和到兵营附近来玩耍的孩子们“缴了械。”晚上，许多士兵到一个小饭馆里去吃中国菜，有些人在一个小的平民舞厅里寻欢作乐。一些法国军官对现场采访的

记者承认：“部队的纪律糟透了。”

我对法国“无法调和”的态度遭到我的舅父莫尼勒和莫尼庞的猛烈抨击。莫尼勒嘲笑我是“军事狂”，并肯定地说高棉新军官们在军事能力方面达不到法国同伴们的水平。这在某些情况下是事实。例如，原“民主党”的一些官员，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突然被提升为大臣和军队的指挥官。象朗诺、施里玛达（此二人后来是一九七〇年政变的发动者）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而突然提为中校的。按照法国人的方式，人家是“因材施教。”

我的舅父莫尼庞对他的首相职务被具有非常坚定的“独立主义”精神和非常忠诚的宾努所取代感到不满，他生怕里斯特·鲁西和朗格拉德不知道他的外甥，自认为能够战胜侵犯王国的共产主义越盟的西哈努克已经完全陷入了“困境”。只有我的父亲和母亲支持我。这些亲法分子，象我所了解的那样，他们大概在考虑我是不是可以不提出太过份的要求。但对他们来说，不管我是错还是对，我依旧是他们的孩子，仍然是个国王。

在王宫里，苏拉马里特亲王和夫人接待了来进行正式访问的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帕特里夏。美国人私下埋怨说我父亲举行的晚宴是“没完没了”和“令人厌烦”的。据说晚宴上的菜是受到一位“兴盛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爱丽舍宫里举行的那些宴会的启发：菜肴和点心的道数是令人难忘的。后来，尼克松夫妇到我在暹粒的小别墅里来拜访。副总统给我带来了一张有艾森豪维尔总统题词的照片。

出乎我的意料，尼克松闭口不谈我和法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向我转达美国总统和人民对我的同情和敬意。他的妻子只字不谈政治，而是津津乐道地表示她对吴哥古迹的赞美。对我开始有所了解的美国人，大概希望能防止我由于受到失去可爱的女儿甘塔·帕花的打击之后所产生的恶劣情绪。

许多报纸，主要是法国和美国的报纸，开始宣传说我变成了“疯子”。还说什么，任何人都知道，不应该去激怒一个疯子。从我在暹粒省发动“柬埔寨有生力量”（高棉语称“民兵”）运动以后，有关我成为疯子的传闻也就更流传起来了。然而，在整个王国，首先是从首都开始，男女老少都穿上咔叽布制服，在几个年老的教官带领下，手拿木枪在马路上进行军事训练。把我看作是他们的眼中钉的《巴黎竞赛画报》指责说，我以昂贵的价格把木枪卖给了民兵们。事实上，这些民兵们和所有柬埔寨人一样具有灵巧的双手，是他们自己用一块木头和一把砍刀，自己制造了这种假武器。

那些一直在等待我命令追击法国人或至少进入丛林的我的军官们对我提出，为了摆脱烦恼，要求我为他们设计一种新军服，因为他们现在穿的军服和法国人的军服太相似了。他们说，在他们同法国同伴发生军事冲突（而他们并不是希望真的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至少不和法国人戴同样的军帽。他们要求换成一种美国式的鸭舌帽。这真是受到命运的嘲弄，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我只好请求于我认识的唯一的军服专家保尔·沃克莱尔（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拉特勒将军的私人裁缝。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八年他曾为我缝制过军装），希望他能为我的那些向往独立的军官们设计新式样的鸭舌帽

和军服的装饰。由于我也有进入丛林的可能性，我同时向巴黎的一家鞋店定做了两双防水的耐用的软底靴子，以便能在森林和沼泽地里行走。后来，当我在一九五四年同越盟打仗时，我真有机会穿上了这两双靴子。

一九五三年九月，法国把我们王国所缺少的一切权力移交给我，以便集中主力投入同胡志明的军队越来越艰巨的战斗中去。在朗格拉德将军的参谋部里，有些军官指责我“无耻地”利用了法国在北越遇到的困难，想把法国“赶出柬埔寨。”他们问他们的长官：“将军阁下，难道您就听任这个疯子摆布吗？”法国盟友中的一个大国大使给我带来了对我仍保持尊重的朗格拉德将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说：“先生们，国王是疯了，但这是一位天才的疯子”……

我的西方读者们也许对我如此频繁地引用报纸上的文章会感到吃惊。这些报纸中，有些文章攻击我，另一些为数不多的文章则对我表示理解。我对外国报刊谈论我和我的政权始终极端敏感：一名法国记者甚至说我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性。

可以完全坦率地说，我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同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对立，以及在七十年代的头几年里同红色高棉联合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于西方报纸对我进行许多攻击造成的。在这些攻击中，有不少是对我进行歪曲，甚至对我怀有敌意。我可以退一步说，这些攻击在促使我同西方对立和把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推入共产主义世界的怀抱里，是帮了很大的忙的。对于共产党人，我并不是一点

也不知道他们的虚伪性，但他们通过考虑，节制了对我的批评，有时还恭维我，这些恭维却触动了我的心弦。在许多年里，当我看到我有利于国家的愿望和微薄的成就遭到西方世界的报纸贬低和诋毁，我本人（请大家不要忘记，我那个时候是柬埔寨的最高领导者！）也遭到西方世界的嘲笑和诽谤的时候，我完全被激怒了。

我想向对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取得的进展感到吃惊和担忧的西方世界补充说，当那些打击落在我身上时，我就抗议、反抗或进行论战。其他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会象我一样对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批评感到不高兴，但他们很少象我那样公开做出反应，而他们采用报复的措施，是逐步滑向反对西方的阵营。谁要试图向他们解释说西方的报纸是“自由”的，是不表达它的政府的观点的，那完全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确认这个自由尤其表现在对一些领导人的“大肆宣扬”上，在富国不能想象的困难中，这些领导人普遍都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在这章里，我想把新闻报道中与我争取独立的“十字军东征”的第二和最后部分有关的段落摘录于下。这些内容具有历史意义，它说明了法国和高棉之间的武装冲突之所以能够避免的原因，而且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把这归功于双方的明智。

《泰晤士报》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同一个变化无常和摇摆不定的年轻人商谈任何严肃的事情都是困难的。”这个年轻人当然指的是我。新德里的一家大报纸发表了冈加·森格博士撰写的一篇文章，作为对《泰晤士报》的回答，这篇文章写道：“这些话完全和纯粹是恶意和经过策划的，目的是让世

界舆论反对一个爱国者，他象每一个正直的英国人或法国人热爱自己祖国那样也热爱他自己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什么成千上万的法国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答案是：为了自由。”

具有客观主义传统的《纽约时报》没有参加这场论战，而是乐于报道我住在自治地区的某些重要情况：“国王通过争取独立来巩固其名望的事实，已被那些游击队联合成为他的人所证实。那些以前曾为柬埔寨独立而斗争的不同派别的非共产党组织约有五分之三的人投奔了国王，为他增添了一千五百人的力量。两天前，柬埔寨军事学校当年应召的五十六名青年人离开了学校和他们的法国教官，经过农村到诺罗敦国王管辖的地区。负责内河巡逻的一支水兵部队离开金边逃到了西部。驻扎在柬埔寨的法国军队的五个营里，有好几千名柬埔寨军人混编在这些法国殖民主义军队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法国军官们的允许，离开了自己的部队。这些法国军官们认为，如果柬埔寨形势继续恶化，这些不愿意留下来的柬埔寨人是靠不住的。”

一九五三年十月出版的一期《巴黎竞赛画报》，对我的十字军东征第二阶段作了“生动”地描写。这份杂志在“一个吴哥和尚（我是一九四七年出家，而不是一九五三年）使纳瓦尔（驻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司令）感到不安”的标题下这样写道：“纳瓦尔将军不愿意让越盟继续从东侧威胁着印度支那军队。再过一个星期，（法国）最高司令部可能会面临着柬埔寨这个第二战场。纳瓦尔知道，整个军队也都知道，他们存在着一个由（西哈努克）国王这个不可理解的人物所提出的

问号。抗议外国吞并本国领土的国王放弃了他的首都金边，在强盛的高棉王朝的见证者——吴哥遗址邻近的暹粒市安营扎寨。他在那里住了很久。在这段时间里，法柬军事协定——他自己的业绩——的签署也未能使他离开那里。不管怎么样，国家的前途还要依靠这个戴着亚洲一种最古老王冠的令人不安的、骄傲的和神秘的脑袋。”

事实上，我正在准备返回金边，因为就在这年十月份，法国接受了我的全部要求。回王宫的日期确定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这是王宫里的占卜家选定的“吉祥”日子，我的母亲对他是完全相信的。

好事总有好结尾。通过我的首相宾努与里斯特·鲁西（由于他的威望，取得了法国高级专员的头衔）和我的老朋友朗格拉德之间艰苦的谈判，一个圆满的协议达成了。移交权力议定书中的主要规定如下：

司法权方面。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的议定书写道：“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将其在柬埔寨王国领土上所行使的司法方面的一切权力移交给柬埔寨王国政府。此项移交（包括在柬埔寨的一切受法国司法机关管辖的人在内），将从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开始生效。”

治安权方面。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的议定书规定：“法兰西共和国将其直到今天还在柬埔寨行使的一切治安权移交给柬埔寨王国政府。”

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在给柬

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宾努阁下的 2756/2 照会中写道：“我荣幸地通知阁下，由于移交了治安权和司法权，法国国家宪兵队随即停止在柬埔寨领土上行使一切民事职权。

军事权方面。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七日签订的议定书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将一切军事方面的权力移交给柬埔寨王国政府。柬埔寨国王陛下的政府可在王国的领土上完全自主地行使一切军事方面和军事指挥上的一切权力。指挥地域的移交包括军队和实施这一指挥的必要手段的移交。”

朗格拉德少将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七日致我国首相的 442/CAB 照令中写道：“我荣幸地把过去在战术使用上属于我指挥的高棉王家军队，自议定书签字之日起移交给陛下的政府。在这些军队即将归属于其国家指挥的时候，我谨向王国政府表示我对这些军队的前途充满着信心。这种信心是建立在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能力的基础上的，我本人曾亲身感受过这种能力。”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在这前夕，我的车队将要经过的所有的城镇和乡村都装饰一新，准备最隆重地欢迎我，向我表示敬意。从暹粒到金边的三百公里路途中，少数法国朋友（其中有我的牙科医生埃尔丹·戴·佩库拉博士）混杂在高呼“国王万岁！”的成千上万的高棉人当中，我的王宫到处都是些身披桔黄色袈裟的新剃光了头的和尚，他们为我诵经祝福。我发现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山玉成的忠实信徒。这些人的微笑是痛苦的，因为他们那位为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

“伟人”已经走投无路了。

在接受法定社团和咨询性的国民议会的祝贺之后，我隆重地接见了法国高级专员里斯特·鲁西和朗格拉德将军。我授给前者一枚王国一级骑士勋章，授给后者一枚王国二级骑士勋章。朗格拉德将军还接受了一枚柬埔寨王国勋章。我最亲密的战友宾努阁下也得到了一枚王国一级骑士勋章，唯有他一个人被授予英雄人物勋章；民族功臣勋章，后来，他又被封上了最高的荣誉称号：“桑岱”（高棉语对爵位最高的亲王的尊称——译者注）。

十一月九日上午，朗格拉德将军和我一同主持军事权力的移交仪式。这是除了法国人之外，还包括塞内加尔人、马达加斯加人、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和摩洛哥人在内的法兰西联邦军队最后一次在金边的街道上，也是在柬埔寨领土上列队行走了，他们即将要到越南和老挝去继续进行战斗。接着，轮到我的军队列队走过来了，它的 身后是从王国的各个角落来的、身穿咔叽军服的几十万名男女民兵。

《巴黎竞赛画报》以悲伤的口吻描绘了这一历史性的军事接管：“在闪电和雷鸣伴随着倾盆大雨的天气下，法国军队离开了柬埔寨。队伍出发时，在检阅台上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刚刚成了民族英雄。在他们当中，一位是高级专员里斯特·鲁西，第二位是直到当时还是驻柬法军司令的朗格拉得将军，而第三位就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英雄”就是他。为了获得这一称号，他只要变成一个逃避正业的人就行了……。国王象亨利四世为送别西班牙人那样伤感地为法国人送行，

然而他不是亨利四世，那些曾在柬埔寨呆过的法国人也不是压迫者，而是保卫者……一句话，法国人走了，这是垂手可得的黄金时代。只要柬埔寨在没有法国人的情况能够维持几年就行。但愿佛陀和胡志明保佑！……”

33

反对越盟

越南共产党人——“胡伯伯的孩子们”，乘柬埔寨获得独立和法国从柬埔寨撤军之机，毫不犹豫地对我的国家施加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从一九五四年初开始，当他们在东京和老挝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他们象人们说的那样把赌注下到他们很早就已进行渗透的柬埔寨上来了。他们在柬埔寨的所作所为，同后来一九七九年的做法完全一样，象对待一个已经被征服了的国家。我的国家什么厄运也没能逃脱：乡长们遭杀害；公务员被撤换；学校和城乡医院被拆毁；一些省长、县长和许多军人（其中有我的卫队的沙里克少校）遭暗杀；桥梁和公共建筑物被炸毁；火车遭颠覆等等。越南人和他们的高棉追随者，以至模仿他们的山玉成分子和其他土匪集团在公路上截住大客车和专车，捣毁车辆后杀死那些旅行者。这些人对那些他们认为“合作”得不够好的村庄大肆掠夺。越南干部试图教育那些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老百姓。他们当然竭力向老百姓们灌输对西哈努克的仇恨。

越南人是没有可以狡辩的理由的。一九五三年年底，我

的首相宾努亲王通过我们国家电台和报纸发表了一封致越南人的信，主要内容是：“你们以帮助高棉民族从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为借口，从一九四七年起就来到了我们国家。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开始，我们的民族已恢复了自己的所有主权。你们再没有理由继续留在我国制造动乱和进行不能容忍的反对君主制度的颠覆活动了。我们的国王、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请你们尊重我们的主权，返回你们自己的国家去吧，不要再干涉我们的事了。考虑到你们为反对法国对越南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还没有象柬埔寨这样获得独立，我国政府特向你们宣布，柬埔寨王国在你们反对法国的战争中严守中立，因为这场战争仅仅是越南和法国之间的事，与我们无关。柬埔寨王国愿意同法国和越南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她希望法国和越南两国能在越南独立问题上通过和平途径寻找一条出路，重归于好，就象法国和柬埔寨在为高棉独立问题上刚刚达成的解决办法一样。

首相在信的末尾提醒越盟说，如果越盟军队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以前不全部从王国撤走，柬埔寨国王将被迫对这些军队采取军事行动。然而，十二月到了，又过去了。越南人不仅没有从我国撤走，他们的军事侵犯活动反而增加了。

于是，我发动了“沙玛给”运动——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团结”的意思，就是高棉人团结起来保卫祖国的运动。高棉人民情绪普遍都很高涨：他们要求去打“越寇”（安南人）——这是对那些在几个世纪前就吞并了柬埔寨一半领土，其中包括下柬埔寨（交趾支那）的人的贬意叫法。

柬埔寨的山玉成分子和共产党人继续侮辱我。前者（自由高棉）在他们靠近泰国边境的巢穴里，以越来越难以令人置信的方式一再坚持说民族独立“不存在”，而且长时间地煽动并不是反对侵略者而是反对柬埔寨王国的暴乱。

山玉成那个时候的戈培尔是韩通哈。对韩通哈其人，我曾给他提供助学金，让他去巴黎留学，学习戏剧和导演艺术，他的教师是夏尔·迪兰和路易·儒韦。我原谅了他的反抗，并在六十年代任命他为皇家艺术学院院长，相当于一级国务秘书。后来，他以成为朗诺的“高棉共和国”的一个“支柱”（甚至还当了几个月的总理）来报答我对他的宽容。一九七五年四月，他还留在金边，结果被逮捕并处死了。

至于柬埔寨共产党人（高棉越盟），他们直接参加了由胡志明的部队进行的反对我的军队的军事活动。

身着军服，拄着拐杖，脚穿为穿越丛林而准备的法国靴子，我同我的部队一起进入了原始森林，和部队一样喝水塘里混浊的泥水（一九七三年，当我视察“解放区”时，对我“极为尊重”的红色高棉向我提供的是法国矿泉水！）由于缺少飞机，我被迫向法军司令部提出要求，请他们驻在西贡的飞机给予协助，用轰炸机扫射来支援我的步兵部队，这对山玉成分子来说当然是个机会，他们可通过他们的电台宣布我同殖民主义者仍有勾结。

由于在马德望省的斯栋坎洪地区遭到我的军队和法国飞机的打击，越盟生气了。他们调动其正规军的三个精锐营侵入上丁和桔井省。在上丁省，我的士兵们在靠近老挝边境的暹邦阻击敌人。在桔井省，我的伞兵在斯雷芝把敌人赶走了。

侵略者逃回越南，一面营级军旗落入我的“伞兵”手中。后来，我把这面军旗陈列在金边的西哈努克博物馆里。一九七〇年，朗诺分子关闭了这个博物馆，里面收藏的东西也都散失了。

形势是很严峻的。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士兵，我只好把我的王家卫队也派到了前线，他们是雄赳赳地奔赴战场的。当然，有许多民兵告诉我说，他们是准备为祖国和国王陛下去献身的，但他们所受到的军事训练是极其粗浅的，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武器，只有“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木枪。

对我国幸运的是，为结束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当时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后来还会有这样的战争）而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举行。在为我国争得独立和宣布柬埔寨在法越冲突中保持中立之后，我遭到了自由世界报刊的诽谤，但他们却突然对我敢于同越盟作战给予极力的奉承。美国报纸赞扬我的勇气和英明，西贡和曼谷的报刊授予我杰出爱国主义奖。曼谷杂志《标准化画报》写道：“西哈努克国王怀着高度的负责精神，镇定和英明地领导他的人民。”西贡日报以赞扬的口吻写道：“我们必须承认，诺罗敦·哈努克国王真正是一个非常英明和令人尊敬的君主。（原文如此）。人们怎么也不会预料到，这位如此忠于法国的年轻国王，会在朝夕之间竟变成了法国的一个具有特殊能力和才干、令人钦佩的对手（……）。这是因为这位君主看到了他的人民在受难，就决定为了他们的独立，为了国家重新得到安宁而斗争。为此，他毫不犹豫地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对在丛林和

山区里过一种士兵生活并不畏惧。他接近他的子民们，以便很好地了解他们的困苦。这样一个国王，尽管很年轻，却赢得了老人和儿童的尊敬（原文如此）。柬埔寨有如此的幸福和机遇，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这象神话一样美好！自然，同西方和亲西方的报刊一起度蜜月是不会长久的。很快，一个“沉着、聪明和英明”的西哈努克的形象就被“红色亲王”、“疯狂的、危险的……腐化的、吃喝玩乐的暴君”的形象所代替了。

当我要结束这一章草稿的时候，有人给我送来了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出版的一期“纽约时报”。这份美国杂志重登了一九七〇年前反对我的那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这份杂志写道：“尽管他神经错乱（间歇性的），有时又像一个小丑，但狡猾的西哈努克在他的国内还是受欢迎的，特别是受到农民的拥护。”绝妙的分析，真是聪明极了……。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的胜利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引起了如此多的研究和专著（我只引用我的朋友让·拉库蒂尔和菲利普·德维耶的著作），因此我只需要大概谈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就行了。在这里，简要地回顾一下在老挝和越南发生的事后，我主要将谈谈我的国家为了避免象我们的两个近邻那样被分割而进行的艰苦斗争。

法国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一九五四年七月，成功地把与印度支那冲突有关的所有国家都召集到谈判桌子

上来了。参加者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越盟的受害者——柬埔寨和老挝当然也被邀请了，然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原则上要为普遍和解作出努力……。

我派了两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去日内瓦，一个是文职官员代表团，由外交部长狄潘先生率领；另一个是军事代表团，由在“王国独立十字军”中升为将军的涅刁龙先生率领。由于我了解我的代表们的能力，同时也因为我作为执政的国王不能直接参加辩论，所以，我就住在法国南方的一个偏僻的地方，通过电话和我的使者们始终保持不断的联系。

当发出会议邀请时，谁都看不起小小的柬埔寨，自由世界的大国准备牺牲它来换取印度支那的和平和东亚的稳定。就象老挝王国那样，尽管它的政府对法国的话非常顺从，但他们的意见仍然被置于不顾，事实上是被牺牲了。两个省脱离了被法国授予抵抗勋章的西萨旺·冯国王陛下：一个是与中国接壤的丰沙里省；另一个是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相邻的桑怒省。巴特寮主席苏发努冯“红色亲王”的背后，还有后来成为被河内殖民化的老挝总理、越老混血儿，凯山·丰威汉。由于范文同、莫洛托夫和周恩来的共同努力，苏发努冯就这样战胜了可怜的老挝国王。

刚刚在奠边府获得胜利并在越南全国各地都取得胜利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获得东京和北纬十八度线以上的安南北部感到满意。它之所以表现得比较“通融”，因为它相信按照协议的规定，在两年后的一九五六年七月举行的大选中，定能把

西贡政府彻底击败，越盟们被美国人“欺骗”了（只此一遭），因为美国人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他们阻止了预定的大选，破坏了越南的统一……直至他们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的失败。

为了避免象它的邻国那样被“割成二块”，高棉王国不寄希望于依靠孟戴斯·法朗士先生，因为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他只考虑把他的国家从印度支那困境中解脱出来。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但我们有一件后来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武器：在日内瓦会议之前九个月，即一九五三年九月，我们就已经获得了完全独立，这是“王国独立十字军”出人意料的成果。

我的文职和军职代表们向对我们感到吃惊、有时甚至是钦佩的其他代表团，解释了我同我的代表们事先商定好的柬埔寨的立场。我的代表们说：“如果必须给越南共产党人的亲信——高棉越盟一个象在老挝给巴特寮共产党的“自治地区”的话，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会在你们向我们建议的协议上签字。高棉越盟不仅一点也没有参加争取独立的斗争，反而以武力反对这场斗争。当我的政府同法国进行艰苦的时而是棘手的谈判时，他们却竭力削弱我的政府。此外，高棉共产党人把越盟“豺狼”引进了柬埔寨的“羊圈”。他们听任越盟占据我们一些省份，不仅不对其背信弃义给予惩罚，而且还让其主子——越盟奴役柬埔寨”。

孟戴斯·法朗士先生并不怀疑我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但他沮丧地看到“西哈努克的人”决心要使印度支那的和平历史

著作倒着写，如果他们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的话。然而，孟戴斯·法朗士先生曾公开宣布，如果最迟到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议协还没有达成和签署的话，他的内阁将辞职。

午夜将临，七月二十日即将来到了。我们的代表们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会议如果失败，将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由于继续对抗下去已感厌倦，各代表团的代表们只好被迫宣布满足金边“小人物们”的愿望。这一来，范文同先生只好把混在北越人的行李里来到日内瓦的高棉越盟首脑山玉明（当年的韩桑林）的代表们隐藏起来了。

停战协议就这样由军人们签署了。河内国防部副部长谢光宝先生代表他的政府在协议上签字。法国驻印度支那武装部队司令的代表德尔戴准将代表法国以及还没有获得完全独立的、其军队仍处在法国指挥之下的老挝和南越在协议上签了字。我们的国家是幸运的，由一个柬埔寨人——高棉王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涅刁龙将军代表独立的柬埔寨签了字。为了挽回面子，谢光宝先生戏剧性地同他拥抱。

是不是一切就此解决了呢？还没有。狄潘部长拒绝在有关非军事的协议上签字。因为他问心无愧地指出，高棉王国不应该象人们对它要求的那样，支付CIC（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其主席为印度，成员有加拿大和波兰）设在柬埔寨的机构及其在柬埔寨活动的百分之五十的费用。狄潘解释说，柬埔寨对由越盟挑起的战争不负任何责任。唯有越盟应该对此负责任，它必须支付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在柬埔寨的一切费用。

孟戴斯·法朗士先生越来越忧虑。万国大厦的钟摆已经

指到了午夜，一个假设的不结束的一天不能再延长了。所有的代表们都非常激动，于是，一位苏联高级官员（我想是莫洛托夫先生）对由于高棉代表团的固执给他的阵营带来的侮辱非常生气，他对狄潘先生说道：“你们维护了你们的领土完整，而你们所支付的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在你们国内的办公和生活用费的百分之五十，与这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狄潘明白不应该走得太远了，最后终于表示了同意。其他代表团听后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并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以后的日子里，自由世界的新闻机构，特别是美国报界，对柬埔寨王国代表团面对着趾高气扬的共产党阵营，“挽救了”西方阵营的荣誉的行动赞不绝口。

周恩来是个老练的行家，他预料到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柬埔寨是属于西哈努克的，他邀请了我的代表们在他租赁的日内瓦郊区的宅邸里共进午餐。招待是完美的，烹调是考究的。席间大家开怀畅饮，不断举杯相互致意。周恩来请狄潘转达他对我的敬意和祝贺。回到金边后，我的代表们向我称赞中国总理，他们被他迷住了……，他们还对中国的美味佳肴大加赞赏。相反，我的代表们对“老狐狸”范文同和对“脾气暴躁的北极熊”的反映，却是持着非常保留的态度。我的读者们大概能猜到，所谓“脾气暴躁的北极熊”指的是莫洛托夫先生……

高棉越盟分子和外国共产党人否认我们独立的日期

高棉共产党人，还有越南和苏联的共产党人对我为我国争得的完全独立和维护了我国的领土完整是永远不会谅解的。

在执行日内瓦协议时，高棉越盟分子必须解散他们的武装力量，并把他们反对西哈努克和君主制的斗争转到政治方面来。但事实上，他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反对王国政府的武装斗争。此外他们还把许多武器分散隐藏在他们的“寺庙”里。正如波尔布特在一九七七年所披露的那样，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遭到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后，他们分裂成两种倾向，后来又变成两种激烈的运动。其中一种倾向还和越盟保持联系（河内把其中的五千名追随者带到东京，继续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另一种倾向自称是“民族性的”，但实际上是和中国毛主义联在一起的。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老一辈”集团以及乔森潘、胡荣和符宁等原留法共产党大学生的“年轻一辈”都属于这个亲毛和反越盟集团的。

留在国内的高棉共产党人组成一个叫做“人民派”的政党。在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的监督下所举行的一九五五年大选中，尽管委员会中有代表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的帮助，人民派也仅仅获得了3%的选票……因而在国民议会中没有取得任何席位。“民主党”和山玉成分子获得13%的选票。只有我创建的“人民社会同盟”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和议会

的全部席位。在我提到过的一九七七年的报告里，波尔布特强烈攻击五十年代的人民派的前领导人。此外，他还从一九六〇年起把这个党的名字改为柬埔寨共产党。一九七八年，河内电台在同红色高棉的激烈辩论中，越南说波尔布特处决了人民派的前领导人，其中包括神秘的山玉明。

在五十年代里，高棉越盟分子和外国的共产党人，象山玉成分子和一些西方人一样的认为，一九五四年七月的日内瓦会议使柬埔寨获得了独立。而到了一九七七年，波尔布特毫不犹豫地认为在日内瓦会议上，社会主义越南卑鄙地出卖了高棉共产党人，并认为胡志明的国家被“柬埔寨封建主义者”（应念成：西哈努克君主主义者）打得惨败。而且他还认为，柬埔寨的独立是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即以红色高棉取得胜利的那一天才真正开始。这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谁都会说自己是正确的……。

为了使人们看得更清楚，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1.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政治、行政、司法、治安、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权力——也就是说，主权的一切标志——都已经掌握在我的政府手中了。

2. 在权力移交后，柬埔寨国王已经通知法国政府，他的国家不再参加法兰西联邦最高内阁会议，并在外交和对外政策方面恢复自己的主权。

3. 在货币方面，柬埔寨从一九五四年起已经退出了法郎区，它的国家货币瑞尔，已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独立的货币。我还必须指出的是，日内瓦会议并没有涉及到货币问题。

在本章的结束部分，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引用我于一九六八年写给苏联作家雅什涅夫先生——“东南亚国家概况”一书的作者的信中的一些主要段落：

“你把柬埔寨独立的实现归功于所谓的解放运动中央委员会，就是因为他们的游击队曾控制过柬埔寨的某些地区，然而，你却闭口不谈我当时作为国王所进行的外交和政治方面的活动，不谈我的同胞们组成的“王国独立十字军”，我认为，对此应该实事求是。在争取我国独立的斗争中，高棉伊沙拉克或高棉越盟集团没有起任何作用。他们根本无法与越盟相比，越盟的行动对北越的独立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至于柬埔寨，法国只同王国政府一方就移交权力以及撤走行政人员和武装部队的问题签订了协定，如果高棉伊沙拉克或高棉越盟集团有象越盟那样的重要性的话，法国肯定就不会这么干了。此外，我还提请你注意，在一九五三年法国司令部和法国军队撤走后，支持某些地方部队的越盟并没有离开柬埔寨，他们保证说只是想“摆脱”法国人。

“你还说‘高棉抵抗者’占领了‘某些地区’，如果他们确实是为了柬埔寨独立而战斗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占领象马德望那样连一名法国士兵也没有，而是高棉国家武装力量所掌握的省份呢？”

“你还把人民派称为‘城乡劳动者利益的代表’。我提醒你注意，在有国际观察员在场以及在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监督下举行的一九五五年的议会选举中，这个党仅获得了百分之三的选票，这就使它很难获得我国劳动者的代表称号”

了,在一九五八年的普选中,你所说的“城乡劳动者的代表们”也只获得选民们的百分之一的选票(……)。我们不应该歪曲历史事实,即使对一个有同样信仰的地方集团也应该如此。相反,我们这方面从来也没有歪曲苏联党和政府的历史,也没有贬低它的功绩。”

34

放 弃 王 位

九五五年，我成功地实现（甚至超过）了在一九五二年——向我的人民所作的一切许诺：我们的国家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在日内瓦，它重新得到了和平，与老挝和越南这两个邻国不同的是，它避免了领土和意识形态上的分裂。

我三年前向人民许诺的，目的在于根据我的《十字军东征》的成果，对我进行裁决的公民投票已经开始。在秘密投票中，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选民表示“满意”。有相当数量的山玉成分子和“民主党”成员，不顾他们上司的命令，也投了赞成我的票。只有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当然也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由于仇恨和嫉妒，投了我的反对票。我发现，在我的公开生活中——甚至在我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个流亡者的时候，这些极右和极左的投机集团都在反对我。

于是，我宣布将按照我的诺言，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以便恢复议会民主。但我建议通过一次新的公民投票，仍然以秘密投票的方式来实施议会选举，其目的是征询人民是否接受我对一九四七年宪法所提出的几个修正案。这些修正案包括以

下这些内容：

——使妇女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政治权利（一九四七年的宪法在这点上是有有些鄙视妇女的）；

——建立在各方面都有权监督国民议会的省议会；

——允许每个选区的选民罢免他们所选出的议员，如果这个议员不再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满意的话。如果大多数选民就此事正式向国王提出要求，国君应该让那个不满意的选区举行新的选举，而被罢免的议员在新的选举中仍然有权重新报名参加竞选。

这个在许多人看来最终还是比较“进步”的修正案激起了我的对手——“民主党”和山玉成分子的猛烈抨击：

——他们坚决反对给绝大多数是王室的忠实支持者的妇女们以被选举权；

——他们担心规定只有当地的人才 有资格当选为本省议会议员，会使各省议会的议员绝大多数都是西哈努克分子，因为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

——侥幸当选的“民主党”、山玉成集团和共产党的议员们所担心的是，万一国王心血来潮，煽动那些反对王室的议员所在的选区的农民们起来要求重新选举的话，他们就不能任满四年任期了。

在金边，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和某些西方国家的大使，也出来支援我的对手。他们要求我放弃这种公民投票，并要我在一九四七年宪法的基础上组织议会选举。他们对我强调说，按照宪法本身的条文规定，这个宪法只能由国民议会来修改，而不能通过公民投票的途径来修改。

我反驳说，人民直接参与协商比议员要好。并说，一九四七年的宪法也是国王“批准”的，而不是国民议会通过的。我请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来监督公民投票。它拒绝了，并警告我说，如果议会选举不是建立在现行的未经修改的宪法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别的什么基础上，它将不能监督议会选举的正常进行。在好几个星期里，我一直保持沉默。“民主党”人、山玉成分子和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外国支持者们欣喜若狂，以为我已被打败了。

突然间，我爆炸了我的“原子弹”，我放弃了王位。

自从法国人撤离之后就完全独立自主的王位最高委员会，一致选举了我的父亲苏拉马里特亲王为柬埔寨的新国王。王国内外对此反映都很强烈。为了同人民站在一起，为给妇女和农民们带来地位的新的民主制度进行辩护，我宣布将涉足于政治舞台。对此，我的敌对者们气急败坏，摆出了对我进行反击的架势。

我立即发起了立法运动，同时还创立了我自己的政党“人民社会同盟”（从字义上讲，是“热爱人民者同盟”，而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什么“人民社会主义同盟”）。我们党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参照了关于社会方面最先进的佛教教义。我办事从来不虎头蛇尾，既然我接受了挑战，我就要象一个具有“胜利者”气质的党的领袖那样行事。因此，“人民社会同盟”主席跑遍所有的省和县，以及大部分的乡，向人民阐述他的政治纲领，同时还对那些同我们竞争的党的批评和指责作出回答，他们是“人民派”、“民主党”和从严森波那里分裂

出来的民主主义者。

诺林德的自由党、朗诺和施里玛达（此二人后来是一九七〇年政变的头头）的革新党以及其他小的政治团体决定解散并加入“人民社会同盟”。我知道这些党派的首脑都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但为了我那弱小祖国的利益，我答应为民族团结发挥作用。“分而治之”从来就不是我的座右铭。

当我的“同盟”在有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密切监督下，举行的选举中获得全胜之后，为了尽可能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同我最激烈的对手——“民主党”人和众所周知的山玉成分子以及共产党人分享权力。然而，共产党人中间的一员——胡荣曾在一九五二年给我写信说，他反对我这样的国王。当看到没有别的路可走时，有些人决定带着可以估计得到的各种用意（其中包括从内部摧毁我们的党）加入我已经获胜的党，我很快就任命这些人为部长、国务秘书、副国务秘书和大使。在后来各次议会选举中，我提名他们为我的党的候选人，也正是因为利用了我的名义，他们才很有把握地当选了，而过去当他们以我的反对者出现时，他们则很少能获得成功。

当抛去伪装的共产党分子在六十年代后期进入丛林，朗诺分子在七十年代叛变我时，就有些人说，我应该对他们的背叛负责。

一九七九年，我再一次表示，对于我来说，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那些从红色高棉手里逃脱出来的原一九七〇年政变分子对我说，他们重新拥戴我为他们的“民族领袖”，我答应同他们重归于好。当我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况时，所有

的幸存者都要为解救他们而携手前进。

再回过头来谈谈一九五五年的选举吧。西方报界普遍把它说成是一股“反共产主义的海啸”。这是不正确的。高棉的“弱小人民”绝对不想在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只是想把曾给他们带来独立与和平的“国父亲王”推举到领导岗位上来。在我的运动中，我特别强调人民社会同盟是中立和不结盟的坚定信徒。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上，以及后来在我作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客人新德里，我对此都已经明确地表明了立场。因此，还没有等到铁托、纳赛尔总统以及尼赫鲁总理于一九五六年创立的不结盟运动提出这个原则的时候，我就已经用它来作为高棉对外政策的基础了。

我父亲的登基

在国外，人们常说：“西哈努克是为了他父亲才放弃王位的”。这不符合事实。我放弃了王位，这本不假，但我绝对没有权力指定我的继承人，因为我们的君主是选举制的。一九四七年的宪法明确规定，一个新国王必须由王位最高委员会在安东国王的男性后嗣中选择。安东国王是诺罗敦国王（安东家族的“长兄分支”）和西索瓦国王（安东家族的“幼弟分支”）的父亲。按照宪法规定，王位最高委员会是由佛教的两派（摩诃尼迦耶派和达摩育托派）僧王、婆罗门教僧王、王室家庭会议主席、王国政府首相、国民议会主席和王国议会（参议院）主席等七名高级官员组成。

我不需要向那些“伟大选民们”施加任何压力，以便让他们选择我的父亲，因为他们已经一致同意选他了。我的舅父莫尼勒是王室家庭会议主席，他崇敬我的母亲——他的姐姐。对她成为王后，他感到很高兴。作为一九四一年王位继承者的不幸“候选人”，他觉得选我父亲作为君主，要比我当国王，使他受到的侮辱要轻一些。因此，他投了他的姐夫苏拉马里特一票。相反，我的另一个舅父莫尼庞，他并没有选举权，但当他得知选择我父亲为国王时，却大发了雷霆。他来到王宫里，但并不是为了向新君主表示祝贺，而是愤怒地高声对我说，我放弃了王位和让一个“傻瓜、花花公子和无能之辈”登上祖先的王位是犯了大错误。当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我的母亲听到她弟弟如此对待她的丈夫——国王时，非常惊恐不安。她恳求我，要我去请求国王的原谅。然而，就在隔壁屋里的国王对这令人难受的场面，当然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我的调解尝试，比我预料的要容易完成的多。我父亲此时还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他说：“莫尼庞可以侮辱我，这无关紧要。我中了头等奖，而他却永远失去了任何登上王位的机会。”他这样说，是有理智的……。我父亲比过去仅仅是个安逸的自由民时更高兴了，他现在有钱了，将能够满足他的宠妃叶夫人的物质要求了。他急忙把她提高到最高的地位，即王妃等级中“坤”的位置。王妃等级是逐级依次排列的，即坤、莫姆、尼亚莫娘和尼亚娘。^①

〔1〕 这是柬语音译，其意有如中国古时的贵妃、贵嫔、昭仪、才人等等——译者注。

苏拉马里特国王和哥莎玛王后的加冕典礼，同一九四一年我的加冕礼很相似，也同样搞得很豪华。唯一不同的是，因为我国已经获得了独立，一大群外交使团参加加冕仪式。尽管柬埔寨是个气候炎热的国家，但为了对我的父母亲表示尊敬，使节们仍是汗流夹背地穿着燕尾服。他们的夫人们身穿宫廷长裙，戴着手套，就像在白金汉宫里一样。几个亚洲外交官保留了他们的很适合气候的民族服装。人民群众的情绪特别热烈。我的漂亮、庄重、非常雍容华贵的母亲不仅是因为她的王族血统，而且也因为无论是对“大人物”还是对“小人物”，都是采取和蔼可亲和仁慈的举止和风度，使她受到所有的人——高棉人、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崇敬。

即使是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废除君主制之后，我们的“弱小人民”仍然是深情地忠于她，那位他们始终称之为“我们的王后陛下”、“民族之母”的人。

35

万隆的回忆

万隆是爪哇岛上的高山名胜。荷兰人为了寻找凉爽的地方，把它整治得很好。这里有舒适的大饭店、漂亮的公园和设备齐全的旅馆。这是印度尼西亚独立之父苏加诺总统为同亚洲、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政府首脑举行历史性会见而找到的最好地方。

这个第一次最高会议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它产生了后来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具有影响的，被视为第三世界觉醒的“万隆精神”。会议是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的代表为了开始执行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的共同政策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聚集在一起。除苏加诺总统、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之外，其他演说家也都受到普遍的赞赏。我在下面将立即指出，这次亚非国家最高会议是一个独特的会议。本着这个会议的精神、亚洲人和非洲人后来召集了“不结盟”的会议。

许多西方人可能面对着这三个概念而感到羞愧，那就是：象征着亚非主义的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一九六〇年在

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会议（这是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已被公认的“第三世界”。

不结盟运动远未被很好的承认。它聚集了上百个进步的、中间的和保守的国家，它的原则是不同大国结盟，也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这个原则并不是被所有的人遵守的，有些国家认为，不结盟就是不被苏联或美国牵着鼻子走，象卡扎菲上校在一九七三年的阿尔及尔会议上所说那样：“真正的不结盟国家用一只手的手指头就可以算得过来。”

亚非主义是那些受过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等国，哪怕是不久前还受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的国家的团结运动。在万隆有一件逗人的事，那就是由周恩来提出来的：中国强烈地支持苏联同亚非国家一起出席会议的要求，因为苏联的一些“共和国”在亚洲。后来，还是中国，同样强烈地提出：苏联根本就无权介入亚非大家庭之事务，因为它属于欧洲，至于它在亚洲的所谓“社会主义共和国”也不过只是俄罗斯的殖民地，而且它在亚洲的土地，实际上是被它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办法非法吞并过去的中国领土。

中国出席了万隆会议，但没有参加不结盟会议。就我个人而言，我为中国感到惋惜，因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无疑比大多数自称为不结盟的国家是更真正的“不结盟”。

再回过头来谈谈一九五五年在万隆的情况吧。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后来，特别是一九七〇年以后，在我最艰难的岁月里，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效仿着范文同（范后来……）主动接近我。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

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中国代表团在他们住宿的别墅里设午宴招待柬埔寨代表团。我可以证明，我的外交部长迪潘在一九五四年从日内瓦回来之后，毫不夸张地向我称赞周恩来的中国厨师的烹调技术。有些象一八一四年塔列朗在维埃纳召开议会会议时那样，他们带来了人数众多的一批厨师，为我准备了我喜欢吃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我在饮食方面的小毛病，但我必须当心中国人所欣赏的用米酿制的“茅台酒”。周恩来在私生活上是以严肃刻苦而闻名的，但他又是一位喝了无数杯茅台酒以后仍保持头脑清醒的很能干的外交家。我必须小心谨慎，一方面，米酒的味道有点使人难以应付，同法国好酒的滋味也大不相同；另一方面，它已使我有些神志不清楚，因为还没有吃东西的时候我已经够……罗嗦了（就是有些外交官说的：“冒失”）。

周恩来赞赏我的发言，尤其是赞赏我那个轰动一时的“关于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声明”。毫无疑问，无需担心他们会来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他称赞我同法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法国和美国之间，宁让法国来训练高棉王家军队的干部。他劝我要当心美国，因为它“比帝国主义还要帝国主义”，很可能重新奴役刚刚获得独立的柬埔寨，而当时的法国，由于它已撤出印度支那而且同那里的关系已疏远，对我国已没有多大的威胁了。有趣的是，“反美”的周也改变了主意，于一九七二年同尼克松和基辛格度起蜜月来了。

那时的中国的合作者苏联，却同中国不同，它对我不满

意，愚蠢地把希望寄托在柬埔寨共产党——人民派的身上。’直至一九五五年初，同他们的高棉帮手们一样，竟敢在联合国说柬埔寨还没有真正独立，并对柬埔寨提出的加入联合国作为正式会员国的要求断然给予否决。

周以毛泽东的名义邀请我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时正处在我国议会选举前夕，我尚未成为我们党的首脑。我也邀请中国总理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那是在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而且同蒋介石还有领事关系的时候。一九五六年，我们的相互访问获得了巨大成功。

后来，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我流亡北京的时候，周经常向我提到我们在万隆建立起来的“多年的牢固友谊”。一九七五年九月，我在返回柬埔寨之前，曾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庆祝我们建立友谊二十周年！”在万隆，我同时也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他当时是周的伟大朋友。他们两人都是富于魔力的杰出的名流，风度翩翩，很有涵养。尽管他们都是大国的政府首脑，而且都在捍卫各自可爱的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中久负盛名，但他们却表现得更为谦虚。

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尼赫鲁（他曾问我：“为什么人们称我为‘学者’？”）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在暹粒——吴哥短暂的时间里，他秘密会晤“游击战士”山玉成。在返回途中，印度总理把这次会见的情况告诉了我，并向我透露说，他劝山玉成停止反对其国王并归顺于国王。山玉成回答说，这办不到，因为西哈努克以假独立来“欺骗他的人民”。

会议上，我在结束我的发言时向尼赫鲁表示敬意，把他

比作“亚洲的灯塔”。当着苏加诺总统的面这样做，是不够礼貌的。我当时对他印象不好，但他对我并不抱怨，后来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万隆会议之后，在高棉选举运动之前，我应尼赫鲁的邀请，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按礼宾规格，我只是一个没有职务的前国王，但尼赫鲁还是在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后来，经过许多困难，被西方人士所谓的“印度第一号人物”）的陪同下，亲自到新德里机场去接我。尼赫鲁仍照旧给我以最热烈的接待，把一个特大花环挂到我的脖子上。他是真的在寻找他的“潘查希拉”（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信徒。我热烈赞同五项原则，因为我一贯信奉“中立”。为了表示对尼赫鲁的尊重，我甚至公开说他是我的“格鲁”（意为我的老师）。令人伤心的是，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战争时，这个“和平共处”即付诸东流了。周和尼赫鲁的极度不和，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在万隆，狡猾的范文同经常要我和他（实际是和越盟）一起抽上和平的烟斗（表示和好）。一九七九年，他和他的同伙无耻地侵占了我的国家，还拒绝了我关于和平解决柬越冲突的建议。他们对他们那个鸚鵡式的韩桑林“政府”说，西哈努克“只代表他自己”，是“柬埔寨人民的死敌”。正如佛祖所说那样：“天下没有固定不变的事”。

36

建设国家

九五二年，我决定承担无议会监督的政府事务。三年后的一九五五年，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我的神圣职责，是接受通过全民投票的人民裁决，在可能范围内，消除我国在王家十字军东征之前所存在的落后状态。

首先，我们的独立自然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恢复自己的主权）；其次，表现在经济方面，这同样是重要的，犹如骑自行车，要是后轮不转动，车子也就无法前进了。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落后，就是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不具备完整的主权，因为它要一切依靠外援。而外援，起初则使这个国家经济感到必不可少，无法与其脱离，进而它又无大妨碍地持续下去，并取代了这个国家的自力更生。

建设国家当然不能只依靠某个人，只有靠全体人民齐心协力的合作才能进行。但是，必须有个受人尊敬和拥护的领导人，以便发动群众并领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同时，还必须有一个忠于职守的政府，以避免那种阻碍进步、蛊惑人心、把国家引向比以前更落后的政策。

下面，以把人民引向倒退的三个政府为例：

——民主党政府（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不致力于加速经济发展（使它处于极落后状态），反而在捣乱分子和扰乱治安分子的秘密支持下，专门反对君主制度。

——朗诺、施里马达政府（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五年），一个极度无能、腐败和混乱的政府，它把国家主权出卖给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它显得非常无能，不仅热衷于外援，而且把它胡乱挥霍，用来把兵营和工厂改成防御堡垒（如乍格雷丁水泥厂和磅湛纺织厂就是如此），把波成东孤儿收容所改成反游击战学校。

——红色高棉政府（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根据河内电台和莫斯科电台的说法，他们最后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即把现代柬埔寨倒退到最原始时期，继而进入石器时期。

在六十、七十年代时，我的一些国内外反对者，说我对当时“落后”的柬埔寨是负有责任的。请允许我在没有任何思想争论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平静地提出一些事实和数据。

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我只接受法国的帮助，来使我的国家现代化。自一九四九年签订“相互依存的独立”（是在法兰西联邦大家庭中相互依存的意思）到一九五四年签订日内瓦协议，有相当一部分国家财政和法国提供的援助，是用于国防方面，特别是用于保安方面，同时也用作经济建设的资金。

只有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这一年我拒绝了美国的援助）期间，我国接受了又一新的外国援助——美援。再

者，必须指出，美国每年提供的军事援助和一般援助，共计也只有三千万美元。相反，美国后来向朗诺政府提供了七亿五千万美元（而我国建设资金也只有这个数的一半至三分之一）。由于采取了很适当的办法，我在当国王期间（一九四一至一九五五年）仍然使我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一九四二年，我们有一所公立中学，一所普通中学和一百余所小学校。一九五五年，我们已拥有十二处中等教育设施、五所技工和职业学校，一所医学院和一所法学院。另外还有二千七百三十一所小学校。在我刚登基时，我们只有几所医院和三十多所医务所。到我在位末期，柬埔寨已有十六所医院和一百零三所医务所、门诊部及接生站。一九四一年，既没有水利设施，也没有工业基础。到一九五五年，已有二万九千公顷水浇地，十个大水库和六百五十个半机械半手工的小型企业。在本书后面，我将向读者介绍我的党——人民社会同盟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国家建设方面所取得成就的统计数。

一九五五年是我作为柬埔寨国王时负责国家建设的最后一年。一九六八年是我作为执政党主席对负责政府工作的最后一年。一九六九年，我把全部权利交给了朗诺、施里马达一伙，而这一伙人一刻也没有忘记把人民社会同盟的“佛教社会主义”变成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并在美国预先的帮助下，准备了反对越盟的战争。

从一九五五年（人民社会同盟在竞选中第一次获胜的一年）到一九六八年，在我国底子比较薄的情况下，但还是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我可以这样说，很少有新独立的又缺乏矿产资源的第三世界国家，能取得这样可喜的成就。

37

对世界的访问

柬埔寨获得独立之前，法国是唯一向我握手的国家。但在柬埔寨取得完全独立之后，许多国家都纷纷邀请我去进行正式访问。请允许我在这里向读者回顾一下我在五十年代所进行的非常有趣的访问。

一九五四年，我访问了缅甸和泰国。仰光和曼谷的大学的都授给我“荣誉博士”称号，以表示对我的独立十字军的敬意。但曼谷的记者仍然断言说，我到泰国只是为了收罗一个漂亮的清迈（一个以出美女而闻名于世的都市）姑娘。因此，我取消了对清迈的访问。相反，我愉快地接受了普密蓬国王的邀请，参加了他在王宫里举行的爵士音乐会。在那里，我吹奏中音萨克斯管，国王吹奏单簧管和次中音萨克斯管。我为国王歌唱，但这也是为了被我视作世界上最和蔼可亲的和最令人着迷的女君主诗丽吉王后。他们留我直到第二天清晨五点钟。銮披汶·颂堪首相每次对我都很殷勤。但是，在他为我举行的一次文艺晚会上，他向我推荐了一个所谓的高棉

舞蹈，而演员们却表演出拳击的动作。他居然把拳击比赛当成芭蕾舞，下面的节目就更有意思了。这当然应该是“泰国芭蕾舞”了。

在缅甸，我同当时的总理吴努建立了牢固的友好关系。后来，他被奈温将军罢黜了。他在结束了囚禁生活之后，曾来过金边，但纯粹是为了同我再见面，向我表达真诚的友谊。他对佛教虔诚的信仰，令我十分赞赏。当他被监禁在仰光时，有人问他希望得到什么，他回答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蜡烛和棒香用来敬佛。”后来，轮到我被监禁在我过去的王宫时，我也仿效吴努。我只要求看守们给我一个照顾，那就是给一些蜡烛和棒香供我每天敬佛。在金边我是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反对的，但在仰光和曼谷以及后来在马尼拉我却意外地讨人喜欢，受到了那里各大学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这真是“本乡人中无先知”^①。

一九五五年，我访问了菲律宾和日本。

在马尼拉，我享受到了摩托车队开道穿过城市的权利，热情洋溢的市民从千百万个窗口向我抛下成吨的彩纸屑，这真象美国惯用的欢迎知名人士的情景，其中，“征服大西洋的人”查尔斯·林德伯格就曾受到这样的欢迎。

国会两院为我举行会议，并邀请我在会上发表正式讲话。菲律宾参议院主席在用英语发表的欢迎词中，对我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表示敬佩，特别是祝贺我通过和平方式取得了独立。可惜的是，我的致答词引起了纷纷的议论。这个国

^① 喻有才能的人在本乡本土不易受尊重。

家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团，非常亲美和反共，我主张独立的讲话对他们是一个当面的挑战。

夜幕来临时，国家元首麦格赛赛总统从他的档案中找出一份文件给我看，使我回想到过去曾有一些（西班牙血统的）菲律宾人应征加入我祖先的军队，以便帮助高棉王国击退外国侵略者。总统对我说：“我们没有提到中立的问题，但我们一直站在柬埔寨一边。”我回答说：“请总统先生放心，如果有一天菲律宾受到侵略，我国将派出分遣部队参加你们的卫国斗争。对我来说，中立既不意味着利己主义和忘恩负义，也不意味着放弃对正义和非正义的辨别。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我周围的一些人企图劝我放弃我的中立，至少也要把它修改一下。他们向我建议，要我到菲律宾军事学院或者在其它权威人士、学者或法官们的集会上宣布，柬埔寨要同东南亚条约组织团结一致。这个组织在未得到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竟要擅自把它的“保护伞”伸展到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然而，正如人们所知道那样，我顽强地为中立和不结盟（这是按照尼赫鲁在新德里和万隆所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提出来的原则）进行了辩护。

菲律宾新闻界摆出了咄咄逼人的架势。在马尼拉新闻俱乐部里，我应邀到那里接受采访，一位记者要求我对下面的问题只作“是”或“不是”的回答。他问道：“亲王殿下，请你谈谈中立的真正含意。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相信有什么真正的中立。请如实作出回答，你实际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自由世界还是共产主义？”那些认为我无法脱身的同事们惊讶地交头接耳。我镇定地回答说：“我早已作出了选择，我既不选择自

由世界，也不选择共产主义，我所选择的始终是柬埔寨”，记者们服了，长时间地为我鼓掌。

后来，马尼拉政界对我进行了谴责，说我曾对记者谈到菲律宾人强迫我放弃中立，这是恶意中伤他们。麦格赛赛因飞机失事遇难之后，他的继承人马卡帕加尔总统个人是想重新建立菲柬真正友谊的。但这是枉然的，因为大部分菲律宾新闻界和国会议员们仍然继续骂我是骗子，是菲律宾的敌人。

一九五五年，我访问了日本。作为我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我在东京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两国友好条约。我代表我国宣布放弃要求日本赔偿它在柬埔寨所造成的战争损失。日本国会为我这一决定热烈欢呼。裕仁天皇陛下在他和皇后为我于宫中举行的正式宴会上，对我这一放弃要求赔偿的声明表示感谢，他说：“多么友好，多么慷慨啊！”他们的政府表示将帮助柬埔寨建立一个现代化牧业中心（包括养牛场、养猪场和家禽饲养场）、一个农艺学中心和一所模范医院。

一九五六年，我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受到的欢迎比在马尼拉时还要隆重得多。我的中立政策在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里真正产生了效用。周恩来在他的讲话中着重指出：“在万隆亚非会议上，西哈努克亲王亲自率领的柬埔寨王国代表团明确表示，柬埔寨始终坚持中立，决不被用来做为侵略基地。在我们相互接触中，亲王殿下维护柬埔寨独立和维护印度支那和平的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柬埔寨的和平中

立政策赢得了世界上广大人民群众和大多数国家的敬佩。柬埔寨王国在亚洲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要当一个好的外交家是很艰苦的。至于中国毛泽东主席方面，他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并同我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单独交谈，详细地询问我国的情况，同我讨论了重大的国际问题。他对我说：“我是人民的儿子，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为有你这样的亲王做朋友而感到荣幸。”

这一次中国之行为我国奠定了真正的工业基础，因为我的朋友周恩来以他的政府的名义为我援建了三座大型工厂：即磅湛纺织厂、金边附近的岱埃胶合板厂和桔井省的川龙造纸厂。周和我都努力使柬埔寨实现在就地取材、加工和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即收购棉花、木材和竹子，提供棉布、普通胶合板、文化用纸等）的基础上的工业化。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又援建了三座工厂：即贡布省的乍格雷丁水泥厂、金边附近的斯栋棉吉玻璃器皿厂和在马德望的第二个纺织厂（采用马德望省安德浩普的棉花）。

一九七〇年朗诺发动政变之后，我的前任工业大臣波隆托先生在东京国际博览会柬埔寨馆开幕式上竟宣称，唯有西哈努克亲王是柬埔寨国民经济的破坏者。

一九五六年底，应铁托元帅的邀请，我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我到达铁托元帅在亚得里亚海岸边布里俄尼岛上的别墅时，正是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离开那里的那一天。铁托安排我住在我的印度“格鲁”住过的那所华丽住宅里。

在尼赫鲁和纳赛尔之后几天，我同铁托就不结盟问题签署了一项声明。该声明说：早在万隆会议上，柬埔寨在宣布它的中立政策的时候，就已经走进了不结盟俱乐部的大门。历史学家们不承认我（因我所领导的是一个大国）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他们只提到尼赫鲁、纳赛尔、铁托、苏加诺和加纳的恩克鲁玛，而没有把我排上去。后来，圭亚那（原英国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在一个公园石碑上把我的名字刻在以上五个“伟人”的名字后面。铁托亲自为我恢复了事实真相。然而，在一九七九年古巴会议的时候，不结盟运动偏离了轨道。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早已追随着那个所谓反美国家的“天然盟友”——苏联，在会议上却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不结盟应该是名符其实的。那时，对不结盟有着崇高和神圣感情的缅甸离开了那个背离根本的组织。这无疑只是一个开端。

作为中立国家的代表，在访问铁托之后，我又先后访问了西班牙、奥地利、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西方国家对我的邀请是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三个东欧国家也是如此。

佛朗哥和他的夫人是非常相称的一对，他们在普拉多宫里接待了我。“考地略^①”举止非常稳重，说话低声低语的。我们互相授受了各自国家的最高级勋章，然后共同进餐。彬彬有礼的佛朗哥夫人卡门让我坐在她的右边，并用她的语言为

^① “考地略”是西班牙语“军事领袖”的意思，这里是佛朗哥的称号。

我发表了即席祝酒讲话。她对我父亲成为我的王位继承人这种高棉君主选任法特别感兴趣，也许她还联想到了唐·璜·卡洛斯和他的父亲巴塞罗那公爵唐·璜。

下午，我出席了优秀斗牛士参加的斗牛比赛大会。整个体育场热闹非凡。我的心被在场群众热烈的情绪以及斗牛士和公牛之间激烈的角斗紧紧地吸引住了。那些优胜者都过来以非常优美的动作向我表示敬意，并把他们的宽边软帽朝我抛过来，而我接到之后必须给他们抛回去。他们高贵的对手们都是膘肥体壮、性情凶猛的家伙，我观看了一个已受了重伤的斗牛士勉强地站着同牛决斗的场面。冷酷无情的观众不让他退出场地，幸亏他刺死了他的敌手。鲜血从被杀死的牲畜的脖子里迸涌出来，决斗到此结束，牛的尸体也被两匹马拖出了场地。这种场面对一个佛教徒来说是少见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想再看这种表演了。第二天，我在普拉多博物馆呆了很长时间，愉快地观赏那些令人赞叹不已的展品。

在奥地利，政治会谈不多。我参观了一些博物馆和历史古迹。还乘坐游艇愉快地游览了多瑙河。多瑙河水因其蓝色之美而被写入奥地利圆舞曲而扬名世界。一群人在我下榻的著名的萨舍尔饭店的阳台上向我欢呼。维也纳糕点名不虚传……。

相反，在共产党国家里，我必须用所有的时间来谈政治和参观访问。在欣赏三个首都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和文物古迹之前，我必须先参观那里不计其数的工厂。然后，我访问了

列宁格勒、克拉科夫和布尔诺。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在波兰的古王都克拉科夫市，我受到密集的人群的鼓掌欢迎。一位身穿黑色上衣和条纹长裤的杰出的外交部官员把波兰群众所喊的话如实地翻译给我听，说他们在高呼：“国王万岁！”。人们很难理解，他们的口号是为我喊的，还是为了给这个城市遗留着浓厚保皇主义的旧君主而喊的。

苏联为我在金边兴建了一所巨大的医院，我命名它为“柬苏友谊医院”。亲中国的红色高棉把它改名为“四一七医院”，因为这是他们在一九七五年战胜朗诺的日子。亲越南的红色高棉又把它改称为“一七医院”，用来纪念河内军队于一九七九年占领金边的日子。这些叫法的改变都是滑稽可笑的。……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向我提供了一所外科医院，我把它兴建在磅湛市。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安东宁·诺沃提尼一九六〇年向我提供贷款兴建了金边市郊的达克茂轮胎厂、磅士卑省的磅特兰炼糖厂和西哈努克市的拖拉机厂。西哈努克市是在法国的帮助下，由我建设起来的海港城市。红色高棉沿用了朗诺集团的叫法，把西哈努克市叫做磅逊市。韩桑林他们是不是还会把它叫做“黎笋市”或“范文同港”呢？

再说另一个大洲吧！一九五八年，我作为柬埔寨的首相，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邀请，访问了美利坚合众国。我受到的礼遇是，十九响礼炮的欢迎；一个在白宫举行的由总统发表颂词的午宴；一个由总统卫队管弦乐队演奏室内音乐的盛大音乐会。总统对我说，因为我和他的儿子同样都出生于一九二二年，所以他对我更有好感。他的坦率是讨人喜

欢的，他那大方的微笑使人抑制不住回报以微笑，我经常自问，如果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我面对的是“爸爸”艾森豪威尔，而不是一脸苦相的理查德·尼克松，我能以同样的力量来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吗？

在芝加哥，我结识了一些态度非常特别和相当难以对付的美国人。有一次，在市长举行的午宴上，一位记者一定要坐在我的夫人莫尼克旁边。他对她的美貌作出了笨拙的恭维。接着，在离开饭桌回到记者席之前，他当着莫尼克的面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有点庸俗但又非常美国式的问题：“您有两位夫人，这是真的吗？那一位留在金边，而面前这位迷人的年轻妇女只是您的第二夫人，这也是真的吗？”对此，市长、我的夫人和官员们都很惊讶。我反驳这位记者说：“你应该向我提出一些政治性的问题或有关我国建设的问题，而不应干预我的私生活。”他却又说：“一点也不，只是您的私生活很有意思。请您告诉我，您是否是重婚？请说‘是’或者‘不是’即可。”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满意地走了，大家对他很满意。第二天，芝加哥的报纸几乎都用大字标题在第一版发表了“西哈努克承认，他是重婚者”的文章。各家报纸都按照各自的方式报导了我的私生活，这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

更有甚者，在纽约同时又演出了一场闹剧：美国中央情报局吸收斯拉波到他们队伍里去。斯拉波是我们党执政期间的国民议会议员，他是达春的弟弟。达春原是叛国组织伊萨拉克分子，于一九四九年在暹粒——吴哥地区向我归顺。我任命他为王国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一直晋升到我军的上校军衔。后来，他于一九五九年阴谋把古代王国遗留下来的暹

粒——磅同“自治区”分割出去，但他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在军事法庭上，斯拉波供认出这个阴谋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的。斯拉波在一九五八年参加高棉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由于莫尼克的原故（她没有过错），我又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

继芝加哥之后，我们又访问了旧金山。在这个面向太平洋和亚洲的非常漂亮的城市，我们度过前所未遇的日子。在那里，我用英语就柬埔寨当前的情况发表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到好莱坞作了短时间的访问，同优秀艺术家鲍勃·霍普交了朋友。

意外的事情就发生在载我们飞往纽约和华盛顿的飞机上。机长离开了他的驾驶室向我走来，直接了当地对我说：“您的夫人很美，我想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同她谈一会儿话。请您离开这儿远一点，那边有一个空座儿。”机长驱赶我，但他面带笑容，丝毫没有一点恶意。怎样对待把我激怒了的飞机上的老爷呢？结果，我还是服从了。大约十分钟之后，他向我走过来并对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次飞行。您的夫人实在太迷人了。我现在要回去工作了，您也可以坐到莫尼克旁边去了。”在同一架飞机里，还有风度优雅的斯图尔特·格兰杰，他是影片《曾达囚徒》中的主角。由于报纸之故，他认为“西哈努克是重婚者”，并对我和我的夫人点头献殷勤。在这次旅行结束之后，我的夫人就此事谈了她的看法：“那位机长非常有趣，但有些厚颜无耻。那位电影演员也很有趣，但有些胆怯，并不叫人讨厌。”我意识到，她没有直接地说出

那个飞行员向她求爱。

一回到纽约，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为我举行了宴会。坐在我右面的是我年轻在西贡时所喜欢的演员艾琳·邓恩，她曾在《她和他》影片中同查尔斯·博耶合作。她显得极为可爱，并为我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时对她的柏拉图式的恋爱所感动，当时我曾梦想着这位《后街》的女主角。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谈那些所谓重大的事情吧。在华盛顿，除了那位令人喜欢的艾森豪威尔之外，我必须和那位极端反共、反对中立、坚决同毛泽东的中国作对的国务卿（即外交部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进行严肃的、艰难而又令人讨厌的周旋。我劝他改善美国同北京的关系。我对他说，不管蒋介石怎样夸出海口，但我确信，他既光复不了“大陆”，也消灭不了毛的制度。我还补充了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必须尽早同周恩来领导下的、已深得人心的、文明的毛的制度实现关系正常化。在我看来，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幼稚的、不成熟的政治家，他一听到有人提到中国就沉不住气。

关于我同福斯特·杜勒斯会见的情况在我的党报《民族主义者》周刊上，以艺术形式向我的读者们作了介绍：

“杜勒斯说一口很流利的法语，这就使我们之间的联系方便得多了。我们之间的交谈无需通过蹩脚的翻译，这样会更好些，因为我们那时集中谈论金门、马祖岛以及福摩萨和大陆之间的问题。在我会见杜勒斯的前夕，苏联驻华盛顿大使（是他！）亲自给我送来了我的朋友周恩来的一封长信。信

中对这个问题和他们国家的措施向我作了详细的说明。考虑到中国政府对我的特殊敬意，我想也许我对我的两个阵营的朋友能起某些作用，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已开始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于是我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向美国政府进行调停，以便为缓和美国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做出贡献。此外，我明确指出我可能的使命将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丝毫不用担心会牵涉我的国家和我本人。当时在场的有我国大使农金尼。福斯特·杜勒斯对我的建议表示感谢，但有礼貌地拒绝了我的建议。他认为向我进行有关中国国内形势、“不得人心”的毛泽东政权和这个政权迫在眉睫的垮台等有说服力的介绍是必要的。我是不会忘记他向我声明的一点：“对于蒋介石，我们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他再也没有任何前途了。尽管我们给他提供大量的援助，他也没有机会夺取中国大陆了。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在未来的某一天改变作法，我们将等待这一天，以便同中国人谈问题。因为，根据我得到的可靠的情报，中国人民在一种路线压迫下所承受的痛苦很快将达到顶点了。到了那一天，我们之间的争吵就会结束了。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人民的解放将不是从福摩萨开始，她将从中国内部搞起，将由对毛泽东已经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自己来进行。”国务卿的合作者们以尊重和确信的心情对国务卿的这番话表示同意。我对此只是有礼貌地微微一笑。

我在美洲取得重大成功。这应归功于一个七世纪制做的豪华的佛像，我以柬埔寨人民的名义把它送给美国人民。它被陈列在华盛顿博物馆显眼的地方，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此热烈感谢我。

一九五九年，我应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邀请，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我都受到了当地群众和青年的热烈欢迎。

在开罗大学，我又一次地被授予“荣誉博士”的称号。几百名青年围住我，对我说：“您是我们领袖的一位伟大朋友，我们象崇敬我们领袖那样热爱您。”事实上，特别是自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以来，纳赛尔成了埃及人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他具有过去古埃及国王的那种威严的气派。我的妻子觉得他比斯图尔特·格兰杰更能引起轰动……。

在阿斯旺，在他正“酝酿”着要建造一个巨大的水坝的地方，纳赛尔按照阿拉伯的习惯和我手拉着手散步。他亲切地和我交谈，一点也没有显出是一个“独裁者”。一九七〇年三月，他支持我反对朗诺，并谴责朗诺的军事政变。他没忘记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国际会议上，我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一边反对以色列，虽然我国政府同以色列还保持着友好关系。

有一天，以色列驻金边大使对我说：“殿下，您说您是中立的。但对于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纠纷，您总是支持埃及反对以色列。您一点也不中立！”我向他伸出一只友好的手，微笑地回答他说：“阁下，以色列是我的朋友，但纳赛尔是我的兄弟，我只能支持他，别无他法。”

纳赛尔夫人很谦虚，甚至很腼腆，她是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我的妻子同她相处就像同任性和漂亮的约万卡·铁托相处一样，感到很自在。一天晚上，纳赛尔总统大概太忙了，让纳赛尔夫人代替他陪伴我和莫尼克出席为我们举行的文艺

晚会。一位美丽的开罗女舞蹈家以精湛的舞艺表演“肚皮舞”，当表演者走近我们以便使我们能更好地欣赏她的多少有点淫荡的艺术时，纳赛尔夫人不知所措了。国家元首的夫人垂下眼皮，对我低声说：“我不喜欢这个舞！”我坦率地回答她说：“夫人，我认为这个舞非常出色。”

我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叙利亚，这里归纳赛尔最亲密的战友阿密尔元帅所统治。过了一些时候，他到金边对我进行了回访。他在一九六七年反对以色列失败后的自杀，就象我的“兄弟”纳赛尔一九七〇年九月的逝世一样使我很难过。

倾听民众意见

柬埔寨的国王们，甚至是在他们最强盛时期，都非常重视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并且注意尽可能同人民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始终知道，政权实际上不是由君主行使，而是由那些以君主的名义执政的人行使的。然而，这些人有时在君主的保护伞下，为他们的野心和私利，却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一个国王或国家元首，如果人民不能直接求助于他，或者人民认为他们的利益已被执政当局或国家的几个大人物以某种方式所伤害的话，他就不能得到人民真正的信任。

“民众法庭”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高棉君主国的历史时期，我们吴哥时代的国王就已经这么做了。后来的各代君主也继续这样做。我的父亲成为国王后和我一样，我们也都不折不扣地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同样沿袭“民众法庭”的做法，既可以纠正许多不公平的事，还可以揭露许多不称职的国家公务人员。

每个星期，我们都向所有要谈对某项政府决定的意见，或要对某些敲诈勒索行为提出控诉的人，敞开我们的大门。

最经常的情况是，在阅读了那些或以个人名义或以集体名义直接写给国王（大都是通过我的私人秘书转给我）的书面诉状之后，我才决定召见那些绝大部分是阶级出身最卑微的申诉人。

那些自称是不公平事或徇私舞弊的受害者与他们所指控给他们带来灾难的人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已形成了一条规律。申诉人或由家属陪伴着，或者由一个机智的能言善辩的代言人陪伴同来。而那些被迫出庭的“被告”，不时地自我辩解，当想到自己是当权者，或觉得有不安全感时，他们就接受一项妥协的解决方法，甚至表示歉意。

在国王面前，政府官员或阔绰的地主，有时还包括法官（如果他们对某个案子判决不公平或……受牵连），都不敢再趾高气扬了，因为他们知道由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是逃脱不了君主的指责，甚至怒斥的。所有参加过“民众法庭”的外国朋友们，都看到我们的农民们和城市贫民们都很直率，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国王对他们比权贵们更亲近，国王是决不会容忍这些权贵们侮辱他们的。

当然，这种审理方法不能代替国家司法机关，但是它可使国家司法机关更通人情，有时甚至还可以纠正司法机关的错误。在柬埔寨也和其他地方一样，法官在富人和大人物面前从来都是相当顺从的，而对小人物却往往非常蛮横。所以，有些群众以气愤和幽默的口吻称我们的司法部是“无法部”……在这种“民众法庭”上，我的父亲和我常常按照惯例同申诉人交换“礼物”（这些出身卑微的群众通常送来他们地里和果园里的产品），我们则把大笔的款项分送给那些急需用钱

的人，或送给病人和伤残者。

我补充一点，在期待着建立当时（就是现在也同样）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中都没有的社会保险的可能性的同时，我创立和领导了全国互助慈善会，用以救济穷人，特别是那些工伤者和病残者。这个慈善机构的经济来源，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个人的收入，而绝大部分（因为需要量是相当大的）则是由那些财主或比较富裕的人自愿捐赠（或多或少均可）的。说穿了，这些财富一般都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的，从这种情况出发，我便毫不犹豫地、坚决地劝说那些财富占有者应对他们的贫苦同胞们表现得慷慨大方。由于我是胡萝卜加大棒，使这些富有者做得不错。为此，我还同意让那些最慷慨的捐赠者和那些出钱建学校、卫生所、医疗站的人在建筑物的匾额上刻上他们的姓名，甚至同意在那些由于他们慷慨解囊而得以修建的街道的路牌子上写上他们的名字。根据“钱应取之于有钱处”的著名格言，我便采取了对资本收缴特别捐税的办法。此种做法还真灵验，因为它是建立在自尊的基础上的，这就会使缴纳者引为自豪，至少也会为此而高兴。

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个“亲近人民”的措施，即国民大会。更确切地说，就是一种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我的党人民社会同盟的代表大会）。一九四七年的宪法在一九五五年经过修改后，把这个大会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大会原则上每年在瑞广场上举行两次，由国家元首主持。如果不把这种大会当作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的措施，又怎么评价这个大会呢？在这里，人们当着部长们和各法定社团人员的面，也当着来自首都和

各省数以千计的代表们的面，在时而温和，时而激烈的气氛中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和社团的问题——也就是说，同各省城乡的农民、工人、种植者、工业者和手工业者协商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原则上（只能是基本上而已）是不允许讨论私人问题的，但事实上，那些和国家计划关系相当密切的个人问题也不止一次地被提交大会审议。只要大会决定审议的话，大会主席（西哈努克对于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加以反对的。

在这里，我想列举常常谈到的几个问题，如：生活费用过于昂贵（指的是日用消费品涨价）的问题；进口产品冲击本地产品（如香烟、布匹、白酒）的问题；新建工厂造成河流污染问题（我国人民是“生态学家”）；某个部长、省长或某个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贪污受贿问题，不同意某项新法律或新法令问题等等。在这些情况下，首相或他的阁员、议员或省长都应该对群众的意见作出回答（尽管他们不愿意这么做）。

讨论不止一次地转到政治上来。我在那个时候的作用不是仲裁，而是指明一条适当的途径。我表示同意，有时也表示不同意。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我发现我的敌对者把一些专门给我制造麻烦的人安插在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团里。其实我也可以组织我的人，甚至可以安排得比我的敌对者还要好，但我没有堕落到去干这种违反我们人民民主的事……我必须指出，与某些发表诽谤中伤的发言者相反，那些支持对我们有利的提案而在大会上发言的人，从来都没有受到我或我的党——人民社会同盟的操纵。而对立面那些人却厚颜无耻地这么干了，但对他们的指责我们从来也没有提

出……。

在任何情况下，我对这种直接与人民群众协商的制度（与希腊的广场公民政治集会和罗马的卡皮托利山的公民代表大会非常相似）都引为自豪，因为它是监督国民议会、政府机关及至我本人的最珍贵的办法。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即：一项政府所通过的决定，在遭到国民大会反对之后，还能继续执行。对于我本人，当知道大会被民主的敌对者所操纵时，我就得认真考虑大会所作出的决定。我可以自豪地说，在我当国王或国家元首的时间里，人民完全有发言权，也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十年来，人民已经不能这样做了……。

39

自由世界在柬埔寨破产

在六十年代里，柬埔寨同人们称之为自由世界之间的关系，经受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的特征是，我国同公开亲美国的西贡和曼谷政府之间，以及我国同在政治上、军事上卷入印度支那并把柬埔寨的中立视为非常“不道德”的美国之间，此时存在着难以忍受的紧张关系。当我写这几段话时，至今还对其干涉印度支那一事存有很坏印象的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和中立的柬埔寨来说很难对其谅解。我相信历史是不会逆转的。

从根本上说，我同自由世界（法国除外）之间的麻烦，是由于柬埔寨同它的两个邻国——越南和泰国之间关于现有边界问题发生争执而引起的。这些边界线是法国殖民者划定的，它给交趾支那以很大的优惠，特别是把一八五九年法国人到西贡时还属于高棉的河仙省、朱笃省，富国岛等地方割让给交趾支那所有。

让出了这么广阔的土地，还远远不能满足的吴庭艳政府，他们还对柬埔寨的威岛等一些沿海岛屿和在柬埔寨边境内的

一些边远村庄提出领土要求。为了“支持”他们政府的这些要求，吴庭艳的军队趁黑夜潜入柬埔寨一侧离边界线二到四公里的地方……。我对此大声地呼叫“抓贼”，国际舆论也轰动起来了，吴庭艳才撤出其部队。

泰国方面也利用武力占领了我们边境上的高原地区和位于暹粒省东北面扁担山脉上的吴哥时期建筑珍宝的神圣的柏威夏寺。这种对我们文明圣地的鲸吞，是所有高棉同胞们所无法容忍的。我想办法争取曼谷政府从他们占领我们国家的领土上撤走，但我的努力失败了。面对着泰国当局的顽固态度，我决心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控告。这个法庭只有在当事国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才受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泰国人由于过分自信，认为自己将赢得这个法庭绝大多数的支持票，便接受了我的挑战，他们事后对此很后悔。

一九六二年，在前美国国务卿、著名律师迪安·阿赫逊和出色的法国法学家邦多和雷特两位教授以及我国政府代表、王国大臣、法学博士张岗的帮助下，我打赢了官司。由于我以首相的身份去西贡，后又到曼谷，以便通过谈判使我国现有的边界得到承认。但是，我遭到了吴庭艳和吉滴卡宗的完全拒绝。

从一九五五年起，我还必须同由曼谷和西贡政府以及一些美国“情报”机构支持的山玉成叛乱武装作斗争。这些自由高棉武装竭力在边境省份里制造不安宁，使我的政权失去“稳定”。山玉成甚至还掌握着两座广播电台，一座设在南越国境线上，另一座设在泰国边境上，他们天天通过这两座电台谩骂和攻击我。

自从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同越南北方、苏联集团及古巴改善了关系之后，被许多西方报纸引用的南越报纸发表了对我越来越恶毒的讽刺文章。河内很精明，正式宣布支持我的中立和同东、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并承认包括沿海岛屿在内的柬埔寨现有边界。一九七九年，还是这个越南，在他的金边傀儡的殷勤赞同下，恬不知耻地吞并了威岛和其他高棉岛屿……

很明显，这些军事上和语言上的侵犯，使我逐步远离自由世界，激起我对自由世界的怨恨。为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我当时的感情，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再介绍一下，我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我们党机关报《民族主义者》周刊上发表的文章《自由世界的破产》。在这篇文章里，撇开我的怨恨不谈，可以使大家清楚地看到，我对反对美国和其卫星国所执行政策所作的详细说明是有着可靠论据的。这些论据也证实了后来美国在我们这个地区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遭到的严重挫折。

自由世界的破产

我们的美国朋友都疯狂地反对共产主义。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们经常象在南越这样的地方一样，投入或陷进了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我既不是亲共分子，也不是“左派分子”，而且也不完全赞同我们的“进步分子”的意见。这些“进步分子”认为，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从来就没有高尚的动

机，而仅仅是出于唯利是图的、帝国主义的和新殖民主义的战略需要考虑。我对阿伯拉罕·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国家的的评价是公正的，我不否认它向一些国家的人民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同他们结盟和甚至提供保护的慷慨的感情。

由于一些事情和事件，美国给某些国家的支持，以及这个西方民主大国对某些国家人民的国家事务的影响，不能积极地表明它是维护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平和幸福。因此，这就给共产主义世界的宣传找到了精神食粮，通过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得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一定信任。

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只知道一些对美国不利的事实：

总之，一个发达的超级大国给那些不发达国家的最重要和最慷慨（然而不很适用）的美援，不是以受援国人民的贫穷程度或它应得的多寡为标准来提供的。

它增加援助与否，是根据这些国家的驯服或遵从的程度，或者是根据这些国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而定的，同时，还担心由于盟友变成敌人或由于它们改变政治路线，最终影响其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援的相当一部分不是分给“受援国”大多数人民的，而是落到了有限的特殊人物、特别是通过政变产生的压迫人民的独裁政府的手里。

——几乎所有的美国“盟友”，都是极权制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在国际年鉴上，经常提到的许多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和亚洲国家，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许多“君主制”国家里，美国在得到一些领导人违背本国人民的意愿，表面上或多或少的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便在那里建立起了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军事基地，甚至是核基地，并以一种更积极、更直接的方式和几乎是公开的方式，干涉这些国家的生活。

那些西方民主国家，在苏联的帮助下击败了法西斯列强之后，却聚集在美国领导下的所谓“自由”世界的旗帜下。它们建议刚刚摆脱纳粹和法西斯的压迫和威胁、获得解放的人民加入它们的行列，反对极权的共产主义，以便保卫他们自己的民主和自由制度，捍卫被否定了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幸的是，当他们刚迈出第一步时，这个“自由”世界就已经遇到了无数的矛盾。

首先，在民主的“模范”西方大国中，人们看到葡萄牙有着一个独裁的极权政府，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最顽固的殖民主义国家。可见，他们声称要保卫自由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货色了。

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所向往的“自由”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祖国的自由，也就是独立；另一个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也就是民主。然而，“自由世界”的优秀成员们对这两方面的自由似乎不甚理解，也不给予重视。

迄今，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并不懂得，对殖民地或原殖民地的人民来说，独立高于一切。一切指的就是民主、财富、福利以及社会秩序和安宁。

比如，人们会感到奇怪，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民宁愿在贫困中，在本民族独裁者的统治下生活，也不愿接受给他们带来不可忽视的物质好处的国家卫星国化和自由化（亚洲和拉丁美洲都有证明了这一点的例子）。

西方人不懂得独立这个词的魅力。他们不理解或错误地理解了阿尔及利亚人民所作出的选择，他们为了争取梦寐以求的祖国独立，宁可舍弃安宁和繁荣，忍受如此众多的痛苦的毁坏。西方人以维护秩序和良好的管理的重要性为借口，以达到他们控制安哥拉的目的，他们不懂得在那些没有彻底“非殖民化”的非洲或亚洲的老殖民地国家里存在着不安宁因素。如果这些国家的军队、警察、法院和主要行政机构，仍然还处在拥有军事基地和具有特殊地位的外国人的操纵之下，那么仅仅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参加选举，玩弄什么“民主制”、“议会制”、“联邦制”等等的游戏，是远远不够的。以上这种情况，也许不再是隶属关系，但肯定不是独立。否则，就不需要长期寻找理由来推动某些国家的人民，比如文莱人民自己起来反对由殖民主义制度所保证的和平及繁荣了。

如果西方大国，首先是美国不能理解那些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民的强烈愿望的话，那么就会被与这些人民邻近的非常了解这种情况的共产党国家以一种很艺术的手段加以利用。

所以，这并不奇怪，共产主义世界根本就不用以“人民”民主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义，而只是以民族独立，国内的主权完整、清除“殖民主义残余”和反对外来干涉的名义，就足以可以鼓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和人民起来阻挠西

方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大国的事业。

我还要重复一下，对亚、非、拉人民来说，为祖国争得自由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而国内制度只是其次的，第二位的。

在这一方面，那种建立军事基地（美国的作法）、插手或控制当地政府、行政机构、军队和警察（英国的作法），肯定是一心一意为了寻求真正独立的人民的强烈愿望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一切为了说服他们诚实的“盟友”或“被保护者”，相信他们的援助可以保证社会秩序、财富、安全和抵制共产党威胁的努力，都是软弱无力的。

一九五三年，对于我为实现柬埔寨独立而要求美国支持的事，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是这样对我说的：“我谨以我们国家的名义向您保证，在我们共同战胜越盟，也就是战胜共产主义之后，我将迫使法国给您以完全的独立。共产主义正在威胁着我们所有的人的自由。首先，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打败共产主义。为了这一目的，你们绝对不能没有法国人。因为如果他们离开了柬埔寨，你们就会很快被共产党人吞食掉。到那时，你们的独立梦就会破灭！”

任何对一个似是而非的推论都是多余的。但应该肯定的是，已故的福斯特·杜勒斯先生的这个理论正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越南南方得到了贯彻。美国人总认为抵抗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是他们直接干涉亚、非、拉国家，以便在这些国家里建立海、陆、空基地。这就等于说，枪杆子可以决定思想。

在国家获得自由之后，我国人民渴望着自己本身也得到自由。美国在为建立“自由世界”的斗争中，遇到了可怕的障碍，而这些障碍是那些从美国得到大量美元和武器装备的美国最忠实的盟国、保护国和卫星国所设置的。这些国家都是被腐败、欺压人民的独裁政权所统治。巴蒂斯塔“雇佣军”的古巴不幸遭遇没能纠正这些美国人的毛病，只要吴庭艳和马沙立这样的极权制度，同意公开声明疯狂地反共，美国人至今仍盲目地支持他们。

我们的两个邻居所做的表演，使人们对美国“为维护各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所进行的斗争困惑不解。在泰国，当感到需要有一个议会时，这种议会是很容易就可以建立起来，而且“按照宪法”的明确规定，半数的议员，即“人民代表”（原文如此）将由军人政府所指定。其余席位，将由正式得到政府支持的议员补充。这样一来，反对党，首先是共产党，当然就遭到完全的排斥。

此外，当美国人看到一个盟国、保护国或友好国家的政府拒绝同共产党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并宣布本国共产党非法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喜悦是非常有趣的。这样，就似乎宣告了共产党的失败，而有利于“自由世界”。可是，如果我们留心看看泰国，就可了解到事实。什么在泰国东北部发现共产党支部、共产党的阴谋、共产党的活动、谋杀沙立，他那叻的共产党计划等等，都成了曼谷每天的报纸上的标题。泰国领导人自己对他们的美国朋友解释说，这种情势的责任者是帮助共产党进行颠覆活动的中立主义邻国的首脑。因而，美国人很快就忘记了这种动乱的根源很可能是来自一个没有

社会公平、没有自由的环境和一个腐败的环境，那里的美援仅仅是使领导集团和垄断者得利，而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

但和南越相比，泰国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在南越这个国家里理想地集中了可能使自由世界、西方民主和美利坚合众国永远威信扫地的，可以想像得到的乃至不可想像的一切条件。

当我写这几行时，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认为，美国继续支持吴庭艳政府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丑闻。

在一段时间里，这个政府使人对它夸耀的基督教的道德造成了某些错觉。现在，它像最无法辩解的独裁政权那样暴露了真面目。

“吴庭艳分子”以及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扶植他们起来的美国人，疯狂地强迫南越人民投入反对共产党运动，也就是说重新开始了一场法国人刚输掉的那样的战争，但这次则企图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来赢得这场战争。于是南越人民遭到了吴庭艳的“唯我主义”和一个卑鄙的寡头势力的无可忍受的残暴的打击……！

“自由世界”和美利坚合众国曾解释说，他们在南越进行的反对共产党的斗争，是为了维护个人自由和人类的尊严。而他们扶植起来的吴庭艳家族政权取缔了一切自由，包括宗教、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都从不执行的暴力镇压的惩罚制度。比如在中国，反对派先被强制关在劳改营里，但可以重新被接纳到国家生活中来。而在南越，反对派甚至只是“不受欢迎的人”都很快地或“文火”地在昆仑岛

受到拷打或被消灭。连美国报纸对此也如实地作了报道……

在“不受欢迎的人”中，不幸地包含着那些系统的灭绝种族政策的受害者——我们的下高棉人。当我们指出这是灭绝种族的代名词时，西方人假装说这是夸大其词。现在，当涉及到越南佛教徒时，西方人承认了这一点，但始终不认为对南越的高棉社会，也应该持同样的观点。

对吴庭艳政府来说，不信仰天主教几乎是一种招来上帝的候选人进行镇压的罪名。由于吴庭艳在南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证明了那个要求我国笃信宗教的人民也起来同无神论的共产党以及同反对宗教信仰和神职人员的人进行斗争的自由世界，可能比共产党更坏。

在共产党国家里，总是有条理地劝说公民们，特别是年轻人信仰另一种宗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南越，却要残酷地枪杀不跟着独裁者及其家属信仰天主教的一切人。

南越信仰的民主和自由都是再也不能欺骗任何人的神话。这就是对毫无任何基础的自由世界宣判了死刑。

过去还存在着维护国家独立的神话。但研究起来，这个独立是不存在的。曾经谴责苏联对一些共产党小国实行卫星国制度的自由世界（包括美国），他们也把自己的小盟国严格地卫星化了。

在那篇社论的开头，我曾肯定地说，我并不怀疑美国想搞殖民主义。然而，如果仅仅指的是南越，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某些事，美国被迫掌握和控制了南越国民生活的许多部门，但并没有因此就做到了把吴庭艳家族，特别是这个政府可怕的女顾问（吴庭儒的夫人）引导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来。

美国人的这种极其明显的插手，其中包括介入那些使大多数人民群众成为主要受害者的军事行动，构成了自由世界研究战胜共产主义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我再重复一遍，共产主义是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独立而斗争的形象出现的。

因此，最后只剩下经济繁荣这张牌了。然而，即使是内战不曾发生过，但由于在西贡和曼谷都是贪污受贿盛行，由于政权是和垄断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经济繁荣也是不会达到的。大多数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从大量输入的美元中得到利益。因为这些美元只是为了延长反人民的垂死的政府的命。

总之，通过我们的西方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炫耀的理想，可以悲剧性地暴露出了美国打着自由世界的招牌，在南越顽固地进行大规模的导致破产的侵犯是错误的。除非是通过具体的和有关的因素顺从地使这场斗争合法化，否则毫无任何高尚行为和宽宏大量之处的这场斗争就会变成明显的毫无意义的行动。但在这种情况下，当共产党、左派和进步分子断言美国和自由世界所进行的只是一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战争时，我们应该认为这些人是有道理的！

我们的西方朋友不可救药地陷入了他们自己的矛盾之中。我说“不可救药”，是因为他们没有采用一条严格的法则来支配世界上一切国家和一切事情，也就看不到他们如何安全地从他们的诺言中摆脱出来；没有人民的支持，是永不会取得胜利的。

南越仍然是自由世界和美国的碉堡。但是南越人民对他们已忍受够了，今天已不再支持他们，将来就更不会支持他们了。当然可以肯定，美国通过许多手段，投入更多的人员和美元，也许还能够在南越再维持几年。但它的下场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

自由世界的这种破产不仅对西方人，而且对我们这些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以及他们永久性错误的未来受害者来说，同样都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40

当选国家元首

在我放弃王位后，我的父亲诺罗敦·苏拉马里特陛下被王位最高委员会一致选举为国王，但他在位只有五年的时间。由于他拒绝接受各种多少还能维持他那个已经很虚弱的病体的治疗方法，终于被糖尿病夺去了生命。

我国人民和他的许多外国朋友都认为，他是一位好国王，一位贤明的国王。他象我的母亲哥莎玛王后一样，非常爱那些出身卑微的小百姓，并且也得到他们的爱戴。他生性宽宏大量，能原谅那些冒犯过他的人，只是在反击那些攻击我们君主制的人时，才变得严厉起来。此外，他还对曾长期是他的朋友山玉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耐性，对我有时被迫强烈反对的“民主党”领导人或山玉成分子，也显得很宽容。

必须指出的是，苏拉马里特国王曾被人们称之为“高压政策”的东西吓坏了，只好完全依赖我这个人民社会同盟的主席，一个对采取任何重大决定都是无所畏惧的人。然而，他还是很注意关心王国大事的，我定期向他谈谈国家事务，借此听取他的意见，他有时也发表一些不无益处的想法，因而使我的

母亲——一位性格刚强、消息灵通和深思熟虑的女性——对此也感到吃惊。

苏拉马里特国王是一位善良和稳重的人，态度和蔼，性格开朗，他从没有受到过批评。“小百姓”把他当作是“第二个西索瓦国王”，甚至称他为“蛋糕国王”。所有地方行政公所和许多人家里都张贴他的一条格言：“一切都很简单，为什么要把它复杂化呢？”这个格言表现了这位杰出人物的公正的哲理。

由于我的“中立”和我顺从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这是我国一直到一九七〇年都能维持和平的政策），使我几乎成为整个自由世界憎恨的对象。而我，一个对国家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我不能摆阔来使所有的人或每个人都满意。我被迫采取一些不能马上被人理解的决定，这给我招来了批评——总而言之，要管理一个国家嘛……，但是，我亲爱的父亲和我之间，终于达到互相谅解，互相热爱。苏拉马里特国王陛下即使是对我的大胆行动感到吃惊，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支持。

一直到最后，我父亲的私生活就象人们传说的那样。除了他的宠妃叶夫人外，他还不时同宫廷里的那些有点野性的小姐和太太们有着令人愉快的小小的艳事，但他却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我母亲常常因此斥责他。她对他说：“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常常以年轻人的热情为借口来为你的放荡行为辩护。你还答应过我说，在你初期荒唐以后，会变得庄重起来的。你现在已上了岁数，但还继续干你的桃色艳事，就好象

你依然还是个二十岁的人一样。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规矩起来呢？我怕你是永远也做不到了”……为了给自己辩解，亲爱的爸爸多次以感人的语言向我母亲求情，他说：“亲爱的，我老了，又患了糖尿病，也许活不了多久了。在死之前，我要尝尽生活中一切其他乐趣，然而我的心灵深处只爱着我的王后一个人。”

事实上，国王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了。一九五七年，王廷御医阿尔芒·里什博士说：“如果国王陛下不停止食用美味佳肴、乳制品和甜食，他将在三年内因糖尿病而驾崩。但如果国王答应遵守一条严格的饮食制度，他将还能活七或八年，甚至是十年。”作为一个地道的享乐主义者，我的父亲反驳他说：“如果要我放弃这些给我生活带来乐趣的一切，我再多活这几年又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要我在七到十年之间遵守一条没有盐、没有黄油、没有糖的饮食制度吗？我是决不会改变我的习惯的。”

里什博士是个预言家。三年后的一九六〇年。就象他所预料的那样，他的令人敬畏和固执的病人在昏迷一个星期后静静地晏驾了。他没有受什么痛苦，甚至没有同意为了延长几天生命而给他输液。在他昏迷之前，我问他是否想见一下叶夫人以及她同他所生的孩子。他抓着我的手，低低地说道：“我对你母亲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我只需要她和你陪伴在我的床边。”这就是他最后留下来的话。

我父亲驾崩以后，我被众参两院（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¹⁾联合选举为国家元首，以便继承我父亲的职权。我当选为国

家元首（并不是国王，因为我在一九五五年就已经宣布，我退出王位以后，永远不重新登基），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事实上，除了我之外，人民、僧侣、政府官员们都不同意让任何人登上王位。按照我本人的意愿，我也不可能重新登基。议会接受了一个宪法的修正案，规定在国王选出来之前，可以选举国家元首。

高棉共产党人，不管他们以什么名义，总是通过一些涉及到“君主恶毒的本性”问题的传单和漫画对我升任国家元首的地位提出异议。由于他们在选举中的可悲的结果，他们在议会中没有自己的代表，他们的报纸（地下的）的发行量也没有超过几百份，所以，他们的抗议声很少能战胜我们的新闻机构。

此外，出来反对的还有山玉成分子，但同样也是软弱无力的。山玉成变成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经费的自由高棉的“主席”，这是由美国人自己证实的，自由高棉是由头戴绿色贝雷帽的，在南越训练出来反对我的雇佣军。这些人中的一些小股武装偶尔越过我国边界，突然袭击王国军队，但都没有造成严重事件……。

为了使国际舆论确信，我既反对亲共分子，同时也反对亲美分子，我组织了一次无记名投票的公民普选，目的是测定柬埔寨人民对我的政权……和对这个政权的争夺者，到底对谁怀有深厚的感情。下面就是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监督（实际不是监督，而是参加）的情况下举行公民投票的结果：

一九六〇年六月五日的全国公民投票

登记数：2,199,731 名选民

有效票：2,020,741 张

空白票：93 张

无效票：31 张

赞成西哈努克的选票：2,020,349 票

赞成山玉成的选票：133 票

赞成共产党的选票：133 票

未投票者（即缺席者）为 178,190 人，大约占登记选民的 8%，这些人包括老人和不能自由行动的病人。据我所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里，这么低的缺席率是不能再降低了，当然在一些称之为“人民的”民主国家里是做得好的，但也还远不及我们这样一个没有侦探的国家。虽然确实有几千名在丛林中的共产党人和山玉成分子没有参加投票，但事实就象我所希望的那样，90%以上的人民群众是支持我的……。

41

佛教社会主义

六十年代，我曾给我领导下的《柬埔寨》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我相信这篇文章很重要，而且在本书中也还颇值得一提。因为文章介绍了至少在西方直到目前为止不太被人了解的一个方面。对于不了解佛教的人来说，佛教是一个原古的宗教；对于了解佛教的人来说，佛教是一个进步的、给人以希望和启迪的宗教。一个没有教条的，充满哲理、伦理、至善的，而又永葆青春活力的佛教，必然能引导人们去寻求自我解脱，努力达到完德，即使他们要做的事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下面便是我当选为国家元首后写的《佛教社会主义》一文。我相信，文章完全能够清楚地告诉读者们，这是指导我的党和我的政府为祖国服务的伟大思想。

“历史证明，宗教对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能起到好的或坏的启示。伊斯兰教就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单单佛教就不能对国家政策给以指导，不能对意识形态给以启示呢？有人

用这样一个说法来解释佛教，说它是一个没有活力的宗教，因为‘它鼓励人们放弃人世间的物质财富，所以，它不是朝向进步，而是引导人们通过这种对尘世利益的弃绝，走向虚伪的幻境——涅槃。’”

“这种解释，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对佛教完全无知的可怜虫。首先，涅槃既不是某些宗教所说那样的天国，也不是非佛教徒所想象那样的一种虚幻。”

“西藏人用‘救度一切众生’来描述涅槃。从字义上看，就是说，要‘度过灾难和痛苦才能达到彼岸’。这是一种被痛苦所缠绕的超越常人的状态，即要度过从痛苦中摆脱和解放出来的超人阶段。”

“在各个时期，佛陀都被知识界权威们认为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果认为佛陀具有洞察力，能救度一切众生到达涅槃的境界的话，那简直是对佛祖极大的不敬。事实上，他的教规、教义、教训不是专门为寻求涅槃的人设想的；同样，也不是为准备一辈子出家的人所设想的，而是说要脱离红尘。”

“佛陀原来是一个富裕王国的王储。他之所以离开妻子和宫廷，抛弃财产而出家为僧，是因为他依然会受到那些富有的国王们的保护，象对待富裕地区和在乐园里修行的和尚们一样，为他修建舒适的寺院，提供同在‘王室’里一样‘富于营养’的饕食。”

“因此，佛陀并不是只把苦行者作为信徒。他知道，假如他只注意造就别的佛陀，他将对人类没有任何帮助。此外，根据佛教的某些经典记载，在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之后五百

年，才又出现有另一个佛陀（弥勒佛）。这种预见并不怎样使我们感到惊奇。事实上，在佛陀和基督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显出象他们那样神圣，有他们那样刚强的毅力，象他们那样面对物质利益漠不关心。”

“同样，被称之为大慈大悲的佛陀致力于改善人类，以便减轻他们的‘羯磨’，也就是说，使人们变得温和，不那么残酷，使那些还不能自我解脱的人（为了达到涅槃）更好地生活。

“佛祖不遗余力地教导各种出身的人，要他们避免做出有害于社会、家庭、朋友或他们本人的事。为此目的，他以讲道理的方式，编成了一些简单的格言，并处处为了帮助所有的人或某一个人着想。例如，他激励国王们要关心人民的幸福胜于关心他们自己的娱乐。他告诫大商人们不要过于追求金钱，任何人都要公平，对穷人多行善。要大地主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他们和农奴们一样被虐待，他们自己是否也会感到痛苦呢？要拦路抢劫的强盗们考虑一下，他们称之为‘同其它职业一样’的行当是不是荒唐事。根据经文说，某些既是强盗又是杀人凶手受到真福者的教训，将成为最高的觉者或真正的圣人（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叫作阿罗诃）。

佛陀布道时都宣传说，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如果要积大德，就要全面行善，特别是要善良、节欲、真诚、温和、大公无私，利他主义、平等待人、善恶分明。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佛教当作我国的国教，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才借鉴于此。‘人不是生下来就成为贱民或婆罗门的。人之所以成为贱民或婆罗门是根据他的行为而决定的’。佛陀的话多么令人赞

佩！他的话正是我们民主政体的基础。”

“请允许我向读者们引用亚历山大·达维德·尼尔夫人所著的题为《佛教》这部杰作中的一些值得人思考，而且使人受到教益的句子。”

“首先让我们来破除一个神话：这就是所谓佛教是怠惰、迟钝和懒散的孽生地。对于这个问题，达维德·尼尔夫人写道：‘对于佛陀，西方作家们往往以十分蔑视的笔法来描绘他，说他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幻想家，一个风雅的虚无主义者，而我们却把他当成一个传奇式人物，而在佛教传说中却未谈及这种人物。这位觉者为了宣讲他的教义，整整花费了五十个春秋，到八十多岁的时候，在去给新听众布道时，跌倒在半路上，以身殉教。人们时常想从他那里继承下来的，根本就不是那种失去魅力的软弱者’”。

“多少次，我们没有接受外国人把我国人民的所谓的‘怠惰和懒散’的责任强加在佛教上面。今天，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对‘朝气蓬勃的西哈努克的不大高棉化和佛教化’感到惊奇。然而，简单地来讲，他们忘记了查考高棉人的历史，也忘记了好好地研究佛教史。渣耶瓦尔曼七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位既不蔑视烧香诵经也不轻视和尚还俗的国王，率领着被人们视为他的‘顺民’们大兴土木，除了建造许多著名的佛殿和亭台楼阁等宏伟的建筑物以外，还修筑了数千公里长的公路和灌溉渠道，而且还修建了几百所医院。”

“我们的人民社会同盟引用佛教的渊源和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伟大的先王们所建立的传统，来唤起我国人民，鼓励他们投入紧张的、持续的国家建设运动中去。”

“达维德·尼尔夫人还肯定道：‘事实上，如果我们从这些基本原则来看，佛教是一所学校，它培养战士们同艰苦作斗争时，应具备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不可动摇的恒心、英勇果敢的精神’。”

“‘战士们，战士们！我们这样地称呼自己。我们为高尚的道德、高度的意志和崇高的情操而奋斗。因此，我们把自己叫作战士！’”（引自佛经）

“把佛教的教义用于我们的国家政策方面，就能为我们培养出为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而战的可靠的、得力的战士。对内，他们能为反对社会上落后的不公正的状态，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在和睦和友爱气氛中过着幸福和愉快的生活而斗争；对外，他们能为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真诚合作、共同繁荣、共同幸福，为捍卫我们的自由和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独立而斗争。”

“佛教清楚地申明，它与怠惰和迟钝为敌：‘竭尽全力进行斗争吧！莫让怠惰在你们心里占领阵地’。‘一个真正的信徒应能弃绝过度紧张和怠惰，从懒散的倦怠中解脱出来。他们追求着聪明而机智的学识，以洗濯他们心中的一切怠惰和懒散。’”（引自佛经）

“外国人对我们为维护自己的信念、理想以及我们认为正义的东西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那种魄力感到惊讶。这句经文将会帮助外国人对我们的理解：‘对于我来说，宁愿为反对邪恶而死在战场上，也不愿为它所征服而活着。’因此，高棉民族宁愿为反对非正义而在战场上牺牲到最后一个人，也不

愿为它所征服而活着。”

“但是，与某些别的宗教不同，佛教从来都不允许它的信徒侵犯他人。相反，它不劝别人改变宗教信仰，而是竭力主张尊重别人的信仰。正因为如此，在把佛教定为国教之后，我国仍坚定地保护柬埔寨已有的其它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正因为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喜欢别人把我们的中立称之为‘中立主义’，因为它是我们为自己的需要，为我国国内的需要而设想的，而不是为了输出。”

“在印度阿育王的碑文中，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话：‘不要对别的教派说三道四，不要诋毁他们，相反，要尊重他们身上值得尊重的东西’。这就可以解释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了。在我们眼里，共产主义和我们的宗教一样，也是一种宗教。我们应当沿着自己的佛教道路走下去。只要共产主义不攻击我们，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上最友好地同它共处。”

“对于美国人，我们已说过，并且已多次重申，只要他们不寻衅，特别是不采取派飞机轰炸和策动政变的手段来改变我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自由世界的教义在任何方面都不妨碍我们。佛经中有这样一句话：‘乔答摩指出：一种教义，不管它来源于何处，如果它导致狂暴而不是和平，导致骄傲而不是谦虚，导致对外扩张的欲望而不是温和的主张，导致产生暴力思想而不是和平的思想，那么，这种教义不是佛陀的教义，不是他的戒律，也不是他的训海。’”（见亚·达维德·尼尔的《佛教》第二百五十二页）

“那些大国应当想想以下这些佛教语言，这与他们给予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我绝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才发善心的。我之所以发善心，是因为我怀有为人类谋幸福的愿望。’（引自佛经）‘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西哈努克注）出于一种纯洁的同情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时，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利益，更不担心他所做的好事是否为人所知’。（引自佛经）‘何为真正的赠予？真正的赠予就是不期望得到任何形式的报答。’”

（引自佛经）

“对于联合国以及所有有诚意的国家，可赠给它们以下一段美好的经文：‘宗教信徒要作为那些相互不和的人们的调停人而活着，要促使人们紧密地团结成为朋友，共同维护和平和安宁，永远互道有利于安定的语言。’”

“亚历山大·达维德·尼尔夫人在她所著的书中所收集的大量佛教格言，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人民社会同盟把佛教作为它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信徒’（也就是一切参加我们的运动的人）纯洁自己的心灵，净化自己的思想，特别是要端正自己（由思想引起）的行动，使我们的国家在融洽、和睦、公正的气氛中获得进步和幸福。佛经提醒他们，‘非公正无幸福’。阿育王在石碑上雕刻道：‘一个真正的宗教应具备的特性是：善意、仁爱、诚实、纯洁、高尚的情操和仁慈。’‘一个对别人拥有权力的人，应该对弱者持温和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劝‘弱者’去打倒强者，并转过来对昔日的强

者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而这种专政不可避免地造成一批领导弱者的新的强者。佛教教育领导者们要尊重被领导者，并在领导者身上播下‘善良和同情’的感情。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为什么要马克思主义和佛教融合到一起如此之困难。”

“《经书》写道：‘一切众生在幸事之后都如怨如诉地哀叹道，原来你的怜悯之心是向着所有人的。’马克思主义不相信有产者的利他主义，所以对他们进行专制性的剥夺。佛教则绝对禁止那种被视为抢劫般的剥夺所有权。达维德·尼尔夫人在她的书中第一百三十页指出：‘不要偷，也不要抢，而要帮助所有的人占有他自己的劳动果实。’‘不要嫉妒，莫覬覦周围的人所享有的利益。对于他们获得的幸福，我们都应该感到高兴。’”

“现在，人们已经可以懂得，对于一个‘地道的’佛教国家来说，要把私人企业收为国有，特别是在没有任何凭据来证明有产者是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使自己富裕起来的情况下，要剥夺他们的财产，这不是不可能的，但这又是多么困难的呀。当然，这也绝不是说，为了穷人的利益，佛教就不设法（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去剥夺有产者的财产。”

“让我们来读一读达维德·尼尔夫人书中第九十四和九十五页的这些动人的句子吧：‘为一切众生的利益而同各种各样的苦难进行机智的斗争（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这是我们人民社会同盟对我们所有公民提出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西哈努克注），是为完美的目的而进行完美的实践的第二个方面。’在阿育王为了他的国家建设而树立起来的柱子上，

人们看到：‘我把一切众生的利益当作我必须为之斗争的目的’。‘大乘佛教徒们特别强调对一切众生要慈悲和仁爱这一格言，他们把它作为教育人民的基础’。‘……威山塔拉是一位立志以慈悲为怀的年轻王子，他施与人们对她要求的一切东西’。‘当他父亲不在时，作为王国的摄政者，由于连续不断地施舍，他把国库的所有财产统统地拿出给人了。’‘有一天，来了一位年老的婆罗门。他对威山塔拉说，由于年纪大行动不便，需要有人来照料，希望威山塔拉能把自己的子女象奴隶那样赠送给他当作佣人。于是王子把自己的子女交给了老人。’达维德·尼尔夫人认为，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种极为‘荒唐’的行为，但她却承认，对于佛教徒来说，这样做是令人感动和钦佩的。”

“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必须消灭王子们，因为他们属于‘贵族血统’，搜刮了人民的血汗！但是，一个真正遵守佛教训诫的王子应该总是——在弄清了原委的情况下——接受剥削或被卑贱者‘搜刮’。”

“尼尔夫人没有隐瞒她对威山塔拉的传记感到不快。她写道：‘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妻子送给了别人。接着，为了使别人能如愿以偿，他剃下自己的双眼送给一位盲人，使这位盲人的眼睛从此得到了复明。’她承认：‘我曾多次想论证，这一传记中的不道德个性培养了东方人的一种令人费解的虔诚，但我的想法都是徒劳的。’”

“不管怎样，威山塔拉仍然是高棉人民最尊敬和最崇拜的传奇英雄，无疑，不论是我，还是别人，我们都不能够也不敢想和他并列。但是，由于威山塔拉的精神和榜样，使人民

社会同盟为人民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同样也使富裕的公民们对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事实上，外国人知道我们百分之八十的学校和医疗所以及很大一部分别的成就应当说都是威山塔拉的无数崇拜者的慷慨施与——我说，应当归功于佛教的慈悲。但说实在的，这些人对于他们的妻子要比对金钱更为吝啬一些。”

“我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对金钱感兴趣，那仅仅是为了把它用于有利于人民的工程建设上。但它从来都没有剥夺有产者的眼睛，也没有抢走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要剥夺富人的财产，也只是通过说服的办法去做……。多亏威山塔拉，他可以说是一个卡尔·马克思式的佛教徒。十一年来取得的建设成就，说明了虔诚王子的教理是有功效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反对利己主义的。我们对我们的同人说：‘尽管身着破烂衣裳，但思想要提高到完德的境界。世界上的人和隐修僧人，如果都克服了利己主义，那么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引自《佛经》）

“我们对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行政官员和我们的军人说：‘竭尽全力奋斗吧！莫让怠惰在你们心中占领阵地。’（引自《佛经》）‘谦恭是最珍贵之宝’。（佛陀的训条）外国人在同我们的士兵、警察和行政官员的接触中，注意到了他们身上的这种谦恭。”

“必须培养毅力，知识在毅力中占有它的地位。什么叫毅力？毅力就是从善的勇气。毅力的敌人是什么？是怠惰，

是自暴自弃和对邪恶的迷恋。”（十七世纪佛教哲学家甘蒂威达的话）

“‘使人变为不道德，并不是因为吃肉，而是因为仇恨、纵欲、奸诈、傲慢、自负以及对那些不公正行为的姑息’。（引自《佛经》）‘要避免犯错误，必须戒掉令人极度兴奋的饮料——酒，并毫不厌倦地做好事。’‘要尊重他人，要谦恭……’‘要公正、直爽，只做那些无可指责之事。’‘要有毅力，要温和……在生活的沧桑中，要思想坚定，不要有偏见……’不偷盗，不妄语，不贪婪……’，‘要避免残酷的行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无与伦比的祖师——佛陀的话。”

“人民社会同盟拥护佛教，并在国内支持佛教的发展和树立其权威。因为他要所有的公民，特别是国家的公仆必须遵循这些庄严的格言，以使这个国家日益健康和进步。”

“外国观察家，即使是我们中立政策的敌人也承认，我们为教育我国人民和青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同时他们还发现我国公民们对知识的渴求，这说明我国教育获得了飞跃的发展。这些应该归功于佛陀的教导。”

“‘让你的心里充满怜悯之情。在这个被苦难撕裂的世界上，请你当一名教育者。无论无知的黑暗笼罩在什么地方，请你在那里点燃一把火炬。’我们的人民社会同盟点燃了知识的火炬，这是因为它在每一个村庄，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都建立了学校或开办了一些学习班。”

“我们坚定地相信真福者这一格言：‘信赖外来的帮助，会带来失望。只有相信自己，才能产生力量和快乐。’由此，我

们定出了自己的口号：‘柬埔寨要自力更生’。”

“假如说有一种宗教能激励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话，这种宗教大概就是佛教了。因为‘佛陀根本就没有自称带来什么超自然的新发现，没有颁布任何教令，也没有要求人家信仰。他只是提供了检验人的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是为了使人们获得最大的利益。他公布这种方法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切苦难。’（亚·达维德·尼尔）‘请用你自己的火炬来照明自己的道路，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吧！’（《佛经》）达维德·尼尔夫人说：‘仅仅他一个人，由于他那种刚强有力的性格，这样的格言使佛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把清规戒律和法令贯彻给他的信徒们，一旦触犯了这些法令和戒律，哪怕是出于国家的需要，也要受到开除的惩罚，铁托就是其中的一个。缅甸总理吴努为缅甸创立了一个佛教社会主义。缅甸的佛教社会主义同柬埔寨的佛教社会主义不完全相同。但柬埔寨的佛教社会主义没有在两个佛教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制造“教义”上的论战。为什么呢？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佛陀不给他人强加任何东西的缘故。他只是教导我们学会思考，能辨别善与恶、真与伪，他给我们指出了最适合我们的道路和办法，领导我们走向幸福的目标。”

“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可以自称是‘实用主义’的，佛陀说：‘让真理充当你们的火炬和方法吧！你们无需再去寻求别的什么方法了。’对于我们来说，‘真理’就是国家的现实。我们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的政策，都始终靠近这些现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成功”。

42

从贝尔格莱德到联合国和“熊”窝

一九六〇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不结盟国家第一届（历史性）首脑会议。作为国家元首，我是柬埔寨的当然代表。在那里我又见到了我的许多伟大朋友：铁托、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吴努。

对许多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不结盟运动代表着正义和自由、希望的时期。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有明显的“左”的倾向的话，那么就不会也不能创立一个集团。我们确实尽力同一切帝国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以为，我们的联合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顶住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他们完全无视我们的主权和我们的愿望，而在寻机控制任何一个拒绝在他们之间进行选择的国家。

在贝尔格莱德，柬埔寨不顾自己的安全遇到危险，毅然决然地决定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这就成了国际观察家注意的焦点。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非阿拉伯国家。我仔细地说明，这是对一个要求恢复自己的独立的民族所应采取的正义行动，而不是对法国怀有什么敌意，我们将同法

国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法国外交界对我们的作法当然是不满意的（他们对我们这个做法是谨慎的），但他们的反映是克制的。经过我的劝说，戴高乐将军两年后才承认阿尔及利亚政府，并以伟大的独立英雄而在他的盟友面前成了名人。是本·赫达到我的住地来要求我给予支持，并争取更多的国家元首在我之后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政府”。我在全体会议上向阿尔及利亚的代表表示同意，引起了轰动，阿拉伯国家各代表团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其它国家代表团也随之作出了响应。至于铁托元帅，也不得不宣布照我的样子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

贝尔格莱德会议的闭幕式进行得相当艰苦。在起草最后的联合公报时，一些中立国的“首脑”表现出了非常古怪的个性。“反对帝国主义”和“亲西方”两派之间早就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到了午夜，由于厌烦空洞无用的讨论，尼泊尔国王说他要睡觉去了，因为他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出去打猎。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柬埔寨馆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因为所展出的吴哥式的雕刻、美丽的丝织品和棉织品、精致的金银制品都很吸引人。我赠送给铁托一个与其职务相称的吴哥雕刻的神女小头像，使他非常高兴。

同年，即一九六〇年的深秋，所有的不结盟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再次相会。尽管在会上还有些分歧，但他们却向“超级大国”显示了不结盟运动的力量。

我敢说，这次会议的插曲是，盛怒的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敲打他的桌子，引起西方人的一阵嘲笑。对此最生气的还是苏联人，他们觉得他们的总书记的粗野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挽回的，这种行为是不够“文明”的。他们认为“文明”应该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合乎礼仪，有教养的”。赫鲁晓夫先生是不太讲礼貌的，这方面我有新的根据。在我为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各国代表团举行的鸡尾酒会上，他邀请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并当各国报界人士的面明确表示，如果我的夫人莫尼克不陪同我一起去，他将不让我进入他的国家，因她的美貌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这次苏联之行使我难以忘怀。在那里，我同他们政府谈判，他们同意帮助我们在滨海的贡布省境内流经象山山脉的甘寨河上修建一座水坝和一座水力发电站（这将是柬埔寨第一座水电站）。那里地势很好，有着茂密的森林，湍急的河流和从天而降的瀑布，有栖身于山林中的各种野兽；当然会有许多大象；也有吃人的老虎和其它猛兽，在被勇敢的猎人捕杀之前，对护林人员威胁很大；还有鹿、麂、野猪；各种飞鸟，五颜六色，在林中自由飞翔。这个地区，到处都开放着各式各样的兰花。总而言之，这是一幅壮丽的天然景色。

来到甘寨的苏联工程技术人员都是雄心勃勃的，因为完成此项工程，既能为他们国家争得荣誉，也使整个柬埔寨南部实现电气化。可叹的是，赫鲁晓夫先生所提供的贷款，却被他们巧妙的长时间的花费昂贵的实地“考察”以及建造俄国技术人员住宅区耗费殆尽。由于经费短缺，设想中的水坝工程成了泡影。高棉政府也没有偿还苏联的债款，因为苏联人

就地花费了很多钱，但却毫无结果。后来，再也没有人再谈起甘寨水坝的事了。又过几年，南斯拉夫在距离金边约一百公里的基里隆，为我们建成了第一座水力发电站。那里的地理环境也是很美的。可惜的是，这个富有艺术性的工程，连同令人喜爱的基里隆航空病医院，都被战争破坏掉了。

再回过头来谈谈我们在莫斯科的事吧。在那里，双方会谈出现了出乎意料的生动的情节。按照赫鲁晓夫先生的正式建议，我带着莫尼克去了。我发觉全俄罗斯的伟大领袖向我的夫人献殷勤，他的副手勃列日涅夫（现在的第一把手）也模仿着他。这位副手有些怕他的“上司”，一直等到赫鲁晓夫走到他的背后给我拿糖果并同我谈一些客套话的时候，他似乎对我的夫人采取了“迷惑人的手法”，以过份的交际手段掩盖他自己的火气，又以过份的礼节换取无拘无束的迷人的微笑。赫鲁晓夫先生还是有些越轨，他要求莫尼克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讨论建设甘寨水坝问题的会谈。他安排莫尼克坐在他的对面，以便随意端详她的相貌。坐在我正面的勃列日涅夫先生，也总是斜着眼睛瞟我的夫人。是严肃的忧郁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在同我谈苏联援助问题。

当天晚上，在为杰出的苏联东道主举行的古典舞蹈晚会上，赫鲁晓夫先生又一次别出心裁。演出结束之后，他夺来表演《罗摩衍那》神话中白猴子哈努曼的面具，把它戴在他自己的脸上并使劲模仿高棉舞蹈家表演猴子的角色，他的表演受到我周围亲近的人们高度赞扬……但他们对他的举止也感到很诧异。

离开苏联，我访问了政治上紧跟苏联的蒙古。接着，又

访问了中国。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长途旅行是令人激动的。沿途，我观赏了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骄傲——无边无际的贝加尔湖（面积为三万多平方公里）和一座巨型的水力发电站。这里的气温大约是零下五十度。

最后，我们来到了乌兰巴托这个由古时的外蒙古变成现在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蒙古人民正在由游牧走向定居阶段。在我逗留期间，住在乌兰巴托的国宾馆。这个宾馆建造在沙漠中间，周围都是蒙古包，显得很壮丽、别致。有人告诉我，在首都住宅区里，有一两个饭店向苏联“专家”（不是蒙古人）供应伏特加酒和威士忌酒。自己的传统消逝了，……。

佛教僧侣们在一个巨大的蒙古包里接待我，他们向我献马奶，但我一点也享受不了。这些僧侣为我举行了一个稀奇古怪的仪式：他们象敬佛那样向我恭敬地礼拜。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小宝座上，而他们自己却在底下就座。这同柬埔寨的做法截然相反，那里的国王在僧侣面前自示谦卑，必恭必敬，不敢轻举妄动……。

蒙古的礼宾安排真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为欢迎我的国宴上，他们竟安排那些僧侣同王家芭蕾舞团的女演员同桌入席。没有多久，他（她）们就交上了朋友，在一起谈笑风生，还频频举起伏特加酒杯互相道贺。我心里思量着，如果高棉和尚也这样和那些迷人的姑娘们在一起大吃大喝，就会被视为违犯戒律，立即令其还俗。

我访问中国的情况就不详细叙述了，在那里就象平常那样很好地度过了。我的夫人对我的伟大朋友周恩来那潇洒的风度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因为她觉得他比苏联熊更富有魅力、

并有良好的教养。高棉人从来就不尊重赫鲁晓夫，给他起了一个叫做“达克鲁”的绰号。（“达”是老的意思；“克鲁”是鹤鹑，全部意思是：“老鹤鹑”的意思）……。

43

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九六一年初，老挝的局势变得非常不安宁，占巴塞文翁亲王领导下的右派分子、梭发那·富马亲王的的中立派和苏发努冯亲王亲越巴特寮共产党之间互相冲突。为了结束这种兄弟间互相残杀的局面，在西萨旺·瓦达纳国王的支持下，我向十四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提出倡议，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经过了长时间的磋商，直到五月才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要求我主持会议的开幕式。我积极准备乘飞机飞往日内瓦，并且决定接受这个荣誉。我把旅途中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修改讲话稿，在嘈杂声中尽可能地把作为高棉代表团团长的简短发言改成“会议主席”的讲话。

老挝的情况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一心想当“宪法的保护者”，至少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好象不希望有什么支持的国王是参加会议的一方，他当然要保守他的琅勃拉邦领地，但是他只能在万象地区……大概人们不知道，他还可以到占巴塞亲王的采地。

战后（一九四七年）由法国建立起来的老挝王国，真象

一个软体动物。唯一“统一”的成分，是苏发努冯亲王领导下的共产党巴特寮（“巴特寮”是寮国的意思）。苏发努冯是梭发那·富马亲王的同父异母兄弟，他娶了一个越南女子为妻。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是亲河内的。

形势对巴特寮很有利，他揭露了王公贵族和大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万象王国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说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不仅非常亲法，而且越来越投靠美国。自从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来，巴特寮控制着桑怒省北部和牛沙皇省东部，这是他们“重整旗鼓的地区”，它的影响扩散得非常遥远。

而且，整个老挝东部还被越南正规部队所渗透。越南人在茂密的森林里修了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还逐渐延伸到柬埔寨东部山区省份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其目的是运输作战物资和粮食，供应正在同西贡亲美政府作战的北越和南越的战士。

这种局势当然影响到柬埔寨的安全，也说明了我要倡议召开这个会议的用意。人们无法相信，依靠老挝的王国部队能够挽救这个王国免遭颠覆和分裂。除了一些精锐部队——特别是伞兵部队——之外，绝大部分是一些可怜虫，多数是一些辍学的青年，装备不好，军饷很少。他们中一些人毫不掩饰地对记者说，他们是“靠当兵吃饭”的。

对老挝来说，幸运的是北越人正同时在自己国内同兵力雄厚的美国远征军和西贡政府的军队作战，无暇顾及对老挝王国的征战。没有越南人的支持，仅拥有八千到一万三千人左右的巴特寮武装，虽然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但装备却不

算很强，所以是不可能征服政府军队的。

梭发那·富马亲王领导着“中立”活动。他足智多谋、有毅力、有理智，受法国的支持，但法国当时对印度支那已不大重视了。数量并不多的“中立”派式武装部队分成非常“左”和亲巴特寮的“真正中立派”和目光短浅的仍忠于梭发那的“中立派”。不管怎样，梭发那·富马是日内瓦会议的受益者。在协议上，他的名字被美国人和苏联人所接受：由他领导三方（中立派、右派和亲共派）联合政府，老挝中立派更巩固了。但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使这种“联合”越来越不稳定，直至它的破裂。

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结束于一九六二年七月。我不抱幻想，指出关于老挝问题的协定达成得太晚了。我建议召开一个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便使我国的中立和领土完整获得国际承认和保证。我想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柬埔寨和老挝在内的中立的缓冲区。如果南越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包括进去，因为它不同于北越，是东南亚一个亲美国家。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因为人们认为，即使同意建立这样的缓冲区来保证我们这个地区的持久和平，也已经为时太晚了。

至少在一定的时间里，我为使老挝王国摆脱严重的不安而出力。而我所得到的报答是很糟糕的，因为梭发那·富马（和一九七九年的范文同一样）对我的“答谢”是：拒绝了我对他的政府提出承认柬埔寨现有边界的要求。

一九六二年十、十一月间，印度在拉达克邦（原文如此）

与中国发生了公开的边界冲突。那里是常年积雪的山区，习惯于温带生活、装备不足以及在地势如此之高的地区作战的印度军队，很难控制习惯于山区作战的顽强的对手。

被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所激动，刚毅的锡兰（今日的斯里兰卡）总理西里马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在科伦坡召开了一个六国（锡兰、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加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会议，目的是为了共同寻求一个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但会议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作为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朋友，我提出了毫无结果的解决方案，但很晚才被我的一位严肃的法国“监察官”承认是“现实主义的”。这说明，我的先见之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

44

我为什么与美国分道扬镳

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中立国的国家元首断然拒绝了美国的援助，而且在两年之后又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并非是一件令人欣喜之事，也并非是一时冲动之所为。我这样做并不是要取悦于社会主义大国，尽管他们会对我的决定拍手叫好，但他们并没有建议我这样做。拒绝援助和断绝外交关系，完全是我个人的责任。但有一点要说明，对这个不幸的事，除了少数亲美的高棉右派外，我的绝大多数同胞是理解我的。

那时的美国不同于今日，它目空一切，傲慢自负。它根本不理会一个小国的自尊心，而这些小国并未先行与它为敌。美国还以“世界宪兵”自居，陶醉于自己的军事、经济和财政力量，绝不容许它惠予一点资金援助的小国实行独立政策。这种可悲的意识，就使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与美国之间发生越来越严重的不和，最后导致两国分手的根源。

首先，我要叙述一下那场持续不断、极其猛烈、具有侮辱性的、反对高棉中立政策和我这个被他们视为“红色亲王”

的宣传运动。这是最有影响的美国报刊煽动起来的，西方报界立刻响应，特别是泰国、南越的报刊也一哄而起。每当我翻开亲西方的报纸或杂志时，总会看到对我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说我标新立异，抵毁我的成就。用世上最难听的语言谩骂我的政府和我本人，有时还骂我的亲属。

与此相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报界，尽管他们难得对我鼓励几句，但他们至少不对我进行批评。这当然都是受命而行的，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政策与共产党国家的政策相抵触的话，他们肯定也会对我进行激烈的批评。但是，这是比较远的将来，而且是不想遇到的事，而我当时天天受到的辱骂都是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

一些西方外交官和西方朋友，劝我最好不要对这些攻击看得太认真了。他们解释说，因为西方是新闻自由，所以许多文章与政府的观点大相径庭。我当然知道这一点，因此，虽然受到了无休止的污辱，情绪很坏，但我不会对美国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只要它不对我及我的政权进行那种无法忍受的颠覆——现在称为“地震”的活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人们不断地对我说它是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这简直是谎话）向活动在我国边境省份的山玉成和自由高棉叛乱分子提供了经费和物质援助。我们俘获了许多最老牌的山玉成分子，特别是象普雷尹之流，他在有十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上，供认自己是山玉成领导下的自由高棉的一个头目。他们为中央情报局效力，最终目的是推翻我们的政权。

与此同时，我们的两个亲美邻国加紧了对中立、和平的柬埔寨的挑衅活动。泰国拒绝承认我们的边界，还象我在前

面提到过那样，侵占了拍威夏省的高棉吴哥时期的古寺庙。南越政府方面则无理地索要高棉的边境村庄和沿海岛屿。他们的军队侵入我们的领土，并制造了流血事件。

从南越空军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对我们边境省份狂轰滥炸，对我们许多村庄进行扫射，并对我们的橡胶园和农田施放化学药剂，使之枯死。总之，美国及其盟友不喜欢柬埔寨中立，就采取了近于不宣而战的敌对行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一九六三年被迫拒绝一切美国援助，并于一九六五年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的原因。

因为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因此，请允许我在下面介绍一下我对自己的同胞就拒绝美援一事所发表的许多报告和文章，以及国际舆论对此的看法，供读者们参考，以便判断我们的决定是否正确：

自由高棉的情况

自从各种形式的美国援助被拒绝已成为无法挽回的既定事实之后，华盛顿和伦敦等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政界、外交界以及金边的政界和外交界便开始散布说：“西哈努克疯狂到了极点”的流言蜚语。在资本家、新殖民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眼里，一个国家元首，而且是中立国的首脑，竟然自愿放弃他人求还求之不得的援助，这倒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从未见过之事。

当然，其他国家曾经有过这种“威胁”、“要挟”，但最终

只是虚张声势。因此，直到事情发生前几天，人们还认为，还在评论，西哈努克也不过就是说说罢了。这大概就是在我真的决定放弃美国援助时，引起一片惊诧的原因。

我手里有一份报告，是一个自称“旅游者”的人寄给西贡政府的，其实他的真名叫范仲仁，是原越南民主共和国驻金边的代表。这份报告是我们的警察在波成东机场检查他的行李时偶然查获的。他在报告中特别指出：西方国家外交官对他说：“西哈努克的行为太轻率了……如同一个三岁的孩子。”

（原文如此）

为了回答这篇报告和敌人对我的诬蔑，我要引用一位先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华盛顿参议院会议上为我辩护的讲话。这位自愿当我的辩护人的先生是麦克·曼斯菲尔德，而他本人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我在这里只能有选择地介绍这位知名人士的讲话的主要内容。但是，在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读者中，除非具备较强的“理解能力”才会相信他们的这位同胞或盟友的“无稽之谈”。为了这些人，我觉得有必要作详细说明，但为了避免产生更多的错觉，我还有必要设法使他们相信，我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也不是贸然地采取什么冒险措施。

我们还是先说说自由高棉的问题吧。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我如此重视一个没有形成什么规模，也引不起人们注意的运动，实在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我把这些叛国分子，通过电台不断地对我本人进行攻击的罪过也归咎于美国人，这就更不公正了。

很明显，与我们全国同胞的总人口相比，自由高棉的人数是少得可怜。所以，在这些方面，完全可以说，它不是很重要的。

西方人大概还不知道，对于一个禀性良好的亚洲人，更确切说是对一个高棉人来说，遭受平白无故的辱骂和不公正的对待，是多么不可容忍之事。我们可以忍受一切，即使受到最残酷的肉体折磨，也从不呻吟一声，但是对辱骂、轻蔑和不公正的对待，是绝不会忍受的。正因为西方人对此根本不理解，所以他们对西贡的俄佛僧侣自焚殉教的行动感到震惊。

这些道德高尚、谦逊而又很平凡的人，之所以要英勇献身，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受到了自称是基督教徒的吴庭艳的蔑视和不公正的待遇。

至于我本人，尽管我受过西方的教育，但还依然深深地打着亚洲和高棉人的烙印。那些走上邪路的高棉人，即山玉成和其他自由高棉分子，对此非常清楚。在权衡利弊之后，他们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不是用由南越、泰国（实际上是美国）豢养的雇佣军来攻打我们的军队，而是通过每日的唇舌攻击，对我本人进行最下流的辱骂和最恶毒的诽谤。

死于枪炮是无所畏惧的。但对我国全体同胞们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也知道，他们对我象对神一样崇拜，把我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加以保护——听到对我的这些侮辱和诽谤的时候，都会感到不可容忍的。如果我是日本人，就会立即剖腹自杀。可做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就不能这样做。对于我来说，宁可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或死在他们

雇佣的刺客手里。

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该知道我的心理了，也应该消除想象和评论所说的那样：说我是因为害怕遭到吴庭艳和吴庭儒同样的下场，才拒绝了美国援助。他们最好应该向他们保护下的他纳·科曼和沙立·他纳勒（他有柬埔寨血统）打听一下亚洲人，特别是高棉人的德行。这些泰国人玩弄这种德行之外的手法，对我不断地进行侮辱和诽谤。

最近，他纳·科曼对泰国和其它国家的记者说：“西哈努克把他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共产党中国了”。其实，这位泰国外长深知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坚定不移的。他也确信，谎言要比制造直接袭击我的住地的事件，或搞一个反对我的阴谋更能伤害我。我要提醒沙立·他纳勒一句，我之所以断绝同泰国的外交关系，就是因为他把我比喻成“敢于同雄狮较量的猪”。而这种比喻只能用在他自己身上才合适。

但是，又有人要问，西哈努克为什么敢把个人的事当作国家的事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作明确回答，是因为全体高棉人民感到自己的荣誉和尊严，或被称做“自豪感”，都是由我或通过我来体现的。如果我仅仅代表个人的话，那么我的敌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南越人早就会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了。事实上，五百多万人民与西哈努克已成为同一体，所以，对我的侮辱和诽谤，就是对柬埔寨人民的中伤。

美国人不断地声明说，山玉成和他的自由高棉是投靠泰国和南越的，说美国是他们的保护人和出资者是毫无根据的。

我所深切怀念的、为人正直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去世前不久，还指示美国政府以他的名义向我们保证，美国绝对

不介入自由高棉事件中。尽管普雷尹和桑山在特别国民大会上对此已供认不讳，但令人怀念和尊敬的肯尼迪总是矢口否认美国政府与自由高棉之间的相互勾结。我对肯尼迪总统在任期内的直率和正派并无怀疑，可惜他的任期被一场悲剧终止了。

相反，尽管我完全尊重我们已故的杰出的朋友，但我绝不相信美国驻泰国和南越的一些官员，对亲自由世界的柬埔寨叛国分子在那两个国家中的活动一无所知。在这些官员的许多报告中有一份骗人的证明材料，而他们这样做与一个大国政府的形象是极不相称的。他们在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面，说什么自由高棉以及他们的部队和广播电台都在柬埔寨境内。他们甚至还言称，这些自由高棉完全是某些共产党大国为了破坏美柬关系而扶植起来的。在最近举行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上，我才有机会完全揭穿这些怪论，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其详了。

我问过一些美国朋友，他们为什么不解除维克多·马初的职务，因为他在和达春策划反对柬埔寨王位、分裂我国领土的阴谋时，就象吴忠孝一样被“当场抓获”。

某些驻金边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察家当然知道，山玉成不会再有机会和我国同胞在一起了。但他们却错误地相信那些被我们邻国的“心理学”机构蒙骗了的美国驻曼谷和西贡的官员，认为这些官员对柬埔寨的现实情况非常了解。

在此，不能不提起驻金边和西贡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在柬埔寨问题上进行的那番滑稽可笑的争论。（金边方面的）谢勒将军认为，柬埔寨必须是真正的中立，不容许有共产党

的破坏；而西贡方面的美国官员则认为，西哈努克的柬埔寨愚弄了谢勒先生和他的参谋部，他们的意思显然是，我们的国家存在着潜在的共产主义或者已被共产主义赤化了。

绝大多数驻西贡和曼谷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都相信泰国和南越领导人所讲的关于我的不可置信的传说。象普雷尹招供时所说的那样，他们大概认为，高棉人民确实在受着西哈努克的压迫，他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正在等待着，一旦西哈努克把僧侣和农民出卖给外国共产党，必定会导致山玉成出来把我推翻。普雷尹还供认，在西贡，南越政府和自由高棉就是利用这种材料对其雇佣军进行宣传的。普雷尹原来也这样认为，所以他趾高气扬地回来与我们“谈判”，但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受骗了，高棉人民的感情与他想象的完全相反。

我们还应该提一提古巴的猪湾事件，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国政府保证，古巴的“自由战士”（与自由高棉同名）已胜利在望，他们一上岛，就能打到哈瓦那，卡斯特罗很快就会被推翻。此事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事后，我们发现，他们对驻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那些可怜的古巴雇佣军所进行的煽动性宣传，同驻在南越的自由高棉天天听到的宣传几乎是同出一辙。令人吃惊的是，猪湾事件之后，“O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缩写词）三个字在我们国家里的名声更是臭不可闻了。

最后，我要提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事情。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为我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并鸣放了十九响礼炮的时候，阿伦·杜勒斯先生的部下却秘密买通了我们访美代表

团成员、柬埔寨国会议员斯拉波。就是这个斯拉波，在他回到金边后，就充当了美国驻金边大使馆某个部门与其兄达春之间的联络员。事发之后，他在军事法庭上供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我在这里向尊敬的盎格鲁——撒克逊外交官们，介绍一下美国驻金边大使馆的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马丁·赫兹在柬埔寨期间的下场，不是没有用处的。他编写一本《柬埔寨简史》，引起了一些轰动，也由此招来了一个不甚光彩的名声。在这本书的第一部份中，马丁·赫兹试图描绘一幅我们吴哥时期的历史图景，但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著名学者贝尔纳·格罗里埃在书中找出了大量的错误评注以及与历史事实相悖之处。

在现代史部份，马丁·赫兹心怀不良，一心要把我在为争取和保卫柬埔寨独立的斗争中的所有功劳一笔勾销。赫兹抱着极其固执的偏见，他对我展开了凶猛的攻势，企图抵毁我的名声，抹杀我的功绩。他的言论非常尖刻，与今天称之为自由高棉的山玉成集团的广播电台过去说过现在还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的言论非常相似。

更有意思的是，这本被西方从事高棉历史研究的学者们斥之为不正经之物的《柬埔寨简史》，在美国却总是被视为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名著，而且还摆在各个图书馆，包括美国各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里供人们查阅。此书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颇受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使大家相信山玉成并不为美国领导

人所青睐，而是北京或河内的人呢？这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卑劣说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美国不亲自出面参与反对分裂柬埔寨友谊的共产党的破坏阴谋。他们或许有理由说，因为他们对南越的城市控制很严，自由高棉是不可能秘密存在的。我知道，他们还会再次辩解说，如果没有“主权国家”南越政府的同意，他们是什么也做不了的。那么当时它这个政府是同自由高棉相勾结，还是同河内同谋呢？看来，这种辩词是荒谬的。

美国在自由高棉问题上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没有美国的支持，那些人是毫无办法行动的。西贡和华盛顿放任这些叛国分子肆无忌惮地侮辱和抵毁高棉国家元首的声誉，如同侮辱和抵毁整个柬埔寨的名誉一样。此事证明南越和美国所宣称的愿意真诚地同我国交好的说法，是没有丝毫诚意的。他们只能成为假朋友，即使在他们告诫我们要警惕共产主义时，也并不是从我们国家的利益出发的。面对这些情况，为了维护民族尊严，我们怎么能够继续接受美国援助呢？

假使美国人真的相信自由高棉就在我国境内的话，那我只能郑重地邀请他们驻在金边的众多的军职和文职官员到我们所有城市、农村和森林中，去捣自由高棉——被他们称之为“他们的东南亚政策大失败”的产物——的老窝好了。如同法新社报道那样：不管怎么样，自由高棉问题事实上是一触即发的炸弹。

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促使我决定最终放弃一切美援的其他原因。这个决定受到了我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热烈的欢迎。

请允许我在下面转引农金尼大使在电报中给我传来的曼斯费尔德参议员讲话的全文，我将不加任何评论，使这个具有极高价值的文献保持其完整性。因为他是一位美国人，一位不同凡俗的、有修养、有道德的正直的政治家，一位在他们国家中的伟大人物，尽管他们国家犯了许多重大错误。

纽约时报仅仅转载曼斯费尔德参议员十一月二十日在参议院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其实，那篇讲话很长，参议员用了非同一般的词句，赞美了亲王和柬埔寨。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个讲话摘要报导，讲话全文也于今天特挂寄回。引文如下：

“在报刊杂志中，有许多文章指出，如果今后柬埔寨政府要求的话，美国应再给予援助。同时，柬埔寨指责美国政府部门，参与了企图推翻柬埔寨政府的阴谋。

“这一时期，产生被人察觉的敌意实在是很不幸之事。但这种事的发生已不是第一次了。在我们与柬埔寨的关系史中近十年来总的说是良好的。但从一开始，这个关系就一再出现误解和毫无意义的个人间的不和。我个人认为，不能总把错误都归咎于对方。

“柬埔寨反复强调要尽力避免对外国援助的过分依赖，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要终止美国援助。而美国政府对这些反复的警告根本不重视，当成了耳旁风。

“美国向柬埔寨提供了八百万美元的援助，尽管比给泰国、南越和老挝的援助少得多，但已是一个可观的数额。这个援助对柬埔寨引人注目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使柬埔寨有力

量防御外来侵略。虽然他们的军队还小，但是非常有能力和非常忠诚。同时，也更加加强了柬埔寨人民的民族主义思想，看到了自己的作用。

“可以说我们重视柬埔寨的意愿，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做法。而且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援助促使柬埔寨最终摆脱了我们的援助。对于一个有勇气寻求自力更生的政府和人民，我们要表示尊重。对于卓越奋斗的人民和国家元首，我们要表示赞赏。我们尽了自己的一切可能来保证，我们是支持和鼓励这种热忱的努力。总的一句话，我认为柬埔寨将终止这个援助。这一点是不是传出去了呢？肯尼迪总统十一月十四日发表了声明：（下面引号里的是参议员引用了肯尼迪总统十一月十四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它在政界，新闻界引起了什么反应呢？请审查一下国务院近几年来的那些谨慎的声明以及报界的新闻报导和社论。按照你们的看法，柬埔寨的这个愿望所受到的是赞赏还是揶揄？是否看到我们在竭尽一切可能来保证，避免由于援助的终止而带来的冲击呢？不，你们不会看到这种情况。相反，人们普遍都说这种想法是愚蠢的。柬埔寨居然还想要自力更生，简直是背信弃义，难以容忍。所以，你们看到的几乎都是谴责柬埔寨放弃美援，可以看到全是统一口径的评论，都对柬埔寨国家元首正常的理智和独特的气质进行诬蔑。也可以看到一个旧君主决心捍卫君主制和佛教传统，犹如一个共产主义者捍卫马列主义一样。还可以看到他被当做一个吹萨克管的花花公子。’

“然而，这个非常虔诚、个人能力很强的国家元首，比起其它的东南亚国家元首来，他更懂得怎样联系本国人民。

“为了捍卫自己杰出的民族文化，他发动并依靠人民共同努力，使它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发展的激流中继续发展。

“总之，你们看到的几乎是国家间的敌意，这促使了他们在现有边界内的发展，主要标志是：人民更加团结，政治更加稳定，人们更加自由，公众更多地关心国家大事，这是任何其他亚洲国家都不能比拟的。当然，柬埔寨也犯了错误，而且柬埔寨在东南亚问题上同其它国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这就说明为什么在柬埔寨刚获得独立之始，其国家元首就受到普遍的反对。

“应该承认，我不理解这种态度，只认为是不够体面的。我想不能以它作为我们两国及我们与其它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我认为，它妨碍了美国的对外关系，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只希望有一种永远依赖于我们援助和我们崇高的德行的关系。如果我们认为，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一旦失去美国援助就会自动倾向共产主义，并以此为处理一切事务的原则，那是很不好的。假设说，一旦停止援助就真的会发生上述情况，我们就一味地通过对他们的国家元首的过份指责及辱骂以促使柬埔寨崩溃，为加速这种崩溃早日到来，我们也不能采用同柬埔寨人民为敌的方法，也不能对柬埔寨人民要自立这样的好事视而不见。否则，久而久之，柬埔寨被推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轨道上的预言将变成现实。如果真有这一天，这个重大责任应该归咎于我们的无知和官僚主义。

“如果我们真的要维护我们在东南亚的正当利益，就不应对柬埔寨终止我们的援助采取蔑视、嘲弄和打击的办法。正

相反，我们要尽可能地挽回那些不应该失去的善意。现在我们要做的，尽管晚了一些，但要真诚地、愉快地承认柬埔寨的现实，不要再为此争论不休了。因为继续过多地争论下去，等于把这个小小的国家推向已张开双臂的中国共产党的怀里。

“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谴责柬埔寨，而是鼓励其它国家也走这条道路，努力摆脱我们的援助。我们应加倍努力，改善柬埔寨和它的东西邻国的关系，为它们创造一种友好的气氛，以安抚受惊的柬埔寨。

“我竭力主张，在柬埔寨尚未完全丢失之前，参议院和政府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应该高兴地看到柬埔寨人民坚决要自立的事实。唯一的奥妙是，我们的外援的正确设想被令人遗憾的敌对情绪所冲淡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引文完）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在结束他的讲话时，要求将他一年前到东南亚考察时写出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报告列入大会文件。

随后，佛蒙特州参议员希肯要求发言，表示支持曼斯菲尔德。
农金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华盛顿。

美国的军事援助及我们的态度

一九五八年，吴庭艳的武装部队在上丁省蛮横无礼地将自法国保护国时期以来的界碑擅自移到了我们境内纵深四公里的地方。那些军队还在这块被天真地并入了南越版图的土地上驻扎了两个月之久。

那时，我要求美国政府进行干预，让吴庭艳撤出他的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队，并把界碑移回原处。不久，卡尔·斯德隆大使把华盛顿的答复告诉了我，说美国政府绝不介入这场“纠纷”，以免引起两个友好国家相互对峙。另外，大使还明确告诫我们，对美国的盟友绝对不能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是专门用来打击共产党的。

就是在一九五八这一年，我终于明白了，美国“慷慨”、“友好”的军事援助不仅是附带条件的，而且是带有毒性和侮辱性的。所以，我们对此也失去了信任。

美国人早已明确地向我们打了招呼，如果我在接受他们提供的军事援助的同时，又胆敢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武器捐赠的话，他们就停止给我们提供粮食和弹药。由于我们的“自尊”，我们接受了与我们的主权不能相容的条款。这些“施主”们曾保证向我们的高棉王家武装部队提供极精良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以保卫柬埔寨的尊严、和平与领土完整。然而，上丁事件，突然暴露了美国军事援助的真正目的。

根据我们当时的测定，使我们首先知道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不仅不足以进行一场防御战，恐怕连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演习也无法保证。为了将军队运到上丁，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人征用大量的马恩出租汽车那样，我们起用了许多中国卡车。但这些车的马力太小，又都是修过的旧车，结果大多数都在半途中抛锚，在通往上丁沿途上，到处都是这种车。至于武器装备，根本不是什么现代化的，而且数量也非常不足。另外，卡尔·斯德隆先生还向我打招呼，不许我们向泰国人或吴庭艳的南越人开火。

对于我们这些信奉“中立”的人，美国提供的只是专门用来杀共产党的武器，而共产党并没有威胁着我们。至于分别侵占了柏威夏和上丁部分地区的西贡和曼谷的士兵们，却丝毫也不许伤害。军事援助协议明文写着，为了维护我们的主权和自由权，美国同意向我们提供必要的和足够的援助。可是在一九五八年，美国的援助显然是用来对付假设中的侵略柬埔寨的共产党，而不是对付真正的侵略者——自由世界的南越和泰国雇佣军。

面对着泰国和南越直接的威胁、挑衅和侵略，柬埔寨既没有抵抗的手段，也没有自卫的权利。美国人重点警惕的是我们的“自由”是否受到共产党的威胁。而这种自由和我们的独立以及领土完整在山姆大叔的亲密盟友们用枪炮来抢夺时，却要轻而易举地被奉送出去。

由于海牙国际法庭的公正裁决，柏威夏才终于归还柬埔寨。至于吴庭艳军队撤出上丁，那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的强有力的警告的结果。如果说我们的领土完整得到恢复，我们的尊严得到保全的话，这完全不是因为美国的军事援助，而是由于国际上的坚决要求，其中包括美国的头号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

一九五八年以来凡驻在柬埔寨的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都可以证明，我当时要摆脱美国援助的目的，是为了使我国和我们的军队能适应在没有这个援助的情况下生活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盎格鲁——撒克逊人，继续在捏造有关我的传奇故事，说我是一个从来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一日数变、“根本摸不透”

的人。其实，就在上丁事件的第二天，我就用法语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我说，在必要的情况下，总有一天我要断绝同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拒绝他们的援助，以洗刷他们的援助和所谓友谊给我们带来的耻辱。但是除了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等少数人和少数几家报刊外，自由世界知名人士和他们的报刊对我的讲话根本就不理采，而且还气愤地说“西哈努克如同三岁孩子般地任性”……。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美国的军事援助使我们蒙受了不止一次的耻辱。由于和平建设需要资金，所以我很难下决心来终止美国的援助，因为这个援助——至少在初期——曾减轻了我们国家的财政负担。在每年四十亿瑞尔的国家财政总预算中，美国援助的八亿瑞尔全作为我军的军费支出了。后来，美国的援助逐年减少了。迄今，在六十多亿瑞尔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只有三亿瑞尔的美国援助了。同我们所蒙受的巨大耻辱相比较，这点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而那时，南越每年都接到美国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每年有一亿八千万至三亿美元的现汇援助。到现在，这笔援助已超过四亿五千万美元。而我们，二千多万美元的援助，还要减去数目很大的一笔开支，即用来支付从美国来的和驻本地的美国援柬人员（包括其家属）的费用；同时还要支付来柬埔寨游山玩水的所谓“考察旅行者”的费用。我记得，一九六一年日内瓦会议前夕，人口只及柬埔寨三分之一的老挝，每年却获得四千万美元的援助，也就是比给我们的多了一倍。

还有一点，南越、老挝和泰国领导人任意挥霍美元，而

我们是非常廉洁的，非常节省地使用这笔援助。这一点，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可以证明。尽管如此，自由世界的反动派还是指责我们“忘恩负义”、“堕落。共和党参议员希肯鲁佩就曾反驳曼斯菲尔德参议员说：西哈努克造成的局面，不能令人满意。在那里，我们美国的援助也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这里，我们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邻国们曾多次对美国进行威胁和要挟，迫使美国削减、停止对柬埔寨的援助。他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我可以列举如下几个例子：

据我们一些高级军官报告，洛韦总后勤部的物资储存处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得到美国“供给人”提供的补充了。我们的军用汽车已经没有新轮胎可以更换，我们的士兵们只能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进行修理。至于我们的王家空军部队，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才得到了四架小型的喷气式飞机。美国屈服于泰国的威胁，就这样出卖了我们。我们的确得到过两架直升飞机，可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富米·诺萨万却得到三十架（是富米将军私下向我透露的）。而这些飞机最终成了巴特寮射击手们的靶子了……。这怎能不使我们国家和军队感到羞辱呢？

吴庭艳和乃沙立的雇佣军想用蔑视和嘲讽来压倒我们，他们肆无忌惮地侵入我们的领土，屠杀我国人民。他们的舰艇在我们的领海上横冲直撞，他们的飞机在我们的领空中不断骚扰。而我们只能是无能为力地低头受辱，因为我们被贫困所捆绑着，而且还受着某些条文的束缚，使我们在不共戴天的死敌面前永远处于劣势。

如果美国愿意的话，是能够按时提供武器的，但正如众

所周知的那样，他们受到了西贡和曼谷领导人的阻止。更有甚者，那些人还多次威胁美国说，如果美国敢于更新高棉王家武装部队的装备的话，他们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就有告吹的可能，那些幼稚的美国人对此当然是让步了。其实这些话都是吓唬人的，因为谁会想象到他纳·科曼能去追随莫斯科或北京呢？

美国的经济援助与我们的关系

在此，我要客观地叙述一下美国对柬埔寨的所谓经济援助。我记得，美国的援助是面向我们国家建设和生活的许多方面。在国家建设方面，农业、社会事务、商业、工业（私营的）、行政、警察、地面保卫等部门都是他们的受援者。据美国新闻界报道，这个援助自始至终总数大约是三亿美元。我们真诚地感谢美国政府和人民，感谢他们向我们提供了数目相当可观的援助，为我们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并不象美国新闻记者无休止地夸大这些援助的重要性那样。其实，这十年的三亿美元的援助，还抵不上南越在一九六三年一年中所获得的援助额，这些还是美国记者压缩了的数字——四亿美元。在这个自然数中，当然是包括了众所周知的耗费最大的战争费用了。同时，我们大概不会忘记，他们给西贡统治者的弟弟吴庭儒，用来镇压人民的盖世太保式的“特别警察”所提供的慷慨的捐助。据一些西方人所透露这笔预算，就大大超过了不结盟的柬埔寨所得到的经济援助。

最后，我也承认，我本人和我们政府各重要部门的官员们都知道，中断美国经济援助，将使国家受到严重损失。另外我也坦率地说，我的美国朋友赞同我的想法，将他们的钱用在能真正为我国人民和青年的利益服务方面。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方面的确也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那期间，这笔援助给适应本地情况的制造旅游车、电冰箱和空气调节器等美国工业带来了好处。美国经济援助对柬埔寨的发展也起了不可否认的作用。前不久，毛赛同事在终止美国经济援助的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了这一点。我可以引用其中几句话：

“从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两国签订第一个经济合作协定以来，至今已有十二年了。柬埔寨人民的努力得到了慷慨的美国人的真诚支持。……要一一列举已建成的项目，数字就太长了，其中有重建的桥梁、翻新的公路、大批的学校、许多农业水利工程及农业方面的其他各种工程等等。这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最好证明。……这些成果足以说明，柬埔寨没有滥用美国人民的金钱。我们还可以自豪地强调指出，如果同所有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国家进行比较的话，柬埔寨所获得的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然而我十分遗憾地宣布，我们认为不得不结束这项总的说来对我们人民社会同盟在国家建设、社会事务、文化、行政等方面以及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政策都起了卓有成效作用的援助。

我应当在此向那些为人正直、工作认真负责的管理这项援助工作的所有人员，特别是向柯迪·坎帕尼先生和他们的大使春普尔阁下表示深切的谢意。

对于我上面所讲的，有人不免要问，我为什么在最近的特别国民大会上，坚决决定要终止美国援助呢？

的确，有许多原因迫使我下此决心。我国人民虽对这些原因不完全清楚，但他们对我的作法是“理解”的，因为他们对我的决定表示热烈的拥护。现在，我要全面地把问题摆出来，并说明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这许多原因的归结点，无疑是自由高棉卑鄙的侮辱。大家都已看到了我写的《自由高棉与拒绝美国援助》和其他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这里我就不赘述了。正如法新社记者让·巴雷指出的那样，已达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当然，后来还有其他一连串的因素。首先就因为我们采取了不结盟政策，自由世界的政客、首脑人物和新闻记者以及他们的仆从国又继续掀起诽谤和侮辱我的浪潮，不断地在“美援受援国”上作文章，攻击柬埔寨。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是在由一个不体面、不择手段和不诚实的政府领导下的一群厚颜无耻之徒，既想要投靠社会主义阵营，却又贪婪地把嘴伸向山姆大叔的牲口槽里。说我们任意挥霍美国的援助，偷盗美元饱填私囊，不顾人民的死活等等。有一个叫希肯鲁佩的家伙，在美国参议院会议上断定地说，我们对美国援助的管理实在“不能令人满意”，而且这个援助在柬埔寨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我们高棉人不能长期容忍这种不公正的令人气愤的指责。泰国、南越还有其他国家的首脑人物为满足个人利益，

毫不知耻地挥霍美国的巨额援款，并未受到丝毫责难。我们是不容置疑的绝对忠实的“受援者”，却要忍受着自由世界不断的辱骂，我们被视为美国受援国中最无能、最堕落的国家。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由于我们自己默默地做出了牺牲，还是在外国贷款的帮助下才得来的，他们对此是看不清楚的。

面对这些痛苦的、不可容忍的情况，为维护我们的尊严，我们非常有必要彻底摆脱美国的援助。与那些数额甚大的受援国比较起来，我们受到的美国援助是非常微薄的。

美国的经济援助也和军事援助一样，在分配和使用方面都附着着我们的主权不能相容的条件。

大约在五个月以前，在上届国民大会上，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享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助学金的漂亮的印度少女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她说：“亲王殿下，恕我冒昧，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象柬埔寨这样一个主权国家和您这样一位极为珍惜民族尊严的领袖，怎么能够接受条件那么苛刻的美国援助呢？”一个非常调皮的提问出自于一个可爱的少女的嘴里，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直到今天，终止了美国的援助之后，我的心才算平缓了下来。这难道就是“孩子气”？我不这么认为。许多年前，缅甸朋友曾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拒绝了同我们一样的美国援助，因为那些附带的条件也是与他们的国家主权不能相容的。对我来说，这样一个有关尊严的教训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多年来，有些激进的同胞，一直鼓动着要摆脱美国的援

助。这些人肯定只是希望排除美国的援助和伴随而来的影响，以使他们为之尽心的共产主义轻而易举地渗透进来。至于我，只要这种援助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振兴有益，我就要时刻地极力地保护它。

但时至今日，十分明显，我们国家、政府及人民社会同盟失去了美国援助已成定局，我再也没有勇气和信心继续为这种援助充当辩护士了。我之所以泄气，不仅因为普雷尹的供词证实了先前的推断，而且还因为自由世界的新闻记者、泰国首脑人物和美国政客还在继续指责、谩骂和诽谤我们国家。

根据美国新闻记者透露，美国的援助仅仅是为其反共战略和政策服务的，而对高棉人民的和平、前途和命运则全部置而不顾。这样，我又怎么能向同胞们保证美国援助有益无害呢？

最近，大批的美国记者到金边采访，他们发回了很多电讯，我当然不可能全部介绍他们的辉煌杰作，不过我还是从《纽约时报》有代表性的文章中摘引如下几段：

“亲王让美国撤出柬埔寨，这一决定使柬埔寨向共产党中国的轨道靠近了很大一步，也使美国苦心经营的印度支那势力范围，面临着灾难性瓦解的危机。……已经在柬埔寨有了一定影响的美国的撤出，减少了他维持反共战线的能力。……美国充其量也就是指望帮助越南反对越共的反共冷线。为了这个目的，美国支持了受他援助的梭发那·富马亲王领导的老挝中立政府。”

我们再也不要美国（有毒的）援助了，而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西贡政权都要接受它。前者受到援助，我很高兴，对后者则不然。为了抵消柬埔寨拒绝美国援助所产生的影响，必须增强万象和西贡政府的反共立场。但这不是我们的事，应尽量避免对这个问题的评论。那是一笔交易。如果美国人愿意用美元做为交换，以便保护其在我们邻国的利益，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权利。

美国的卒子从我们的棋盘上挪到了老挝和南越的棋盘上，也许他们不会大规模地再回到我们领土上来了，但我们并没有什么伤感，正相反，我们感到很宽慰。

对此事件，《纽约时报》记者发回的电讯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柬埔寨从中国共产党那方面拉回来。”（事实上，我们仍坚定地站在严格中立的立场上，根本就没有纳入人民中国的轨道。可美国人已经形成了一成不变的概念，把我们视为人民中国建立在老挝和南越两个美国“堡垒”正中间的一个前哨阵地）……“反共联盟锁链将打破，西方在东南亚的阵地保不住了”……。

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前途，也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社会同盟和王室，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摆脱美国的经济援助，而这样做的主要理由就是防止“商业化”援助的危害。

关于美国援助商业化的问题，受援国所批评的是，签发权严重地不适应受援程序。我们的同胞最清楚，多年来美国对援助的消费品和设备的进口，采取了“美元”分配的办法，

这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困难和社会弊端：可憎的行贿、受贿，不断地尔虞我诈，为了美元互相责难、互相忌妒，我们的大臣和官员们为这厚此薄彼，外汇分配中的贪污十分猖獗。法国商人向采访记者透露，不给高棉的政府官员行贿，做进出口生意是不可能的。这些丢人的事情，无须再细述了，它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形象。

我懂得，上面的批评不仅是针对美国的现汇援助，同时也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外汇分配的。但是，为了提醒那些健忘的人们，我还要强调指出，在我国获得独立的头几年里，美国的现汇援助真是我国必不可少的资源。我现在所讲的这些作法是发生于一九五五和一九五六年，也就是我们正迫切需要美国帮助的年代。说到底，我们目前在外汇分配方面，即使是外国援助的国营单位也好，都还带有美国援助商业化所留下的痕迹。……我再补充一点，极端自由主义，对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说，是伴随着我们的商业政策暴露出来的，也是造成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原因。除了倒卖美元的黑市，又产生了 *BFAC* 市场，虽是符合规定，但也由此产生了许多不道德的行为。这两个市场采取种种投机手段，比如囤积商品，使产品消费短缺成了恶性循环，物价也随之暴涨。

这些，使人民社会同盟内阁不断受到严厉批评。国民经济部门的所有大臣们，无论其资历如何，经验是否丰富，属于哪个阶层的，都在这些问题上遭到挫折。

然而，无论如何也得改变我们的做法，使我们的外汇建立在一个很好的基础上。但是，除根据比较可靠的原则进行国家外汇分配之外，仍然有一些重要的贸易部门还以美国援

助的美元作为资金，这是腐化的因素。……我们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很可能会失败，因为这个因素的传染性太强了。

我还试图使美国人对我们的利益有一个较客观的看法。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回忆一下美国援助造成困难的那一段是特别有教育意义的插曲，是很有好处的。几年前，一个说是中国援助的工业企业得到了美国援助的外汇补贴，要进口一些生产火柴的机器设备。这些进口的机器，在外汇支付订单上写明是新的，但运到柬埔寨的却是一堆无法使用的废铁。美国经济代表团直接向王国政府（不是向中国人）要求偿还预支的美元（况且也无力偿还人家）。王国政府向美国表示，既然要对这件事进行赔偿，自然就应该允许高棉政府有权进口自己所需的机械设备。美国政府的态度依然如故，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同时还声称，美国不允许把他们提供的美元用于这种国营企业，那是专门帮助私营企业的。

这篇文章开头时，在谈到美国援助所造成的后果时，正如我着重强调指出那样，这种援助只许用于一些基本建设工程、社会福利设施、研究中心，……而绝不能用来发展那些直接出产品的国家产业，如种植园和国营工厂。对于这个附有条件的美国援助，我要说的是，美国商品化的外汇援助只是有利于商人“阶级”和代理商。这样，美国援助的本来面目就暴露无遗了：它并不愿意引导高棉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独立国家，而只能最终使已成为无限忠于高贵的外国资金的出资者的当然“主顾”的“某些”高棉人得利。我还要提一下，这些有获得外国巨商高额报酬保证的享有特殊利益的高棉人，很少关心虽有较大风险，但能保证我国经济取得令人满意的

发展工业项目。

上述的种种理由，使我越加肯定了如下的推断：不解除这个有碍于一个国家自主发挥民族生产潜力的援助，不解除这个使我国沉湎于有好处的商业活动，而却使我们丧失了创造精神的援助，我们就绝对达不到自己努力要达到的经济独立的目标。尽管施主们吹嘘他们的经济援助能帮助我们实现经济自主。但随着年月的流逝，事情也逐渐地明朗起来了，他们是在让我们的国家堕落，不得不依赖于他们。如果想要摆脱象泰国、南越、老挝等受援国那样的充当外援的俘虏的命运，我们就必须果断地采取措施，坚决地与这个援助一刀两断。

毫无疑问，我们将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我感到，这些困难时时刻刻地缠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也感到，拒绝了这个有毒的援助，我们的政权可能会完蛋。这确实是在冒险，因为我们的新政策缺乏廉洁作风的负责人，而只有一些无能之辈。但是，我们已别无它择。既然都是要死，我们宁可死得勇敢些、壮烈些，也不能被美国援助所窒息和腐烂而死。

我所表述的这些悲观情绪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在我拒绝了美国援助后，朗诺和施里玛达果然背离了我，并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罢黜了我。

45

吞并高棉领土的敌人

这一章讲的是，六十年代我们国家与泰国和南越之间的“边界危机”。下面的一些材料都是我在那个时期，用法语发表在我的党的机关报上的文章，请大家务必仔细阅读。

这些文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高棉爱国者的作品。民族主义者在法国已经是一个过时的陈词了，而且常常与沙文主义一词混同在一起。何谓“沙文主义”？拉鲁斯辞典——我尊为有权威性的辞典——解释为“忠于自己的祖国，然而却是盲目的”。我对自己的祖国是忠诚的，但并不盲目。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自己的同胞完美无缺。有一天，我的老朋友宾努亲王对一位西方记者说：“如果柬埔寨人口不是七百万，而是五千万的话，她早就把下柬埔寨（即现在的交趾支那）夺回来了，或许还走得更远。”另外，我也很尊重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爱国主义，特别是对我们邻国就更是这样。我认为，他们坚决地保卫自己的领土，是合乎情理的，完全正确的。只是在他们要“吞并”高棉领土的时候，我才起来反对他们。

问题是非常清楚的，我所说的我们要保卫和将要保卫的高棉国土，不是指十二世纪帝国时期的版图，因为那时的高棉包括现在的交趾支那（即越南南方）、老挝、泰国，还有缅甸和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战争和他人的谋略，使我们丢失了大片土地。现在，如果提出要归还这些土地，是没有道理的。我本人和我国同胞认为，我们无可争议的领土是我的先王诺罗敦国王陛下（诺罗敦家族的始祖）所传下来的那一部分。在一八六三年，诺罗敦国王陛下被迫求助于法国，要求他们帮助捍卫王国所剩无几的土地，而这时已是历史上我国版图最少的时候了。如果没有诺罗敦国王的话，用不了多少时间，柬埔寨国土就会被南越，泰国不断地兼并，恐怕早就只剩一个首都了。

我觉得奇怪的是，每当在美国人和英国人面前提起他们的西贡、曼谷和东京宠儿们的扩张主义时，他们总是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他们怎么会不知道，泰国与日本合谋吞并了马德望省及暹粒、磅同、上丁诸省的大部分土地呢？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六四年，瑞士记者贝蒂勒·加朗采访了泰国的一些知名人士，他们都说他们国家丝毫也没有想占领柬埔寨的省份，只是要柬埔寨将“暹罗的省份”，如马德望等省归还给泰王国。

然而，历史学家们都知道，马德望历来只居住着高棉人。一八八四年，在被占领九十年之后，马德望的暹罗社团的总人数也只有二百人。这个省里唯一的“少数民族”是居住在拜林地区开采宝石的几百个缅甸人。

我们再提一下，暹罗人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占领

马德望省的情景，也许不是无益的。在泰国人进来之前，大部分的官员、医生，艺术家都回到了金边。而许多商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还留在了那里。再者，就是农民了，他们舍不得离开祖辈传下来的土地。暹罗占领时期，因为与高棉居民相对立，经常惹出麻烦。我们的同胞，包括小学生在内，都要着“暹罗服装”，城镇和村庄要以暹罗话命名。高棉文的石刻，包括寺庙里的碑文，都不复存在了。在一些寺院里，高棉的礼法正式被禁止，一些僧侣们对此进行了抵制，也无济于事。最初，泰国宣布取消所有捐税，但只过两年，这些捐税又落到了居民头上。比如，骑自行车必须上牌照！泰国行政当局坚持了他们的老习惯，敲诈勒索百姓，警察对他们的不法行为和犯罪活动不闻不问。

在一九四七年的华盛顿调停会议上，法国代表描述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他们再次接管该省时的情景。一切都很糟糕，公路网破损不堪，政府大楼被遗弃，每天只能供几个小时的水和电。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居民人数减少。卫生设施被盗窃。天花、霍乱到处流行成灾。稻米产量显著地下降。泰国占领之前，年产量是十八万吨。就是说，一九四五年，下降了百分之八十。玉米产量几乎下降到零。牲畜大量死于瘟疫，在马德望收归柬埔寨时，必须进行牲畜的检疫隔离。

泰国占领时期，马德望是我们所丧失的省份中，被搞得最悲惨的一个省。上述那些情况和数字就足以证明了，我无需赘述。如果需要的话，法国政府也可资证明。泰国对此也只能在官方报纸上气冲冲地进行有气无力的辩解。

为了更清楚地揭露泰国的扩张主义野心，需要把情况详

细说明。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国际法庭判决，柬埔寨对柏威夏高原和高棉古寺（有几百平方米属于我们的）拥有主权。但是，泰国在一九六八年联合国大会上控诉说，柬埔寨要对柬泰的“边界事件”负责任。

请看：

多年以来，我一再向泰国建议，双方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表示互相尊重边界现状，但都遭到泰国的拒绝。

泰国当时是（美国保护伞底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的所在地，它拥有近二十万人的强大国防力量。据估计，当时还有大约四万五千人的美国驻军。

柬埔寨只有三万人的弱小军队，怎么能够同这个强大的邻国进行军事较量呢？何况它又是美国的盟友。

另一个“高棉领土的吞食者”是南越。必须指出，（在西贡的）吴庭艳政府曾正式提出对一些高棉沿海的领土要求。有一个时期，吴庭艳以后的几任南越政府虽然也一直坚持这个要求，但却尽力避免事态激化。然而，西贡的报纸《新越南》发表了一篇社论，声称西贡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准备再次要求归还“被（柬埔寨）占领的领土，因为在不速之客（柬埔寨军队）驻扎之前，越南对那里拥有主权。”真是胡说八道，几个世纪来一直受越南之害的小小柬埔寨，竟被指控为“扩张主义者”。

我要提一下，吴庭艳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三日对我说，如果柬埔寨愿意与越南友好的话，那就应该把“（柬埔寨）非法占领的越南岛屿”归还给越南。这个要求并非开玩笑：一九

六零年三月九日，西贡发出正式照会，要求柬埔寨对自己的五个沿海岛屿“放弃行使主权”。（真是不打自招！）同年四月十四日，他们的要求又增加了白马海滨游泳场对面的两个岛屿。我们不会忘记，法国将历史上属于高棉的整个交趾支那以及现在被南越称之为富国岛的梭子岛，赠送给了吴庭艳的前任及政敌保大。

如果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吴庭艳承袭了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安南王朝的帝王们的做法，对我们玩了猫捉老鼠的把戏，妄图迫使我们臣服。简而言之，他的意思是：如果想同我们和平共处，你们得给我们让出一小块土地来！

暹罗人（即泰国人）和安南人（即越南人）都采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柬埔寨。他们或以武力，或扶植一股反高棉王室的力量，或收买一些高级官吏、大臣或将军，让这些人分裂出一个或几个省做为外国的保护领地。一旦阴谋得逞，这些省份就会为暹罗或安南在很短的时间内所吞并，而叛国集团头子就成了那里的地方长官。一七八二年，本亲王就是把马德望和吴哥出卖给了暹罗之后，成了那里的最高长官的。一九五九年，被我们政府任命为暹粒和磅同两省负责人的达春也是想这么干的。在南越的策动和美国一些“间谍”的支持下，他企图把这两个省分裂出去。

在更远的过去，当高棉国王渣耶洁达陛下驾崩时，他的越南籍王妃呼吁她的同胞，派来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们逮捕了新国王安占，用一个铁笼把他装运到了交趾支那，最后就死在那里了。这是法国历史学家让·穆拉记述的史实。他还

记下了许多安南当局策划的暗杀、残害、绑架高棉王室成员的事件。

人们看到这些简略的历史悲剧后，大概会更理解，为什么所有的高棉人（除了一小撮叛国分子之外）和我本人要誓死捍卫今日的柬埔寨——历史上一个强大帝国的一个弱小部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46

世界各国要人对柬埔寨的访问

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〇年，柬埔寨的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外国元首，包括许多世界名人连续不断地到柬埔寨来访问，许多外国政府也邀请我去进行国事访问，都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互相访问都是在高棉王国内外处境非常困难情况下进行的。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同泰国、南越及他们的保护者美国的关系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在柬埔寨内部，有美国某些机关支持和援助的山玉成的自由高棉，还有越南北方共产党支持的红色高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高棉王国接待了如下的欧洲国家元首：捷克斯洛伐克的安东宁·诺沃提尼总统和夫人、法国戴高乐将军和夫人、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及夫人。

从非洲来的有毛里塔尼亚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和他的家属、尼日尔总统迪奥里·阿马尼。

亚洲有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很喜欢我们的国家，来过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菲律宾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后来，还有苏加诺总统的继任人苏哈托将军、中国总理周恩来、马来西亚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来进行过许多次国事访问）、澳大利亚总理霍尔特先生等等。

在这些著名人物中，还有比利时前国王利奥波德陛下及其夫人雷蒂王妃、美国前总统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及苏加诺夫人哈蒂妮等。

在这十年间，我正式访问了法国（一九六四年）、印度尼西亚（与苏加诺互访三次）、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九六五年，就在那时，我与金日成首相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在朗诺政变前最后一次访问这个国家，因为中国一些分子和红色高棉知识分子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引进了我国，使我同中国发生了矛盾。

我永远保持着同这些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交往的回忆。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在参观吴哥窟时，坐在一乘轿子上，俨如过去的高棉君主。他很喜欢吃印度咖喱，幸好我们在暹粒找到了一个印度商人，他为自己杰出的同胞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菜肴。总统的样子特别有趣：他按照印度的传统习惯——柬埔寨也是这样——坐在一个垫子上，用手

抓饭吃。

诺沃提尼夫人对我讲，她和她的丈夫都不习惯于亚洲的饭菜。她接着还说他们也不习惯于某些国家比较简单的厨房烹饪法和简易的寝室，特别是浴室更应该改进。但她说，使他们高兴的是，我们西方式的接待方法，舒适又整洁的宾馆，法式菜肴和法国酒。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夫人也说，她和她的丈夫担心访问亚洲之行后感到不舒服。在南斯拉夫代表团到达金边之前，铁托夫人打电报给我，她希望招待的饭菜简单些：烤肉，熬菜和面包即可。饮料方面只需要矿泉水。当他们在柬埔寨吃第一顿午饭的时候，我向元帅和他的爱妻推荐了两个菜，一个是营养的，另一个是美食的。前者是根据他们的要求安排的，后一个是在我的监督下，由两个金边最好的法国餐厅老板烹调而成的。这两个名厨是金边塔韦内餐厅的米尼奥先生和巴黎咖啡厅的斯巴克塞西先生。最好的法国葡萄酒都准备上了，铁托马上就同意了，他对我选定的那道美食菜和法国酒的评价都很高。他请他的夫人转达对我的谢意，感谢我的热情款待，为他们安排了精美的菜肴。后来，他们参观了吴哥，照了近百张相片。元帅还兴致盎然地出席了在金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新公园的开幕式。

在起草例行的联合公报时，出现了意外的事情。我根据自己的中立政策，要求对美帝国主义明确地表示谴责，对越南北方和越共所进行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铁托则坚持其共产主义立场，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只同意保留有关越南北方问题的一小段，不希望加上公开谴责美国（即便是不点

名)那些话。对支持越南那一部分，态度也很谨慎。为了取悦于我的这位贵宾，我“妥协”地接受了他所提的草案的主要内容。

我和乌尔德·达达赫总统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这友谊在我被政变所推翻以后也未泯灭。达达赫总统反对这个政变。一九七二年，他组织人民热烈地欢迎我。在努瓦克肖特，还放映了我赠送的，他成功地访问柬埔寨的彩色纪录片。

尼日尔的迪奥里·阿马尼总统于一九六九年访问柬埔寨，获得了很大成功。欢迎群众，特别是孩子们，一边热烈鼓掌，一边(用柬语)喊着“这个大个子黑人穿着一件大白袍，真有意思！”漂亮而有良好教养的迪奥里·阿马尼夫人好奇地问我的夫人，孩子们说的是什么。莫尼克把原意修饰之后回答说：“孩子们说，总统真有大贵人的风度！”迪奥里没有忘记高棉王国的盛情。在犹豫一段时间后，他不顾自己西方朋友的反对，于一九七二年承认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合法地位。

我觉得，海尔·塞拉西皇帝没有什么胆识。朗诺政变之后，他在北京对我说，他不能承认我的政府，并劝我祈求上帝帮助。他说“只有上帝可以为你做点事情。”

苏哈托，政变一发生就承认了朗诺政府。

崔庸健访问柬埔寨之后，在给金日成元帅的一份报告中赞扬我说：“在西哈努克的领导下，柬埔寨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第三世界众多国家中属于上等的。这个国家取得了显著进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马卡帕加尔对他在金边所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一直很感

动。但使他感到内疚的是，在他访问我们首都期间，未能调和我和他的美国朋友之间的关系。在双方会谈后，我为他举行了跳舞晚会，但他心不在焉，只与我夫人跳了一圈，而几个月前，在马尼拉时，他赞口不绝地夸奖莫尼克。

使我感到荣幸的是，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接受了我的建议，在吴哥同马卡帕加尔举行了首脑级会晤，讨论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国际新闻记者也随之纷至沓来。我在吴哥举行了传统舞会和烟火晚会，并且邀请来了艺术家库尔德·朱尔让、珀泰尔·奥图勒和在那里拍摄《洛德·金》的剧组。朱尔让对我很尊敬。奥图勒对我夺走了晚会的女主角耿耿于怀。他对《生活》杂志发泄了不满，说我“充好汉”，说我自以为是一个不可一世的鳄鱼（原文如此）。

一九六〇年，周恩来和他的助手陈毅是在我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驾崩时到来的。他们在我父亲遗体的脚下安放了两个巨大花篮，以示哀悼。他们乘王家海军炮舰游览了白马和贡布的沿海岛屿。通过富国岛（高棉人称为梭子岛）时，他们说这个岛无疑应属于柬埔寨，因为它就在柬埔寨领海之内，法国殖民主义者根本不应该把这个岛划给越南。两位伟大的中国朋友，对我的母后，按照他们的意愿准备的高棉式早餐倍加赞赏，连作为米粥香料的茉莉花都吃掉了。

一九六七年，杰奎琳·肯尼迪的访问，引起的国际反响最大。那时，我们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已有两年。许多外国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都蜂拥来到了柬埔寨。我敢断定，只有戴高乐将军（我将在下一章里介绍这位伟大的法国

国务活动家的这次访问)才能同杰奎琳拥有的宣传工具“相媲美。”

同许多人当时所想象的相反，杰奎琳·肯尼迪并未向我转来美国政府的任何书信、口信或别的信息，她只字未向我提起美国和柬埔寨之间的问题。每到一地，当人们以怀疑的态度问她时，她都直率地说，她只是想访问吴哥。在西哈努克城，她为以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剪了彩。她在金边，可以说是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但这两个城市都不如那神奇的吴哥那样吸引她。杰奎琳是一位文静的、贤慧的、风趣的女性，她一点也不懂得高棉语。而有一天，当我对她说，他们在向她热烈欢呼时，她却说：“亲王殿下：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些人欢迎的是您。他们不停高呼：桑岱欧！桑岱欧^①而这并不是我的名字呀。”

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间，虽然我正与美国进行斗争，但杰奎琳·肯尼迪仍坚持在每年九月三十一日向我祝贺生日。这样做的还有一个意大利贵族莱蒙多·奥西尼王子及另外很少几位有情感的人。

杰奎琳访问柬埔寨两年之后，当我到腊塔纳基里省的山区视察时，红色高棉煽动那里的山民们质问我，欢迎那个美国前总统的遗孀来访，目的是不是准备恢复柬埔寨与美帝国主义的外交关系……。

对哈蒂尼·苏加诺只需一句话：她太漂亮了，我们的大学生都为之倾倒。我理解他们……，这位富有魅力的妇人私下

^① “桑岱欧”是柬埔寨语国父亲王的意思。

对我说：在河内，她使胡志明主席承认自己并非圣人，也有过几段艳史。

我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比利时的利奥波德陛下和他的夫人李丽安娜王后。这些真正的大贵人却很随便，我和我的夫人陪这两位旧日的君主在吴哥和白马度过了难忘的时刻。在白马对面的一个岛上，我们甚至过起了塔西堤式的生活：大家都围着沙龙，而男人们都光着上半身。

李丽安娜很有教养，富于探求精神，很愿意同我争论政治问题。她很爱吃我们厨师做的“法国式”面包，并说除了法国，唯有柬埔寨才能做出真正的法国式面包，她吃得特别多。李丽安娜聪颖过人，不但讲究美食，而且是个体育爱好者，很喜欢驾驶汽车。我把我的“阿尔法·罗米欧”赛车给了她，她便在白马到贡布的公路上（大约二十公里）很娴熟地驾驶着，在那辆车上还有她丈夫——国王及莫尼克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和诺林德拉邦。我和我的夫人驾驶着另一辆车。到贡布后，我们在贡布河旁一个公园里找了条长凳随便地坐下来，在优美、宁静的环境里聊了很长时间。

我可以这样说，利奥波德国王特别有学问，他对世界政治形势，特别是亚洲形势分析得十分精辟，同时，他非常有诱惑力。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七九年，有一位公主——利奥波德和李丽安娜的女儿，到泰国来照料柬埔寨难民。

我和新加坡的李光耀关系很好，这位中国人的后裔，头脑清醒，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发誓将他的小国家变成秩序良好，繁荣昌盛的楷模。他赞同我面对着“列强”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从一九七〇年至今，他是东盟国家中不那么反

对西哈努克的领导人，同时也是我个人忠实的朋友。

真正的友谊的桂冠应属于苏加诺总统。这位前印度尼西亚独立英雄是一位爱美的纨绔子弟。他很喜欢穿着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长官的军装。但他并不象有些人那样令人发笑地将纪念章、勋章挂满胸前，而只是佩戴着一条彩绶。因为爱美，所以在公共场合，他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穆斯林帽子，以免露出他的秃顶。他有雄辩的口才，用协调的动人的格言来激励他的人民，也用来激励他自己。在许多年里，他的人民对他这位威望极高的领导人所讲的一切都表示热烈的欢迎。尤其是，他在柬埔寨用法语发表讲话时，至少表示要反对“人剥削人”。喜欢女人是他的癖好，虽然这种事情需要多年的时间，但他总能成功。他按古兰经的教义，娶了四房夫人：法特玛哇蒂、哈蒂妮、黛薇（她是日本人，在七十年代，成了社会活动的“火车头”）第四位就是哈尔雅蒂，她最年轻，但不太漂亮。苏加诺总爱在我夫人莫尼克身边，仿佛她就是他的王后了，反而让我亲切地陪着黑得象纯种高棉人一样的哈蒂妮。但哈蒂妮却不把我当作她的“可靠朋友”，因为苏加诺让我陪黛薇共进晚餐，又让我和哈尔雅蒂一起乘游艇。

一九六七年，苏加诺被苏哈托废黜，监禁在一个小别墅里，尽管倍受凌辱，又被病魔缠身，但他照样还娶了一个芳龄十六岁的女学生，真是至死也要做一个唐璜式的人物。他对我的感情始终如一。一九六九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他还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并赠我一把带有镶金象牙把儿的爪哇苏丹短剑，以表达对我的永恒友情。

戴高乐将军在逝世前两个星期，也亲笔题词把他的回忆录《希望》赠送给我……。

这两位伟大的朋友，他们离职之后和去世前不久，都看到了我被迫退出国际政治舞台的情景。

47

戴高乐将军与他的“金边演说”

西哈努克的柬埔寨和“戴高乐将军的法国”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很好的。自从一九四六年在科龙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起，我就始终不断地对这位伟大的法国爱国者十分钦佩。特别使我赞赏的是，当他的祖国处在最黑暗的时候，他对于恢复祖国的独立和强盛，始终充满着信心。他善于激发已经四分五裂了的法国人的热情，也善于劝说那些长期迟疑不决的同盟者承认他的合法性。

对于我的国家以及我本人，将军表现得十分谅解和友好。他是极少数能理解我对法国的独立政策怀着非常真挚和深切情感的法国人之一。对于我在对外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那怕是有些冒昧，甚至是过于大胆的行动，戴高乐将军都能认清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因而他始终给予我以支持。

一九六四年六月，我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将军给予我像对待友好大国的君主或国家元首那样的礼遇。戴高乐将军和夫人前往奥利机场迎接我和我的夫人。我进入巴黎时，没

有摩托车队护送，而是在共和国卫队的骑兵护卫下进入市区的。他们安排我们住在凯道赛，这是英国女王曾经住过的地方。在巴黎歌剧院举行的盛大晚会上，当节目进行到第二部分时，我国的芭蕾舞团为戴高乐将军和夫人成功地表演了我们最精湛的古典舞蹈。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个精彩的演出。

一九六六年八月末，戴高乐将军和夫人对柬埔寨进行回访性的正式访问。为了让高贵的客人在柬埔寨逗留期间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我们竭尽全力地进行筹备。然而，我国人民对法国总统夫妇所怀有的热情，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在波成东机场到王宫的十二公里长街上，几十万柬埔寨人和数以千计的华侨和越侨，当然还有在柬埔寨的法国人，密密层层地拥挤在街道两旁。当戴高乐将军站在敞蓬车上习惯地挥动双臂，向夹道欢迎的群众致意时，人群顿时欢呼雀跃，人们的感情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如果不是由于我们的同胞们具有那种天生的礼貌和纪律性，自动地让出一条通向王宫的路子，恐怕标兵们早就被冲散了。晚上，整个首都灯火辉煌，公园及其它游乐场所，到处都装饰着法国国旗的蓝、白、红三个颜色的霓虹灯。为了欢迎这位杰出的法国战士，我尽可能安排了非常隆重的活动日程。比较起来，大大超过了以往对其它国家元首的接待。

将军第一次接受了外国军衔，他被任命高棉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因为高棉的王家武装部队是从法国军队中派生出来的。此外，将军还成为我们首都的第一位荣誉公民，接受了一把金钥匙。我还赠给他一条独立钻石项链。他是第一位象

柬埔寨国王那样坐在金銮殿上接见外交使团的外国国家元首。还是他，是第一位在崭新的金边奥林匹克运动场上向十万群众发表演说的外国国家元首。不仅如此，金边的一条林荫大道和暹粒到吴哥的一条最漂亮的大街，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桑园，戴高乐将军为一座专门接待国家元首的新的国宾馆的落成典礼剪了彩。

戴高乐将军和夫人下榻在克马林宫里已修得相当现代化的套间里，这里是我们的先王们曾居住过的宫殿。他们不在餐厅里用餐，而是要求在靠近他的办公室的小房间里摆上一张两人用的餐桌。这里，曾发生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在一次家庭式的晚宴上，将军觉得小豌豆（当然是法国的）炖高棉雏鸽很好吃。当人家给他上第二只雏鸽（这东西很好吃，但很小）时，将军很有礼貌地问夫人是否可再吃，夫人想了好一会儿才表示同意。

国宴是在桑园宫举行的，桌上都是镀金的银器餐具，金线刺绣的台布和餐巾，王宫乐队奏的是维也纳圆舞曲。将军在宴席上滔滔不绝地向我夫人讲述着他年轻时的往事，也就是他还是个少尉时候的事情。

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上，戴高乐将军发表了著名的《金边演说》。他和他的夫人观看了有两万小学生表演的组字团体操。这种团体操我已在前面介绍过了。这位伟大的战士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给他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他的巨幅肖象，还有一面巨大的法国国旗和《法兰西万岁》的标语，使将军惊叹不已。那些孩子们在辅导员出色的指挥下，每幅“图案”都排得分毫不差，恰到好处。随后，千余

名和尚为将军诵经，赞美他的胜利和他的光荣。

戴高乐将军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阐述了他对今后形势的看法。他的讲话不断被会法语的青年人的欢呼声所打断。我要在此摘引几个主要段落：

我谨向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在他伟大的首都为我们举行如此盛大的欢迎仪式，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柬埔寨人民特别表现出来的对我的最高信任和对法国怀有的深切友情。

柬埔寨和法国之间，尽管血统不同，地区有别，但我们还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有着一部既光荣又悲惨的历史；都有着精湛的文化和艺术；都有着肥沃的土地和脆弱的边界，受到有野心的邻国所包围，因而始终存在着危险。

一个世纪前，我们两国的命运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结合在一起，法国帮助柬埔寨维护领土完整，而法国也从中得到了有益的帮助。后来，根据双方一致同意，两国分别掌握各自的主权，这就为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使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比以往更加相互尊重，相互友好。对我们法国人来说，我们认为，柬埔寨十三年来恢复了自力更生的立场，这就是这种互相尊重和友好的有力的证明。我们看到，尽管它遇到了许多严重的困难，但这个王国仍能完全维护了自己的风格，尊严和独立，为他们所在的世界、这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做出了贡献。

我们也亲眼看到，在亲王殿下强有力的推动下，柬埔寨

国内有了巨大的发展；兴办了数以百计的学校、医院和门诊所；建立了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兴修了数千公里的大小公路；经营着数万公顷的种植园。这一切都是柬埔寨自己的工程师、专家和劳动者所创造的，完全表明了个国家一年比一年更有气魄，一年比一年更加发展。

贵国政府将“柬埔寨自力更生”所挣得的外汇都用在各个工程上，理所当然地使高棉人民感到自豪，也使其它国家人民找到了令人鼓舞的榜样。此外，我们还看到，由于全国人民如此努力，你们国家绝不会走回头路，再次求助于法国的语言和文化，求助于法国的教师、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和工业企业家等等。为了自力自强，充分利用外来援助，使其服从自己的愿望合理地满足国内建设的需要，并直接为国家服务。总之，我们看到柬埔寨既忠实地继承了自己的历史传统，又断然地建设自己的现代化文明。由于国内出现了空前的稳定，它还逐步朝着有利于子孙后代的方向实现引人注目的转化。

当王国正在顺利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它怎么会希望边境上发生造成大量伤亡、以致破坏自己的前途的战争呢？

高棉国家元首对这些不幸事件是有预见的，并指出了只要通过诚意的协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签订之后，柬埔寨勇敢而清醒地选择了中立政策。这在日内瓦协议中已写明了的。协议还规定，法国撤离之后，应该避免各种敌对势力和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把印度支那变成他们互相争夺的地方，同时，也不能因此引来美日的干涉。正因为你们国家坚持了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立场，所以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努力只能停留在越

南。因此，这里重新发生的战争便成了民族抵抗战争了。

那么，面对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我在这里声明，法国完全赞同柬埔寨为避免冲突所进行的努力，同时，我们将继续给柬埔寨以支持和援助。

只要世界上没有遇到严重的祸灾，只有签订政治协定才能够恢复和平。当然，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只有象一九五四年协议那样的协定，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即恢复和保证印度支那人民的中立，让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有权处理自己的事务。

总之，如果没有这样的协定，任何一种调停都是徒劳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提出其他建议的原因。唯有金边是我表达这种态度和愿望的最好地方，柬埔寨方面也是这么考虑的，因为处在四分五裂的印度支那中间的柬埔寨王国已成为统一和独立的模范，因为现在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强烈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生命力，也因为这里更能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

柬埔寨万岁！

戴高乐将军和夫人用了较长时间游览了古迹。客人们被高棉的文化深深的吸引住了。他们和吴哥的主管法国远东研究所的贝尔纳·格罗埃先生进行了饶有风趣的讨论。戴高乐将军特别对吴哥的建造者们如何解决材料问题得出了明确的判断。

在古老的吴哥窟里，我为他举行了“声与光”文艺晚会，场面十分壮观，前所未有。探照灯照亮了阴暗的塔面，每个

场景”都站立着一位身穿黄袈裟的僧人。这时，“画外音”讲述着我们文明历史。在古典音乐声中，数百名身着古代武士服的人，骑在几十头大象背上，从浩瀚的森林中走出来，成纵队地行进在吴哥，犹如几个世纪前高棉国王的仪仗队。最精彩的节目是，王家古典音乐舞蹈。我们的两个儿童身着金丝织品，扮演着未参加今天盛大晚会的国王和王后。将军为我们这种怀古的表演所深深激动，连声赞道：“太出色了！真是神话般的意境！”

说实话，有一部分为数很少的高棉人，在戴高乐将军和夫人离开后，才真正地松了口气。这就是那些负完全责任的人员……将军喜欢到人群中去。有时，当欢迎群众在途中向他欢呼时，未经我们安排，他就停下来了。他还弯下高大的身躯从欢迎他的标语牌和小旗下面钻过去，向人们一一致意，直到最后一排。无数的青年人都希望和他握握手，或抱他的腿，他总是尽力使他们满意。这当然使得维持秩序的人累得精疲力尽。晚上，便衣警察都要在贵宾下榻的地方筑成个警戒圈。我们的保安大臣古伦先生说他本人不止一次地到总统的窗下去“蹲坑”。

在本章的结尾，我要向读者们透露一下，一九六四年在爱丽舍宫个别会谈时，戴高乐将军对我说这么一句话：“殿下，你要当心美国人，他们很可能会做出许多伤害你的事。”几年后，他的预言应验了，尼克松利用高棉人把我“罢黜”了。如果戴高乐还掌权的话，法国一定会把反对我的阴谋告诉我；然而，当时他知道此事，却……。

48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九年的国家建设总结

国家建设就是一个政府或一种制度，在经济社会事务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总和。我党——人民社会同盟成立于一九五五年，并于当年掌握了国家政权，直至一九六九年八月，接着，国家政权落入了朗诺、施里马达集团手里。一九七〇年三月，我便被废黜了。

从三月十八日政变起，柬埔寨某些“大知识分子”和西方某些“观察家”肯定地认为，西哈努克时期的柬埔寨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取得任何发展，而经济方面更是严重衰退。有些同胞甚至还说我所执行的是一种“蒙昧主义”政策，使我国人民处于无知的状态中。然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却给我国政府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以表彰我国政府在国民教育和扫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的确，人民社会同盟执政时期所创办的中学、学院和大学，在“高棉共和国”政府执政期间变成了兵营，或者由于缺乏教师和学生而被关闭。

	一九五五年	一九六八年
I 公共教育		
小学校	2,731 所	5,857 所
小学生	311,000 人	1,025,000 人
中学校(包括私立中学)	12所	180所
中学生	5,300 人	117,000 人
技术学校(包括职业学校)	5所	99所
专科学生	334人	7,400 人
大学(或学院)	2所	48所
大学生	347人	10,800 人
II 公共卫生		
医院	16所	59所
医务所、门诊部和妇产医院	103所	553所
药房和药品店	24处	358处
III 农业		
大米	1,484,000吨	3,251,000吨
橡胶	25,000 吨	51,000 吨
合作社	0个	728个
灌溉面积	29,000 公顷	264,000 公顷
大水库	10个	63个
水库蓄水量	14,000 万立方米	29,400 万立方米
堤坝总长		552公里
灌溉渠道		1,510 公里
IV 交通运输		
公路及可通车的小路总长	4,805 公里 (其中有柏油路 1,603 公里)	16,697 公里 (其中有柏油路 2,175 公里)
钢骨水泥桥	875座	1005座
钢铁桥	120座	164座
木桥	1,100 座	1,853 座

● 铁路	386公里	665公里
国际港口	1个(金边)	2个(金边和西哈努克港)
国际机场	1个(金边波成东)	2个(金边和暹粒)
国家级机场	1个	4个(磅湛, 马德望, 上丁和西哈努克市)
省级机场	15个	21个
V 工业		
国营工厂	0	28家
合营工厂	0	29家
中小私营工业企业	650家	3,700家
VI 电业		
发电量	11,055 千瓦	70,000 千瓦
1968年建成的第一座水力发电厂		10,000 千瓦

人民体育的飞跃

为了发展王国的体育事业，我党——人民社会同盟作了很大的努力。六十年代初，我们修建了四十多个省级体育场，几百个足球、篮球和排球场，还有许多游泳池。这些体育活动场地很快就成了年轻人的天下。一九六四年，金边一个很大、很现代化的国家综合体育场落成。这个体育场里还包括一个奥林匹克运动场。在举行大型活动时，整个体育场可容纳六至八万名观众。一九六六年，在欢迎戴高乐将军时，这里举行了十万人的群众大会，虽然很拥挤，但气氛非常好。“亚新运会”（反帝进步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时候，观众也是非常拥挤的。

为了测定一下柬埔寨体育运动的水平，即使不同世界水平相比，至少也要同亚洲水平比一下。我们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派出的国家级优秀运动员到金边参加这次运动会的成績作个比较。诸允许我列举几个数字，这些既表明了某些大国的雄心（合法的），也可以看出柬埔寨的实力。

我们派出的田径运动员是 332 人；中国 208 人；朝鲜 201 人；北越 106 人；巴勒斯坦 59 人；印度尼西亚 51 人；日本（进步的）49 人；伊拉克 47 人；锡兰 35 人；也门 28 人；黎巴嫩、新加坡和叙利亚各 27 人；尼泊尔 20 人；老挝 16 人；蒙古 10 人。

从获得奖牌的情况来看，柬埔寨王国仅次于中国，和北朝鲜并列第二。从得到金牌的数量来看，柬埔寨只落在中国和朝鲜后面，但却远远超过了越南。同巨大的中国那些训练有素的优秀运动员比赛，能获得 13 枚金牌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绩了。这些金牌证实了我国运动员在下面这些项目中的实力：游泳（男子 100 米仰泳，男子 200 米仰泳，女子 200 米仰泳）；田径（女子标枪）；自行车（两项赛场短途项目、200 公里公路赛、女子 54 公里团体赛、女子 24 公里个人赛）；拳击（最轻量级、轻量级）；赛艇（多桨小快艇）；网球（男子双打）。

我要指出的是，中国所有的男女优秀运动员都来到了金边，特别是世界男子跳高纪录保持者倪志钦以及男女乒乓球优秀运动员。下面我向读者们公布一下金边“亚新运会”获得奖牌的名次：

国 名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	113	58	37	20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30	40	34	104
柬埔寨王国	13	34	57	104
日本(进步工人代表队)	10	13	8	31
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	4	11	14	29
印度尼西亚	7	9	5	21
伊拉克	2	9	7	13
黎巴嫩	3	3	7	13
巴勒斯坦	1	3	3	7
叙利亚	2	3		5

六十年代，柬埔寨在训练学生进行组字运动方面，仅次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亚洲最先进国家之一。回顾一下这一历史不是没有用的。

优秀作家兼著名的体育日报《体育运动队》报赫赫有名的记者居伊·拉戈斯对这次运动会作了热情的、令人惊叹的描绘。请允许我简要地引用他的文章中的几段话：“开幕仪式非常隆重。规模之大，令人赞叹不已。整个过程的组织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大型团体操异常优美，这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两万名少年组成了彩色图案、人物肖像、镶嵌艺术，栩栩如生的画面，犹如真正的壮丽景色。开幕式持续了四个小时，一直到了天黑，接着，是盛大的、令人难忘的、五色斑斓的焰火晚会。体育场挤满了十二万名观众，真是叫人赞叹不已！”

居伊·拉戈斯的文章的结尾是：“最后，是规模巨大的闭

幕仪式，五彩缤纷的焰火，欢腾的人群。各国代表队互相冲散了队伍，友好地混杂在一起，他们成群地相互拥抱，有的还跑到主席台上拥抱西哈努克亲王。他们跳舞，唱歌，象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员一样，饱尝着生活之乐趣。”

三洛发生过群众暴动吗？

“三洛事件”引起很大轰动。它已成了某些外国人用来编造传奇故事的材料。如果我冒昧地说，它已经被编入我执政时期的历史中。

一九六七年二月，当我在法国治病的时候，马德望省南部三洛地区居民中某些分子，进攻了王家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营地和省保安队的一些小据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象多次被一些外国人所说和所写的那样，它是一次“高棉农民暴动”，是一次矛头指向我们的“扎克雷起义”呢？

朗诺担任首相时，当时的政府代表在这个地区犯了一些错误，我对此并不否认。在四月底，我要求朗诺辞职，撤换了许多不称职的官员，组成了一个“特别政府”。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局势就平静下来了。但是，我坚决否认，这次事件是一次“群众暴动”。

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我党的机关报上，我对于三洛事件是这样写的：“马德望省这个地区的人民一点也不苦，象所有边远地区的居民一样，他们都拥有肥沃的土地（每户约有二至五公顷土地）、有完备的住房、足够的耕畜、家畜、农具和

种子。我敢相信，象柬埔寨这样给农业小生产者做这么多的事情，在世界上还是少有的。另外，在这个地区里，公路四通八达，还建立了学校、医务所和合作社。在这样的条件下，是绝不可能发生扎克雷起义的。但是，这个省曾被越南占领了许多年，而且越南当局一直注意向某些人灌输他们的思想，并同这些人从未间断地保持着联系。就是这些人手里拿着武器，并配备了一些离开讲台的教师和“失踪”的议员为干部，对群众以死相威胁，迫使他们离开村庄到深山老林里去生活。”

对于三洛事件，我无论如何也要向读者们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1) 在一九六七年的时候，惹起农民们的不满情绪，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何况这些农民是我最忠诚的拥护者，他们直到一九七九、一九八零年仍然不顾一切地继续支持我。

2) 一九七〇年，当朗诺发动政变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优秀分子”争先恐后地抛弃了我，而这些农民（唯有他们）为了我而起来反抗，直至最后倒在朗诺军队的机枪口下。

3) 不管红色高棉的“辩护士”们怎么说，实际上，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五年的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后来成为“革命军”），是由于亲西哈努克的农民们的不断加入才能得到补充和壮大的。

4)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间，到泰国难民营采访的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记者们，都承认我的绝大部分同胞仍旧坚决地拥护我。

青年、知识分子和我

我想起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即在我被朗诺分子罢黜前几个月，我在位于王宫前四臂湾上的“浮宫”主持了传统的送水节。事毕，当我离开那里时，数万名年轻人向我热烈欢呼，挡住我的车路，还跑过来拥抱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这样地对待我的继位者——共和分子。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间，当我探望在法国避难的同胞们时，我高兴地察觉到在那里避难的知识分子，有百分之八十（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体力劳动者）全力支持我，还和从前一样地热爱我。但是当时，只要有一小撮文人通过宣传工具批评我，“观察家”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青年人和优秀分子当中，我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支持……这种思想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很久以来我就是这种思想的受害者。

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针对高棉共产党（人民派）指责我虐待知识分子和进步分子的问题，我在我的党报上进行了辩别。我着重指出：

有些人，当他们在巴黎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山玉成的党或越盟组织，公开反对王室和国王，粗鲁地辱骂王室，甚至宣称要废黜国王（当然他们是不会征求我国人民的意见的）。

回到柬埔寨后，他们从来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更没有被关进监狱。

还是这些大学生，在一九五五年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和人民派，反对王室西哈努克。他们对青年和人民说：“你们不能投人民社会同盟的票，因为它是为君主制度、王公贵族及其代表们卑鄙的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原文如此）

他们还说：“君主制度是卖国的。就是这些君主们，从诺罗敦到西哈努克都向法国人出卖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他们还接着说：“即使是现在，王国政府把人民经过斗争、流血牺牲和通过日内瓦会议获得的民族独立当成廉价物，出卖给了美帝国主义。”

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你们投人民社会同盟的票，它将同样会把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上获得的中立出卖给美国人，人民将同在黑暗的封建时期一样受到压迫，青年将会陷入极端愚昧的境地”。（原文如此）

在这帮大肆侮辱和诽谤王室和王国政府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受到追究更不用说早已不掌握政权的西哈努克和人民社会同盟了。

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些粗野的批评家们，一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社会同盟还让他们当了议员和大臣。

请我们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们作出回答，在非洲和亚洲其它中立国家或者在共产党国家里，人家能够让反对派知识分子随便批评和指责已经确立的制度吗？人家能够象人民社会同盟一样，为了“酬劳”这些人而让他们当议员，或大臣吗？

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里，情况当然不一样，他们用烧毁

学校的办法，来惩罚那些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的大学生。有的国家，甚至把佛教僧侣关进监狱，等等。

唯一被人民社会同盟捉进监狱的知识分子，是山玉成的忠实信徒游扬先生，因为他犯有叛国罪。但游扬先生承认，监禁他的监狱所执行的制度是非常温和的。他可以接见任何一个他想见的人，包括他的家属在内，而且还可以继续在法学院学习。虽然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很快得到了国家元首的赦免，而且是带着法学博士文凭出监狱的。

在人民派看来，“左派”知识分子受到了人民社会同盟的虐待。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人民社会同盟给他们带来了哪些遭遇。

胡荣、符宁和乔森潘先生是继农顺之后，被磅湛和桔井的小红色分子们推举为他们的鼓动者和领导者，但一直没有被追究。人民社会同盟还让他们当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虽然他们的选民多次向国家元首提出了异议，要求取消他们的权责（特别是对胡荣先生更是这样），但他们还是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运动确定为国会议员。

《电讯报》等进步刊物，从来就没有被封闭。它们的领导人都被安排了很高的职位。狄秋根同事是政府新闻社社长。周成同事多次担任大臣以后，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办公厅主任（是国家元首的左右手），成了领导集团中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人物之一。

在政府内阁中，有很大一部分职位都安排了年轻知识分子。在这些人当中，苏南和周索等人，如果不是“红色”，也是

“粉红色”的，而根本就不是西哈努克的“亲信”。许多有这种倾向的知识分子至今还担任着最高的行政职务，仅从教育界方面来说，他们是公立中学的校长，学院的院长，甚至是大学的校长。

目前，国家元首正在强调要发挥“年轻”知识分子固有的作用。他们已经占据着或将要占据大部分的经济要害部门、国家机关以及城市警察署。我们并没有只限于资本家阶层。

访问过我国的法国、日本、印度、中国等国的政治家，对我国把重要的职位交给年轻人，时常向我表示惊讶和赞赏。他们说，这在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做到，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也还没有做到。

人民社会同盟是非常宽容的，它甚至尊重拒绝承认它的人。即使我本人，也还和共产党的高棉学生联合会继续热情地互换贺信。如果这些大学生属于第三世界其它国家的话，他们就会被召回国内受审，如果他们拒绝，他们的护照就会被吊销，也可能被取消国籍。

即使这样毫无差错地去做，人民社会同盟还是被人民派说成是青年人、知识分子的最坏的敌人，尤其是进步人士的敌人。

这个党的政论家们毫不犹豫地写出了如下的号召，我把这个号召逐字逐句地从柬文翻译过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要求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必要的、健康的和平等的社会。”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被剥削阶级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无情的斗争。”

“革命党人应该经受一切考验，经受帝国主义的走狗们（在人民派看来，包括西哈努克在内的人民社会同盟的盟员们，都是无可辩驳的美国走狗。——西哈努克注）和当权阶级（我认为，很多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都属于当权阶级——西哈努克注）所造成的一切苦难”。

“这些苦难不是永恒的，革命必须象马克思（原文如此）和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去战胜它们”（因此，我国的红色分子把我们看成同“白”俄罗斯极为凶恶的沙皇一样坏。——西哈努克注）

“尽管这些帝国主义走狗们指责我们是红色叛国分子和左派破坏分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丧失勇气”“决不应该屈从于当前的当权者的要求（原文如此），（这些“要求”只要大家都成为一个坚定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西哈努克注）也不要过于相信西哈努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注意的。”

“表面上似乎是风平浪静的柬埔寨，需要进行一场反对在国内横行霸道的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因为他们正在任意地虐待进步分子和知识分子。”（如上面所述——西哈努克注）

“为了革命事业，每一个党员在斗争中，都应该保持冷静。”

因此可以说，对我国红色分子来说，为了马克思列宁的事业，必须同时考虑他们自己祖国的安宁与和平。

一九七〇年三月，朗诺分子说，有几千名所谓的“西哈努

克反对派”（据说）被西哈努克“关押”起来了，这和所谓的西哈努克“屠杀”红色高棉知识分子，同样是一种诽谤。我在我的报纸上所肯定的东西，已被一些生动的例子所证实了：交趾支那的柬埔寨人、药理学教授、生物学家石端先生，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给我的信中写道：“有幸地生活在柬埔寨这个复兴时期，我才能满怀激情地参加我们祖国的改革。我之所以能够获得大学的职衔这完全由于我们的人民社会同盟长期有效地执行了国家建设的政策。我只不过是享受了这一政策已经成熟了的果实。请允许我向您——尊敬的国父亲王、现代化柬埔寨之父——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九日的《日内瓦日报》上，让·巴雷再一次地用这样的词汇着重指出，我党和我本人在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西哈努克连续不断地为人民社会同盟——民族主义和佛教的联盟（西哈努克是它的创建人和领袖）的最新成果举行落成典礼（邀请了外交官和记者）。其中有：一所规模很大的技术大学（茶胶、贡布）；马德望的一个机场和一家土厂；金边的一所很大的大学和一座宽敞的国家剧院；西哈努克城的一个炼油厂、一个啤酒厂和一家大旅馆。西哈努克每次接受记者采访，都要持续几个小时。他曾在金边奥林匹克运动场内主持召开了有十万年轻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博得了阵阵的欢呼声。他每天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

曾在柬埔寨生活过的法国人让·克拉沃德夫妇，一九六八年在巴黎地区的一家报纸上提到，在放弃美国援助之后，我们国家还在继续进行国家建设。他们下面这几句，是帮我说了公道话的：“……当我们在法国度完六个月的假期之后，

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回到柬埔寨时，这个国家刚刚宣布放弃美国援助。有许多专门预卜祸福的预言家们说，灾难即将来临，‘三个月之后，柬埔寨将要重新回到石器时代。’然而，这个国家不但没有向后倒退，而是按照自己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自己竭尽全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柬埔寨只有一个方面是落后的，那就是盗窃、凶杀和土匪。对我们来说，我们对此并不抱怨。

一九六八年，保罗·格兰姆斯先生对人民社会同盟的柬埔寨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在《费城晚报》和《星期日报》上发表了文章。他自己说是要尽力做到“准确地、诚实地和客观地来报导”。下面我引用了他用英文写的这篇文章中的一段：

“金边可以称是一个拥有六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在不到十五年里，作为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把这个不引人注意的法国殖民地时代的后方，变成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国都。它的主要街道都是用柬埔寨历史上杰出人物，友好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知名人士，如戴高乐和毛泽东等人的名子来命名的。与其它亚洲国家首都相比较，金边比较安宁，秩序井然，对美国人也很友好。在许多西方人眼里，西哈努克似乎变化无常，在两个大阵营之间采取了左右逢源的立场。但柬埔寨人和许多了解内情的西方人认为，他的理论基础是民族主义，他从未背离过这一点。为了让他的六百二十万人民强大和统一起来，他建立了数百所医院和学校。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把这个沉睡的滨河城市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都。许多公路建设都有助于农业和大森林的开发。”

至于人民社会同盟的反对派所喜欢听到的腐败方面的问题，格兰姆斯先生是这么写的：“……每个人似乎都承认，如果与亚洲其它国家相比，这种滥用职权（由于腐败所致）的现象，在柬埔寨也许是有限的。”

高棉和外国破坏分子

人们都知道，我在困难的国际条件下，是怎样为我国的发展而工作的。

为了破坏我们的建设，美国和南越真是竭尽了他们的一切可能。他们经常使用的手段是，侵扰我们的边境。但人们还不太了解泰国是怎样厚颜无耻地投入这一破坏活动中去的。一九六七年，王家部队粉碎了在柬埔寨领土上活动的一支由泰国军民混合组成的特别分队，这些人由于得到了山玉成的自由高棉的同意（是地地道道的出卖），为了泰国人的社会利益，定期到与泰国交界的梅莱山地区来伐木。

这些泰国人不仅采用最现代化的机械来采伐这个地区的林木，而且还在那里修路以便把他们砍伐的木材运回他们的国家。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中尉指挥官和两个泰国保安系统的士兵负责和自由高棉叛国分子保持联系。在他们的指挥下，一百来个泰国老百姓成了他们的奴隶，充当他们的卡车和推土机驾驶员以及伐木工等等。

事实上，泰国当局完全蔑视我国的主权，吞并了高棉的梅莱山地区。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其它的边境地区也将被我们的邻居所“经营”，我们政府将对这些地区失去控

制。一九六九年八月七日，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曾就这个问题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作了详细的报告。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七九年泰国又支持红色高棉——对十二年前三洛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在同一个梅莱山地区合法地建立了他们的大本营。

49

我的电影

读者们大概都知道我“拍”了许多部片子，至少某些片子在西方国家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评介”。我要详细地解释一下，作为一个电影酷爱者，我为什么和怎样成为电影制片人的。起初，往往在片子拍到一半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时我不仅是电影编剧和导演，还经常扮演我的作品中的主要角色。

当这些片子放映时，我遭到了电影评论家们的批判，或者至少是被当真地讽刺一下。但到一九八〇年，我得到了证实，对我并没有好感的逃难的同胞和外国人都一致地认为我的片子（“标准化”的三十五毫米的彩色影片）都是美丽的柬埔寨无可替代的见证，它们使人迷恋着当时那种安宁生活的快乐。可叹的是，即使经过很多年的努力和牺牲之后，有一天柬埔寨恢复和平的话，也不会有当时那种快乐的生活了。因此，当我联想到柬埔寨的丢失，就感到这些纪实性片子在今天起到了一个历史资料的作用。

从一九七五年初，由于预感到红色高棉的“革命”将从根本上来改变我国，所以我就以个人名义从北京给美国总统

杰拉尔德·福特先生寄去了一封信，要求他劝说高棉共和国政府，请他们把我一九七〇年留在金边的三十五毫米影片归还给我。在这封信中，我对福特先生说，我们应该把政治问题暂搁置一次，先尽力设法去抢救我的影片吧。福特要他在北京的代表布什先生来见我。但是当时坚定地站在反美立场上的我，有充足的理由担心这是一个政治陷阱。于是，我便托词给予婉言拒绝了。几个星期之后，红色高棉开进了金边。后来，我才觉察到，“共和分子”和一些人毁坏了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我的一切财产。

幸运的是，在茹安维尔的电影制片厂里，我的一些片子还在继续印制，并在进行后期录音，多亏他们还好意地送给我一些拷贝。另一方面，在朗诺政权倒台前夕，法国终于承认我的王国政府，高棉共和国大使馆又暂时变成了柬埔寨王国大使馆。这个使馆赶紧把我制作的一些片子归还给我，这些片子有的放在地窖里发霉了。

一九七九年底，我们在巴黎和法国其它省的同胞们以及许多法国人和外国人（其中有埃及前国王法鲁克陛下之子，流亡国外的埃及国王富阿德）都激动地感到，一九七〇年前的柬埔寨是很可爱和吸引人的。

读者们将很愿意读到《我的电影》这一章中所附上的这么一段话：

一九四一年，我十八岁半时登上了王位，我对电影产生较深的癖好，是从我登基之后开始的，至于对电影的喜爱，那就更早些了。当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我父母每个星期四和

星期日早晨都要带我到电影放映厅去看电影。我生活在（请允许我这样回忆它）一个爱好各种各样艺术的家庭之中。

我的杰出的祖先，安东陛下特别会写诗，有的还写成了诗歌形式的剧本（最受欢迎的是《不贞的王后朵凯》）。

诺罗敦家族的始祖诺罗敦国王陛下，是高棉古典舞蹈复兴的真正创始者。十五世纪，吴哥文化由于暹罗侵略者的占领而开始衰退。我们可以说，暹罗侵略者从吴哥抢走了它的文化、它的音乐和舞蹈。十九世纪，诺罗敦国王陛下从曼谷请来了有高棉血统的古典芭蕾舞大师，使古典芭蕾舞在金边得到复苏。

我的可尊敬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陛下是一位词人，写了很多高棉歌曲的歌词。这些歌词有的是配“萨克瓦”曲牌（在送水节的时候）演唱的，有的是供剧团合唱队演唱（用来为古典芭蕾舞伴唱，或为解释舞蹈家的动作而演唱）。原来的歌词全部是暹罗语的，莫尼旺国王陛下把它们翻译成柬语并增加了适合于歌唱的新诗词。这些御词和御诗一直被宫廷歌唱家们用来在送水节时演唱或为古典舞蹈伴唱。

我的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陛下，是音乐家（擅长吹笛子、萨克管）和作曲家。我们应该象他那样继承和纯洁高棉古典的和民间的乐曲。从前，这些乐曲是通过口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后来，多亏我们的最后一位国王，他采用了音符和欧洲式的记谱方法保持了这些乐曲的纯洁性。

我母亲王后陛下，以古典芭蕾舞和高棉传统舞蹈发展的保护者和传授者而著称。但人们还不知道，她年轻时也曾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善于用高棉笛子演奏乐曲，有时也演奏

手风琴。

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怎能使我不喜欢音乐、舞蹈和别的艺术呢？我的父母谈不上是电影艺术家，但至少是电影爱好者。直至当时，在她的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母亲不断地叫人在家里放映一些好的外国电影。为了鼓励国内电影事业的发展，她还叫人放映一些柬埔寨片子，尽管其中有些片子还很不成功。

一直到一九四一年，我当上国王之后，自己才有足够的钱买一台电影摄影机、一些电影胶片 and 一幅电影屏幕。从此以后，我就不断地拍摄电影，但由于下列两个原因，我的片子（谦虚地讲）没有受到国际观察家们的注意：一方面，在王国的独立运动之前，我在国外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另一方面，我只满足于在“家庭”放映厅里（仅仅为我周围的人）放映十六毫米的柯达短片。《仙女》是我第一部采用“标准化”的规格和手法摄制的片子。

方式上的变化，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国产片一直没有能够摆脱即兴编写和“临时修改”的阶段，特别是还停留在纯粹的“商业性”阶段，因而它还没有被承认是一种艺术。此外，我担任主席的全国互助慈善机构，也缺少资金来帮助越来越多的在（所谓）越南战争中遭受灾难的家庭。因此，我的影片的收入将可用来接济他们。

一九四一年前，我是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大学生，所以我仅仅满足于在童子军内部组织演戏（我是剧社和营火会方面的负责人）。

大家知道，我跟被我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的那些

人——也就是说，首先是同美国人的关系从来就不好（包括政治方面在内）。有的人有时对我的电影公司取名叫“马克拉·皮丘尔”^①感到惊奇。他们说“皮丘尔”这个名称就很美国化了。

事实上，可以追溯到我的青年时代。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即我当国王的那一年，只是通过它的电影，我才知道有个美国的。我对格里塔·加博、诺马·希勒、米尔纳·洛伊、罗伯特·蒙哥马利、加里·库珀、克拉克·加布尔以及西方电影着了迷。这仅仅是为了纪念那个时候，当我的电影公司（私营的）需要取名时，我才给它取一个有点“美国化”的名字。出于同样的（感情上的）道理，我给现在我担任总经理的国家电影公司（国营的）取了同样的名称。

另外，某些人对我拒绝我的影片商业化的建议感到惊讶。我的片子是由美国和欧洲的电影发行者替我介绍出去的。在当时，这大概是让人了解和欣赏柬埔寨的极好机会——这是我拍电影的根本目的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一点上迟疑不决。我拍的电影，其文化性和宣传性要大于商业性。除此之外，这些片子的特点就是十足的“高棉化”，以便使许多外国观众都能了解。在一次内部电影联欢会上，我的朋友勒内·拉波特的父母看了《吴哥的阴影》和《黄昏》之后，对这两部片子给予肯定的评价，他们问我的同事尤·巴纳卡，为什么这些片子没有商品性，同时还认为这些片子大概比在巴黎各区放映的片子还要好。

^① 克马拉是柬语高棉的意思。皮丘尔是英语电影的意思。

我并不认为，由于承认我的片子比来自奇奈契塔(意大利电影城)的某些西方二流片子或从香港、台北进口的与史实不相符的片子高出一个等级，就是一种不谦虚的表现。但是，提出让我的片子在国外商品化，这是没有为所有的人着想，而只是为了少数人。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倒不是金钱收入问题，因为这方面一点也不使我感到担心。使我担心的是被观众们品头论足，拿它来开玩笑，还可能会吹口哨喝倒彩，因为观众自以为花钱买了门票就可以这么做。这样做，将很可能产生与预期目的截然相反的结果。比如，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就很可能发生：在美国，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物，所以那里的报刊已经形容我的片子是“枯燥沉闷的样板”。

再说，在西方我只能同私营企业谈生意。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这些私营企业不但没有给我赠送“礼物”，而且还险些把我的片子的商业价格下降到最低限度。几年以前，新加坡的一家公司愿意出一千英镑，按当时币值相当于柬币十万瑞尔（或者一万法朗）向我购买《快乐的森林》这部片子的制片权（全部的，无限期的）。这家公司还（慷慨地）提出，如果出现亏损的情况，完全由他们负担。然而，仅仅在金边，《快乐的森林》就给我带来了二百多万瑞尔！

这些波折并不意味着我的片子没有服务于我所提出的目的：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柬埔寨。事实上，我的片子越来越多地在外面流转，只是在商业的圈子之外。我的片子也越来越多地被送到盛大的联欢节上放映，特别是在“非竞赛性”活动中。

我的长片子《快乐的森林》、《小王子》、《吴哥的阴影》、《黄昏》都曾在莫斯科、塔什干和新德里的联欢节上放映。《快乐的森林》在世界上流传，首先是在布拉格，然后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为巴勒斯坦难民募捐），雅加达（共三次、其中二次是公映）、美国（在一些大学里）。在莫斯科，《快乐的森林》获得了苏联作曲家协会颁发的音乐奖，并和《小王子》一起在香港节日期间上映。《小王子》还被推荐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我相信《黄昏》也同样会被推荐到那里去的。

我的短片成功地参加了欧洲国际电影联欢节（并获得了重要奖）。

所有的影片所带来的只有对柬埔寨的尊重和钦佩，因为这些片子只是为那些能理解它们的人放映的，有：西方和不结盟国家的优秀人物，社会主义国家中那些有艺术修养的领导人和劳动者。另一方面，这些片子要么是免费放映，要么就是用来作为文化交流而放映的，再就是为友好国家的社会福利而组织放映的。从流通和经营的角度来讲，我的片子要比重商主义强得多。重商主义仅仅是让那些没有教养的付了钱的观众对他们的片子进行侮辱。

总之，我必须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使我的片子在有限的国际范围内流转，这样做可以替柬埔寨带来了值得注意的利益；要么让我的片子广泛地进行商业性的流转，但这种做法将冒着有损于我国尊严的危险。我当然选择了第一种办法。这种选择虽然限制了我同广大群众的关系，但却可以使我接触到那些优秀人物，并且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了我国的最大利益，争取到了群众。

象《黄昏》这样一部会招来批评的片子（而且是出自于西方人），也得以在世界各地更多地流转。

这些片子受欢迎的情况怎样呢？在美国，由于政治原因多于艺术的原因，所以总的来讲，情况非常差。在法国，意见是不一致的。请允许我摘引杰出的、有独到见解的评论家让·德巴隆塞里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金边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之后发表的：

“金边，……十二月×日电——在四臂湾之滨，即在浩瀚的湄公河和洞里萨河汇合处，金边一座新建的剧院拔地而起，很多城市对柬埔寨首都的这家剧院只能望洋兴叹。这家剧院的使命就是为一切艺术服务。为期三周的金边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就在这里举行。

开幕的那一天，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剧院的大厅里。北朝鲜、蒙古、菲律宾、古巴、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印度的代表同他们来自东欧或西欧的同志们、朋友们并排走来。三个沉默寡言，表情严肃的人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东西两个德国的代表相互生硬地点头致意。大家窃窃私语，嘲笑柬埔寨的抽签方法，险些儿把以色列的短片同埃及的长片编排在一起……。由于忠于它的中立主义，柬埔寨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有各种国家代表出席的电影节。

随后，大厅里暗了下来，银幕上显出了片头字幕：《吴哥

的阴影》；‘编剧、导演：诺罗敦·西哈努克’；‘领衔主演：诺罗敦·西哈努克’；‘音乐：诺罗敦·西哈努克’。场上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尽管光线很昏暗，但是所有的目光都朝向同他夫人坐在前面包厢里的那位还比较年轻的人。

在金边，人人都知道对十五年来掌握柬埔寨命运的西哈努克来说，电影远远超出了业余爱好，已经不象别人打高尔夫球那样，仅仅是为了娱乐。他对电影的爱好是认真的（在某些人看来，他‘过于认真’了），而且‘专业’已经最终取代了他身上的业余爱好。他说道：‘作为柬埔寨的第一公民，我应该从事各种职业……有一天，我似乎觉得关心并领导我国的电影事业的发展，是必要的。多种形式的艺术活动是柬埔寨的优良传统……’

在多种形式的活动方面，西哈努克亲王是无可比拟的，他是作家、画家、作曲家、音乐演奏家、书刊编辑以及报社社长，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亲自参加维护他所珍爱的一切。当他号召在柬埔寨开展足球运动，他就变成了足球运动员，并且要求他的部长们穿着短裤衩在体育场上奔跑。四年以来，作为推动电影事业发展的人，他不知疲倦地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至少摄制了八部长片。

导演一部电影需要一个技术人员组成的小组来帮助，其中主要的负责人来自（法国）高等电影研究所，各种角色往往是由他本人和他的亲属或者他周围的工作人员来扮演。在亲王看来，（所得收入归于国家互助机构的）商业性片子必须是能起到向导作用的。目前，柬埔寨的电影，事实上还纯属一种手工业状态，而且每年拍的二 来部片子都是16毫米

的，既没有一点美学感，也没有文化艺术的味道，而完全为了迎合一帮观众所追求的传奇性的和粗俗的剧情。亲王认为，这些片子只能使柬埔寨人自己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仙女》的作者还说：‘我以为，一部故事影片，配上鲜艳的色彩，美丽的风景，华丽的装饰，再加上爱情的情节，就能使人对柬埔寨的现状和历史传统有所了解。’

亲王在他的作品中严格地执行了这种审美要领，不仅对作为电影艺术家的诺罗敦·西哈努克有好处，而且有时也对作为国务活动家的诺罗敦·西哈努克有一定的帮助。《仙女》这部片子就揭露了美国和南越对柬埔寨领土进行狂轰滥炸的情况；《吴哥的阴影》则详细地描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策划的反对金边政府的阴谋。同样，正在拍摄中的《戈公的雷电》是反映红色高棉在边境地区进行颠覆活动的情况。

亲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电影爱好者以至电影艺术家，自然会有在他们国家组织一次电影节的一天。第一届金边电影节，就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发起的。由于试验成功，他还打算再次举办这种活动。在闭幕式的那一天，西哈努克亲王正式宣布：‘下一届金边电影节将于一九六九年举行。’

西哈努克亲王拍摄的电影《小王子》，代表柬埔寨参加了比赛（《吴哥的阴影》也同时放映，但不参加比赛）。作者指出，《小王子》的特点‘是我国大好河山的一曲朴实的赞美歌’。这部片子通过生动的画面，描述了一位年轻的君王，由于对他的人民的热爱，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才智和勇气，挫败了他自己家庭内部策划的一个阴谋。”

由亚洲一些大国报界带头，不结盟国家的报刊普遍为我主持正义，这并不是为了讨我的喜欢，而是因为他们比西方报界更理解我的目的和动机。对于这个问题，我希望读者们看一下印度一些主要报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对我的最后一部片子《黄昏》的评论。

《斗争周报》虽然对我所解释的吴哥宫殿不是印度宫殿的仿制物感到不满意，但是这家报纸还是肯定了我的片子具有某些优点。它写道：“对这部片子，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反对那种说宏伟的吴哥古迹是印度文化的再现的观点；第二种看法，认为这是使人对美丽的国土的一次愉快的游览。……对于第一种看法，那就要看历史学家们是否同意亲王的这种观点。至于第二种看法，则使大家感受到，能和土帮主的妻子（实际生活中的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一起旅游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西哈努克夫人扮演土帮主的妻子玛娅，从头到脚都充满着魅力。这两位主要演员为一个可爱的王国的传统增添了光彩。图像犹如花朵般鲜艳。宋桑阿的摄影技术是无可挑剔的。”

《国民先驱者》认为：“一个政治家成为一个电影制片人，这是非常少见的。对于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来说，电影就同绘画、戏剧及音乐一样，都是一种娱乐。他对《黄昏》所作出的努力是令人尊敬的。在这部片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雄伟的宫殿、纪念塔和美丽的景色。”

《印度斯坦时报》说得很清楚：“通过建筑物和风光的美丽景象来说明柬埔寨的文化、历史和当前的发展情况，历史仅仅是个衬托。莫尼克·西哈努克扮演的土帮主的妻子是十分

迷人的，而迪·莎薇扮演的女士也是很漂亮的。”

请允许我用下面几句话作为结束语：如果我的片子有时被西方的外交使团或报界嘲笑的话，那也是些拒绝承认我的乐曲是优美的极少数的人，这种现象比什么都没有还要好。

事实上，我的片子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豪感为基础的，但其中某些片子有些相互“交叉”。比如：《吴哥的阴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柏威夏》是反对泰国扩张主义的；而在《黄昏》这部片子里我拒绝接受所谓吴哥是“仿造”印度古代建筑的，光荣的吴哥时期之后高棉人民变得毫无生气等等一些论调。

有些西方外交官很自然地会来祝贺我的两部片子：《小王子》和《快乐的森林》。这为什么呢？因为头一部片子仅仅反映了柬埔寨的优良传统；第二部片子也只反映了一个艺术的、富于情感的、不参与政治的柬埔寨。这种偏爱是可以理解的。我本人也这样，我喜欢为艺术而艺术，但是，有时人们是不能完全摆脱政治的。

50

我为何支援越南的革命者

高棉人民不喜欢越南人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因为长时期以来，我们的东邻不断地“吞并”历来属于柬埔寨的领土，并把它们占为己有，而对当地的居民只允许他们作出或者归顺或者逃去的选择。

这些历史性的感伤的回忆，使我们的许多同胞（特别是那些已变为交趾支那的下柬埔寨的高棉人）对越南是十分仇恨，有些甚至想尽可能重新收回已失去的领土。这种“憎越”情绪导致了朗诺分子在一九七〇年政变之后，就屠杀了许多无辜的侨居柬埔寨的越南人。

在我同越南的关系中，我始终持现实主义的态度。老天爷给我们安排了这么一个永久性的邻居，包括北方和南方，它在六十年代已拥有近五千万人口，相当于当时柬埔寨全国人口的八倍。不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它都是一个十分狡猾和非常危险的邻居。

在前面的一章里，曾谈到我访问西贡的情况。我当面要求吴庭艳承认柬埔寨现有的边界，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吴

庭艳拒绝了我的要求，我只好向他的对手——越南北方及其南方同盟者去寻求这种保证。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在军事和人口方面比柬埔寨都要强大得多的邻居，竟会采取“强硬的手段”。在我下台之前，我采用的是“温和的办法”，以求得我所希望的结果。

一九六五年二月，印度支那人民大会在金边召开，我在这个大会上表示支持越南爱国者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我讲话的大意是：“柬埔寨是中立国家，但我们不能在侵略者（美国）和被侵略者（越南）之间保持中立。因为被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所承认的越南国家统一的权利，已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所剥夺，所以，我们不能在正义（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的权利）和非正义（美国对越南实行新的殖民主义）之间保持中立。”

一九六七年，柬埔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北方）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柬埔寨也是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之后第一个承认它的国家。采用“温和的方法”的结果是不能等待的。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柬埔寨王国政府发表公报，呼吁所有国家尊重柬埔寨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为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庄严声明：

（一）我们始终不渝的立场是，承认并保证尊重柬埔寨在它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

（二）我们承认并保证尊重越南南方和柬埔寨之间的边界；

(三)我们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及其南越和泰国走狗对柬埔寨王国的侵略阴谋和活动，我们坚决反对他们改变柬埔寨王国现有边界的一切企图。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对于柬埔寨边界的政策，如同它对柬埔寨王国的总政策一样，完全符合两国人民为捍卫各自神圣的民族权利而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当前利益，同时，也符合两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建设的长远利益。这个政策将对世界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越南（北方）民主共和国政府就我们的边界发表了一项声明。该声明说：

“在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第十二部分中，各与会国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民族权利和领土完整，并不干涉该国的内政。”

“然而，在对越南进行侵略和对老挝进行军事干涉的同时，美帝国主义同西贡和曼谷当局不断地对柬埔寨王国的独立、主权、中立和领土完整进行威胁，并阴谋重新划定它的现有边界。显然，他们践踏了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严重破坏了印度支那和世界这个地区的和平。”

“在他们的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英明领导下，高棉人民为了捍卫神圣的民族利益，同美帝国主义的破坏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越南人民始终全力支持高棉人民的这一斗争。在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越南同兄弟的高棉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和战斗团结，日益得到巩固和发展。”

“因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柬埔寨王国始终不渝的政策是，尊重该国的独立、主权、中立和领土完整。特此，我们庄严声明：（一）承认并保证尊重柬埔寨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

（二）完全同意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声明，承认越南南方和柬埔寨的现有边界。”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所说的边界，并保证予以尊重。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相信，加强越柬之间的睦邻关系以及增进相互间的友谊和信任，符合两国的利益，有利于两国人民为捍卫各自神圣的民族权利，维护印度支那、东南亚和世界和平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共同斗争。”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于河内

这个文件是随着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的一封信一起寄来的。那封信也许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兴趣，其主要内容是：

“我荣幸地给亲王送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关于承认柬埔寨现有边界的声明。借此机会，我谨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亲王和高棉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对越南人民在反对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敌人——美国侵略者的正义和必胜的斗争中，所给予的积极的和强有力的支持。

“我深信，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以及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我们两国人民之间邻居加兄弟的真诚友谊和战斗团结，

必将得到不断的发展。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一九六九年底，当胡志明主席逝世的时候，我在金銮殿里举行一个有七十九位和尚（是按照主席的寿数安排的）颂经的宗教仪式，祭奠越南独立之父的英灵。接着，我又到河内，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全世界只有我这么一个国家元首这样做，尽管朗诺和副首相西索瓦·施里玛达亲王的党羽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争取越南对我的柬埔寨尽可能多的感激心理，同时也是为了解除越南对我国的威胁。

有人问我，一九七九年，范文同是否拒绝了我旨在和平友好地解决柬越纠纷的建议？是的，这是真的。但是，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九年，越南和柬埔寨都流满了鲜血，犯错误的（这是一种婉转的说法）是美国、朗诺和红色高棉，是他们制造了两国间的战争局面。我相信，如果高棉的亲美右派集团不在一九七〇年三月推翻我的话，虽然也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我还是可能拯救我国于逆境之中的。

在戴高乐将军的《希望回忆录》一书中，将军对我的政策作了很好的评价。他写道：“我们劝他（指老挝的梭发那·富马），要他的政府象它的邻国柬埔寨的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那样，采取非常强有力而又极为灵活的态度。”

一九八〇年一月三日，《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安东尼·刘易斯先生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非常公正的文章。他写道：“直到一九七〇年，管理柬埔寨的是这么一个

人，他所关心的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政治逻辑的问题，而是他的人民在多灾多难的世界里的生存问题。在越南战争期间，西哈努克亲王根据必要或站在这边或站在那边，保持左右均衡。他允诺越南北方利用柬埔寨东部诸省境内一些地方做庇护所，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他的不完全的中立，已被证实是对柬埔寨有益的。后来，一九七〇年三月的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柬埔寨从此陷进了苦难。一个有余粮的富有国家，变成了饿殍遍野的地方。”

有人说我“准许”美国轰炸高棉领土…

要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那就是有人说我在一九六八年允许美国轰炸越共和北越在柬埔寨的庇护所。但不管怎样，亨利·基辛格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已经说清楚了。那么，就让我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本来面目恢复过来吧。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我在金边的寓所里同柴斯特·鲍里斯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我同美国客人谈话的要点如下：

“我绝非希望在我的国土上建有越共和北越的庇护所，你们是希望清除掉这些庇护所的，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但是，我坦率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轰炸我们的领土，即使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或密林深处，那些牺牲者很可能都是高棉人。如果你们只杀越共和北越人，也不会使我感到高兴，但这与我无关，因为越南人同你们发生战争，你们之间互相残杀是毫不奇怪的。而在柬埔寨的越南庇护所并不很重要，也不很多。

据我所知，你们轰炸到今天，牺牲者都是柬埔寨人。正由于这个原因，才使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一九六五年断绝了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如果你们继续轰炸我的国家，残杀我的同胞，我们就不会很快地恢复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对我这个声明，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和他的朋友们引用了这句话：“如果你们只杀越共和北越人，这与我无关……”而那些人却对这段话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为的是让世界上相信，美国轰炸高棉领土是得到我允许的。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向国际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声明，作为对里查德·尼克松总统在华盛顿发表的一个声明的回答。

“法新社华盛顿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电：当记者问尼克松总统，一九六九年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同美国当时关于尊重柬埔寨主权的声明是否相抵触？他声明说：不，那‘十英里’被轰炸的区域全部是被北越人所占领，并用来作为攻打驻南越美国军队的地方。在那个地区，既没有柬埔寨百姓，也没有柬埔寨的行政机关……。”

对此，我必须指出两点：

（一）尼克松总统说他没有侵犯柬埔寨的主权，因为他的飞机只轰炸‘全部被北越人所占领的十英里的区域’。他完全无视国际公法，因为所提到的这个区域，即使没有高棉人居住，它也是属于柬埔寨的，是柬埔寨完整的不可分割的领土主权的一部分。

（二）尼克松总统撒谎说，他认为一九六九年被美国空军

轰炸的地区是既没有高棉百姓居住，也没有高棉行政机关的地区。请听听我的副官丁南参谋的证词吧：“一九六九年的野蛮轰炸，并未炸死北越人，而是炸毁了高棉王家武装部队的哨所和驻地，炸毁了高棉的学校和民房。美国飞行员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这种屠杀的，难道他们能看不见我们的兵营、学校、村庄的广场上空飘扬的高棉国旗吗？”

到底什么是这些一再被提到的轰炸事件的原因呢？在我看来，是美国“鹰派”，他们（当然是背着我）竭力支持（正在准备发动政变反对我的）高棉极右分子，加紧“动摇”我的制度；但要慢些行动，以免影响美国正在南越的胜利。

正是好机会：因为红色高棉（根据波尔布特自己于一九七七年所讲的）从一九六〇年以后，就开展反对君主制度的武装斗争；王家武装部队的军官们对我一九六三年拒绝美援感到不满意；政府（根据我的提议，国民大会一致通过）开设一个娱乐场，以便筹集必不可少的国防经费，用来代替美援……。

对此，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曾对我说，如果他是我，他也会这样做的。因为娱乐场一开张，“比重新接受帝国主义有毒的援助要好得多。”无论如何，此事已被沈法和施里玛达集团（后者是娱乐场的“老主顾”，是个积恶成习的赌棍）用来对我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

一九六六年，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亲美极右派获得多数选票当选。不久，我同我的亲密盟友——中国之间——又发生了大矛盾，因为中国从“文化革命”初期就同红色高棉站

在一起。

一九六九年，我杰出的朋友戴高乐将军终于辞职了，乔治·蓬皮杜先生接替了法国国家元首的职务。一九五九年，巴黎和北京政府向我通报情况，使我镇压了叛国分子达春的政变。但是，在一九七〇年二、三月间，当朗诺、施里玛达及其同伙非常秘密地进行“反对西哈努克”，并共同密谋推翻我的时候，不管是法国还是中国，尽管他们消息灵通，但却都没有向我通报任何情况。

另外，在七十年代，人们谈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稻谷的收成打破了历来记录的时候，美国飞机却在我们的橡胶园、田地和果园上空轮番地大量地撒下落叶剂，说是为了清除越共可能借以藏身的一切掩蔽所，这只能说是对高棉国民经济的大破坏。

请原谅，我要回过头来再详细谈谈美国轰炸的问题。按照美国官员们的说法，是我给开的“绿灯”。回想起早在一九六五、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的这种轰炸，照我看可以证明两点：

(一)美国企图通过指出我国农民的不幸，是由于我无能力保护人民，以达到他们离间我的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并没有得逞），同时，他们还企图破坏我和越南革命者的团结。

(二)在反对这些轰炸的年代里，我只能表示愤慨，而不能阻止越来越多的轰炸。对此，我只简单地说，象我国这样的小国是完全无能力“劝阻”美国继续从事杀人的。

然而，在提到美国飞机轰炸我们边境地区村庄的恐怖活动之前，我要向我的读者们准确而概括地介绍我们全国性的杂志《柬埔寨》(英文版)上所载的关于尼克松总统派柴斯特·鲍里斯来柬埔寨执行任务的情况。

第二十一页：“尼克松总统的特别代表柴斯特·鲍里斯先生阁下，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至十二日，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一月十日(星期三)，国家元首接见了她，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在同一期杂志中，我向国民说明，他们有权等着了解鲍里斯先生的访问情况。

第二十一页：“我对我的六百万同胞的生命负责，美国总想找借口屠杀我国人民，至少也要伤害我们的民族。……他们说我们不是中立的，是帮助越共的，然而，我们是中立的。我邀请尼克松总统的代表到实地来亲眼看一看。”

第二十二页：“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国家元首亲王殿下设午宴招待柴斯特·鲍里斯先生。应邀出席的还有：美国代表团的菲利普·哈比、赫伯特·斯比瓦克、约翰·齐斯莱、道格拉斯·费尔里先生和玛格丽特·费兹哲罗小姐，澳大利亚大使诺尔·St·克莱尔·德湛普斯阁下，法国大使于贝尔·阿尔戈德阁下。宾努亲王、宋双首相、湮·刁龙少将、国防部长杨森安将军、外交部代理部长阮财基先生出席作陪。宴会是在非常轻松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二十六页：“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宋双首相和柴斯特·鲍里斯先生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其主要内容如下：

‘鲍里斯大使重申美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中立和领

土完整。在确信柬埔寨的诚意的基础上，鲍里斯大使郑重指出，美国不允许以任何方式侵犯柬埔寨领土。美国向高棉王国政府保证，它将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来避免对柬埔寨的侵略及给柬埔寨居民造成物质损失的意外事故和事件发生。”

正如大家所知道那样，我曾直截了当地向美国提出，不要用任何入侵、制造事端和事件的方法来干涉我国，这就是断然地拒绝了美国的空中轰炸。另外，我还使美国接受关于一九六八年初我国形势很好的说法，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停止一切对柬埔寨的侵犯，承认柬埔寨的中立和它的诚意，尽管我国确有越共的庇护所，因为我们无力阻止。这些形式上的保证，是否能在实际中被遵守？

在鲍里斯先生来访之前的事实是：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美国飞机完全炸毁了柴楨省巴图村，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我国政府就此向联合国提出了控告。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两架美国直升飞机又在巴图村扔下了九颗火箭弹。然而，在这个村子里，只有高棉农民，连一个越盟或越共分子也没有。我们的武装部队击落了一架直升飞机。我们向国际监督委员会展出了它的残骸。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贡布省波雷博鲁乡的一个村庄遭到了美国空军的轰炸。国际监督委员会察看了现场。可叹的是，两个被炸死的和两个受重伤的都是高棉人。

柬美联合声明签署之后，美国军队侵犯我国边境村庄的活动有增无减，其中主要有：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美国轰炸了茶胶省普农登村，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全都是高棉人。其中有一个妇女和一个儿童。国际监督委员会已进行了察看。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美国直升飞机对波罗勉省磅略白县斯外阿农村进行扫射，造成十四人死亡，全部是高棉人，其中有三个妇女。已经国际监督委员会察看。在这个野蛮的完全非正义的行动之后，我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先生，代表我国提出了控告。我要求吴丹先生向美国政府进行干涉，要他们“立即停止对柬埔寨人民的这种肆意的屠杀。”一九六八年七月四日，吴丹先生向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转交了柬埔寨的抗议书。读者们大概也会同意，以上的事实证明此事并非象尼克松和基辛格先生后来所说那样，我根本就没有准许美国对柬埔寨进行空袭。

我的控告和抗议书似乎没有引起我的美国对手以足够的注意。如：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美国三架直升飞机对柴桢省罗梅赫县波雷杜村进行扫射和发射火箭弹，造成了一人悲惨的死亡，二十三人受伤，全部是高棉人，其中有五个妇女和八个儿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美国轰炸了柴桢省龙杜县博蒙乡，造成了三个高棉士兵的死亡。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美国轰炸了贡布省磅乍叻县布雷格鲁乡，造成十二人死亡，其中有三个儿童；七人受伤，其中有六个妇女。死伤者全部是高棉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和二十一日，美飞机轰炸了蒙

多基里省境内的克辛公路。造成了七人惨死和二人受伤，都是高棉人。国际监督委员会察看了现场。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八日，我国政府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书面控告，并附有照片资料以资证明。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日，又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美国飞机对我们在蒙多基里省达丹哨所进行猛烈的袭击。早在一个月以前，美国飞机就在那个地区上空盘旋，寻找目标并向我哨所及其周围发射火箭炮，造成一个女教师和两个学生死亡。

位于山顶上而且周围植被稀疏的哨所那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在它的建筑群中有一座房屋顶上还标着“柬埔寨”字样。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士兵的一致证明，即使是越共和北越分子渗入蒙多基里省，“越南人从来就没有到过哨所附近”。

美国飞机空袭王国军队的哨所，纯属是地地道道的侵略行动，造成了二十五人死亡（其中有二十四个军人和一个百姓）；十人受伤，其中有八人重伤。受到的物质损失是巨大的。按照我们的记录，摧毁了营房五座，办公楼一座，学校一所，诊疗所一个，民房五栋；毁坏加农炮二门，重机枪五挺，迫击炮一门、步枪四十七支，军车九辆，其中救护车一辆。达丹已不复存在了。相反，在这个范围内，连一个越盟或越共受害者也找不到。正如我对柴斯特·鲍里斯说过那样：“由于美国轰炸，‘遭殃’的全是高棉人，越南人都会巧妙地溜走或躲进了掩蔽所。”

在这个不可饶恕的罪恶事件发生之前，我是不会有兴趣

去向联合国递交抗议书的。在我们党的杂志一九七〇年一月号上，我向全世界呼吁：

“在越南作战的美国军队肆无忌惮地对中立和和平的柬埔寨进行了规模空前的侵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即自星期日至星期三），他们连续四天对高棉王家部队在蒙多基里省的达丹哨所（距离柬越边界线七公里）及其周围地区进行轰炸、扫射和炮轰，造成了二十五人死亡，十人受伤，其中有八人重伤，毁坏一个诊疗所、一所学校、许多民房，烧毁了一些重要物资。这就是柬埔寨方面向世界舆论公布的数字，用以揭露美国当局的和平宣言的伪善性，它投入军队攻打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唯一罪过是反对美国的控制。柬埔寨庄严地呼吁世界各国和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立即制止美国对包括柬埔寨人民在内的印度支那人民发动的毁灭性战争，制止美国飞机在达丹及其周围地区只能给高棉人民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的轰炸。很明显，这是侵略者经过充分准备的恐怖行动，其目的是迫使柬埔寨屈服进而占领之，因为这对美国司令部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重要的地方。”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向吴丹送去了一份正式文件，控诉美国轰炸克辛。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正当美国军队对我国平民百姓犯下越来越多罪行的时候，柬埔寨却发扬人道主义，在圣诞节释放了十二名美国俘虏。我们相信，联合国不会对藐视它的宪章和一切国际法的行动漠不关心。我将无限感激阁下能把美国最近的一次侵略

行为通报联合国各会员国，并帮助我们敦促美国尊重我们的民族权利和我国爱好和平的人民。”

一九六九年，美国对高棉领土的空袭并没有间断，我们的同胞还在流血牺牲。

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日，美国一架直升飞机在蒙多基里省布斯拉村附近被我军击落。后来，这架飞机展出于金边。

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美国飞机轰炸柴桢省磅略白县，造成一个农民死亡，五个士兵受伤，全是高棉人。国际监督委员会可作证明。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美国轰炸了波罗勉省龙杜县，使高棉人二死十二伤。国际监督委员会可以证明。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二日，我军击落一架在柴桢省上空飞行的美国侦察机，飞行员马左·莱尔德、P·奥斯本受伤被俘，在我们的首都法国人办的卡尔麦特医院疗养，后来被释放了。

我这里引用两位杰出的美国政治家的看法来结束本章。他们两个人都是美国参议员。在我的档案中发现这些材料，使我很高兴。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参议员威恩·摩尔斯在参议院的讲台上说：“近五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有许多重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推翻了过去关于在国际事务中实行法制的决定。在越南，我们嘲弄了法律的支配地位，戏弄了联合国宪章。十多年来，我用无法抹掉的墨水在可悲的编年史册上

写下了侵犯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侵犯联合国宪章的一个条款又一个条款；侵犯美国宪法第八章第一条；违背了外交政策上的法则。我们对东南亚不宣而战的决定，公然违背美国一贯主张以法律的支配代替弱肉强食的意图，使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名誉扫地。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好名声，以前曾赢得了不发达地区千万人的信任，但由于我们在东南亚进行非正义战争，使我们的好名誉失去了光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群众面前，我们失去了许多荣誉。”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柬埔寨及其国家元首忠实和慷慨的朋友麦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在访问柬埔寨之后第二天，在给当时驻新德里大使农金尼（曾较长时间任驻华盛顿的高棉代表）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概内容如下：

“在忠于民族的西哈努克亲王的专心领导下，你们国家继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我能为此作证明，感到高兴和满意。过去，亲王充满着信心和极大的热情说过，他最大的忧虑，就是柬埔寨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高棉人民的安全和柬埔寨文化的问题。”

正因为在美国有象他们两位那样的一些人物，所以我对这个大国并没有失望。我希望它把力量用在伟大事业上，但不要由激动昂扬变成意志消沉。而且，希望它在可能的情况下，改正在柬埔寨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综上所述，我认为完全可以证明，我并没有为美国空军开绿灯，让他们在我国上空进行空袭。由于这种空袭，死亡者都是高棉人……。

51

对美国俘虏的人道主义活动

我因对在柬埔寨边境地区的美国俘虏给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并不时地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提出交涉，要求他们优待被南越游击队抓获的美国人，而经常受到柬埔寨左派和我过去的一些法国合作者的责难。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出自易于被理解的一种感情的。柬埔寨是一个中立国家，同时它又尽自己的可能对越南人为独立而进行反对美国的斗争提供各种帮助。这个大国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因为它认为这里是导致本地区共产主义化灾祸的发源地。

尽管象我在上一章里所说那样，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边境地区的村庄进行空袭，并以“消灭越共”为名对我国政府进行恫吓，对我们的农民进行威胁，但它还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与我们之间没有处于交战状态。为了正确对待美国俘虏，为了按照这些战俘家属哀怨的要求而向越南革命者进行交涉，我曾到处奔走，但这不仅是出自于佛教徒的慈悲为怀，而且也出自于珍惜美国同柬埔寨今后的关系。

除此之外，对这些曾经按照命令或处于误会而侵犯我国

领土或领海 最后被我军俘获的惶恐不安的人们，我从来就没想到要进行报复，只是要他们遵守我们的风俗习惯。他们人数并不多，而且都受到了优待，这对美国舆论界不能不产生良好的印象。因此，也可以证明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野蛮人，而都是有教养的温良恭俭让的友好的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还安排美国战俘中的伤病号到我们最好的医院（如法国人的卡尔梅特医院）去治疗。我经常利用圣诞节或其它节假日等良好的时机，把他们释放，交还他们的家属。

一九六八年，王家海军部队捕获一艘侵犯我国领海的美国内河舰艇（也许就象他们艇长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一时疏忽而造成的），并俘虏了艇上所有的水兵。在我国人民内部没有激起强烈的谴责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立即释放他们。我敢说，我们把他们“留宿”在金边附近的水净华水兵基地上很好的楼房里。我们给他们好吃好喝，给很好的照料。他们可以同高棉“看守们”一起搞体育活动。这些“看守们”对他们并不凶狠，相反却待他们很好。许多外交官和记者多次访问了他们。

在我国的朋友罗伯特·肯尼迪逝世的时候，为了表示对他的哀悼，我释放了他所有的同胞，还给他们全换上了崭新的便装，并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独立节和电影节。我们所给予这种不寻常的待遇，不仅值得感到惊讶的美国水兵们的感激，也值得美国当局和美国记者的感谢。

总之，正象我前面已说过那样，我曾为在越南被越共抓

获的美国俘虏得到优待而不断奔走，尽管我的一再请求为越南革命领导人的恼怒而告终。我引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通信如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在给越南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的信中说：“出自于纯粹的人道主义，请允许我再一次转达两位被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抓获的美国俘虏的家属的请求，她们想知道她们的亲人是否还活着，如有可能的话，他们之间能否互相通信。他们是：

古斯塔夫·赫茨先生。他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总务司司长，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在平阳省被俘。

道格拉斯·拉姆齐先生。他是美外交人员服务局的成员被委派到厚义省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表，于一九六六年二月被俘。

做为一个中立国家的国家元首，我很难拒绝那些忧虑不安的家属们的请求，只好向您提出这个问题。我知道您会同过去一样对我给予友好的谅解……”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我在给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主席的信中说：“请允许我随信附上我刚收到的贝蒂·米切尔夫人的来信抄件。她的丈夫阿尔奇·米切尔先生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同女医生阿德尔·维蒂小姐和丹·格伯先生在邦美蜀麻疯病院被阵线的武装部队俘获。米切尔夫人代表这三家的家属再次要求说，这三个人都是‘为不幸的麻疯病人解除病痛，从事社会工作的文职人员，他们的工作同军事和政治活动毫无联系之处’。我衷心感谢您大发善心，能对我的上述要求给予认真的考虑，顺致崇高的兄弟般的敬意。诺罗敦·西

哈努克。’

我经常收到令人可怜的或认识或不认识的美国人的感人的信件，对我的态度表示感谢。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詹姆斯·L·伊根夫人从美国新泽西州曼亭赛德市广景路寄来的信里说：

“我急切地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您在试图寻找我的儿子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仁慈和好意，如果你能将这一谢意转达给阮友寿先生，我将非常感激，他为我们事情做了许多调查……，请再次接受我们对您所做的努力所表示的诚挚谢意。我们期待着和平必将来临的那一天，殿下，那时我们将能够向我们的政府，自由地披露您的巨大的好意。顺致最诚挚的敬意。”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索兰格·赫茨先生、普莱斯巴格先生和弗吉尼亚先生用法语写信说：

“殿下：感谢您八月十九日通过澳大利亚大使馆转来的信……您的和蔼和仁慈使我们感到非常不安……。”

一九六七年九月，美国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先生用法语写信说：

“殿下：您对古斯塔夫·赫茨先生和我们许多公民的亲属所表示的善意和仁慈，我谨表示谢意。对于被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抓去的美国文职人员，他们的亲属都为他们的生活待遇甚为担心。您对这个问题亲自给予关怀，使我更为感激，也为高棉人民能有您这样的国王和国家元首感到钦慕……。”

你的忠实朋友罗伯特·F·肯尼迪。”

我想，在我提出交涉之后，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先生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我的信，将引起人们的兴趣：

“亲王：我刚刚收到了您充满着友情的来信。您在信中，转达了赫茨先生和拉姆齐先生的亲属的要求。我认为，有些美国人就是滥用您的善良，经常不断地打扰您，而他们的政府却不断地对柬埔寨进行无礼的攻击，同时还筹谋反对高棉的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的最恶毒的计划。

“为了感激亲王、高棉王国政府和人民对我们阵线和我们南越同胞一贯怀有兄弟般团结的感情，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荣幸地直接通知亲王：

“阵线准许赫茨夫人领回其丈夫的尸体和他的衣物。我们想，由于美国远征军并未放松其反对我们的战士和人民群众的野蛮活动，战争给我们造成了许多物质上的困难，所以还不能及时地寻找和移交其余失踪人员。

“关于犯人唐纳德·R·拉姆齐的问题，请相信，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所有的战犯同样都实行人道主义政策。迄今，我们释放了很多美国军人和美国特务，这已经可以向世界表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定不变的。然而，美国政府方面，显然还不断地继续犯下了反对越南同胞的令人厌恶的罪行。这种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单方实行人道主义政策是无效用的。

“美国人的亲属已体验到，这场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的非

正义战争的苦难，就应该同我们配合在一起，努力制止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亲王在百忙中抽出了宝贵时间为他们奔忙，不仅赢得他们的尊敬，也保持了您同他们已有的友谊。

“最后，关于厄尔·P·加拉哈夫人的情况，我赞同亲王的意见，她可能只是受到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的引诱而犯了过错的。

“请亲王接受我深切的情谊以及最崇高的和最衷心的敬意。阮友寿。”

对阮友寿先生这封很有礼貌却又动听而带刺的信，我随即复信说：

“……我十分清楚地理解您的感情，也就是当您接到由您本人和您的勇敢的人民的忠实朋友所转达的这些请求的时候的感情……但您大概也了解，我不大可能回避一个纯属人道主义方面的要求……照我看，您（对美国人的亲属）的答复，只是对民族解放阵线的事业有利，别无其它……。”

我相信这些通信可以说明……。

52

向法国等外国朋友表示敬意

在我当权的时候，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别的国家，都有许多社会出身不相同的男人和女人乐意同我交朋友。即便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的政变使我成为流亡者之后，他们仍然完全保持着对我的诚挚友谊。我们有时还相互通信，有时也见面（但因相隔遥远，见面是很少的）。而我，对他们中间那些仍对我怀有友好感情并祝颂我的祖国和我本人的，不论是社会名流还是地位卑微的人，只要能听到他们的一些消息，我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承认，在我可信赖的和尊重的老合作者和老朋友中，如果预想不到地丧失了任何一位，都会使我感到痛苦。在我被排斥之后，我并没有等待他们对我的支持，但我相信他们还是那样正派，不会在我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时极力奉承我，过后却迫不及待地迎合我的敌对集团，甘做学舌的鹦鹉。然而，也许我可能有点天真，也许是过于多情，就这么一回事罢了。

我愿在这里向我真正的外国朋友表示敬意。我不能全部

提到他们，但对我忘记提名的那些应该得到赞扬的人预先表示歉意。

给我留下充满深情记忆的是，过去我所在的母校——西贡沙士鲁·罗巴中学的法国和越南的同窗好友。令人惊讶的是，在他们中间竟无一人同我的敌人同流合污而成为军事政变的支持者，而我的敌人则是我在金边的弗朗索瓦·博杜安和西索瓦中学的一些高棉同学。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艾蒂安·普拉吉博士、他的兄弟明和德以及拉乌尔·西奥多。拉乌尔一直支持我，可惜他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失了视力。

我在保护国时期和五十年代的朋友中，我要提出的是总督乔治·戈蒂埃及其夫人、我过去的副官菲利普·阿梅代·戴布瓦松、瓦斯奈教授及其夫人、我过去的参谋长埃利·儒伯将军及其夫人、原御林军骑术教官安德烈·戈泰先生。我还要感谢忠于友谊的尊敬的法国驻柬埔寨大使让·戴博斯阁下和男爵夫人。

我谨向我的老朋友表示深切的怀念。他们是原柬埔寨宫廷御医阿尔芒·里什博士以及埃尔当医师、克里斯蒂昂·戴贝古拉医师、鲁耶医师；当然还有我亲爱的乔治·巴泰医师及其一家、皮埃尔·贝雅尔医师及其一家、苏薇太太。我也向医学教授格拉塞、勒梅尔、埃尔韦、阿尔努、梅尔洁以及樊尚·蒙泰伊教授致以崇高的情谊。

我还真切地怀念原驻柬埔寨的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朋友们，他们主要是：罗朗·梅威尔先生（奥布里·拉歌纳耶）；高棉语言和文化的行家勒内·拉波特先生、C·布律克勒先生（又名哈玛韦）。同时我也非常怀念阿兰·达尼埃尔教授

以及亨利·夏博博士及夫人。

我始终怀着感激之情缅怀王宫的管事“戴罗妈妈”。她对我们全家非常忠实，直到一九七五年她去世前，她还想念着我。我也不会忘记法国警察署长罗歇·科利尼翁先生（已退休）。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三年，我去法国旅行时，他负责我的安全保卫工作。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的战争中，他和他的夫人一直在支持着我。我也向我所敬重的其他法国警察，特别向警察分局局长勒热内和比费致以友好的敬意。

我向以下几位大作家和新闻记者表示最深切的敬意。他们是：让和西蒙娜·拉古蒂尔、威廉·阿特伍德、菲立普·德维耶、贝尔纳·古雷、弗朗索瓦·夏雷多纳。朗卡斯德、J·塞克德等。他们在我应该受到批评时就批评我，同时他们也给我以正确的评价。我还向我过去的合作者和知名记者热拉尔·布里塞、让·巴雷、达尼埃尔·雷等致敬。热拉尔·布里塞先生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朗诺一伙发动政变之后至今，不断地进行各种活动，或写一些有文献为依据的文章，以捍卫我过去的政绩。

请允许我以弗朗索瓦·夏莱的名义，并代表两位卓越的电影艺术家让·皮埃尔和让·保罗·让桑兄弟（他们曾编导关于人民社会同盟的柬埔寨的重要纪录片），向我的朋友马塞尔·塔拉博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和“世界知识”摄制组一起，拍摄了一部关于我所领导的国家——一个“微笑的国家”的记录片。

在我的朋友中，我还要提到下列一些饭店和旅馆的老板，大家一定不会感到奇怪。他们是：银塔饭店的老板克洛德·泰

雷，对他来说任何赞美之词都是多余的；讨人喜欢的桑·勒托内住在蓬夏特朗，为了招徕顾客，他会训练公鸡、母鸡和鸽子表演节目，他本人同时也是一个天才的表演家，以人们意想不到的猪尿泡和锯琴为道具作表演。在他夫人的陪同下，他曾多次去柬埔寨演出。为了给我排忧解难，还到北京来表演过一次；可爱的弗拉梅里·马丹一家，在帕朗德格拉斯开设塞达尼饭店；布维耶夫人，是里昂附近利穆内斯特旅馆的老板娘，同时也是一位有名的厨娘；还有马科斯·维拉先生，他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城和法国埃松省巴哈耶——维埃耶都开设了旅馆。

在我列举的法国朋友中，我还提到老朋友忠实的让娜·蒙，她过去曾任《柬埔寨现实报》编辑部秘书，现在印度的彭地治利；还有原柬埔寨王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法国职员埃尔曼、朱利安、克鲁瓦泽诸先生，他们拒绝为“高棉共和国”服务，很快就离职了，这种友好表现，使我永生难忘。

在我最好的外国朋友当中，我要提一提原大不列颠国王陛下驻东南亚高级专员马科姆·麦克唐纳阁下，他是我所认识的著名绅士之一。我们的交情从四十年代就开始了。对联邦德国的克劳斯·梅赫涅特教授，我是不会忘记的，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演说家和新闻记者，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认识和赏识他的。使我高兴的是，我能于一九七九年冬在北京请他吃饭。

如果我不在这里向闻名世界并受人尊敬的美国知名人士——前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表示谢意的话，我将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作为著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曼斯菲尔德参

议员确是最了解柬埔寨的美国人。他曾不断地努力劝说他的国家政府和舆论界，让他们相信我以前所实行的是民族主义的、独立的、光荣的制度，是应该受到支持而不是遭到反对的制度，是在动乱的地区里保持稳定的因素。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他的看法是清醒的。我还要补充一句，在我被“废黜”以后，这位参议员为了保护我，勇敢地起来说话，反对那些对我的指责和诽谤。对他的这种难能可贵的态度，我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我要向另一位美国朋友——巨商塞鲁士·伊同表示敬意。他一直积极地支持我。我还要向我的朋友L·特洛伊·波雷沃罗致敬，他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给了我非常积极的支持。

请允许我特别提一提我的比利时朋友保罗·德尔贝格赫博士和他的夫人，他们非常关心高棉难民，并经常为保护我而出面驳斥在他们国家那些把我当成共产党人的议论。

当代伟大的作家韩素音女士也是我的一位诚实朋友，我们还能经常愉快地见面。

我高兴地在这里向我的伟大瑞士朋友致意。他们是原柬埔寨王国驻他们国家的名誉总领事布里德尔先生和夫人。他曾经写了一篇捍卫我的制度的博士论文；还有一位大银行家的遗孀泰雷兹·勒鲁夫人和她的家属以及名记者伯赫蒂耶·加兰。

我还要提一提我的美国老朋友——曾在一段时间内是金边的和尚的罗伯特·巴尔兹；我的澳大利亚朋友——原柬埔寨王国驻他们国家的名誉领事、我的得力支持者柯林·普拉

特，我的新西兰朋友G·F·米尔兹和我年轻的智利朋友(现已加入澳大利亚籍)朱利奥·A·杰尔德斯。

西哈努克的崇拜者依然有他们的缪斯。二十多年来，开罗的迈朱·开里夫人和波尔多的塞西尔·皮埃尔夫人一直用她们的竖琴为柬埔寨和我本人演奏了悦耳的赞美曲。使我高兴的是，在最近我到法国的时候见到了她们，向她们的才智表示赞赏，并对他们热爱我的国家表示感谢。

53

在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的日子里

一九六九年九月八日，我到河内去了。正如我在前一章里说过的那样，在动身前夕，为吊唁越南主席逝世，我在金銮殿里举行了一个宗教仪式。虽然胡志明对柬埔寨王国所持的态度一直是不够正确的，但我还是钦佩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热情。胡和我从未见过面。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时候，为了感谢我为越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持的立场以及给他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支援，胡主席愉快地给我发来了许多热情颂扬的信函和电报。

尽管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四年期间，越南军队曾在柬埔寨作战，但我却很想会见这位特殊人物。一九六八年，我很想到北越去访问。胡志明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对我要看望他的心意甚为感动，不过他向我诚恳地表示，为了免遭可能发生的美国飞机轰炸河内时造成的危险，准备把我的访问时间放到他的政府和人民有可能为我组织盛大欢迎的时候。然而，胡志明的要求，竟使我在他逝世之后才同他见面。

在金边举行的宗教仪式上，朗诺和施里玛达政府派我的

堂弟——外交部长诺罗敦·富里萨拉代表政府出席，但却奇怪地“忘记”派新闻宣传部的电影摄影师拍摄仪式的记录片。对国家元首主持的仪式，不拍摄电影给人民看，这还是第一次。幸好我把仪式的各个角度都拍了一些镜头，并于当天晚上由我妻子的妹夫游·班纳嘎把它们串成了影片，以便第二天可以赠送给越南政府。

在河内，在范文同总理的安排下，首都主要电影院连续许多天放映了这部短片。人民群众和青年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前去观看，因为在这部影片里，他们看到了他们的主席的巨幅照片安放在高棉金銮殿前面；高棉国家元首点燃蜡烛，并对着这幅遗像进行祭奠；庞大的僧侣团诵经拜祭超度亡灵；身着民族服装的朝廷要员们恭恭敬敬地聆听和尚诵经；穿黑色衣服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柬埔寨大使及其全体同事们也都按着高棉的礼节合十，静听这段消灾经。

第二天，在我的夫人、诺罗敦·富里萨拉和他的夫人以及其他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我乘坐柬埔寨王家航空公司四个引擎飞机，由波成东机场飞往河内附近的嘉林机场。机组人员全部是高棉人。离开波成东时，朗诺未露面，副首相施里玛达代表政府去给我送行。我的金边到河内之行本是官方的，但却变成了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柬埔寨，因为施里玛达集团向全国宣传，说我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是私人性质的，而且是十足的叛国行为。

与此相反，我抵达嘉林的时候，受到了北越政府和河内人民群众非常热烈和隆重的欢迎。虽然全国人民沉浸在“丧

父”般的极大悲痛之中，但他们还动员了那么多的人……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我。河内妇女长得很漂亮，穿着也整齐大方。这使我在这个处于战争状态的贫穷的共产党国家里感到意外的舒适。政府方面，他们安排年事很高的共和国代理主席孙德胜（八十多岁）到我的飞机舷梯旁边来接我。他个子矮小，身体稍胖，头上长着稀疏的白发。有人打着黑色小阳伞，为他遮挡强烈的阳光。他周围的人，除神秘的人物——党的第一书记黎笋之外，民主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都到我的住地（过去是法国驻东京高级专员的官邸）来向我表示真挚的敬意。讨人喜欢的孙德胜主席用力地拥抱着我。这位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老战士依然“精力充沛”。

范文同负责全程陪同，是我在河内期间的伙伴。见面时，他先是施了地道的高棉式的“合十”礼，然后紧紧地长时间地握着我的手。这个既风趣又有才智的人，一个我希望能同周恩来和金日成那样成为我的好朋友，却在一九八〇年用法语发表电视讲话说“西哈努克嘛，他已是过时人物，我没有必要再同他谈。”

就这样，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我继续多年的“支援”；另一方面，我是唯一来参加胡的葬礼的外国国家元首。所以，包括黎笋在内的越南领导人竭尽一切可能来讨好、亲近我。作为他们的任务，他们更以“兄弟般”的情谊接待了老挝“红色”亲王苏发努冯和南越的领导人。由于极大的悲痛所笼罩，高棉人、越南人和老挝人处得还很好。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主席长征甚至还恭维我的妻子说：“夫人，你的美貌真动人！”他当然也是一个真正的好外交家。

真正羡慕莫尼克的，还有奠边府的英雄，著名的将军武元甲。他的个子比我还小，然而我不能不这么说，他比索米尔少尉还活泼。他不断地向我的妻子献殷勤。非常敏感、聪明和有教养的武元甲夫人接待了高棉第一夫人。

在德古海军上将还健在的时候，我曾经到过河内。这是一个非常漂亮、雅致和干净的城市。一九六九年的北越首都还有几个市区保留着一些过去的魅力。但在共产党管理之下，已变得破旧和衰老了。有些市区人口拥挤，而且很肮脏。这使我很扫兴，也使我急于邀请范文同、武元甲等人访问“我的城市”。在法国保护时期，金边还只是一个小镇，而河内当时已是举世瞩目的大都市了。

一九六九年，金边达到了鼎盛时期。即使那些对我的中立政策怀有敌意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记者也不得不报道说：高棉首都已变成非常漂亮、整洁而且富于魅力的现代化大都市。我说，北越领导人是一些较早“开放”的“法国化”类型的共产党人，不能不到金边去游览，看看那里的新大学、国家剧场、奥林匹克运动场，还有受到美国人赞扬的城市规划。这时，朗诺和施里马达却另有打算……。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胡志明的事吧。我向胡志明那已涂了防腐香料的遗体献了一个具有柬埔寨色彩的大花圈。他的遗容，尽管已变得腊黄，但依然使人感到和蔼可亲。这是经过严肃艰苦生活的面孔，下巴还保留着越南或中国文人式的一撮胡须。

礼宾司给每一位外国代表发一条红臂章用来代替黑纱，而别的地方都是用黑色的。我们代表团婉言谢绝配带红臂章，

因为我们每个男团员都已穿上了我们民族的孝服（白短上衣和裙子），并戴上了黑纱。越南礼宾官劝我接受他们所给的红臂章。我拒绝了他，并解释说，对我们高棉人来说，黑色配上白色才是服丧的颜色。我们的太太们全身着黑色服装，男人们的裙子也是黑的。范文同对我说，我已为我的代表团做好了准备，而其他代表团来时没有做这个准备，因此才发给他们红臂章。

在吊唁簿上，我激动地颂扬胡志明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爱国者，是第三世界一切爱国者的典范。

我很快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大街上，群众自发地为我热烈鼓掌和围拢在我周围。我的汽车（苏制的豪华的汽车）所经过的地方，群众充满感情地高呼“西哈努克！”“西哈努克！”，许多人还象孩子般地自动从车门拉住我的手，因为我摇下了车门上的玻璃。他们都激动地向我表示热烈欢迎。在我离去之前，范文同、武元甲和长征都对我说，对我吊丧他们已故的民族英雄，越南人民及其政府将永志不忘。确实如此，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他们帮助高棉抵抗力量把反对美国和反对朗诺的斗争进行到底，因为这场斗争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当他们的军队入侵波尔布特——英萨利的柬埔寨之后，他们再也不愿听到西哈努克的声音了。

再回到胡志明的葬礼上来。中国总理周恩来想回避与苏联政府首脑柯西金一起参加葬礼，但他为了向胡伯伯的遗体告别，比我早两天到达河内，而且很快就回去了。

在参加胡的葬礼的时候，在礼宾安排次序上，我被排在柯西金总理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崔庸健前

面。在他们国内，崔是仅次于金日成元帅的第二号人物。

黎笋宣读了胡志明的长篇遗嘱。在这长篇遗嘱里，没有提到由他的党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野心，却主张各兄弟党必须加强团结，避免相互间的争论，因为这样做有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以及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事业。读遗嘱时，范文同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特别注意，也由于他的哭泣受到了全世界的非议。他象小孩儿一样地大哭，真是悲痛欲绝。他是胡志明的忠实信徒。象对范文同哭泣的回音一样，千万个男女青年和成年人都谈论他感人的忠诚，这使我不难理解他的至深悲痛。

请允许我引用几段不那么忧伤的记录来结束本章：

范文同（他的夫人因为病重，从不公开露面）、长征（及夫人）、武元甲（及夫人）、外交部长阮维桢（及夫人）、后来接替阮维桢的阮基石（及夫人）为充实我们在河内的生活，先后宴请我和我的夫人。后来，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五年期间，他们都成为我亲密的朋友。尽管是服丧期间，他们的宴会都在非常热情和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但是，我只能向他们表示歉意，我吃不了越南菜（我忌讳吃鱼露，它的气味浓得呛人，是越南菜必不可少的调料）。在这一点上，我获得了一个（小的）胜利：我的主人——越南领导人给我另外准备了法国菜，是四十年代给法国人做过饭的老厨师做的。

让·桑德尼代表法国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他因一九四六年同胡志明举行无结果的谈判而出名，但他取得了胡对他和他的主要助手们的信任 and 好感。他急于在葬礼后的第二

天赶回法国。在我的友好邀请下，让·桑德尼先生乘坐了我的飞机。在金边，他乘了法国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的波音飞机去巴黎。

象来到时那样，在我离开河内的时候，孙德胜主席到嘉林机场为我送行。这个人生命力很强，一九八〇年四月才逝世。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我经常被邀去看望他，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直到最后，他的头脑始终非常清醒。他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其原因自不必多说了。他是从在法国邮船公司西贡——马赛航线的客轮上当水手和厨子开始自己的生涯的。正如他在一九七〇年对我说的那样，他那时是为了“发动反对殖民主义”。同比他年龄小的范文同以及许多北越其他领导人和干部一样，孙德胜也曾被关在昆仑岛上的苦役犯监狱里。当时，他的隔壁正好是两位高棉“抵抗战士”的单人牢房。此二人就是我在本书开头所提到的巴春先生和阿渣汉鸠。

毫无疑问，孙德胜主席是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但是，外表也可能会迷惑人，就象范文同那样，自一九七九年开始揭掉自己的假面具，成了独立的柬埔寨不共戴天的敌人。

54

我是怎么被废黜的

我已在前一章里说过，当胡志明主席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初逝世的时候，我决定在王宫里举行一个宗教仪式来悼念他的英灵，因此遭到我的政府副首相施里玛达亲王的强烈抨击。接着，我又决定亲自去河内参加越南伟大爱国者的葬礼。我很晚才知道，我的飞机刚刚起飞，施里玛达随即转向他的同伙说，现在是罢黜我的最好时候了。他肯定地说，我的这次旅行是不恰当的，因为当时越共和越盟的部队还非法地占领着柬埔寨的部分领土。

而朗诺由于他的妻子刚刚去世，而且他还没有就此求签问卜，所以主张另择有利时机。不久，朗诺因意外事故肩部受伤，住进了美国人开的纳伊—戍尔—赛纳医院里。就在这个医院里，他们的阴谋确定下来了。在朗诺周围，许多装成病人的美国专家，被接受为政变的技术顾问。在同这些人密谋之后，朗诺天天打电话，把方法告诉施里玛达和金边的其他同谋者。为了保证这个“重大行动”不致于破产，朗诺将军想事先争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支持者。

在这些支持者之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自由高棉武装部队。一九六九年夏，他们佯装脱离山玉成，而后向王国政府投诚，集结在民国西部各省乃至金边市里。这些搞假“投诚”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花大钱豢养的雇佣军，在我们的内部起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

朗诺不在的时候，掌握着政府大权的施里玛达企图在政治方面孤立我。各种行政命令不象从前那样呈请我批示，而规定必须呈报首相府，由他们决定是否需要送我，“违者严厉制裁”。他们要把我架空和使我在人民面前威信扫地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在金边召开了一个国民大会。当时在法国的朗农（朗诺的弟弟）指使数千名所谓投诚的自由高棉士兵和他们的密探参加了大会，并要他们伺机进行捣乱。朗诺的大臣们以自由竞争和自由开放为名，采取进出口业非国有化的办法，终止国家对酒和药品等的专卖，允许私人 and 外国银行开展营业。

此时，红色高棉也在动员他们的支持者，支持我的经济政策。大多数人民代表也都支持我。那些自由高棉分子怕暴露，只好附和多数投票反对施里玛这一伙提出的办法。

会后几天，我由于过度疲劳，住进了金边卡尔梅特医院。我的健康情况坏得很快（我当时觉得还是那些老毛病：糖尿病、胆固醇过高、尿酸过多和肝功能减退）。再者，我的同事们也不断地缠着我，使我一会儿也得不到休息。我决定到法国蓝色海岸的格腊斯去，象每两年的做法那样，在那里接受乔治·帕泰医学博士两个月的临床和营养方面的治疗。帕

泰博士不仅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实践家、杰出的医学专家，同时也是我忠实的朋友和最好的顾问，他与我建立真挚的友情已经很久了。我愿意承认，我到格腊斯去接受临床治疗，不仅仅因为我的健康情况不佳。同时也可以说，由于某些事情使我感到心灰意懒，如：

——打着人民社会同盟的招牌和在我本人推崇之下，一九六六年大选中，当选的国会议员多数是右派或极右分子，他们都是支持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施里玛达，企图把我弄得名誉扫地的阴谋诡计的人。

越南共产党在他们渗透进来的一些地方（如腊塔纳基里等地），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做为一种义务，都在更多地援助我的对手——红色高棉。

我的至交中国人，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动乱所致，也积极支持红色高棉。

我依然认为，并不象我的朋友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所想象的那样（见我同他合写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反对柬埔寨》一书），认为由于他们被财经和政治“综合症”所困，施里玛达之流会自己垮台的。我非常庄重地建议组织一次“公民投票”，让人民群众在支持或反对西哈努克的问题上自由地表态。

朗诺和施里玛达一伙感到恐惧，他既不愿意搞公民投票和召开国民大会，也不愿意搞任何民主协商，让我国同胞在当权的叛逆者和我之间进行选择。阴谋分子们告诉我，他们准备派前首相严森波和前首相、我的叔伯兄弟诺罗敦·康托尔来同我“谈判”。这主要是要我放弃人民协商，作为交换的是

每月发给我终身年金一百万瑞尔（相当于十万新法郎）。我不能接受这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勾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谈判对手”说：请宽容，让我出去吧！

朗诺、施里玛达一伙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通过恐怖的国会废除我的职务的同时，还禁止我返回柬埔寨，甚至还威胁各航空公司说，将没收接我回到（金边的）波成东机场或暹粒机场的飞机。政变以后，从消息灵通的记者 T·D·奥尔曼发表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和十八日、九月十八日）《卫报》上的文章，我才知道，如果我不顾那个禁令，我将在下飞机的时候，就会遭到绑架或暗杀。这是朗诺给那些“无限忠于”军事政变的亡命徒所特别签署的一道军事命令。

在这里公布国民议会一位女议员的第一手证词，我想一定会引起读者们的兴趣。她详细地记述了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的时候，为什么她的同事们和她本人只能投赞成废黜我的票，而不能作别的选择。我得补充介绍一下，这位证人是方炳桢夫人，在我们政府中曾两次出任大臣，她的丈夫方炳桢先生也任过我的大臣。在战争的时候，他们成功地离开了金边，并到北京投奔我。他们是我的忠实合作者和朋友。

方炳桢夫人的证词如下：

“三月八日，在朗诺政府的命令下，柴桢、占知、磅罗、龙杜和罗梅赫（都是靠近南越边界的地区）爆发了有当地群众参加的中小学生的示威游行，反对住在柬埔寨境内的越南人。他们拿的小旗上写着‘国父亲王万岁！’、‘越共滚出去！’、‘柬埔寨不是越盟的领土’、‘杀越南佬！’”

“三月十一日，金边的大、中学生继而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列队经过国民议会门前，当时议会正在召开全体会议。接着，他们又经过王宫门前，但没有在那里停留。那些领队的（都是穿便服的朗诺、施里玛达和教育大臣巧索康的人）率领着游行队伍同群众中的捣乱分子汇合走向独立纪念碑，然后转而走向越南南方临时共和革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馆。在几个坏头头的指挥下，数百名青年闯入这两个大使馆大肆进行破坏。越南外交官的手表和皮夹子被抢夺，他们在所谓的指挥部前面受到粗暴对待。他们的汽车被烧毁。使馆里的文件、档案和家俱被从窗口扔出去，游行者放火作乐。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在坏头头们的指使下，一群流氓侵入金边郊区鲁塞高的越南天主教村。他们毒打男人，强奸妇女，抢劫房舍，亵渎教堂。直到王后陛下进行干预后，才恢复了秩序。

“非常清楚，这些有组织的示威游行，目的是为了破坏西哈努克的声誉，使他名誉扫地。但是，游行中引诱群众参加政变的人，为数并不很多。

“三月十三日，又有新的行动。那天学生们到国民会议门前，群众队伍中出现许多亲王的巨幅照片，还有前面说过那样的小旗。一个小学教师偷偷地散发教育大臣在头一天给准备好了的反对西哈努克的传单。散发传单的人遭到学生们的谴责并被扭送给警察。但他很快被施里玛达下令放跑了。

“三月十七日晚上，王后陛下发表了最后一次的广播讲话。她的讲话既感动人又很巧妙，但反对朗诺的话是被禁止

的，所以王后未能揭露叛国阴谋，否则一定会激起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应。

“深夜，波成东机场被关闭；坦克车和装甲车占据了首都各战略要地，公共建筑物被军队把守。一部份上校军官兴高采烈地部署政变事宜，其余大部分上校军官反对政变，他们则被传讯或被“解决”。因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不跟他们走，朗诺和施里玛达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暴动，只好采取通过议会（因为它能给他们一个合法的假象）和军队双管齐下的办法。

“三月十八日，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于上午九时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怎样宣布国家正面临着危险以及授予政府最高权力的问题。国会议员和王国会议员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严重事件，他们看到议会被坦克车包围，感到极大的不安。会议厅里也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

“会议开幕前十分钟，议会的总务主任郑簧在过道上向议员们散布说，政府打算废黜西哈努克亲王，并选出那些不受反对的人来接替。接着，郑簧、屋艾、何来恩和柏隆星先后登上讲台控诉西哈努克的‘罪行’。他们无耻地拼凑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使与会者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建议罢黜亲王。王国会议员冯山先生胆怯地登台颂扬‘国父亲王’，并提请大会提防一切轻率的行为。他马上被拉下讲台，并当着施里玛达的面进行威胁，要他立即当众改变主意。

“十三时，叛乱者们赢了。国民议会采取恐怖手段表决通过了废黜西哈努克亲王的决议。因为与会者都知道，发表不同意见会立即招来报复，而且不管投什么样的票也都会被宣布

为一致通过的。大会至此也就闭幕了。

“接着，又开始了赞美新制度的宣传战。朗诺出钱要议员们出门走访所在各地区的佛教僧侣的首领，请求他们参加‘反对西哈努克’的活动。在各省，他们的阴谋失败了：他们所联系的和尚都拒绝同他们合作，并对他们表示，如果他们说西哈努克的不是，众信徒将‘断绝他们的生计’，或者可能杀他们的头。有些议员由反对亲王的金边和尚陪同回去，企图在他们的“选区”进行诱惑活动。他们遭到拒绝、辱骂和警告。在各省，到处发生了反对政变的示威游行。三月二十六日，磅湛人民起来造反。他们捣毁了法院和省长宅邸，要求西哈努克亲王回来。军队小心谨慎地守在营房里。

“被新政权任命为磅湛省省长的英丹先生（这是英的原籍），乘直升飞机走马上任。等候他的却是一群手持斧子和砍刀的群众，他只得急忙登上未曾灭火的汽车逃走了。省里来接的议员们也不敢下汽车，都在示威群众队伍前面掉转车头匆匆跟着跑了。两个新当选的议员金蓬先生和苏萨温先生想安抚示威群众，都被群众绑起来，进行拷问，最后剁成了几段（他们的尸体后来运到国会的会议厅前）。正住在家乡的英丹夫人被村民追捕，只好化装成农妇藏在运载香蕉的牛车上逃命。英丹的祖坟被掘……。

“在朱普，朗诺的弟弟朗尼被杀死。他的肝被割下来，拿到镇上的中国餐馆煮熟出卖。

“在川龙，国会议员何来恩的豪华住宅被焚烧，他们一家人躲进一个兵营里去避难。省里几乎所有议员的父母都在被

追捕和处死。

“磅湛省的农民自发地集合起来，征用数百辆卡车和大轿车，坚决地非武装地向金边进军。在进入金边的路口上，他们被军队截住了，并遭到机关枪的扫射，当场被打死了九十三人。人们看到，他们卡车上还挂着用高棉文写的横幅：‘国父亲王万岁！’、‘国父亲王是我们的国家元首！’六百名穷苦农民被关进监狱，受尽严刑拷打，不少人被大兵折磨致死。

“在同一个时间内，茶胶省也暴发了忠于亲王的起义。朗诺的军队在安塔松和波雷三德向起义农民开枪，又对还没有死的人投上了手榴弹，受难者多达数百人。所幸存的居民非常愤怒和绝望，只得投奔游击队。这样，就开始了忠于亲王的真正的人民抵抗运动。”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反对我的政变的序幕中，一定要提到这些阴谋家同我过去的敌人——自由高棉的头子山玉成曾多次接触，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二日，澳大利亚的米尔顿·奥斯本教授为《墨尔本时代报》采访了南越参议员、山玉成的弟弟山络源。山提到：“朗诺曾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同山玉成秘密联斋……开始就推翻西哈努克问题进行协商。朗诺到法国期间，这种交易中断了。直到一九七〇年二月，朗诺回柬埔寨以后才又恢复了接触。”“根据他哥哥的要求，朗诺有时亲自到柬埔寨和越南边境地区去会晤；有时则派出密使到那里同山见面。”奥斯本在报道这位南越参议员的谈话时指出，朗诺一谈到他所部署的“可靠”的军队，就担心届时是否还有反对政变的军

队。”朗诺他面对面地要求山玉成提供具体的帮助。山玉成他满口答应了。山玉成向朗诺保证，正在越南同美军和南越特种部队并肩作战的自由高棉和柬埔寨山民都将来帮助。”他还明确表示，要把自由高棉和“特种部队”象完全掌握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那样，完全由他来控制。

本章只是概括地回顾一下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政变之前和政变当时所发生的事件。我在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反对柬埔寨》一书中曾谈过这些事件。

令人痛心的政变标志着我的一生和高棉民族的一个新转折。今后，柬埔寨和我本人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痛苦和灾难了。我们《尝尽艰辛，受尽凌辱》，这将是下一本书的标题和中心内容。

诺罗敦·西哈努克

一九七九年八、九月于平壤

一九七九年十、十一月于北京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八〇年一月于巴黎

一九八〇年于平壤

书中主要人物一览表

(按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

A

阿伯拉罕·林肯 (1809—1865) —— 美国第十六位总统 (1861—1865) 共和党人。南北战争刚结束即被南方奴隶主指使暴徒刺杀。

阿尔贝·勒布伦 (1871—1950) ——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后一位总统 (1932—1940)。

阿尔希波夫·伊凡·瓦西里耶维奇 (1907—) —— 现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曾任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阿莱桑德里 —— 曾任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

阿伦·诺罗敦 —— 西哈努克亲王同玛尼婉之幼女。

阿密尔 —— 埃及元帅，纳赛尔的亲密战友，阿联时期分管叙利亚，1967年自杀。

阿明·达达 (1928—) —— 乌干达前总统 (1971—1979)。在任时期实行独裁恐怖统治，1979年被推翻后流亡国外。

阿斯特里德 ——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的夫人。

阿育王 —— 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国王 (约公元前 268—232)。在位期间，感到佛教适应他对外扩张和对外奴役的需要，便予以大力的扶持。传说他举行过三次佛典集结，并派人到国外布教，对佛教的传播很有影响。

阿渣坞 —— 又称阿渣汉坞。柬埔寨佛教高僧，学识渊博，曾任金边佛教学院教授，因参加反法斗争，被关进昆仑岛感化院。

埃利·儒伯 —— 法国将军，曾任西哈努克国王武装部队参谋长。

爱德华八世 (1894—1972) ——英国前国王，1936年1月登基，因决意与已离过两次婚的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成婚，于同年12月被迫逊位，后被封为温莎公爵。

艾森豪威尔·德怀特 (1890—1969) ——美国第三十四位总统 (1953—1960)，共和党人。

安东国王——柬埔寨前国王 (1841—1860)，西哈努克亲王的曾祖父。

安东宁·诺沃提尼 (1904—1975) ——捷克共产党前中央第一书记 (1951—1968)、捷克前总统 (1957—1968)。

安占国王——即柬埔寨前国王安占一世，又译安赞一世，(1515—1555)。

奥菲尔——法国人，曾任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

B

巴春——柬埔寨山玉成卖国集团分子。曾任新闻大臣，因反法被关进昆仑岛感化院，五、六十年代流亡西贡，1971年曾出任朗诺的顾问。

巴蒂斯塔 (1901—1973) ——古巴独裁卖国统治者，曾两度出任古巴总统 (1940—1944，1954—1959)。

巴东·帕花·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蓬珊莫尼公主之幼女。

巴雷斯·莫里斯 (1862—1923) ——法国小说家、散文家。

巴特夫人——西哈努克亲王的外曾祖母，哈萨甘亲王的夫人。

巴乌希斯——希腊神话中弗里及亚的老农妇。她和丈夫菲利门殷勤款待了微服巡访的宙斯和赫耳墨斯。因此，受到神的赏赐，把他们的小房变成宫殿，并使夫妇二人同时寿终。巴乌希斯变成椴树，菲利门变成栎树。

班达拉奈克·西里玛沃·拉特瓦泰·迪亚斯 (1916—) ——斯里

兰卡前总理、自由党主席。

班英——柬埔寨老政治家，山玉成分子。

保大皇帝（1913—）——越南傀儡皇帝，原名阮文瑞，1926—1945年继承王位。为越南阮氏王朝第十三代皇帝。1949年又以“立宪君主”名义在南越复辟，1955年被吴庭艳废黜，后来流亡法国。

保宁一世——希腊国王。1927年继承其兄乔治二世的王位。

贝当（1856—1951）——全称亨利·菲利普·贝当。纳粹德国占领时期法国维希政府首脑。因投降德国，1945年8月以通敌罪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

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贝尔纳·格罗斯里埃——法国著名学者，远东研究所成员，吴哥古迹管理委员会负责人。

贝尔朱安——曾任法国驻柬埔寨代理高级专员。

贝纳尔——曾任法国驻柬埔寨菩萨省专员。

贝却敌·威尔弗雷德——澳大利亚记者，西哈努克亲王之友，著有《沿湄公河而上》。

本·赫达——阿尔及利亚前总理。

本亲王——柬埔寨十八世纪的一位王储。

宾达拉公主——柬埔寨国王西索瓦的王妃，诺林德亲王的母亲。

宾努（1906—1985）——柬埔寨前首相，被封为亲王。抗美援朝时期任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1975年全国解放后任民主柬埔寨主席团高级顾问。1971年1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后来北京，后到法国定居。

波德戈尔内·尼古拉（1903—1983）——苏联共产党前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1977）、苏联最高苏维埃前主席团主席（1965—1977）。

波尔布特（1925—）——原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1962—1981年）。在此期间曾任民主柬埔寨总理（1976—1979）。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后，1979年12月任民主柬埔寨国民军最高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1985年8月退休，被任命为最高国防研究院院长。

波隆托——先后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内政、商业、工业国务秘书，朗诺政变后任工业大臣（后改为工业部长）。

拔示巴——《圣经·旧约》中人物，拔示巴原为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大卫在屋顶上看见她沐浴，便派人把她接走，与她同房。她怀孕以后，大卫设计谋杀乌利亚，娶了她。此事使耶和华不悦，于是让大卫与拔示巴所生之子病死。但后来他们又生了所罗门、押沙龙、暗嫩和他玛。大卫年迈时，应拔示巴的要求立誓让所罗门接续他的王位。

博夫人——西哈努克亲王的岳母，莫尼克的母亲。

博卡萨·让·贝德尔（1921—）——前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一世。

博拉埃尔——前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1906—1982）最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前书记处总书记（1966—1982）、苏联最高苏维埃前主席团主席（1977—1982）。

柏隆星——曾任柬埔寨国民议会议员，六十年代任王国政府社会福利和劳工副国务秘书。

卜·德斯库马——曾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外交部新闻司长，抗美援朝时期任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副大臣，全国解放前病逝在丛林中。

卜京——六十年代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外交部秘书长、王位最高委员会委员。朗诺政变后曾出任驻日本大使。莫尼勒亲王的妻舅。

卜图尔——曾任西哈努克国王的副官。莫尼勒亲王的妻舅。

卜婉娜——柬埔寨前首相秀的外孙女，莫尼勒亲王的夫人。

卜夏——柬埔寨前首相秀的女婿，莫尼勒亲王的岳父。

布洪——西哈努克亲王的表舅（其母潘薇拉公主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外祖母之妹），亲日派。

布什（1914—）现任美国副总统，共和党人。曾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1974—1975）、美国中央情报局长（1976—1977）。

C

查尔斯·林德伯格——1929年第一个征服大西洋的美国人。

查士丁尼——东罗马帝国皇帝。

柴斯特·鲍里斯——1968年被任命为尼克松总统的特别代表，率领美国代表团访问柬埔寨。

长征（1907—）——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陈豹——柬埔寨华裔大资本家，原籍中国福建省。

陈茂——柬埔寨反法民族主义集团“陈茂集团”的首领。

周坤·巴特夫人——西哈努克亲王的外曾祖母，哥莎玛王后的外祖母。

春普尔——六十年代美国驻柬埔寨大使。

慈乃旺·西索瓦——柬埔寨王族成员，西哈努克亲王中学时期同学。

崔庸健（1900—1976）——曾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57、1962和1967年连续三届当选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72年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D

达春——即春·莫舒皮，又译达琼和琼莫舒皮。曾任柬埔寨公安部队总司令、王国政府安全大臣和宗教大臣。1958年出任暹粒省省长、王国驻暹粒省代表、任暹粒省军区司令时进行叛国活动，阴谋败露后逃

向泰国边境，1959年3月3日被伏兵捕获，因伤重而死。

达特夫人——西哈努克亲王的岳母，莫尼盖珊公主之母。

大卫国王——《圣经·旧约》中以色列国王。他原是伯利恒人耶西的小儿子，幼时被派到宫里为国王扫罗弹琴。扫罗死后，大卫受旨为犹太王，多次攻侵邻族，扩紧领土，统一犹太各部落，成了犹太和以色列王。他妻妾众多，儿女成群，大卫最后遗命所罗门继他为王。

戴布瓦松·菲利普·阿梅代——法国人，曾任西哈努克国王的副官。

戴高乐（1890—1970）——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40年曾任法国国防部次长，德国侵占巴黎后，出奔英国，随后组织和领导“自由法国”（后改称“战斗法国”）运动。法国解放后，组织临时政府，亲自出任主席。1958年任总理。1959年1月至1969年4月任第五共和国总统。1970年病逝。

戴雷蒙——曾任法国驻柬埔寨专员。

戴罗妈妈——法国人，曾任柬埔寨王宫管事。

戴薇——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夫人。

道格拉斯·费尔里1968年访柬美国代表团成员。

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早期作品受浪漫派影响，后在印象派和象征派诗歌影响下，开创了音乐上的印象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写过一些接触社会生活的作品。

德尔戴——1954年法国军队准将，法国驻印度支那部队的司令代表。

德古·让——四十年代法国海军上将，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

德朗——原法国民事专署主任，曾任驻柬外交、司法和行政事务顾问和专家。

德洛夫人——曾任法国索米尔市布当旅馆招待科长，后来负责柬埔寨王宫礼宾工作。

德斯——柬埔寨佛教僧王。

德雅尔丹——曾任法国驻柬埔寨新闻处处长。

迪安·阿赫逊——美国前国务卿，美国著名律师。

迪奥里·阿马尼（1916—）——尼日尔前总统（1960—1974）。

迪科鲁瓦——曾是法国海军上校，法国驻印度支那体育和青年高级专员。

迪罗絮——四十年代法国将军，索米尔军校校长。

狄摩西尼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古希腊著名演说家。他的演说在罗马时代和后世被认为是古希腊散文的典范。

迪·萨薇——柬埔寨电影女演员。

迪韦尔——四十年代法国驻柬埔寨戈公省专员。

狄潘——五十年代先后任柬埔寨国家银行副行长、国民经济大臣、副首相、马德望省长，六十年代先后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计划大臣、内政和宗教大臣、金边市长。

狄秋根——1930年毕业于巴黎高等电影研究学院，在法新社工作多年。六十年代任《柬埔寨电讯报》副总编，柬埔寨新闻社社长、新闻国务秘书。

蒂埃里·阿尔让留——四十年代法国海军上将，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

蒂博多——曾任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

蒂利埃尔——四十年代法国骑术队员，后来任金边军校校长。

丁宁——柬埔寨王国军队少校，六十年代任西哈努克亲王的副官，1970年11月参加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董乌——柬埔寨民主党成员，曾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巡回大使。现任宋双派对外发言人。

杜大福——越南人，西哈努克亲王中学时期同学，后参加越盟，先后进行抗日和抗法斗争。

杜勒斯·艾伦·威尔什 (1893—1969) —— 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弟弟，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杜勒斯·约翰·福斯特 (1888—1959) —— 美国前国务卿 (1953—1959)，共和党人。

杜麦纳 —— 曾任法国外交部礼宾司长。

杜萨迪·西索瓦 —— 西哈努克亲王的女婿，巴东·帕花公主之前夫。

多列士·莫里斯 (1900—1964) —— 法国共产党前总书记。

多米尼克·尤德旺 —— 柬埔寨前首相尤德旺亲王的夫人。

多田熊 —— 侵柬日军中尉，负责西哈努克国王的安全保卫工作。

E

俄狄甫斯 —— 希腊神话故事中人物。他是底比斯王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因神曾预言他将杀父娶母，出生后就被父亲遗弃，被牧人救起，由科任托斯王波吕玻斯收养。长大后，在无意中杀死亲生父亲，来到底比斯后，因除掉怪物斯芬克斯被拥为新王，并娶了前王之妻，即他的生母伊俄卡斯忒为妻，生子女四人，后瘟疫流行，神谕必须除掉杀死前王的罪人才能消灾，他追究原因，才知自己已杀父娶母。伊俄卡斯忒知道后自缢，他悲愤地刺瞎双眼，流浪而死。

恩克鲁玛·克瓦米 (1909—1972) —— 加纳共和国前任总统 (1960—1966)。

F

法鲁克·福阿德 (1920—1965) —— 埃及末代国王。1936年继承王位，1937年正式登基，称法鲁克一世。1952年被纳赛尔推翻，后逃亡意大利。

法特玛哇蒂 ——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夫人。

樊尚·奥里奥尔 (1884—) —— 法国政治家，1947年任共和国总统。

范文同 (1906—) —— 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总理、国防会议副主席。

范仲仁 —— 曾任越南共和国驻柬埔寨代表。

方炳楨 —— 曾先后担任柬埔寨王国政府教育部总局长、王位最高委员会秘书长，1972年参加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方炳楨夫人 —— 曾先后任柬埔寨国会议员、教育副国务秘书、劳工和社会福利国务秘书、公共卫生、社会事务和劳工大臣，1972年参加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菲利门 —— 希腊神话中人物。见“巴乌西斯”。

菲利普·哈比卜 —— 1968年访问柬埔寨的美国代表团成员。

费利克斯·古安 —— 法国前总理。1961年1月接戴高乐将军的职务。

费留宾·尼克拉·帕夫洛维奇 (1908) —— 苏联前外交部副部长。

冯山 —— 曾任柬埔寨王国议会议员。

佛朗哥·巴蒙德 (1892—1975) —— 西班牙前国家元首，前部长会议主席 (总理)，西班牙长枪党前领袖。

符宁 (1932—) —— 法学博士，六十年代先后任柬埔寨国会议员、国会第二副主席，王国政府副国务秘书，国务秘书，〈民族主义者〉周刊主编、记协副主席，柬中友协第一副主席。抗美援朝时期，任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新闻、宣传大臣。

福特·杰拉尔德·鲁道夫 (1913—) —— 美国第三十八位总统 (1973—1977)，共和党人。

弗雷德丽卡王后 —— 希腊国王保罗一世的妻子。

富阿德·艾哈迈德 (1868—1936) —— 即埃及国王富阿德一世。

富里萨拉·诺罗敦（1919—）——任多次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外交大臣，1972年参加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任该阵线首都金边市委员会主任、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不管部大臣。

富马·梭发那（1901—）——老挝亲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顾问、原万象政府和联合政府首相。

富米·诺萨万——曾任老挝王国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1962年6月作为右派代表参加联合政府，任副首相兼国防大臣。1965年2月兵变失败后逃亡泰国。

G

甘布——柬埔寨神话中人物。据传，二千多年前，从印度来了一位叫甘布的亲王和当地的娜亚女王结合，共同建立了柬埔寨。

甘地，英迪拉（1917—1985）——印度前总理兼国防部长、计划部长和原子能部长，国大党（英迪拉派）前主席。

甘蒂威达——十七世纪佛教哲学家。

甘霍——西哈努克亲王的前妻，曾是柬埔寨王家芭蕾舞团演员。

甘塔·帕花，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与蓬珊莫尼之次女。

高达——柬埔寨自由高棉分子。

高乌法师——曾任巴东·瓦岱寺住持，救过西哈努克国王，后被封为佛教僧王。

哥莎玛王后——全称为西索瓦·莫尼旺·哥莎玛·尼亚里丽王后。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1974年病故于北京。

戈培尔·保罗·约瑟夫（1897—1945）——纳粹德国宣传机构首脑，战犯。“戈培尔”一词后来成了造谣诽谤、进行法西斯宣传的同义词。

戈蒂埃·乔治——曾任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和驻柬埔寨高级专

员。

戈尔贝——西哈努克亲王的老师，曾任法国驻柬埔寨的总学监。

古伦——曾多次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国家安全和地面防御国务大臣，国家警察局局长。

H

哈蒂妮——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夫人。

哈尔雅蒂——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夫人。

哈萨甘，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外曾祖父，诺罗敦国王之子。

韩·潘拉西——又名韩杭曾任西哈努克国王的秘书。后来担任过副国务秘书，驻印尼、日本、菲律宾、古巴大使。

韩桑林（1934—）——柬埔寨傀儡政权头目，现任伪“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韩素音女士（1917—）——英国女作家、医生周光瑚（曾用名周月宾）的笔名，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丈夫陆文星是印度人。

韩通哈——曾任柬埔寨王家艺术学院院长，一九七〇年追随朗诺政变，当过伪政权的部长、总理。

何来恩——西哈努克亲王中学时期之好友，曾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大臣，一九七〇年追随朗诺政变，当过伪国会议员、伪政府顾问。

赫伯特·斯比瓦克——一九六八年访问柬埔寨的美国代表团成员。

赫费尔——法国人，曾任南越一省省长。

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1894—1971）——苏联共产党前中央第一书记（1953—1964）、苏联前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

亨利·卡伯特·洛奇——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胡达法师 —— 柬埔寨佛教学院前院长，后被封为柬埔寨佛教大部派僧王。

胡荣（1928—） —— 经济博士，先后担任法学院教授，柬埔寨王国国会议员，王国政府预算、计划、公共卫生国务秘书。抗美战争期间任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内政、乡村改革、合作社大臣。

胡志明（1890—1969） —— 越南劳动党前主席（1951—1969）、越南民主共和国前主席（1946—1969）。

黄晋发（1913—） —— 前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1969—1976）。现任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黄意 —— 柬埔寨王国政府前首相兼宫廷大臣和财政大臣。

辉根托 —— 柬埔寨民主党人，曾任中学教员，后来任首相、驻苏联大使。

霍尔特 —— 澳大利亚前总理。

霍梅尼·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1902—） —— 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最高国家元首。

J

吉滴卡宗（1911—） —— 即他依·吉滴卡宗 —— 泰国前总理兼国防部长。

基辛格·亨利·艾尔弗雷德（1923—） 美国前国务卿（1973—1977）。

加洛瓦 —— 曾是法国著名将领勒克莱尔将军的特使，当时是法国军队少校。1945年被派到印度支那的第一批戴高乐“解放法国”武装力量的指挥官。

加斯东·巴罗尔 —— 曾任法国驻柬埔寨的特命大使。

加斯东·德菲尔 —— 曾任法国马赛市长、政府部长。

贾丕才（1921—）——即米哈伊尔·斯捷帕诺维奇·卡皮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1960—1970年曾任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后改任第一远东司司长。

姜沙烈——柬埔寨山玉成分子。

姜万（1916—）——曾任柬埔寨民主党总书记，后任进口公司董事长，抗越战争开始后曾任宋双派的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副主席。

杰奎琳·肯尼迪——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夫人。

金蓬——柬埔寨朗诺发动政变后当选国会议员。

金日成（1912—）——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

久保田——日本侵略柬埔寨时，任日本驻柬埔寨王廷和王国政府的高级顾问。

居约——曾任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

K

卡尔·斯德隆——曾任美国驻柬埔寨大使。

卡门——西班牙前国家元首佛朗哥的夫人。

卡斯特罗·菲德尔（1926—）——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5）、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1976）、部长会议主席（1959）。

卡斯特罗·劳尔（1931—）——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第二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革命武装部长，大将。

卡瓦耶·皮埃尔——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法国骑兵，曾任枫丹白露骑术中心的首席指挥官，法国马术队队长。

卡扎菲·奥马尔·穆阿迈尔（1942—）——利比亚“九·一”革命领导人，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上校。

卡薇夫人——西哈努克亲王的岳母，甘霍之母。

凯未尔·穆斯塔法 (1881—1938) —— 土耳其共和国奠基人、第一任总统。

凯山·丰威汉 (1920—) ——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

凯撒 (公元前 100—公元前 44) —— 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曾建立独裁统治。后来成为西方帝王习用的头衔。

康托尔·诺罗敦 —— 西哈努克亲王的堂兄。曾几次担任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兼内政或外交大臣、王国议会议长、王位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宫廷事务总监。

考地略 —— 西班牙语“军事首领”、“司令官”的意思。这里指的是佛朗哥的称号。

科戴斯 —— 法国远东教派成员，专门研究佛学。

科尔贝 —— 曾任法国驻柬埔寨总学监。

科罗斯·雅克·科斯塔 —— 法国人。西哈努克国王组织的蓝球队队长。

柯迪·坎帕尼 —— 美国人。六十年代主管美国援助柬埔寨事务的负责人。

柯西金·阿列克谢·尼克拉耶维奇 (1904—1980) —— 苏联共产党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前部长会议主席。

克伦威尔 —— 十七世纪英国共和国时代的摄政者。

克马努拉·诺罗敦 —— 西哈努克亲王与蓬珊莫尼公主之幼子。

肯尼迪，爱德华·穆尔 (1932—) ——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美国参议员，民主党人。

肯尼迪·罗伯特 ——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美国参议员，民主党人。

肯尼迪·约翰·菲兹吉拉德 (1917—1963) —— 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民主党人。

坤娜夫人西哈努克亲王的岳母，蓬珊莫尼公主之母。

L

拉赫曼·东古·阿卜杜勒（1903—）马来西亚前总理。

拉金德拉·普拉沙德（1884—1963）——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50—1962）

拉纳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与甘霍之长子。

拉斯美·索帕娜——西哈努克亲王的姑母。

拉塔里·西索瓦——柬埔寨卖国集团头目施里玛达亲王的父亲。

拉威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同蓬珊莫尼之次子。

朗格拉德·巴隆·戴——法国军队将军，曾任索米尔军校校长，驻柬埔寨法国军队司令。

朗尼——柬埔寨叛国集团头子朗诺的弟弟。

朗农——柬埔寨叛国集团头子朗诺的弟弟，朗诺统治时期任武装力量协调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情报局负责人。

朗诺（1913—1985）——柬埔寨王国前首相。1970年3月18日发动反动政变，自任“高棉共和国”总统。

朗斯德尔——四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南越的头目。

勒克莱尔——法国将军，后晋升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曾征战于北非、德国、印度支那等地。

勒图尔努——曾任法国同联邦成员国联络部部长。

雷蒂——比利时前国王利奥波德的夫人。

雷内·莫里宗——法国人，曾任西哈努克国王的私人顾问。

黎笋（1907—）——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书记。

里什·阿尔芒——法国医学博士，曾任柬埔寨宫廷御医、西哈努克国王的私人医生。

里斯特鲁西——曾任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

李光耀（1923—）——新加坡总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

李丽安娅娜——比利时前国王利奥波德的夫人。

利奥波德——比利时前国王。

林肯——见阿伯拉罕·林肯。

龙萨（1524—1585）——法国诗人。是法国最早用本民族语言，而不是用拉丁文写诗的桂冠诗人。

卢贝——曾任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

銮披汶·颂堪（1897—1964）——泰国前总理兼国防部长，自升为陆海空军元帅。

罗曼·朱尔（1885—1972）——法国作家。原名路易·法里古勒。“一体主义”诗歌的倡导者。文学上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善意的人们》和讽刺剧《克诺克医生或医学的胜利》（1923）以及《特鲁哈代克》三部曲（1923—1930）。

罗塞特卜——柬埔寨前首相莫尼勒亲王的夫人卜·婉娜的别名。

M

马蒂威特——法国米尔蒙特市市长，后曾任西哈努克国王的顾问。

马丁弗·黑尔兹——美国职业外交官，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维也纳、巴黎、金边、东京使馆任职，写过《柬埔寨简史》等著作。

马卡帕加尔·迪奥斯达多（1910—）——菲律宾前总统（1961—1965）。

马科姆·麦克唐纳——曾任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

马里于斯·穆泰——四十年代法国殖民部长。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年）于公元前336即位后，残酷镇压希腊各城邦的反马其顿运动。为掠夺土地和财富，大举侵略东方，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病死后，整个帝国迅即瓦解。

马西亚斯·恩圭马（1924—1979）——即马西埃·恩圭马·比约戈·涅格·恩东，赤道几内亚前总统（1968—1979）

马左·莱尔德·P·奥斯本——美国侵略军空军驾驶员，1969年2月12日在柬埔寨柴桢上空被击落、被俘。

玛格丽特·费兹哲罗小姐——1968年访问柬埔寨的美国代表团成员。

玛尼婉·帕尼旺——西哈努克亲王的前妻，老挝人。

麦格赛赛——菲律宾前总统。

麦克·曼斯菲尔德——美国前参议员，民主党人。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

曼特农夫人（1635—1719）——原名弗朗索瓦·奥比涅，是法国作家斯卡龙的妻子，1660年开始守寡，1684年同路易十四秘密结婚。

毛赛——曾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大臣、人民社会同盟副书记、《民族主义者》周刊社长兼总编辑。朗诺政变后，任伪国务部长、总统特别顾问。

蒙巴顿勋爵（1900—1979）——英国著名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联合作战部司令官。1944年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官。1947年任驻印度总督。1979年被暗杀。

蒙达那·诺罗敦——柬埔寨进步党创建人。曾任柬埔寨王国议会会议长。

蒙公主——西哈努克亲王之姑母。

孟戴斯·法朗斯·皮埃尔（1907—）——法国前总理，激进社会党领袖之一。

弥勒佛——佛教菩萨之一。《弥勒下生经》说他从“兜率天”下生此世界，在龙华树继承释迦牟尼的佛位而成佛。

弥赛亚——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

莫洛亚·安德列（1885—1967）——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原

名爱米尔·埃佐格。1926年发表小说《贝尔纳·盖奈》而成名。1918年曾以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布朗勃上校的沉默》。他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传记和历史著作，而传记最有特色。

缪塞（1810—1857）——世界著名的法国诗人。

缪斯——希腊神话中文艺女神的统称。

莫洛托夫（1890—）——全称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前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即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

莫尼盖珊·西索瓦——西哈努克亲王的前妻。

莫尼克·伊吉——即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西哈努克。

莫尼勒·西索瓦——莫尼旺国王之长子，西哈努克亲王的舅父，曾任柬埔寨王位最高委员会主席，王廷最高会议顾问，王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私人代表。

莫尼庞·西索瓦——莫尼旺国王之次子，西哈努克亲王的舅父，曾任柬埔寨王国首相、驻法国高级专员。

莫尼旺·西索瓦——柬埔寨前国王（1927—1941年在位）西哈努克亲王的外祖父。

N

拿破仑——一般指的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即拿破仑·波拿巴特（1769—1821）。

纳拉迪波·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与莫尼盖珊公主之子。

纳赛尔·加麦尔·阿卜杜勒（1918—1970）——埃及前总统（1956—1970）。1952年7月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1953年6月埃及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副总理、总理、代总统、总统兼总理。

纳瓦尔——五十年代初，任驻印度支那法国武装部队司令。

奈温（1911—）——原名德钦秀貌。缅甸前总统，缅甸社会主义

纲领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南芳——越南傀儡皇帝保大的皇后。

尼赫鲁·贾瓦哈拉尔（1889—1964）——印度首任总理。

尼克松·理查德·米尔豪斯（1913—）——美国第三十七届总统，共和党人。

尼亚尔——西哈努克亲王的前妻甘霍和乍华之子。

涅·刁龙（1910—）——曾先后任柬埔寨王国省长、金边市长、基里隆市长、内阁大臣，王国武装部队总监、司令、参谋长，多次出任驻外大使。

农金尼——先后任柬埔寨国王办公室主任、内阁副首相、外交大臣，曾出任驻美国、印度、泰国大使。

农顺——原人民派领导人。

农谢（1926—）——原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努呼——柬埔寨王国武装部队少将、空军司令兼参谋长，1970年5月参加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同时任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公共卫生、宗教和社会事务大臣。

诺尔·St·克莱尔·德湛普斯——六十年代澳大利亚驻柬埔寨大使。

诺丽亚·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前妻。

诺林达拉邦·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同莫尼克之幼子。

诺林德·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堂叔，自由党的创建人，多次出任驻外大使。

诺罗敦国王——西哈努克亲王的曾祖父，柬埔寨前国王（1860—1904年在位）。

P

帕花黛维·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同甘霍之长女。

帕特里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夫人。

帕托利切夫·尼克拉·谢苗诺维奇——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

潘迪特·尼赫鲁——“潘迪特”是学者、博学者的意思，在印度则用作尊称。这里是对尼赫鲁的尊称。

潘拉西——柬埔寨人。四十年代任西哈努克国王的私人秘书。

潘薇拉公主——西哈努克亲王的外祖母（莫尼旺国王的王后）的妹妹，布洪的母亲。

抛·斯里雅农——泰国前内政部长、警察司令。

佩差拉——苏发努冯亲王的同父异母哥哥，老挝王族的族长，曾任法兰西印度支那政府委员会成员。

蓬巴杜夫人（1721—1764）——法国侯爵夫人，路易十五的情妇。

彭江莫尔——柬埔寨前首相秀家族成员，山玉成分子。

蓬皮杜·乔治（1911—1974）——法国前总统（1969—1974）。

蓬珊莫尼·西索瓦——西哈努克亲王的前妻。

皮埃尔王子——希腊王子。

皮尼翁——曾任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

普雷尹——柬埔寨自由高棉头目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普密蓬·阿杜德（1927—）——泰国国王（1950年5月5日登基为拉玛九世）

Q

乔答摩——瞿昙的另一译法。古代天竺人的姓。旧时因释迦牟尼姓乔答摩，故常以乔答摩代表释迦牟尼。

乔森潘（1931—）——民主柬埔寨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民主柬埔寨方面主席。曾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

乔治·皮杜尔——曾任法国外交部部长。

巧索康——柬埔寨法律教授，曾任国会第二副主席。参加朗诺政变，任工业、矿业和渔业部长。

钦迪——柬埔寨王国前首相、大臣，朗诺政变后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

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厄洛斯。

R

让·巴雷——法国记者，本回忆录《序》作者。

让·桑德尼——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的法国代表。1946年曾作为法国代表与胡志明主席谈判。

儒贝——五十年代初任西哈努克亲王的部队参谋长。

阮财基——曾任柬埔寨王国铁路总局长、外交部秘书长、公共工程和邮电大臣。

阮基石（1922—）——越南外交部长。

阮维桢（1910—）——越南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阮文绍（1923—）——原南越“越南共和国”总统（1967—1975）。

阮友寿（1910—）——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副主席。曾于1962—1964年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69—1976年任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

S

萨德——这里比喻虐待狂者。

萨勒——法国在西贡办的学校沙增·罗巴中学的校长。

撒母耳——《圣经·旧约》中希伯来成为先知后，奉耶和华之母命，遵照民意，立扫罗为王。后因扫罗违背神命，便秘密立大卫为以色列王。

塞拉西，海尔（1892—1975）——即埃塞俄比亚前皇帝塞拉西一世。

桑萨里——五十年代任柬埔寨王廷最高顾问及内阁副首相，后来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1959年与山玉成勾结，密谋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阴谋败露后逃往南越。

桑山——柬埔寨自由高棉头目。

沙立·他那叻（1908—1963）——泰国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前总理、前国家社会党主席。

沙洛特绍——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的原名。

沙士鲁·罗巴·普罗斯佩（1805—1873）——法国国务活动家，曾任海军部长、内阁总理。在任期间，宣布对交趾支那进行吞并，建立对柬埔寨的保护制度。

山玉成（1908—）——下柬埔寨人。原民主党领导人。日本占领时期，任柬埔寨傀儡政府首相。反动组织“自由高棉”的首领。朗诺统治时期任高棉共和国总理。

山玉明（1913—1972）——下柬埔寨人，原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山斋源——柬埔寨“自由高棉”头子山玉成的弟弟，曾任南越国会议员。

沈法（1906—）——柬埔寨有名的亲日派，先后担任王国政府首相，计划、外交、国防大臣，驻日本大使。1970年参加朗诺的反动政变。

圣雄甘地（1869—1948）——即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印度民族运动领袖，提出“非暴力抵抗”口号和“不合作运动”方案。

施里玛达·西索瓦 (1914—1975) ——柬埔寨王国前副首相、驻中国大使。1970 年与朗诺勾结，发动反动政变，任“高棉共和国”副总理、总理代表兼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

诗丽吉王后 —— 泰国国王普密蓬的王后。

狮心王理查 (1157—1199) —— 即理查一世，英国金雀花王朝国王 (1189—1199)，绰号“狮心王”。

石端 —— 下柬埔寨人，柬埔寨药理学教授、生物学专家。

石夫人 —— 柬埔寨国王莫尼旺的妃子，曾一度是西哈努克亲王的情妇。

释迦牟尼 (约公元前 565—公元前 485) —— 佛教创始人。

斯拉波 —— 柬埔寨叛国分子达春的弟弟。曾任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因积极参加其兄的叛国阴谋活动，1960 年 1 月 30 被判处死刑。

宋成 (1930—) —— 民主柬埔寨方面副主席、民柬国民军总司令、民柬联合政府国防协调委员会成员。曾任民柬政府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

宋桑阿 —— 柬埔寨电影摄影师。

宋双 (1911—) ——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总理、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主席。曾任王国政府首相。

宋云西 —— 曾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国防大臣、驻联合国代表，驻法国、英国、美国大使。

苏发努冯 (1909—) ——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老挝最高人民议会主席、老挝建国战线 (原名爱国战线) 中央委员会主席，亲王。

苏哈托 (1921—) —— 印度尼西亚总统，陆军上将。在 1965 年“九、三〇”事件后，接管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

苏加诺 (1901—1970) ——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任总统 (1949—1965)。1965 年“九、三〇”事件后，权力被军人政权接管。

苏佳塔·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同玛尼婉之长女。

苏拉马里特·诺罗敦 (1896—1960)——西哈努克亲王的父亲，
1955—1960 年继西哈努克亲王的王位登基为柬埔寨国王。

苏丽亚·伦赛·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同蓬珊莫尼之长女。

苏里亚瓦尔曼二世——柬埔寨吴哥王朝国王 (1113—1150 年
即位)。

苏南——曾先后担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大臣、国会副议长、柬中友协
主席。

苏萨温——朗诺分子，1970 年“三、一八”反革命政变时在磅湛地
区当选为国会议员。

苏他罗·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祖父，前国王诺罗敦之次子。

苏他罗王妃——西哈努克亲王的祖母。

孙德胜 (1888—1980)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前主席。

索波塔——西哈努克亲王的女婿，巴东·帕花公主的丈夫。

T

他纳·科曼 (1914—) ——泰国副总理，民主党主席。

塔薇·西索瓦——西哈努克亲王的岳母，诺丽亚公主的母亲。

泰雷兹·勒鲁夫人——比利时大银行家的遗孀。

唐·璜——原西班牙传奇人物，是一个荒淫贵族，屡见于西方诗
词、戏剧中。

堂吉珂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珂德》中的主人
公。

铁托·约瑟普·布罗兹 (1892—1980)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
联盟前主席、南斯拉夫前总统、联邦主席团前主席。

托尔——西哈努克亲王的小名，后来又用作笔名。

托马斯·杰斐逊 (1743—1826) 美国第三位总统 (1801—1809)。

W

瓦克里万·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前妻诺丽亚公主的前夫。

婉娜·莫尼勒——见卜婉娜。

威恩·摩尔斯——美国前参议员。

威利亚·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堂弟，曾任柬埔寨公安部队司令、王廷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国政府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威桑达拉——佛教徒对释迦牟尼的尊称。

威山塔拉——佛教故事中的人物。

维亚—内拉托尔——四十年代任法国索米尔军校步兵教官，后任柬埔寨金边军校校长。

魏刚（1867—1965）——法国将军，法国科学院院士。1939年任驻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军总司令。参加制定法英1940年进攻苏联计划。1940年5月19日，因法、英、比联军节节失败，损失惨重，甘未林将军被撤销统帅职务后，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谋长和法军总司令。魏刚是法军投降的主谋者之一。

温洪——柬埔寨自由高棉分子。

文翁（1908—1980）——即文翁·纳占巴塞亲王，老挝前王国总监（1962）、前王国政府首相（1960）。1975年被废黜下寮王的地位，同年被缺席判死刑。1976年逃往法国，1980年死于巴黎。

翁谦戎——1957年任驻老挝首任大使，后任柬埔寨一省省长。

乌利亚——《圣经·旧约》中说：乌利亚妻子拔示巴容貌甚美，被大卫命人接去，与她同房。接着，大卫派乌利亚到约押那里，让他到最危险的地方，结果死在那里。

屋艾——柬埔寨国会议员。

吴丹（1909—1974）——缅甸外交家，联合国前秘书长（1962—1971）。

吴努 (1907—) —— 缅甸前总理。

吴庭儒 —— 南越伪总统吴庭艳的弟弟。

吴庭艳 (1901—1963) —— 原南越的“越南共和国”总统 (1955—1963), 后在杨文明发动军事政变中被击毙。

武元甲 (1911—) —— 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越南政府副总理, 大将。

X

西尔韦斯特 —— 法国将军, 曾任驻印度支那总督。

西古拉尼 —— 四十年代任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

西哈莫尼·诺罗敦 —— 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的长子。

西哈努克·诺罗敦 (1922—) —— 本书作者。民主柬埔寨主席 (1982) 曾于 1941 年任国王, 1955 年放弃王位, 任人民社会同盟主席。同年任王国政府首相兼外交大臣。1960 年任国家元首。1970 年任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西里·巴扎 —— 埃及封建领主, 法鲁克王朝的首相。

西伦凯维兹·约瑟夫 (1911—) —— 波兰部长会议前主席、波兰国务委员会前主席。

西萨旺·冯 —— 老挝前国王。

西萨旺·瓦达纳 (1907—) —— 老挝前国王 (1959—1975), 西萨旺·冯国王的长子。

西赛罗 (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 —— 古罗马的政治家, 演说家, 也是杰出的散文作家。

西索瓦 —— 西哈努克亲王的曾叔祖, 1904—1927 年任柬埔寨国王。

希肯 —— 美国佛蒙特州参议员。

希肯鲁佩 —— 美国共和党议员。

希特勒·阿道夫（1889—1945）——纳粹德国元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法西斯头子。

夏卡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同蓬珊莫尼之三子。

谢桑——曾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国务秘书、代理大臣、驻苏、波、蒙大使。朗诺政变后任柬民族统一阵线政治局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司法、司法改革大臣。

辛普森夫人——英国温沙公爵（即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的夫人，美国人。

肖邦（1810—1849）——波兰作曲家、钢琴家。

谢光宝——曾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副外长。

秀——柬埔寨王国前首相，秀氏家族的始祖。

秀臣（1920—）——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卫生和社会事务协调委员会成员。曾任王家医科大学校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卫生大臣，民柬政府卫生部长。

秀木（1925—）——民主柬埔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曾长期在法国工作。1970年任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经济和财政大臣，后任民柬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秀蒲拉西（1930—）——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任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协调大臣。

秀珍——秀首相的孙女，秀臣的妹妹。

秀宗（1924—）——曾任金边大学教授、私营工商业公司经理。后来担任民柬政府经济和财政部长。

Y

雅格涅夫——苏联作家，曾著有《东南亚国家概况》。

雅克师傅——雅克师傅原为莫里哀《吝啬鬼》中身兼厨师和马车夫的人物。这里意为“大管家”的意思。

严森波（1914—）——曾任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1949—1950），后来任过朗诺内阁第二副首相。朗诺发动反动政变后，先后担任伪国会议长、内阁部长等。

扬森安（1919—）——柬埔寨将军，曾任王国政府国防大臣、王家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总监。朗诺政变后，任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军需、军备大臣。现在法国定居。

扬四洲——四十年代留法学生中的激进派，后来是民主党和抗法伊沙拉克领导人。

叶夫人——柬埔寨国王苏拉马里特的宠妃。书中有时亦称叶小姐。

伊俄卡斯忒——希腊神话中人物。见俄狄甫斯。

伊冯娜大婶——人们对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夫人的称呼。

依吉·弗朗索瓦——西哈努克亲王的岳父，莫尼克的父亲。莫依吉的父亲是法国籍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布列塔尼人。

伊卡洛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和父亲一起被关在克里特的迷宫里，父子二人身上装着用羽毛和蜡制的双翼逃出克里特。由于忘记父亲的嘱咐而飞近太阳，蜡翼遇热融化，坠海而死。

莫丹（1922—）——民柬联合政府国防协调委员会成员。曾任王国政府大臣、省长。1970年参加朗诺政变，任伪国会议长兼磅湛省长、第一军区司令、第一副总理、总理等职。1981年任西哈努克的“民族团结阵线”副主席兼武装部队司令。

英萨利（1925—）——民柬联合政府财政和经济协调委员会成员。曾任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常委。1970年被任命为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国内特使到北京同西哈努克亲王一道工作。1975年任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负责外交事务副首相。1976年任民柬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

游·班纳嘎——西哈努克亲王的连襟。

游格——柬埔寨民主党的领导人，1949年在民主党内斗中被炸死。

游扬——自由高棉分子。

尤德旺·西索瓦——柬埔寨叛国集团头目施里玛达的叔父，曾任王国首相。

尤根托·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伯祖，诺罗敦国王的长子。1884年被诺罗敦国王派到巴黎，要求法国政府恢复柬埔寨君主一切权力，被法国认为是反法的激进分子禁止返回祖国，被迫流亡泰国至去世。

尤瓦那·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同蓬珊莫尼公主之长子。

于贝尔·阿尔戈德——六十年代任法国驻柬埔寨大使。

裕仁（1901—）——日本天皇，称号迪宫。

约伯——《圣经·旧约》中乌斯人，极为富有，并具有忍耐的精神。神为试他，夺去了他的全部财产、女儿，他都能忍受。最后，神把女儿还给他，并给了他加倍的财产。转义指极能忍耐的人。

约翰·齐斯拉——1968年访问柬埔寨的美国代表团成员。

约万卡·铁托——南斯拉夫前总统铁托的夫人。

Z

乍华——西哈努克亲王前妻甘霍的情夫，后来是她的丈夫。

渣耶洁达——柬埔寨前国王。

渣耶瓦尔曼——柬埔寨前国王。

张岗——曾先后担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外交、财政大臣，《民族主义者》周刊社长，后来任驻中国、蒙古、朝鲜大使。朗诺政变后，任伪政权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真木——日本将军，曾任驻柬埔寨日军司令。

郑瓚——曾任柬埔寨王国国务秘书，柬埔寨作家协会主席、国会议员。朗诺政变后，任新闻大臣。

郑兴（1920—）——曾任柬埔寨中央监狱长、农业国务秘书、国

民议会议长。朗诺政变后，任伪国家元首。1975年逃亡美国。

郑——六十年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中尉，曾获印度支那运动会200米赛跑冠军。

周成（1930—）——曾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大臣、国民议会副议长、《民族主义者》周刊总编、《柬埔寨电讯报》社长、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佛教学院院长。朗诺政变后任柬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特别使命大臣。1975年流亡法国。

周索——曾任柬埔寨王国政府国务秘书。朗诺政变后，拒绝出任他们任命的伪内阁贸易大臣。

朱韦纳尔——拉丁姆讽刺诗诗人。他的作品愤怒的有力的反对罗马统治者的罪恶。

俊纳特——柬埔寨佛教僧王。

书中地名一览表

(按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

A

阿尔卑斯山——欧洲南部的最新褶皱山脉，西起法国东南部的尼斯，经瑞士、意大利，东到奥地利的维也纳。

阿尔及利亚——非洲北部国家，全称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首都阿尔及尔。

阿尔萨斯—洛林——法国一个地区，包括今日法国的上、下莱茵和摩泽尔省。自一八七一年起，为法德两国争夺地区，曾两次被德国兼并，一九四五年最后一次归还法国。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同叙利亚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合并成立的国家，后因叙利亚于一九六一年脱离而解体。

阿斯旺——埃及的城市和河港。位于上埃及尼罗河“第一急滩”下的东岸。

埃及——非洲东北部国家，全称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首都开罗。

埃塞俄比亚——非洲东北部国家，全称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埃松——法国地名，塞纳—瓦兹省科尔贝—埃松地区的首府。

爱丽舍宫——法国总统官邸。建于一七一八年，当时叫戴佛罗大厦。一八四八年以前为法国王宫，从一八七三年起成为法国总统的官邸。

爱丽舍田园大街——巴黎市协和广场和凯旋门之间，巴黎人游玩的场所。

安哥拉——非洲南部西海岸国家，现在全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首都罗安达。

安南——原法属印度支那一个国家，位于现在越南中部，面积约十四万七千平方公里，当时的首都是顺化。

安塔松——柬埔寨地名。茶胶省占卡县县城所在地。

澳大利亚——大洋洲英联邦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大陆和塔斯马尼亚岛，全称澳大利亚联邦，首都堪培拉。

奥地利——欧洲中部国家，全称奥地利共和国，首都维也纳。

奥多棉吉——柬埔寨西北省份，省会三隆市。

奥利机场——巴黎国际机场

B

巴东·瓦岱寺——柬埔寨一座佛教寺庙，位于金边王宫附近。

巴哈耶·维埃耶——法国地名。埃松地区一个地方。

巴基斯坦——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国家，全称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首都伊斯兰堡。

巴勒斯坦——亚洲西部地中海与死海、约旦河之间的一个地区。

巴厘岛——印度尼西亚一个岛。西隔巴厘海峡同爪哇岛相望，东部有著名的阿贡火山。

巴黎——法国首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巴黎歌剧院——建于一六六九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歌剧院之一。

巴黎圣母院——法国著名的天主教堂，1163年兴建，1235年完成。

巴林——波斯湾中段国家，全称巴林国，首都麦纳麦。

巴萨河——柬埔寨境内湄公河一条支流，在金边附近从湄公河分出，向南流经越南南方注入中国海，在越南境内称后江。

巴色——老挝南部占巴塞省的省会。

巴图村——柬埔寨地名。属于柴桢省。

白宫——美国总统官邸。建于1792年，1800年以来为历届总统的官邸，后成为美国政府的代称。

白马——柬埔寨海滨避暑胜地。位于贡布省南部，距金边175公里。在古代，白马港为海上交通要道。

百囊奔——柬埔寨首都金边市的柬语音译。“百囊”是山的意思，“奔”是传说中一位妇女的名字。据传，五百多年前，住在洞里萨河岸边的奔夫人，发现河里被漩涡托起来的树叉上有五尊佛像，便求邻人帮助在岸上堆了一座小山包，并在山上修了佛塔，此山被称为“奔山”，后来又成为该地的名称。

拜村——柬埔寨马德望省拉塔纳蒙多县县城所在地，是盛产宝石的地方。

磅略白——柬埔寨波罗勉省南部一个县。

磅罗——柬埔寨柴桢省南部一个县。

磅清扬——柬埔寨西部省份，省会磅清扬市。

磅士卑——柬埔寨西南省份，省会磅士卑市。

磅特兰——柬埔寨磅士卑省一个地方。

磅同——柬埔寨中部省份，省会磅同市。

磅逊——柬埔寨磅逊湾东南岸的城市，曾名西哈努克城。磅逊港是柬埔寨最大的海港和对外贸易的咽喉，有铁路和公路与金边相通。

磅咋叻——柬埔寨贡布省东南部一个县。

磅湛——柬埔寨东部省份，省会磅湛市。

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首都，也是塞尔维亚首府。

贝加尔湖——苏联东西伯利亚南部的淡水湖，湖面海拔456米，面积3.15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730米，最深达1620米，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中国古称北海，曾为中国北方部族主要活动地区。

本地治里——印度东南沿海城市，曾被法国侵占。

比利时——西欧国家，全称比利时王国，首都布鲁塞尔。

扁担山脉——唐勒山脉的意译，位于柬埔寨北部，东西伸延三百余公里，窄而长，形似扁担，因此而得名，高度约为海拔700米左右，是柬埔寨与泰国的天然边界。

波成东机场——柬埔寨最大的国际机场，位于金边市西面八公里，机场跑道长三千多米，可供大型喷气机起落。

波尔多——法国西南部加龙河下游的港口。1810年、1914年和1940年曾为法国政府所在地。

波哥——柬埔寨避暑胜地，位于贡布省西南部，距金边189公里。

波兰——欧洲中部一个国家，全称波兰人民共和国，首都华沙。

涉雷博鲁——柬埔寨贡布省一个乡。

波雷杜——柬埔寨柴桢省罗梅赫县的一个村。

波雷三德——柬埔寨茶胶省德良县县城

波列内波列——柬埔寨马德望省北部一个县。

波罗勉——柬埔寨东部省份，省会波罗勉市。

博蒙——柬埔寨贡布省龙杜县一个乡。

柏威夏——柬埔寨北部省份，省会特崩棉则。

柏威夏寺——柬埔寨古代寺庙，又名隆端古寺，位于柏威夏北部，历史上是柬泰争夺的地方，一九六二年八月，国际法庭裁决柬埔寨对该寺享有主权。

布尔诺——捷克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布拉格），南摩拉维亚州首府。

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首都。

布雷格鲁——柬埔寨贡布省磅咋叻县一个乡。

布雷萨——柬埔寨干丹省金边县一个乡。

布里俄尼岛——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西南部群岛。

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突出于英吉利海峡同比斯开湾之间的半岛。

布斯拉——柬埔寨蒙多基里省奥拉英县的一个村。

布瓦舍里——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在科龙贝双教堂的花园住宅的名称。

C

查尔平原——老挝川圹省镇宁高原上两个山间盆地之一，面积100多平方公里。

茶胶——柬埔寨西南省份，省会是茶胶市。

柴楨——柬埔寨东南省份，省会是柴楨市。

朝鲜——亚洲东部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本书指的是朝鲜北半部，1945年8月获得解放，1948年9月9日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川圹——老挝北部省份，省会川圹。

川龙——柬埔寨桔井省南部一个县。

D

达丹——柬埔寨蒙多基里省奥拉英县的一个乡。

达克茂——柬埔寨干丹省干丹斯栋县一大市镇，干丹省部分机关所在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的全称，位于欧洲西部不列颠群岛上，首都伦敦。

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世界最古老城市之一。

德国——欧洲中部一个国家。本书指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柏林。

德威维尼查——柬埔寨金边王宫里的一殿。

奠边府——越南西北部城镇，1954年5月越南人民军在此大败法

国侵略军，即奠边府大捷。

东京——原法属印度支那的一个国家，位于今日越南北部，面积116万平方公里，首都河内。

东京——日本首都，全称东京都。

洞里萨河——柬埔寨境内的湄公河一个支流，全长155公里，沟通湄公河与洞里萨湖，起调节水位作用；湄公河上涨时，它向北流把水注入洞里萨湖；湄公河水位下降时，它又南流把湖水引入湄公河。

洞里萨湖——又称柬埔寨大湖，位于柬埔寨西部，通过洞里萨河与湄公河沟通，是湄公河的天然蓄水池，枯水期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涨水期达10000平方公里。盛产鱼类。湖周围土肥水足，稻产很盛。

豆蔻山——柬埔寨西部至南部的山脉，延伸几百公里，因盛产豆蔻而得名。法语称豆蔻为“加达莫美”——所以法国统治时期此山脉也有“加达莫美山脉”之称。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主峰奥拉山高1.813米，为全国最高峰。

多瑙河——欧洲第二大河，发源于西德里林山东麓，向东经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苏联八国，在罗马尼亚苏利纳附近注入黑海，全长2850公里。

F

法国——欧洲西部国家，全称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根据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一九四六年，反法西斯德国的法国政党，组成制宪会议起草新宪法草案。同年十月，宪法草案经全民投票批准生效，称第四共和国宪法。一九五八年十月，第四共和国被第五共和国代替。

法兰西联盟——根据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的规定，法兰西联邦由法国本土各省和各海外省（即殖民地）组成。

法兰西印度支那——即法属印度支那，包括今日的越南、柬埔寨

和老挝。

法老的埃及——“法老”本意为“大官”，是古埃及国王的称呼。因当时埃及人不得直言国王之名，故有此称。后来有人称古埃及为法老的埃及。

凡尔赛——法国首都巴黎西南十八公里的一个城市。有著名的凡尔赛宫，原是法国帝王的行宫。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对德和约在此签订。

G

嘎纳——法国阿尔卑斯海滨省格拉斯行政区一市镇。

甘波兹——柬埔寨的法语音译。

甘寨河——柬埔寨一条小河。

高棉——高棉是柬埔寨一个大民族，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因此，柬埔寨人一般都习惯称自己的国家为高棉，并自称为高棉人。

高棉共和国——美国扶植起来的柬埔寨傀儡政权。

戈公——柬埔寨西南省份，省会克马拉普明。

格拉斯——法国阿尔卑斯海滨省一个行政区。

阁昌——泰国暹罗湾中一个港湾。

贡布——柬埔寨西南部省份，省会贡布市。

古巴——拉丁美洲国家，位于加勒比海西北，全称古巴共和国，首都哈瓦那。

圭亚那——拉丁美洲国家，位于南美洲北部，全称圭亚那共和国，首都乔治敦。

H

哈瓦那——古巴首都，西印度群岛最大城市和著名良港。

海防——越南北方第一大海港和重要城市。位于红河三角洲，距

河内约 100 公里。

荷兰——欧洲西部国家，全称荷兰王国，首都阿姆斯特丹。

河内——越南首都。

河仙——越南南方旧省名。

红海——印度洋西北的长形内海，因沿岸水中生长许多红色藻类，使海水呈红色而得名。

厚义——越南南方旧省名。

华盛顿——美国首都，临近大西洋，一七九〇年定为首都，为纪念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而命名。

胡志明小道——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时期，为解放南方的斗争，修筑一条由越南北方经过老挝、柬埔寨到越南南方的运输通道。

J

基贝隆——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一个地方。

基里隆——柬埔寨著名的避暑胜地，位于磅士卑省西部原来是一个特别市。

加尔各答——印度最大城市和主要港，在恒河三角洲胡格利河左岸，近孟加拉湾。

加纳——西非中南部国家，全称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

加拿大——北美洲北部国家，首都渥太华。

嘉林机场——越南首都河内东北部的国际机场。

柬埔寨——东南亚中南半岛南部国家，全称民主柬埔寨，首都金边。

交趾支那——原法属印度支那一个国家，位于今日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首都西贡。

桔井——柬埔寨东部省份，省会桔井市。

捷克斯洛伐克——欧洲中部国家，全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布拉格。

金边市——柬埔寨首都，原音为“百囊奔”，位于洞里萨河和湄公河汇合处，建立于一三七二年，一四三四年曾是柬埔寨王都，一八六七年始成为固定的首都。

旧金山——美国地名。音译圣弗兰西斯科，是美国太平洋岸仅次于洛杉矶的第二大城市。

K

卡蒂纳——越南地名。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西贡市一街名。卡蒂纳（尼古拉）是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的法国将军。

卡拉奇——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在印度河三角洲西缘，临阿拉伯海的港口。

卡诺萨——本书里指的是日本东京。

卡斯蒂利亚——西班牙中部梅塞塔高原区，中央科迪勒拉山脉将高原分为北部旧卡斯蒂利亚高原和南部新卡斯蒂利亚高原。

开罗——埃及首都，非洲第一大城市。

凯道赛——法国外交部所在地，用来指法国外交部。

克拉科夫——波兰南部城市、重要工业和文化中心，克拉科夫省省会。十四到十六世纪末曾为波兰首都。

克里姆林宫——苏联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十八世纪以前是帝俄皇宫。

克罗地亚——南斯拉夫的成员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市。

克马林宫——柬埔寨王宫，位于金边市南部，在四臂湾岸边。

克辛——柬埔寨蒙多基里省的一个地方。

科龙贝教堂——法国地名。

科伦坡——斯里兰卡首都。

科西嘉——法国一个省，是地中海西部一个岛屿，首府阿雅克修。

肯波迪亚——柬埔寨的英语音译。

魁北克——加拿大北部一个省，省会魁北克。

昆仑岛——越南南部湄公河口外南海中的小岛，过去法国殖民者和以后的南越反动统治集团曾在此设有巨大集中营。

L

拉达克——克什米尔一个地方。

拉纳普勒——法国阿尔卑斯海滨省一个小村庄。

腊塔纳基里——柬埔寨东北省份，省会隆发。

蓝色海岸——法国尼斯和土伦间的地中海海岸地带。又译科特达祖尔。

朗勃拉邦——老挝西北部古城，曾作王都一千多年。

老挝——东南亚中南半岛北部国家，现在全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万象。

黎巴嫩——西南亚西部国家，全称黎巴嫩共和国，首都贝鲁特。

里昂——法国西北部塞纳河下游一个港口城市。

利比亚——北非中部国家，全称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首都的黎波里。

列宁格勒——苏联第二大城市（仅次于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列宁格勒州首府。

留尼汪岛——印度洋西部马斯克林群岛中的火山岛，是法国的海外省，首府圣但尼。

龙杜——柬埔寨柴楨省一个县。

卢瓦尔河——法国最长河流，发源于塞文山脉，经中央高原，西流注入大西洋。

鲁塞高——柬埔寨金边市郊区。

伦敦——英国首都。

罗梅赫——柬埔寨柴贞省一个县。

洛韦——柬埔寨波罗勉省西托冈达县一个乡。

M

马达加斯加——印度洋西岸一个非洲岛国，全称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首都塔那那里佛。

马德望——柬埔寨西北省份，省会马德望市。

马来西亚——东南亚国家，全称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

马里尼安——法国罗纳河口省一个机场。

马尼拉——菲律宾首都，又名小吕宋，全国最大港口城市。

马赛——法国第二大城市和最大港口。

曼谷——泰国首都，是世界著名米市。

曼亭赛德——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地方。

毛里塔尼亚——西非西北部国家，全称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首都努瓦克肖特。

湄公河——柬埔寨境内最大的河流。发源于中国唐古拉山脉东北坡，叫澜沧江。东南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称湄公河，注入南海。澜沧江和湄公河全长4,500公里，其中湄公河长2,888公里。柬埔寨境内的湄公河长约500公里。

梅莱山——柬埔寨马德望省西部边境地区的一座小山。

美利坚合众国——英文缩写为(USA)美国的全称，首都华盛顿。

璜广场——柬埔寨地名。位于金边市内。

蒙多基里——柬埔寨东北省份，省会森莫诺隆。

蒙古——本书里指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亚洲中部国家，首都乌兰巴托。

蒙索罗——法国曼恩—卢瓦尔地区一地方。

蒙特利尔——加拿大第一大城市，最大海港和首要的工业、金融、

商业中心。

米尔蒙特——法国地名。

缅甸——东南亚中南半岛西部国家，全称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仰光。

摩洛哥——非洲西北部国家，全称摩洛哥王国，首都拉巴特。

莫诺波里——柬埔寨金边王宫的一个殿。

莫斯科——苏联及俄罗斯联邦的首都，全苏最大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N

南斯拉夫——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国家，全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

尼泊尔——南亚国家，全称尼泊尔王国，首都加德满都。

尼日尔——西非内陆国家，全称尼日尔共和国，首都尼亚美。

纽约——美国第一大城市和最大海港，在东岸哈得逊河口。

努瓦克肖特——毛里塔尼亚首都。

诺戈瓦特——柬埔寨吴哥寺的音译，又称吴哥窟，位于吴哥古城城南，有五座宏伟的宝塔和精美的浮雕，是世界著名宗教建筑。

诺曼底——法国西北部旧省名，北临英吉利海峡。

P

庞恰特雷恩——美国地名。

平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旧名西京。

平阳——越南南方旧省名。

普拉多宫——西班牙总统府。

普农登——柬埔寨茶胶省基里翁县一个村庄。

菩萨——柬埔寨西北省份，省会菩萨。

葡萄牙——欧洲西南部国家，全称葡萄牙共和国，首都里斯本。

普瓦蒂埃——法国维埃纳省首府。

Q

奇奈奥塔——意大利电影城。

R

日本——亚洲东部岛国，全称日本国，首都东京。

日内瓦——国际名城，在瑞士西南部、日内瓦湖西端。

茹安维尔——法国上马恩省一地名

S

撒哈拉沙漠——阿拉伯语意为“大荒漠”，北非干燥区的总称。

萨格勒布——南斯拉夫第二大城市，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

塞内加尔——西非国家，全称塞内加尔共和国，首都达喀尔。

三隆——柬埔寨奥多棉吉省省会。原属暹粒省。

三洛——柬埔寨马德望省西部一个地区。

三圻——法国殖民主统治时期，他们把越南分成三部份，越南人称之为三圻，即北圻东京、中圻安南、南圻交趾支那。

桑怒——老挝北部省份，省会桑怒市。

桑园——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金边的官邸，曾被朗诺占为总统府。

上丁——柬埔寨东北部省份，省会上丁市。

圣保罗德旺斯——法国地名。

水草平原——即越南的同塔梅平原。

水净华——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区一个地名。

斯栋坎洪——柬埔寨马德望省一个地区。

斯雷波克河——柬埔寨上丁省一条河流，是湄公河的支流。

斯雷桑河——柬埔寨上丁省一条河流，是湄公河的支流。

斯里兰卡——亚洲南部印度洋中的岛国，全称斯里兰卡共和国，首都科伦坡。

斯外阿农——柬埔寨波罗勉省磅略白县一个村。

四臂湾——位于柬埔寨首都金边市东面，湄公河、下湄公河（流经南越部分称前江）、洞里萨河和巴萨河（流经越南部分称后江）汇合处，又称四叉河，柬埔寨王宫建于其岸边。

苏联——横跨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的国家，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都莫斯科。

苏伊士运河——在埃及东北部，著名国际通航运河。亚非两洲分界线。一八五九——一八六九年开凿，贯通苏伊士海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总长 173 公里。

索米尔——法国曼恩——卢瓦尔省一市镇。

梳子岛——即现在越南南方西部的富国岛。历史上为柬埔寨沿海岛屿，因形似梳子，柬埔寨人称之为梳子岛，后被法国殖民主义者划给越南。

T

塔山——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南部洞里萨河岸上一座山庙。传说是在一三七三年涨水季节，住在岸边的奔夫人为了安放她在河中捞上来的五尊佛像，加大了其家院的小山丘，并在山上修建一座金边宝塔，柬埔寨人称此山庙为“百囊奔”。几十年之后，柬埔寨国王南迁到此定都。

塔什干——苏联中亚最大城市，乌兹别克的首都。

塔希提岛——太平洋上的岛屿。

塔子山——见塔山。

泰国——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国家，全称泰王国，首都曼谷。

铜柱——即旺多姆圆柱，位于巴黎市中心旺多姆广场上，高四十四米。拿破仑于十九世纪初用缴获的1,200门大炮熔铸而成，故也称“凯旋柱”。

突尼斯——北非中部国家，全称突尼斯共和国，首都突尼斯。

土耳其——西亚西部国家，地跨亚、欧两洲，全称土耳其共和国，首都安卡拉。

W

万隆——印度尼西亚位于爪哇岛西部的名城，为著名的避暑和游览胜地。

万象——老挝首都。又译为永珍。

旺多姆广场巴黎市中心大广场，建于路易十四，广场中心建有高四十四米的铜柱（又称旺多姆圆柱，见铜柱）。

威岛——柬埔寨在暹罗湾中的一个海岛，一九七五年曾一度被越南侵占。

维埃尔——法国伊泽尔省一城市。

维也纳——奥地利首都。

维希——法国阿利埃省一城市。

韦连——柬埔寨贡布省西南部一市镇。

文莱——东南亚加里曼丹岛北部国家，全文莱苏丹国，首府斯里巴加湾市。

乌东——柬埔寨干丹省西北部一市镇，历史上曾为柬埔寨王都。

乌东国君山——柬埔寨国王陵园，位于干丹省西北部的乌东市。

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 原名库伦。

吴哥——柬埔寨的古都和游览、考古胜地。位于洞里萨湖北面，

距暹粒市五公里。公元九世纪至十五世纪曾是国都。

吴哥窟——柬埔寨著名宗教建筑，又称诺哥瓦特，建于十二世纪，有五座宏伟的宝塔和精美的浮雕。

无名烈士墓——法国巴黎市凯旋门下的烈士公墓，建于一九二〇年，收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阵亡的不知名的将士。

X

西班牙——欧洲西南部国家，首都马德里。

西伯利亚——亚洲北部苏联境内一地区，介于乌拉尔山脉和太平洋岸之间，北起北冰洋岸，南抵哈萨克丘陵，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气候寒冷，大陆性显著。

西贡——越南南部重要港口和经济中心。一九七五年四月改名为胡志明市。

西哈努克市——亦称西哈努克城，现在的磅逊市，柬埔寨西南沿海的重要港口。磅逊港是全国最大的海港，可泊万吨海轮。有铁路、公路通金边。

西奈半岛——埃及在亚洲的领土。面积约六万平方公里，居民约五万人，曾一度被以色列侵占。

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

下高棉——包括湄公河三角洲在内的今日南越许多省份，历史上均属于柬埔寨，从十七世纪初开始被越南封建王朝不断侵吞，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又被法国殖民者多次割让给越南，使柬埔寨失去了大片土地。柬埔寨人称这个地区为下柬埔寨或下高棉，把那里的高棉族居民称为下柬人或下高棉人。

下柬埔寨——即下高棉。

暹邦——柬埔寨上丁省塞雷多县县城。

暹粒——柬埔寨北部省份，省会暹粒市。

暹罗——泰国的旧称。

象山山脉——柬埔寨西部的山脉，是豆蔻山脉沿海岸向东南部延伸的一段，海拔一千米以下。

协和广场——法国巴黎市塞纳河畔的广场，建于一七六三年路易十五王朝。

新德里——印度的首都。建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九年。印度独立后成为首都。

新加坡——东南亚马来半岛南端国家，全称新加坡共和国，首都新加坡。

新泽西州——美国东海岸人口密集和经济发达的一州，首府特伦顿。

叙利亚——西南亚西部国家，全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首都大马士革。

Y

雅典——希腊首都，欧洲古代文明发源地，多希腊艺术古迹。

雅加达——印度尼西亚首都，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曾名巴达维亚。

亚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首都。

亚德里亚海——南欧亚平宁半岛和巴尔干半岛之间的内海，是地中海的一部分，沿岸有意大利、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

亚兰——泰国地名。巴真府东部边境城镇，泰国同柬埔寨间的交通要冲。

亚历山大——埃及最大海港，全国和全非第二大城市，曾为古埃托勒密王国首都所在地，因亚历山大大帝时兴建而得名。

仰光——缅甸首都，古称大光。

也门——本书里指的是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位于西南亚阿拉伯半岛南部，首都亚丁。

伊拉克——西南亚国家，全称伊拉克共和国，首都巴格达。

伊朗——西南亚国家，旧称波斯，现全称伊朗王国，首都德黑兰。

伊泽尔——法国一个省，省会格勒诺布尔。

以色列——位于西南亚巴勒斯坦地区，全称“以色列国”，是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制造的产物。

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全称意大利共和国，首都罗马。

银庙——柬埔寨一佛教寺庙，位于金边王宫附近。

印度——南亚次大陆国家，全称印度共和国，首都新德里。

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岛国，全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都雅加达。

印度支那——突出于亚洲大陆南部的一大半岛，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但通常是指原法属印度支那，即现在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英联邦——又译“不列颠联邦”。英国对联邦其他成员国在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和文化上施加影响的组织，现有三十五个成员国。

越南——东南亚中南半岛东部国家，全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河内。

越南北方——原指越南境内北纬十七度临时军事分界线以北地区。

越南共和国——南越傀儡政权。一九五五年，在美国指使下，吴庭艳废黜傀儡皇帝保大，把南越改称越南共和国，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南越解放。

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越南人民举行八月革命，同年九月二日正式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后来专指越南北方。

越南南方——原指越南境内北纬十七度临时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成立的越南

南方临时革命政权。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一九六〇年成立的越南南方抗美民族统一阵线。

Z

乍格雷丁——柬埔寨贡布省贡布县一个乡。

占巴塞——老挝南部省份，省会巴色。

占猜雅殿——柬埔寨金边王宫最前面的殿堂，意为月光殿。

占知——柬埔寨柴桢省一个县。

爪哇岛——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巴厘岛之间的岛屿，是全国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芝加哥——美国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城市，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最大的谷物和牲畜市场。

芝罗尼翁——柬埔寨暹粒省一个县。

朱笃——越南南方旧省名。

朱普——柬埔寨磅湛省南部一地区，有柬埔寨最大的朱普橡胶园。

猪湾——即古巴的吉隆滩。

宗卡——柬埔寨奥多棉吉省一个县。过去属于暹粒省。

书中名词解释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A

阿拉伯人——泛指说闪含语系闪语族阿拉伯语的人。主要分布在西亚和北非，约一亿多人。多信仰伊斯兰教。

阿罗诃——梵文“阿罗汉”的另译。其一、是释迦牟尼的十种称号之一。其二、是“罗汉”的全称，是小乘佛教所理想的最高果位。佛教寺庙常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或五百罗汉的塑像。

阿塔土尔克——土耳其语，是“土耳其之父”的意思。这里是土耳其人对凯末尔的称呼。

安卡——柬埔寨语，是“组织”的意思。柬埔寨共产党宣布公开以前，以“安卡”作为代称。

盎格鲁——撒克逊——古代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朱特等部落集团。经过历史的变迁逐渐形成近代英吉利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一词，近代常被用来泛指英吉利人、苏格兰人以及他们在北美、澳大利亚、南非等地的移民。

B

巴利语——流行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一种书面语言，是小乘佛教使用的经典语言。

《巴黎竞赛画报》——周刊，创刊于1949年，发行量956000份，是法国最大的画报。在政治上亲政府，与戴高乐派关系比较密切。

巴特寮——老挝语，意思是寮国。这里是1950年初建立的老挝人

民武装——寮国战斗部队和同年8月建立起来的以苏发努冯亲王为首的寮国抗战政府的简称。后来则被用来称呼老挝爱国战线。

半人马星座——即人马座，黄道十二星座之一，位于银河最亮部分。

磅湛纺织厂——中国援助柬埔寨兴建的第一个纺织厂，位于磅湛市，1960年正式投产，年产棉纱1,450吨、棉布500万米。

贝杜基中学——四十年代南越西贡市的一座中等学校。

比尔族——柬埔寨少数民族，居住在豆蔻山一带，长期过着游牧生活。

《标准报》——泰国一家画报。

波拉霍——柬埔寨的一种卤鱼，是用淡水里的小鱼（形似沙丁鱼）腌制而成的。因为经过一种特别的发酵方法，其味非常浓郁。

柏拉图式的恋爱——柏拉图哲学是一种唯理论的、空谈的哲学。柏拉图式的恋爱是精神恋爱的意思。

不结盟国家——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多为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1961年9月，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一次会议，形成了一种反帝、反殖和反霸的运动。

《布朗勃上校的沉默》——法国作家安德烈·英洛亚的作品。英洛亚精通英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英、法两国军队联络官，1918年以自己的经历写成了这一部小说。

布列塔尼人——又译布勒通人，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的居民，是公元五、六世纪自大不列颠岛渡海迁来的部分布立吞人的后裔。

《不贞的王后朵凯》——柬埔寨民间故事。

C

川龙造纸厂——中国援助柬埔寨兴建的工厂，位于桔井省川龙镇，

1961年正式投产，年产4823吨纸。

冈茨人——吉卜赛人的别称。原来居住在印度北部的居民，十世纪时开始向外迁移，流浪在西亚、北非、欧洲、美洲等地，多从事占卜、歌舞等职业。

D

达摩育特派——佛教名词。巴利语，意思为小乘佛教法相应派，戒律较严，是小乘佛教的少数派，教徒多为王室和上层人士。

大乘佛教——梵文，公元一世纪时，由佛教大众部的一些支派演变而成。大乘佛教除标榜“自我解脱”外，还标榜“救度一切众生”。按佛教解释，这种教义能“运载”更多的人到达涅槃境界的“彼岸”，故称“大乘”（大车）。主要流传于中国、朝鲜、越南、日本等地。

大东亚共荣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奴役亚洲各国人民，建立殖民大帝国的侵略计划。1940年8月日本近卫内阁正式提出“共存共荣”，后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对外声明中始称“大东亚共荣圈”。被列入这个“共荣圈”的有朝鲜、中国及东南亚、南亚次大陆、大洋洲各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这一阴谋。

大陆饭店——四十年代交趾支那首府西贡市最豪华的饭店。

岱埃胶合板厂——中国援助柬埔寨兴建的工业项目，1960年正式投产，年产胶合板90万立方米。

戴沃达——柬埔寨语，是神仙的意思。

当笃节——柬埔寨的传统节日。“当笃”是柬埔寨语“展览”的意思。当笃节期间，各省市都要把本地的各种土特产品送到金边王宫展出。

《电讯报》——柬埔寨法文日报。

笛卡尔主义者——笛卡尔是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在哲学方面，他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原则，认为在空间中一

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可以怀疑的，而“我”的存在才是绝对不可怀疑的。这种学说，康德称之为“置疑的唯心主义”。

东南亚条约组织——全称是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是美国主使和策划下，美、英、法、澳、新西兰、菲、泰、巴基斯坦1954年9月在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议时，建立起来的侵略性的军事集团。

《斗争周报》——印度报纸。

E

俄罗斯人——苏联人口最多的民族，约13,500万人（1975），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少数散居苏联其他各地。

F

《法兰西晚报》——巴黎主要报纸，1944年创刊，发行量77万份，政治态度明显倾向政府。

法兰西学院——1635年在路易十三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倡议下建立。设院士40人，绝大部分是文学作家，后来陆续选入为院士的也有少数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知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原定任务是编纂字典一部、修辞学一部、诗律一部及语法一部，实际只完成了字典和语法。

法郎区——法国控制下的排他性国际货币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包括法国及其当时的殖民地和战后托管地。区内各成员货币都与法国法郎保持固定比价；区内贸易用法郎结算；区内资金流动不受限制；黄金外汇储备集中在法国保管。

法新社——前身是“哈瓦斯通讯社”，创建于183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哈瓦斯通讯社分裂。1944年8月巴黎解放后，几方面合并，建立起“法新社”。法新社名义上是独立的报业联营企业，实际上是法国官方通讯社。

梵语——古代印度通用的文化语言称为梵语，意思是文雅的语言，和比较接近各地方口语的种种“俗语”相区别。梵语中包括早期的吠陀语和后起的规范化的梵语。

《费城晚报》——美国第四大城市费拉德尔非亚（即费城）的一家报纸。

《费加罗报》——巴黎历史最久的日报。1854年创刊，现发行量40万份。1871年时主张对巴黎公社社员“格杀勿论”，二次大战后，鼓吹对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戴高乐上台后，该报反对戴高乐对美国闹独立的政策。蓬皮杜上台后，态度有所改变，比较支持政府，不时抨击苏美对外政策。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所创立。基本教义有“四谛”、“六道轮回”等。

佛陀——梵文。“佛”的全称。

复活节——基督教纪念所谓“耶稣复活”的节日。该教称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后第三天复活。16世纪西欧改用格列历后，正教因历法不同，复活节的具体日期同天主教、新教常相差一、二个星期。

福隆德运动——即法国投石党运动。1648——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

伏特加酒——俄国产的一种烈性麦酒。

G

盖世太保——德语，法西斯德国1933年成立的国家秘密警察的简称，是法西斯党对本国和被占领国家人民进行残暴统治的血腥工具。

高卢人——古代凯尔特人的一部分，居住在高卢地区，包括今日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及意大利、荷兰、瑞士的一部分。

高棉老族——柬埔寨少数民族，居住在上丁、柏威夏等与老挝相

邻省分的山林地区，与老挝老族同一民族，主要从事农业、牧业、渔业和林业。

高棉民族统一战线——即高棉伊沙拉克。

高棉学生联合会——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柬埔寨全国性学生组织。

高棉新年——每年公历4月13—15日是信仰小乘佛教国家共同的节日——佛历新年，柬埔寨称新年，缅甸叫泼水节，泰国叫宋干节，老挝既叫泼水节也叫宋干节。

高棉伊沙拉克——即高棉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于1946年，为柬埔寨人民反抗法国侵略的政治组织。

《戈公的雷电》——西哈努克亲王自编自导自演的故事片。

格里历——即现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阳历。阳历创始于罗马（公元前46年），后经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命人修订而成目前所用的阳历（公历），所以又称“格里历”。

古兰经——又译“可兰经”，是伊斯兰教经典。“古兰”是阿拉伯语，意思为“诵读”。是该教创立人穆罕默德在610——632年传教过程中作为安拉的“启示”陆续颁布经文，为该教最根本的立法依据。

“国父亲王”——柬埔寨人对西哈努克亲王的称呼。1953年11月柬埔寨宣布独立之后，柬埔寨人尊西哈努克亲王为“国父”，加上“亲王”的尊称，即成“国父亲王”。

国际监督委员会——根据1954年7月21日签订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关于结束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敌对行动并建立国际监督和监察的规定，建立了一个以印度为主席、加拿大和波兰为成员的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对印度支那停战进行监督。

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作为国际联盟的附属机构成立。1946年国联解散后，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国民先驱报》——印度的英文日报。

《国际先驱论坛报》——美国一家报纸。

国民议会——柬埔寨立法会议会的下议院，由选举产生，任期四年，有立法权、内阁人选同意权和倒阁权。柬埔寨第一届国民议会是在1947年12月的选举中产生的。

H

海牙国际法庭——亦称“国际法院”，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1946年2月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在荷兰海牙成立。

旱季——柬埔寨每年的季节有明显的旱、雨两季之分，这是因定期从海洋和内陆吹来的季风而形成的。每年11月至翌年4月，从内陆吹来干燥的东北季风构成旱季；每年5月至10月，从海洋吹来潮湿的西南季风，构成了雨量充沛的雨季。

好莱坞——美国地名，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西北郊区。因具备拍摄电影外景的各种条件，从二十世纪初美国各地的制片商陆续集中到该地，遂逐渐形成美国电影制片业的中心，因此，习惯上把“好莱坞”作为“美国电影业”的同义语。

荷马英雄——古希腊荷马两部著名史诗《伊利昂纪》（又译《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又译《奥德赛》）中的“英雄”人物。

合十——两掌在胸前对合（十：十指），佛教的一种敬礼方式。合十在柬埔寨是一种最普遍的礼节，动作也有很多讲究。

合众国际社——美国第二大通讯社。1958年由前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合并组成。

红色高棉——外界对以原柬埔寨共产党为核心的左派的称呼。

《华盛顿邮报》——1877年由犹太人尤金·迈耶创办，在华盛顿出版，是较有影响的美国三大报纸之一。

《黄昏》——西哈努克亲王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

J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以及一些较小的派别。公元一至二世纪形成于罗马帝国，主要盛行于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国。

极乐世界——佛教名词。“极乐”为梵文，又译“安乐国”、“安养国”。《阿弥陀经》描绘说，这个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

袈裟——佛教僧人的法衣。在柬埔寨等信奉小乘佛教的国家里，僧人所披的袈裟为黄色的。

柬埔寨共产党——成立于1960年9月30日，当时称高棉劳动党，1971年9月三大时改称柬埔寨共产党。曾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并于1975年4月解放全国。越南侵柬后，继续坚持抗越斗争。1981年12月6日，柬共宣布解散，号召原柬共党员继续抗越。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成立于1970年3月23日，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为抗击美国侵略、推翻朗诺卖国政权的统战组织，西哈努克亲王任阵线主席，宾努亲王任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越南1979年1月7日占领金边以后，8日拼凑了以韩桑林为主席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傀儡政权，10日宣布把柬国名改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柬埔寨现实》周刊——五、六十年代柬埔寨法文刊物，半官方性质，常刊登西哈努克亲王的言论。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柬埔寨合法政府，1970年5月5日成立于北京，西哈努克亲王任国家元首、宾努亲王任首相，乔森潘任副首相兼国防大臣。

《柬埔寨》杂志——西哈努克亲王主办的柬埔寨人民社会同盟机关刊物，1965年4月15日创刊，分英法两种版本。

羯磨——佛教语言，梵文的音译，意为“作业”或“协商办”。事原

指一般人的内心活动和身体动作。佛教密宗将佛菩萨的“现身”、“说法”、“入三昧”等通称为羯磨；律宗以“受戒”、“忏悔”等为羯磨。

解脱——佛教名词，梵文。佛教徒声称修道到了最后阶段，即可脱离烦恼等事束缚，“自在无碍”，名为“解脱”。但有时也被用作“涅槃”的同义词。

进步党——柬埔寨四十年代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蒙达那亲王为该党主要领导人。

K

开呐——老挝一种竹制的吹奏民族乐器。

科尔马圣马丁教堂——法国最漂亮的宗教建筑之一。

科教文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简称，成立于1946年11月4日，同年12月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总部设在巴黎。

《克诺克医生》——法国作家朱尔·罗曼的讽刺喜剧，全称《克诺克医生或医学的胜利》，讽刺矛头指向江湖郎中和一切以虚假手段骗人的人。

肯波迪亚——英语，即“柬埔寨”。

《快乐的森林》——西哈努克亲王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

昆仑岛威化院——法国殖民者和后来的南越反动统治集团在昆仑岛（南越湄公河口外南海中的小岛）设立的巨大集中营。

廓尔喀——西方国家对尼泊尔人的笼统的称呼。廓尔喀原是尼泊尔的一个地名，是尼泊尔沙阿王朝的发源地。

库依族——柬埔寨少数民族，居住在东北高原地区，多数过着游牧生活。

L

拉丁语——古罗马帝国的国语，中世纪西欧各国的国际语，因古代说这种语言的拉丁人部落集团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台伯河下游的拉丁姆平原而得名。后来在拉丁语基础上产生了现今的罗马语系，即现在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

《拉鲁斯》——法国词典，有《大拉鲁斯》和《小拉鲁斯》之分。最初，由法国语法学家，词典编纂者皮埃尔·拉鲁斯(1817——1875)编纂，因此而得名。

兰斯大教堂——法国最漂亮的宗教建筑之一。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945年10月16日成立。1946年12月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

轮回——佛教名词。梵文，原意是“流转”。佛教沿袭婆罗门教的说法而加以发扬，宣扬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不去求“解脱”，则永远在所谓“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中生死相续，有如车轮的旋转不停，故称“轮回”。

M

马德望第二纺织厂——中国援助柬埔寨兴建的第二个纺织厂，位于马德望市。

马斯佩罗出版社——法国巴黎一家出版社。

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统治集团的主要间谍机关，直属国家安全委员会。1947年7月成立，总局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雷，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每日电讯报》——创刊于1855年，由电讯报业公司出版，是英国四家全国性“高级”日报中销量最大的一家。

民主党(柬埔寨)——1946年4月成立，原是柬埔寨党员最多、

势力最大的政党，党的中下层党员大都具有民族主义倾向，曾同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1947、1951年曾两次在大选中获胜，组织过一党政府。后来日趋分化，首脑人物或亲美或向法殖民主义者自首，中下层或倒向山玉成(后来成为“自由高棉”)或投向山玉明领导的伊沙拉克。

民众娱乐场——金边市一个规模较大的游乐场，设有影剧场、赌场和其他娱乐场。

民族主义——主张一个民族应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自己的事情，独立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外来的暴力干涉和强制。

《民族主义者》周刊——柬文刊物，柬埔寨人民社会同盟机关刊物，西哈努克亲王担任政治指导。

摩尔贵族——又译“摩洛哥人”。1、指北非摩洛哥、毛里塔尼亚、马里(北部)等地的柏柏尔人后裔。2、泛指公元八——十三世纪从北非西部进入并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3、近代欧洲人对非洲西北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兰教徒的泛称。4、八世纪迁至斯里兰卡东海岸的阿拉伯商人的后裔，说泰米尔语。5、菲律宾南部的伊斯兰教徒，也称摩洛哥人。

摩诃尼迦耶派——佛教名词。巴利语，意为小乘佛教大部派，戒律较松，受到柬埔寨广大佛教徒，特别是广大农村的佛教徒的信奉。

魔罗——梵文。意为“扰乱”、“破坏”、“障碍”等。佛教认为能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而故名。印度古代神话传说欲界第六天主波旬为魔界之主，常率魔众作破坏善事的活动。佛教采用其说，以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为魔。

N

纳粹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政党“纳粹党”的反动主张，宣传大日耳曼主义和反犹太人运动，鼓吹战争政策和公开侵略。

南旺舞——流行于柬埔寨、老挝和泰国的民间集体舞。“南”是柬、老、泰语“跳舞”的意思，“旺”是“圆圈”，合起来的“南旺”意为“绕着圆圈跳舞”。

涅槃——佛教用语；梵文，意指幻想的超脱生死的境界，也用做“死”（指佛）的代称。

《纽约时报》——1851年创刊，由“纽约时报公司”在纽约市出版，是美国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P

潘查希拉——梵文，意为五项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互相尊重领土主权；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

波罗门——梵文，意为“净行”或“承习”。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居于四瓦尔纳（种姓）的首位。世代以祭祀、诵经（吠陀）、传教（婆罗门教）为专业。

婆罗门教——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相传约于公元前七世纪形成，以崇拜婆罗贺摩（梵天）而得名。

普农族——柬埔寨少数民族，是柬埔寨古老土著民族。多居住在东北部山区，过着游牧生活。

Q

《前卫》——周刊。是美国四十年代后期一批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原名“国民前卫”。

R

人民派——前高棉抗战人员的政治组织，成立于1955年7月，在政治上拥护西哈努克亲王的和平中立政策。

人民社会同盟——西哈努克亲王“逊位”后创建的政治组织，成立于1955年3月。从1955年9月开始，人民社会同盟在历次竞选中一直获胜。

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

《日内瓦日报》——1826年创刊，在日内瓦出版。该报反映瑞士自由党观点。

瑞尔——又译“里尔”。柬埔寨货币单位。柬埔寨独立后，于1955年1月1日成立国家银行，独立发行本国货币——瑞尔。

S

萨克瓦——柬埔寨民间古乐的一种曲牌。

“三、一八”政变——美国为挽救其侵越战争的败局，扩大侵略印度支那而策划的反动政变。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叛国集团在美国策动下，发动反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政权，成立“高棉共和国”。

桑格里亚兹——柬埔寨意语，为佛教僧王。

僧伽罗仙境——僧伽罗人是斯里兰卡的基本居民，约公元前五世纪建立过维阇耶王朝，中国古籍中称这个国家为“僧伽罗”。

桑雷族——柬埔寨少数民族，人口较少，多在东北山村地区过游牧生活。

僧王——柬埔寨佛教分大部派和法相应派，两派各有自己的领袖，称为僧王，由国王在两派有威望的“高级僧侣”中挑选任命。

沙玛给——柬埔寨语，意为团结。

沙士鲁·罗巴中学——过去法国人在南越西贡开办的一所完全中学，以法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沙士鲁——罗巴的名字命名。西哈努克亲王及其父都曾在这里读过书。

沙文主义——即“大国主义”，一般也称“大国沙文主义”。十八世纪末产生于法国。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地拥护拿破仑一世进行扩张主义而得名。

山姆大叔——美国的绰号。其来源传说不一，最普通的一种说法是：1812年英美战争时，美国军事供应品的箱子上都印有USA（英语“美国”的缩写）的字样。当时美国特罗城有一个专门检查政府军事订货的官员，名字叫山姆尔·威尔逊，他的亲友平日都叫他“山姆大叔”。由于“山姆”和“大叔”两个英文字的第一字母也是U和S，因此特罗城的人便开玩笑说这些军用品箱子都是山姆大叔的。后来流传开了，那“山姆大叔”就成了美国的绰号。

舍利塔——巴利语，意为“骨灰塔”。佛教传说释迦牟尼火葬后，有八国国王分取骨灰，建塔供奉。柬埔寨人死后一般都要火葬，为了安放死者的骨灰，子孙们都要花一笔钱在寺庙里建造舍利塔。

《生活》杂志——美国出版的以照片为主的一种画刊，创办于1936年。

圣·梅克桑军校——法国德赛夫勒省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圣西尔军校——法国塞纳—瓦兹省一所军事专门学校，创办于1808年。

《十字架报》——法国一种日报，创刊于1883年。

《世界报》——法国一种报纸，创刊于1944年，是法国在国外发行量最大的日报。

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成立，同年9月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总部设在日内瓦。

斯栋棉吉玻璃器皿厂——中国援助柬埔寨兴建的工厂，位于金边市郊区斯栋棉吉。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法国最漂亮的宗教建筑之一。

送水节——柬埔寨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一般在每年11月初举

行，以金边市为最热闹，由国王、王后亲临主持，白天赛龙船，晚上举行拜月仪式，然后观看放河灯。

索米尔军事学校——法国曼恩——卢瓦尔省一所军官学校，原为一所骑兵学校。

T

《泰晤士报》——创刊于1785年，原名《世鉴日报》1788年改为现名。

特哀寨尔——柬埔寨语，意为“斋日”，每月有四个斋日。柬埔寨善男信女每到预定的斋日，都穿着整齐的衣服带着各种东西到寺庙去斋僧，并听僧人布道。

特洛伊木马——在古希腊一个神话故事中，希腊国王的爱妃海伦被朴利耶姆王次子帕黎斯诱往特洛伊城。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历时十年不能攻下。奥德修斯献计造了一个大木马，马肚子藏有精兵，把马放在特洛伊城外，然后佯装败退。特洛伊人把木马当作战利品拖进城内。半夜，希腊勇士们从木马里爬出，打开城门放希腊军入城，攻下了特洛伊城。后来，特洛伊木马常被用来比喻内部的颠覆者。

天蝎宫——星座。黄道十二宫第八宫，原居天蝎座，故名，现已移到人马座。

万隆会议——即“亚非会议”。1955年4月18日到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是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

王国议会——柬埔寨立法议会的上议院，其权限主要是审查国民议会初步通过的法案及回答王国政府向它提出的一切问题，并提供意见，但国民议会通过的法案，如被王国议会否决或修改，只要国民议会仍以绝对多数维持原议，即可成立。王国议会由24名议员组成。

王家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柬埔寨青年的群众性组织，成立于1957年9月，实际上是人民社会同盟的助手。据称盟员约50万。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分别任该盟主席和副主席。

王室家庭会议——同最高皇廷会议一样是柬埔寨国王的最高咨询机构。由王族中有影响的成员组成，其主席是最高皇廷会议的当然主席。

王位最高委员会——柬埔寨王国国家政权组织之一。1960年6月，西哈努克亲王担任国家元首以后，根据新修订的宪法规定，王位最高委员会（取代原最高皇廷会议）是国家元首的最高咨询机构。西索瓦·莫尼勒亲王任该委员会主席。

维希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西斯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1940年6月，德国占领巴黎后，以贝当为首的卖国分子向德国投降，7月1日将政府迁至法国的中南部的维希，故称。

维也纳圆舞曲——“圆舞曲”又译“华尔兹”，舞曲的一种，每节三拍子。这里所说的维也纳圆舞曲是指以十九世纪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父子闻名于世的作品为代表。

维萨——巴利语的译音，是佛历五月月圆的那一天，柬埔寨佛教徒把这一天作为最重要的斋日。

《我的奋斗》——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著作，1925年出版，宣扬极端反动的沙文主义、复仇主义、种族主义思想。

沃萨——巴利语，从广义讲，是雨季的意思。在柬埔寨，每年大的农忙季节就在雨季里，为了不影响农民的农活，僧侣们约有三个月的时间闭住庙门从事佛事活动，他们把这一段时间也叫沃萨。

《吴哥的阴影》——西哈努克亲王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

吴哥时代——从公元802年渣耶瓦尔曼二世统一柬埔寨全国并定都于吴哥起，直到公元1432年奔尼亚雅特迁都金边为止，是柬埔寨的鼎盛时期。

吴哥王朝——即吴哥时代，前后经历了660多年，更换了32个国王，因为王都设在吴哥而得名。

X

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希腊语族，希腊人的语言。

西索瓦中学——柬埔寨第一所完全中学，位于金边市区，用柬埔寨前国王西索瓦的名字来命名。

《希望》——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回忆录。

《仙女》——西哈努克亲王编导的影片。

《小拉鲁斯》——意为“法语小辞典”。《拉鲁斯》有大、小之分，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由法国著名的语法学家和字典编纂者皮埃尔·拉鲁斯首创，因此而得名。

《小罗贝尔词典》——法语词典。

小圣西尔军校——柬埔寨金边军官学校的别称。因为该校照法国圣西尔军校的办法办学，因而得了这个比喻的名字。

《小王子》——西哈努克亲王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

Y

雅利安人——欧洲十九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人民的不科学的总称。自印度和波斯古文献的比较研究中推知，远古在中亚地区曾有一个自称“雅利阿”的部落集团，主要从事畜牧，擅长骑射，有父系氏族组织，崇拜多神。公元前二千至一千年间，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游，后来一支向西南进入波斯，另一支迁入小亚细亚。自十八世纪欧洲语言学界发现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等有共同点以后，即根据“雅利阿”这个名词造出“雅利安语”一词来概括这些相互有关的语言（现通称印欧语系语言），有些人就由此错误地假定：一切用这些语言的古代或近代民族必然渊源于同一祖先，

并虚拟定为“雅利安人”。

亚里斯多德学说——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是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将科学分为（1）理论的科学；（2）实践的科学；（3）创造的科学。

《鸭鸣》——原巴黎一家报纸。

耶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圣经》宣称：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拯救人类，降世为人，是“救世主”。后来被犹太教当局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复活升天。

《野水牛》——柬埔寨莫尼勒亲王在四十年代办的报纸。

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第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一种神教。在中国也称“回教”、“清真教”等。

伊沙拉克——这里指的是高棉伊沙拉克，即高棉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于1946年，为柬埔寨人民抗法的政治组织。

犹太教——犹太人的宗教。奉雅赫维（后被基督教人误读作耶和华）为“独一无二真神”，并称犹太人是雅赫维的“特选子民”，教义教规是雅赫维通过摩西等传授下来的。

犹太人——古称“希伯来人”，公元前十三世纪曾在巴勒斯坦居住，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以色列王国。公元一、二世纪，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绝大部分被赶出住地。后来，犹太资产阶级掀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煽动世界各地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成立“以色列国”。

雨季——柬埔寨的季节明显地分为雨、旱两季，每年5月至10月，从海洋吹来潮湿的西南季风，构成雨量充沛的雨季。

浴佛节——佛教节日。中国汉族地区，相传夏历四月初八为释迦牟尼生日。佛寺常于此日诵经，并用香水灌洗佛像，选取神话中“龙王以香水灌洗太子”的故事，以纪念佛的诞生，故称。柬埔寨的俗佛节则在

阳历四月中，往往与佛历新年结合起来。

《远东经济评论》——香港出版的英文刊物。

越共——越南共产党的简称。

越盟——胡志明发起建立的“越南独立同盟”的简称，1941年成立，提出“抗法驱日”、“争取完全独立”口号，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越南共产党——1930年2月3日成立。同年10月改称印度支那共产党。创建人胡志明。1951年印支共二大决定越、老、柬分别建党，把在越南的党组织改称越南劳动党。1976年12月党的四大改用现名。

越南南方临时共和革命政府——1969年6月至1976年6月。越南南方成立的临时革命政权，阮友寿任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黄晋发任政府主席。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0年12月20日成立，是越南南方人民“民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参加该阵线的有越南人民革命党等二十几个政党、群众组织和教派组织。

Z

扎克雷起义——1358年法国北部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得名于“呆扎克”（意即“乡下佬”。）是当时法国封建主对农民的蔑称。百年战争期间，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封建压迫日益加重，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在吉约姆·卡尔领导下，农民揭竿而起，提出了“消灭所有贵族，一个也不留”的口号。起义席卷法国北部，沉重地打击了大封建主的统治，并与当时爆发的巴黎市民起义相呼应。由于缺乏明确的斗争纲领和坚强的组织，被法、英封建主镇压。

乍格雷丁水泥厂——中国援助柬埔寨兴建的工厂，位于贡布省乍格雷丁，1964年正式投产。

占族——柬埔寨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约有10万人，信伊斯兰教。他们是古代占婆国的遗民。公元二世纪，占族在今日越南中部地

区建立占婆国。曾一度强盛，人口达200万以上，十七世纪被越南灭亡。

爪哇苏丹——这里所说的苏丹系阿拉伯语，是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震旦报——法国一种日报，1942年创刊。

猪湾事件——又称吉隆滩事件。1961年4月17日，美国雇佣军在古巴吉隆滩登陆，实行武装入侵，遭到失败。

自由党——柬埔寨一个政党，是法国殖民者为了对抗民主党而扶植起来的政治组织。党员成份多数是王族和大商人。

自由高棉——1956年底至1959年，美国在柬埔寨国内培植亲美势力，多次策划颠覆活动。其间，他们收买山玉成组织叛国武装力量——“自由高棉”。1970年朗诺政变时，也靠这支反动武装。

卒塔婆——佛教建筑物，即佛塔。塔按梵文或巴利文亦称“窣堵波”或“塔婆”。是古代印度埋葬佛骨的半球型坟墓。